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近代战争史 (3)

 **eBOOK**
内参资料 非卖品

中国近代战争史

第十四章 辛亥革命战争 (1911年10月—1912年4月)

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和发动了一场以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战争。这是一次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又一个新高潮,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在这次革命战争过程中,交织着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本章对这方面的内容仅作概要的介绍,而着重叙述武昌起义,汉口、汉阳保卫战,攻取南京城等作战行动,并针对这次起义战争的特点,探讨其在指导方面的得失。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的国内形势

一、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阴谋，由于受到中国爱国军民的打击和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影响而未能实现，便转而采取扶植清廷，“以华治华”的策略。为了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和对中国的掠夺，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要害部门派遣了顾问，以左右清廷的重大决策；在京津、京榆沿线驻扎军队，以武力挟制清廷；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以扩大在中国开辟商埠、增加投资、修筑铁路、开发矿藏、内河航运等特权。至1911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设的通商口岸达八十二处之多，在十六个城市内设有租界，霸占了十几个省的矿产开发权，取得了粤汉、正太、津浦、陇海等十多条铁路的修筑权。帝国主义还通过增设银行，扩大资本输出，垄断中国的财政金融。它们在掠夺中国时，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1904年2月，在中国东北境内爆发的日俄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清政府完全放弃了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职责，竟无耻地宣布“局外中立”，听任人民遭受屠戮和凌辱。俄国战败后，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英国乘机再次入侵西藏，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约，攫取了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日俄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经过肮脏的交易，暂时缓和了紧张关系，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清政府听任帝国主义驱使，实际上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神州大地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正处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

随着清政府卖国残民的面目更加暴露，人民的反抗情绪也不断增长。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政府挂出了一块实行“新政”的招牌。自1901年1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那拉氏发布“变法”上谕以后，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如裁汰制兵练勇、编练新军，裁撤冗衙、节省浮费，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等等。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最重视的是练兵。1903年，在北京设练兵处，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1904年9月，练兵处和兵部会同奏定《新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和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确定陆军以镇为经常编制。镇设统制，每镇辖步兵两协。协设统领，每协辖两标。标设统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大官僚地主家庭出身。1895年12月被推荐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袁即怀着建立私人军队的野心，结党营私。清政府推行“新政”时，袁抓住“练兵筹饷”这项要政，进一步培植私人势力。1901年11月，李鸿章病死，清廷任命袁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6月实授）。袁到任后，积极筹饷练兵，建立北洋常备军。至1905年，先后编成以“小站旧人”为骨干的北洋新军六镇，共计七八万人。袁世凯以此为资本，左右朝政，并成为与革命为敌的北洋军阀集团的头子。

带，每标辖三营。营设管带，每营辖前后左右四队。队设队官，每队三排，每排三棚，每棚目兵十四名。每镇有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合计一镇将弁兵夫共一万二千人。遇有征调，则以二至三镇为一军，由朝廷钦派总统节制。全国计划编练常备军三十六镇，除近畿四镇、四川三镇外，其余各省编练一至二镇，限二至五年内编成。新军的编练工作，大多数省份没有按期编成。直至 1911 年清王朝灭亡时，全国建制完备的新军只有十四镇，其余只有一协或不满一协，总人数约二十六万人。在编练新军的同时，还把部分绿营练勇等改编为巡防营，以加强镇压力量。清政府推行“新政”，虽然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一些促进作用，但却同时又给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提供了方便条件。为了编练新军，需要大批饷款，而当时的清廷已“帑藏大绌”，于是巧立名目，加捐加税，摊派勒索，无奇不有。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在此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把武装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反清武装斗争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由于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摧残，所以发展非常缓慢。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1911 年，投资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已有五百多个。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独立的阶级，并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先进者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忧患倍增，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向西方学习；发行各种书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组织各种革命小团体，积极开展爱国革命活动，其中较著名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由于经济地位不同，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亲疏关系不同，因而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的政治态度也不相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他们虽然也介绍过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参加过爱国宣传活动，但是不愿与清王朝决裂，只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以取得参政的权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主张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发展资本主义开拓道路。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童年时，对洪秀全的反清壮举怀有敬慕之情。青年时代，对清王朝的腐朽暴虐深为憎恨，但也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1894 年 2 月，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主张，结果遭到拒绝。从此，他便毅然摆脱改良主义的羁绊，率先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1894 年，他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

华兴会于 1904 年 2 月在湖南长沙成立，主要负责人有黄兴、刘揆一、陈天华、宋教仁等，黄兴任会长。

1895年与1900年，在广州和惠州（今惠阳）三洲田组织了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反清揭开了序幕。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奔走国外，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促成了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一致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负责本部日常工作）。会议还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不久又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政治纲领，并决定暂设总部于东京，在国内外分设支部，支部之下设立各省区分会。同盟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同盟会成立后，一面同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坚持只有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中国才有前途；一面积极在国内外发展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在同盟会的领导和影响下，从1906年起，各地革命党人组织的武装起义，先后达十多次，大致可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以运动会党为主的武装起义。如1906年12月湘、赣边界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5月的广东潮州黄冈（属饶平县）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属归善县）起义，9月的钦州防城起义，12月的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广东钦州上思起义，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此外，还有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秋瑾发动的皖浙起义。革命党人之所以依靠会党，是因为会党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容易一呼而集，其成员大多处在社会最底层，富有反抗精神，且与农民群众有较多的联系，在反清起义中常常可以起冲击作用。但会党的成分复杂，纪律松弛，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没有充足的饷械，更少训练。孙中山等虽然提出了“整理和指导”会党的主张，但一般都是在未经认真教育改造的情况下，便仓促起义，以致“发难易，成功难”，不能坚持长期的斗争。上述这些起义，大多在粤、桂、滇边陲地区。这与孙中山先夺取南方数省，然后挥师北进的指导思想有关；同时，这些地区便于从国外购运军火，获得财力、人力的援助。从单纯依靠会党和依赖外援这两个侧面，反映出孙中山等人对武装起义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广泛而又深入地发动工农群众的必要性，还缺乏认识。

另一种是以运动新军为主的武装起义。当时，运动新军具有一定的便利条件。一是新军士兵多数来自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容易激发其革命情绪。二是新军选募的士兵，一般需要粗通文墨；其薪饷也高于旧式军队。当时正处于废除科举前后，许多贫寒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出路，便“投笔从戎”，“秀才当兵”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而这些知识青年，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三是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数从武备学堂的学生中选拔任用，另一部分则从日

[†] 1904年冬在上海成立，主要负责人有蔡元培、龚宝铨、陶成章等，蔡元培为会长。

[‡] 所于1904年6月在湖北武昌成立，主要负责人有胡瑛、吕大森、张难先等。

本等国的军事学校留学归国的学生中选拔。这样，就有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新军，其中有些人是同盟会员，他们利用合法身分，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经过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开始出现了以新军为主的起义高潮。如 1908 年 11 月由熊成基等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1910 年 2 月由倪映典等率领三千新军进攻广州城的起义，1911 年 4 月 27 日爆发的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这些起义，或因势寡力单，或因布置不周，或因缺乏统一指挥，且与当地群众均无联系，因而也都失败了。但愈来愈频繁的武装起义，引起了清廷极大震惊，于是三令五申，严饬各省督抚加强对新军的防范。而在革命党人方面，则不断吸取了经验教训，激励了革命斗志。

新军工作做得最有成效的是武汉革命党人。当时在武汉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是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革命小团体演变而成，成立于 1911 年初，由蒋翊武任社长。该社成立不久，组织迅速发展，约有社员三千人。共进会是一部分原籍长江中上游的同盟会员，因不满意总部只注意在华南边境发动起义，于 1907 年秋在日本东京成立的。1908 年 10 月，孙武、焦达峰等奉命回国，在汉口设立机关，秘密发展组织，到 1910 年冬，会员已发展到二千余人。

在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以前，湖北的许多革命党人就以运动新军为工作重点。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参加行伍不可”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廛午，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县人。十五岁考入长沙岳麓书院，后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1902 年被选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他在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界的抗俄、排满革命活动，并在课余悉心学习军略，参观兵操，练习骑马射击。1903 年回长沙任教。1904 年组织华兴会，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准备在长沙举行起义，因事泄失败。起义失败后，再次东渡日本。次年，结识了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时，被推为庶务，成为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同盟会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黄兴都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是一次由同盟会策动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举行的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1906 年，同盟会总部派会员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湖南运动军队，联络会党，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刘在长沙主持全局，蔡往萍乡策动哥老会首领龚春台，联络各地山堂，成立“洪江会”。拟于 1906 年旧历腊月底分三路起义。后因事泄，清军突袭浏阳麻石起义机关。12 月初，龚春台在江西萍乡高家台率众起义。萍乡、醴陵、浏阳等地农民、煤矿工人及部分军队纷起响应，推举龚春台为都督。旬日之内，起义武装发展至三万余人，屡败清军，声势浩大。清政府调集湘、鄂、赣及南京军队数万人进行镇压。起义武装因各自为战，至月中失败。刘道一、蔡绍南等被捕牺牲。

起义前，黄兴等计划以新军为主干，以革命党人组成的“先锋队”为中坚力量，并发动广州附近的农民配合，分兵十路进攻广州。后因内奸告密，广州全城加强了戒备。在实力尚未集中又不得不发的情况下，黄兴等率“先锋队”百余人单独行动。结果起义失败。这次起义殉难的七十二人葬于黄花岗，故称黄花岗起义。

，因而纷纷投笔从戎，在敌人营垒中开展革命活动。他们注意积蓄革命力量，不轻率发难，反对“暗杀主义”，长期深入士兵之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后，这方面的工作更有成效，并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在宣传教育方面，首先从“灌输知识”着手，在新军中秘密散发革命书刊，启发官兵的爱国思想。他们还注意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工作，如邀入参加演讲会，宣传民族危机，抨击时政；或在个别交谈中“迎机启示”；或借“讲有关故事以激励之”；或编唱歌曲、吟诗联句以传播革命道理。他们还利用报纸揭露清廷的各种黑幕和新军中的贪污舞弊行为，以激发官兵的反抗情绪。

在组织工作方面，开始时曾“专以发展军官为主”，后发现军官“人数过少，一旦发生变故，又以地位关系，不能坚持到底”，遂改为“专从士兵着手”。在吸收会员方面，注意严格手续，保证组织纯洁。文学社简章中规定：“凡愿为本社社员者，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本社派员调查，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为本社社员”。[〔]为了便于领导，根据新军的建制，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各标、营、队设代表一人，平时由标代表参加会议，研究情况，部署工作；各营、队代表分别按上级代表的部署进行活动，起义时即可成为临时指挥员。为了免遭敌人破坏，均按秘密工作原则，实行单线领导，“只有直的关系，并无横的联系”。湖北革命党人运用“借矛夺盾”的手段，长期进行争取新军的工作，使驻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1911年秋，在一万七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一，并有许多革命的同情者。另外，在武汉周围各县，革命党人还联络了一批会党、农民、士兵和学生。

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急剧激化，革命时机趋于成熟

与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策动新军组织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的抗租、抗粮、抗捐、抗税、抢米、反洋教等自发斗争，也呈现急剧高涨的形势。据统计，1909年自发的群众反抗斗争为一百三十多次，1910年猛增到

蒋翊武（1885—1913），湖南醴县人。1905年在上海创办《竞业旬报》，鼓吹民族主义。1909年投身湖北新军，次年参加振武学社。1911年，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蒋任社长。

孙武（1879—1939），湖北汉口人。1897年入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湖南新军教练员、管带等职。1904年加入科学补习所，后赴日本学习海军。1907年在日本参与组织共进会。1909年在武汉建立湖北共进会。

〔1886—1911），湖南浏阳人。1904年加入哥老会，倾向革命。1906年赴日本学习军事，加入同盟会。次年与孙武等在东京成立共进会。1909年回国，建立湖北共进会，在两湖地区开展革命活动。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下同），第55页。

二百九十多次。参加斗争行列的有各民族和各阶层的人民，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有些斗争还把反清和反帝结合起来。蓬勃发展的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预示着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为了阻遏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清王朝于1906年又抛出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结果，不仅遭到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而且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裂。1908年，光绪帝和那拉氏相继死去，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改年号为宣统，由其父载沣摄政。载沣积极推行集权于皇族的政策，首先将掌握军权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罢黜回籍。接着，载沣自任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并任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管理军谘处事务大臣，兄弟三人总揽了军政大权。同时，对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作了种种限制。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任命奕劻为总理大臣，成立了所谓“皇族内阁”。结果引起汉族官僚的普遍不满，清朝亲贵集团的处境更加孤立。至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骗局，已被彻底戳穿。资产阶级立宪派多次请愿，要求参政的希望成了泡影，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多数对清政府产生了离心倾向，少数开始同情或参加革命。特别是“皇族内阁”成立后，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11年5月悍然宣布所谓“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行接收广东、四川、湖北、湖南四省商办铁路公司，将人民多年争得的路权重新拍卖给帝国主义。这一卖国行径，更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尤以四川最为激烈。四川同盟会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人数不下二十万。随之全省沸腾，各地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攻州占县，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起义。吴玉章、王天杰还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揭开了辛亥革命战争的序幕。为了扑灭四川的革命火焰，清廷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各省革命党人在四川保路斗争的鼓舞下，积极准备起义。湖北革命党人乘时而发，首义武昌，一个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风暴终于来临了。

第二节 武昌首义成功，全国掀起革命高潮 (1911年10月—12月)

一、清军在武汉的部署和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

清政府鉴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该地的设防一向十分重视。189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仿效西法，编练了两镇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湖北新军。1906年，按全国陆军编制序列，第一镇改称陆军第八镇，张彪任统制；第二镇改称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任统领。两部共有官弁兵夫一万七千二百五十九人（第八镇一万二千零七十一人，第二十一混成协五千一百八十八人）。此外，在武汉及湖北各地还驻有相当数量的巡防营、水师营等旧军。巡防营由张彪兼管；水师营统领为陈得龙，归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管辖。武昌起义前夕，新军在武汉的部署情况是：约有三千人分驻武昌城内，四千人驻武昌城外南湖、塘角等地；约有千余人驻汉口；约有五百余人驻汉阳。另有武装警察二千人 and 巡防营、督署卫队等旧军，驻武昌城内。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在武汉驻扎重兵，目的是为了镇压革命。而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新军已被革命党人所控制，瑞澂等文武大员已经坐在火药桶上而不自知。

为了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湖北各地的反清群众，1911年9月上旬，瑞澂等奉命将第八镇第三十一标及第三十二标两个营调赴四川（少数人留守武昌），另将第四十一标和第二十九标的几个营、队分别调往宜昌、襄阳、郧阳和湖南岳阳等地。新军的调动，固然分散了一部分革命力量，但也使湖北反动统治的腹心地区兵力空虚，有利于发动起义。同年9月14日，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消除门户之见，联合武装反清。两个革命组织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军事方面，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政治方面，由刘公任总理，设军务、参议、内务、外交、理财等部，负责制造炸弹，起草文告、印信，赶制旗帜、符号等工作。同时，派人往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等来汉主持起义。黄兴得知武汉的有利形势后，便致电在国外的孙中山，介绍了湖北革命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起义的决心，提出了“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的起义方针，认为如此则“大事不难一举而定”，并要孙中山迅速筹款接济。黄兴对形势的估计，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但他没有及时去武汉领导起义。这时，瑞澂等已闻到起义的风声，开始四处搜捕革命党人，加强了防范。在这紧急情况下，孙武等人便于9月24日召开了六十余人参加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下同），第123页。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以下简称《辛亥革命》——第五册，第9页。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4页。

的骨干联席会议，讨论了起义日期和总动员计划，制定了起义方案。会议确定于10月6日（阴历中秋节）

举行起义，并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对各标、营的任务确定如下：

（一）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负责在塘角放火作为发难信号；同时掩护该协炮营进占凤凰山炮台及青山，拦击海军舰船。

（二）第八镇工程第八营负责攻占中和门内楚望台军械库，并占领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入城。

（三）第八镇二十九标二营和三十标一、三营以及测绘学堂学员见到信号后，立即赶往楚望台，协同工程第八营向总督署发起进攻。

（四）第八镇炮兵第八标在三十二标（留守部队）掩护下，从中和门进城，在楚望台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总督署轰击。

（五）第八镇和混成协的骑兵，负责城外警戒和通讯联络。

（六）第八镇三十一标、混成协四十一标（留守部队）负责占领蛇山，掩护炮队占领发射阵地。

（七）混成协四十二标驻汉口的部队占领武胜关；四十二标驻汉阳兵工厂的部队控制兵工厂和占领龟山炮台。

（八）宪兵营起义者，负责侦察官方情报，将军事要点之防备情况随时报告起义总司令部。

此外，派人通知湖南的焦达峰，请他按原定成约，届时起事响应。

会议当天，发生了南湖炮队少数参加革命团体的士兵反抗长官压迫而企图暴动的事件，引起了湖北统治当局的注意。10月3日，湖广总督瑞澂召集首县和管带以上文武官员紧急会议，决定调巡防营、教练队等驻守督署及附近各要道；令张彪、黎元洪督率所部日夜巡城；派舰船游弋江面；对楚望台军械库加派人员监守；收缴士兵子弹，实行械弹分离。革命党人鉴于清军已有戒备，加之湖南策应起义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遂决定延期起义，并派人催促随队前往岳阳的蒋翊武速回武汉。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配制炸药时，不慎引起爆炸。孙武受伤被送入医院，其余人员仓促转移。俄国巡捕闻声赶赴现场，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印信等物，并转交总督署。瑞澂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急调巡防营分守各街巷，四出搜捕革命党人。在风云突变之际，适蒋翊武从岳阳赶回武昌起义总机关，当即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研

湖北旧军有巡防营、水师营、八旗兵和绿营兵。巡防营分五路（武汉、黄冈、襄阳、宜昌、安陆）驻防，每路五营，每营二百五十人，共约六千二百余人。水师营驻汉阳、黄冈、襄阳、宜昌、安陆。荆州驻有八旗兵九千余人。各地还有未裁绿营兵七千余人。

同盟会中部总会于1911年7月由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专 经营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并以两湖为活动

究对策。刘复基认为“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蒋翊武亦认为，“再无别法，只有前干，或可死中求生。”遂决定于当晚12时，以城外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发动起义。蒋翊武根据原定计划，以临时总司令名义下达了起义命令，重新明确了各标营的具体任务。不料就在当天，杨宏胜往工程第八营运送炸药时不幸被捕；起义总机关也突然被军警包围，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蒋翊武乘隙逃脱，离开武汉。武昌戒备森严，城内外交通断绝，起义的命令未能及时送达城外的炮队，城内的部队亦未全部接到命令，结果南湖的炮声未响，各标营均未行动，起义计划遂告流产。

10月10日清晨，瑞澂下令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杀害；加强督署的防卫及要道的巡逻；传令各标营停止操课，子弹一律上交，禁止官兵出营。在巡警的搜抄下，又有一些革命机关遭到破坏，三十多名革命党人和不少无辜群众被捕入狱，武昌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二、武昌首义，光复武汉三镇（参见附图二十三）

（一）工程营首先举事，夺占军械库

瑞澂采取严厉镇压措施，武汉革命党领导人有的被捕，有的走避，对武装起义无疑是个沉重打击。瑞澂洋洋自得地电奏清廷，声称他“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愚蠢的瑞澂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由于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入，组织比较隐蔽，各标营中的革命组织未遭破坏，革命力量未受大的损失。在危急关头，第八镇二十九标、三十标的革命党人蔡济民、吴醒汉与工程第八营的熊秉坤、金兆龙等秘密联络，约定于10月10日晚，以枪声为号，按原计划发难，并立即分头通知各标营。驻城外的混成协辎重队的革命党人也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举义的部署，与附近的炮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

当晚，工程第八营的革命代表将收集所得的数盒子弹分发各革命党人，打死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军官，并连放三枪作为起义信号。熊秉坤等急率数十人赶赴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该营左队守库的革命党人立即响应，顺利地占领了该库。楚望台军械库为湖北新军的重要军火库，储有从国外购买的双筒毛瑟枪一万余支，单筒枪一万五千支，汉阳造步枪数万支，炮

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起义军首先占领该库，对武昌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

中心。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46页。

首县即督抚衙门所在县。

作用。

工程第八营占领楚望台后，陆续集合了二百余人，推举原日知会干事、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吴便整理队伍，作了如下部署：以两个排防守军械库；以两个排袭击军械库东西两侧的三十标及宪兵营的旗兵；以一个队夺占中和门，迎接炮队入城；派数人向通湘门、中和门一带侦察敌情，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派人分头递信，催促各营响应；指挥部设在军械库南端，预备队在军械库北端集结待命。与工程营起义同时，驻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的革命党人李鹏升，亦举火发出了起义信号。炮兵营与工程队立即响应，并同辎重队一起向武胜门挺进，因城门紧闭，一部绕道至中和门，直趋楚望台。

（二）各标营立即响应，迅速攻占总督署

当工程第八营打响起义的枪声，混成协辎重队点燃革命的火焰后，其它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纷起响应。二十九标的蔡济民、三十标的吴醒汉等分别率领部分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测绘学堂的近百名学兵也迅速向楚望台集中。其它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先后率众起义。清军军官大部逃逸，部分士兵自动走散。这时，武昌城内除防守督署等机关的旧军仍企图顽抗外，已有近三千人参加起义；但大多散处各地，到楚望台集中的仅约七八百人。吴兆麟与熊秉坤、蔡济民等商议，认为单纯防守楚望台，不迅速进攻，待至天明，清军集兵反扑，处境将很危险，遂决定兵分三路，趁夜向总督署及紧靠督署的第八镇司令部发起进攻。

武昌城东西长约五里，南北长约六里，周长约二十二里。蛇山横亘其中，将城区分隔为山南山北两部分。山南东部为各标营驻地，西部有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山北有藩署（布政使所在地）。当时，守卫督署的部队，计有巡防队三个营、教练队一个营、武装消防队一队、骑兵一队、机关枪一队及部分督署卫队和警察。瑞澂、张彪在得知起义消息后，又急忙将辎重第八营调入城内，总兵力约有三千人。其部署如下：辎重第八营为左路，以长街为主要防线，前沿伸至王府口街、南楼一带，防御由武胜门入城及从阅马场西进之起义军；巡防队、消防队为右路，以保安门正街为主要防线，前沿伸至津水闸一带，防御城内及从南湖入城之起义军；警察则分布在督署以北及长街以东各街巷，前沿达阅马场、紫阳桥一带。

起义军的进攻部署是：第一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二十九标一排及其它零星部队组成，从紫阳桥经王府口街进攻督署后院；第二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组成，从水陆街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及督署翼侧；第三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及二十九标、三十标各一部组成，从津水闸经保安门正街进攻督署前门。同时，令已入城之炮八标迅速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轰击。其余人员编为预备队，在楚望台待命。

晚 10 点 30 分，起义军开始进攻。因事先未将敌人的部署侦察清楚，加上兵力有限，南湖炮队尚未完全进入阵地，不能给步兵以有力支援，以致初次进攻受挫。第一路进至紫阳桥附近时，遭敌军猛烈射击，伤亡较大，一部退回楚望台。第三路之一部进至津水闸，遭敌顽抗，前进受阻；另一部虽进抵保安门附近，亦被敌击退。

正当起义军进攻受挫时，又有一部分起义士兵自动前来参战，炮队也已进入蛇山阵地，开始射击，于是士气更加高涨。

晚 12 时后，起义军发起第二次进攻。第一路向紫阳桥发动猛攻，战斗异常激烈。第三路之一部转至大朝街，对紫阳桥守敌形成翼侧威胁，迫使其向西撤退。起义军乘势追击，一举突破敌人防线，向督署进逼。这时，四十一标一部起义队伍已攻占官钱局和藩署，随即分兵一部南攻督署；第二路及第三路之一部已进至水陆街西口，接近督署；第三路之另一路进至保安门正街恤孤巷时，遭敌伏击，进攻受阻。为了突破敌人防线，第三路起义军组织了四十余人（一说一百人）的敢死队，向前猛冲。其余部队攀登保安门城楼，沿城墙西进，配合敢死队实行上下夹击，迫使保安门正街之敌节节败退。这时，第二路已进至水陆街西口外大街，与第一路会合，南向进攻督署，并联络第三路，在督署和镇司令部后门以及前门钟鼓楼等处放火，使蛇山和中和门的炮队对督署的射击更加准确。三路起义军紧紧包围了督署及镇司令部，在炮兵火力支援下，一举冲入署门，将大堂点燃。企图依托围墙进行顽抗的守军，见大势已去，一部投降，大部溃散，督署及镇司令部遂被起义军占领。

在起义军快要逼近督署时，瑞澂慌忙率少数卫兵从后墙凿洞，逃往“楚豫”号军舰，并在舰上致电湘、豫两省速派巡防营来鄂“会剿”，又电奏清廷，“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张彪也率兵一部仓皇逃往汉口刘家庙，黎元洪则躲藏在其僚属家中，布政使连甲逃匿。清军失去指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11 日黎明，武昌城内各官署、城门均为起义军所控制；当日上午，一些处于观望状态的清军士兵也陆续向楚望台集中，听从革命党人指挥。革命党的十八星旗帜飘扬在黄鹤楼上，宣告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三）夺占汉阳、汉口

10 月 11 日下午，驻汉阳的混成协四十二标一营（左队驻兵工厂，前队驻钢药厂）的革命党人，得知武昌起义获胜的消息后，决定于当晚 8 时 30 分举义，并派人与驻汉口居仁门的第二营取得联络。汉阳的起义者未遭任何

刘复基（1884—1911），湖南常德人。字尧澂。1905 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 年回国后，在长沙、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09 年入湖北新军，参加振武学社。1911 年初，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被推为评议部长，积极促进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9 月，任起义领导机关的参议。

抵抗，迅速占领了兵工、钢药两厂[〔]，并拖炮布防于龟山。起义军随即向从武昌逃来的辎重第八营（宿于大校场）三百余人发起攻击。该部未作抵抗，即向汉口刘家庙方向逃窜。12日清晨，瑞澂派载有步兵的军舰一艘，从刘家庙直驶龟山，企图夺占兵工厂，结果被龟山上的炮兵发炮击中，被迫驶回青山下游。同日上午，驻汉口的第二营中的革命党人，在第一营派人策应下，亦率众起义，并拟夺占刘家庙车站。该营在进军途中，得知清河南援军已抵汉口郊外，因虑寡不敌众，遂退回大智门一带防守。驻汉口的三十标第二营中的旗兵，大部闻风逃匿，其余百余人与二营的起义者一起，分防汉口，维持社会秩序。至此，武汉三镇全部为起义军占领。起义军严守纪律，“无一兵入民家之房，无一人夺民家之食”[〔]，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武汉三镇人民也积极支援革命军，军民关系十分融洽。

（四）湖北各地遍燃革命烽火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湖北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举兵响应。10月12日，梁钟汉、王守愚在汉川起事，杀死县令，组织军政分府。15日，刘英在京山永隆河起兵，很快攻克了钟祥、天门、潜江、监利等地。17日，武汉下游重地黄州（今黄冈）宣布独立，所属八县一齐响应。与此同时，驻守河南信阳的四十二标第三营革命党人刘化欧等率领起义士兵、工人、农民、会党千余人进袭武胜关（不久即被清军击退）。19日，唐牺支组织革命军攻克武汉上游重镇宜昌，先后夺取当阳、沙市、荆州等地。28日，施南驻军反正。11月下旬，郧阳、襄阳等地，亦被会党势力与起义的新军所控制。这些起义，巩固和扩大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成果。

三、成立军政府，编组革命军

起义军占领武昌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革命政权，巩固起义成果，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当时，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宋教仁等重要领导人又迟迟不来武汉。而组织武昌起义的领导成员，孙武负伤，蒋翊武脱险离汉，在武汉的革命党人中缺少有威望的人物，加之革命党人对掌握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于10月11日上午成立军政府时，竟将曾亲手杀害过革命党人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抬出来做了都督。其理由

[〔] 1884—1911），湖北鄂城人。1904年入湖北新军，次年加入日知会。日知会被破坏后，入宪兵学校从事秘密革命活动。1911年初，先后参加文学社与共进会。9月，任起义领导机关军事筹备员。

[〔] 1886—1911），湖北襄阳（一说谷城）人。1911年初加入文学社。9月，任起义领导机关交通，负责运送军火。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同），第55页。

是可以利用黎的“威望”以“号召天下”。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汤化龙等也乘机混入了军政府。军政府内部成员复杂，从成立第一天起，革命势力与旧势力之间就存在着激烈的斗争。革命党人为了行使领导权，便由蔡济民等十五人组成谋略处，实际负起领导责任。10月12日，复由革命党人詹大悲等组成汉口军政分府。

军政府成立后，首先进行了如下工作：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民众，废除清帝年号；发布檄文，声讨清廷的残暴统治和卖国罪行，号召各省人民迅速执竿起义；致电黄兴、宋教仁等，促其来鄂；电请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颁布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法令；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告以军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权，要求外国政府不得助清“以妨害军政府”，否则就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为了保卫武汉和推进革命，10月14日，军政府决定扩编革命军，在参加起义的三千人基础上，扩编成步兵四个协、骑兵一个标、炮兵二个标、工程和辎重各一个营。自军政府贴出招兵布告后，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和退伍士兵踊跃参军，四五天内即招足了约二万人的新兵，而四乡农民前来报名的仍源源

不绝。后来，随着战事的发展，又先后成立步兵四个协，骑兵、炮兵各一个标，工程、辎重各一个营，机关枪一队，以及将校决死团、学生军、宪兵队等。此外，还集中部分老兵组织了四个敢死队，并编组了荆襄、长江水师。总兵力最高额约六万人。

革命军的编制仍仿旧军队，军官的薪饷则不论职位高低，一律月支二十元，班长十二元，士兵十元。这样，士兵的生活有所提高，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也有改善。由于编制扩大，新兵数量骤增，军事干部极感缺乏，大部分老兵被提升为初级指挥官和军士。因战事紧迫，部队训练不多，战斗力受到一定影响。

军政府在扩军的同时，还部署了武汉三镇的防务：吴兆麟的步兵第一协防守汉阳；何锡藩的第二协防守汉口；成炳荣的第三协防守武昌武胜门外两望山至青山一带；张廷辅的第四协防守武昌；熊秉坤的第五协（10月16日成立）为预备队，驻武昌。马、炮各标营分隶各协指挥。

武昌起义后，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人心安定，商店照常营业，武汉三镇呈现出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武昌起义之所以能获得胜利，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自《天津条约》规定汉口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在此兴办企业，开辟航运，倾销洋货，不仅工人受到剥削，而且愈来愈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运输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广总督瑞澂致内阁军谕府陆军部请代奏电》，《辛亥革命》（五），第289—290页。

工人陷入破产失业的境地；加上洋务派首领之一的张之洞，不惜耗费巨额资金，在湖北积极推行“新政”，因而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捐税分外苛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迅猛发展，这就为首义成功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武汉和湖北的革命党人把着眼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群众中特别是在新军中长期进行艰苦扎实的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积蓄了相当的革命力量，从而为首义成功准备了主观条件。这次起义的军事行动也是很成功的。起义的部队首先抢占制高点和军械库，并由基层单位迅速推举出统一指挥的人员，立即组织部队实行步炮协同，很快攻占敌人的首脑机关，使敌军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从而很快控制了武昌城。

四、各省响应起义，纷纷宣告独立

武昌起义的炮声，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迅速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

首先响应起义的是湖南。10月22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发动新军和会党攻入长沙。巡抚余诚格外逃，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杀。焦达峰、陈作新被举为正副都督，建立了湖南军政府。湖南起义胜利后，军政府下令扩军，并先后派王隆中、甘兴典各率步兵一协赶赴湖北，支援武汉革命军，使首义地区增强了抗清实力，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日，陕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发动起义，占领省城西安。曾参加过同盟会的新军管带张凤翔被举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后改称都督）。23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次日攻占湖口及马当炮台，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30日，南昌新军举义，占领南昌城，建立江西军政府。

接着，山西、云南、贵州、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先后宣布独立。至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已有十四个省和上海脱离了清朝的统治。宣布独立的省市主要在华中、华南地区，其中以长江中游的湖南、江西和下游的江苏、安徽对武汉影响较大。北方地区各省，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较为稳固，因而没有出现独立的省区，但当地的同盟会员及与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团体也发动了规模不等的起义和暴动。此外，东北、内蒙、西北的甘肃和新疆、西南的少数民族人民，也先后爆发了反清斗争。这些起义和暴动，对武昌起义起了积极的策应作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高潮。

由于同盟会对迅猛到来的革命形势没有足够的准备，缺乏坚强的领导和通盘的筹划，在各省的实力有大有小（不少省同盟会的实力小于立宪派），对革命的态度也不相同，参加起义队伍的更是鱼龙混杂，这就使各独立省份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有的省在革命派武装夺取政权后，被立宪派、旧官僚采取阴谋手段，窃夺了实权（如湖北、福建）。有的省被立宪派分子采取

流血政变的办法篡夺了政权（如湖南、贵州）。有的省在革命洪流冲击下，迫于形势，采取改头换面的手法，仅将旧衙门换上一块新招牌（如江苏、广西）。即使革命党掌权的省份，也有部分革命党人很快成为争权夺利的政客，或者变成了地方军阀（如安徽、山西）。这些独立的省份，相互之间各有打算，内部局势也不稳定，因此很难做到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尽管如此，各省的独立，毕竟极大地孤立了清政府，壮大了革命声势。还应指出，由于革命党人重视做新军的工作，自武昌新军打响反清第一枪后，不到三个月，在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四个标的新军中，先后反正、解散、溃败的约有七个镇、十个混成协、三个标，大大削弱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力量。所有这些，都为最后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汉口、汉阳保卫战 (1911年10月—11月)

一、清军南下攻鄂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极为惶恐，于10月12日确定如下应急措施：将瑞澂革职留任，令其“克期克复省城”；命河南巡抚宝棻就近派兵一协，星夜驰援武汉；停止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秋操，速调北洋陆军两镇“赴鄂剿办”；由海军提督萨镇冰、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率两舰队“即日赴援”；任陆军大臣荫昌为钦差大臣，“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

由于当时京汉铁路运输能力有限，加之尚需补充弹药，清廷决定从10月13日起，将所调陆军分批南运，并于河南信阳设总粮台，负责南下部队的后勤补给。北洋军将领多系袁世凯的亲信，清廷恐荫昌指挥不灵，不得不于14日下谕重新起用贬回河南“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同日，清政府决定将北洋六镇和禁卫军编组成三个军，并明确规定了各军的任务：

第一军以荫昌为军统（亦称总统）。由陆军第四镇和第二镇的混成第三协、第六镇的混成第十一协编成。该军第四镇即向孝感附近集中，第三协及第十一协二十二标速趋淝口，掩护大军南下。

第二军以军谕府正使冯国璋为军统。由陆军第五镇、第三镇的混成第五协、第二十镇的混成第三十九协编成。“迅速筹备，听候调遣”。

第三军以贝勒载涛为军统。由禁卫军、陆军第一镇编成。“驻守近畿，专司巡护”。

10月17日，荫昌到达信阳，坐镇指挥。袁世凯一面要挟清廷，一面又对清廷表示忠心，于19日奏陈在冀鲁豫招募一万二千五百人，编成湖北巡防军二十五个营（后更名为武卫右军），参加对起义军的“围剿”。

二、刘家庙争夺战

（一）双方作战企图及兵力部署

汉口保卫战首先是从争夺刘家庙开始的。刘家庙在汉口以北十公里处，濒临长江，周围地势平坦，水网沟渠纵横，部队不便展开。刘家庙车站（即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上谕》，《辛亥革命》（五），第291页。

当时汉阳兵工厂储有枪七千余支，山炮一百五十余门，枪弹五百万发，炮弹六千颗。（见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91页。）

江岸车站)为南下清军必经之路,也是革命军保卫汉口的前哨阵地。

第八镇统制张彪逃到刘家庙以后,湘、豫援军亦先后到达。他得悉清廷派荫昌率军南下后,便决定固守既有阵地,然后配合南下清军向武汉反攻。当时,集结在刘家庙的清军,有辎重第八营及四十二标残部,湖南驻岳州巡防营两个队,河南新军二十九协五十八标两个营及一个巡防营,另有骑兵数十人,共约二千余人。清军在刘家庙以南构筑工事,沿铁路两侧进行防御;预备队配置在刘家庙东北的丹水池地域。不久,南下清军先头部队进抵刘家庙东北的滢口;萨镇冰所率舰队也大部驶至武汉江面,并派鱼雷艇在江面巡弋,防阻革命军从武昌渡江增援。

湖北军政府得知清军南下消息后,于10月15日召开军事会议,确定趁南下清军尚未全部集中时,先敌发起进攻。其方针是:“拟先击攘汉口之敌,逐次向北进攻,以阻止清军南下。”为此,决定向汉口增兵,首先肃清盘踞刘家庙之敌。

当时,驻守汉口的革命军为步兵第二协,下辖步兵第三标(统带姚金镛)、第四标(统带谢元恺),另配属骑兵一营、炮兵一标(欠一营)、工程兵一队、敢死队两个大队,共四千余人。其进攻部署是:右翼为第四标,左翼为第三标(欠一营),分别从铁路两侧进攻刘家庙以南之敌;炮兵及工程队配置在洋商跑马场东侧;预备队在第四标之后跟进。此外,以驻武昌的第五协为增援汉口的预备队,令驻汉阳的步兵第一协派一个标移驻汉口,负责接济弹药。由第二协统领何锡藩任前线指挥。

(二) 革命军攻占刘家庙

10月18日黎明,革命军在炮兵支援下发起进攻,很快逼近刘家庙车站,与清军展开肉搏战。因后续部队遭敌舰炮火拦击,未能及时投入战斗,以致进攻受挫,部队退回大智门车站附近。

18日上午10时,步兵第一协的一队士兵,突然从右翼发起冲击,其势甚猛,迅速突入清军阵地,守军一部乘火车北撤。该队乘胜追击,进展顺利。但因其余部队未能及时跟进,形成孤军深入,翼侧暴露。北逃之敌忽停车阻击,革命军遭受很大伤亡,不得不再次退回大智门一带,仅留百余人(内有铁路工人数名)隐蔽在铁路两侧,监视清军行动。革命军两次进攻受挫后,重新调整部署,令两个敢死大队分别在第三、第四标之后,督同步队前进。

18日中午12时后,革命军再次发起进攻。由于新兵不善利用地形,伤亡较大,进展迟缓,至午后3时才推进五六百米。这时,敢死队全部投入战斗,炮兵一部向敌右翼猛烈轰击。下午4时,清军急派步兵一标、炮兵一队乘车急赴刘家庙增援。

革命军发炮拦击不中。此时，潜伏在铁路两侧的革命军士兵，迅即将十余丈路轨拆毁，使列车脱轨倾覆。革命军乘机发起冲锋，附近的工人、农民亦手拿铁锹、锄头、扁担助战。清军死伤惨重，纷纷后退。为了阻止革命军的进攻，清军立即派兵一部，从姑嫂树迂回革命军侧后。

10月19日晨，革命军约三千人，以骑兵为前锋，在炮兵支援下，从两翼发起进攻，并派兵一部阻击敌之迂回部队。清军依靠舰炮支援，顽强抵抗。激战至中午12时，清舰弹药用尽，驶往下游。革命军乘机加强两翼攻势。清军窜入棚户，继续顽抗。革命军立即以敢死队组织火攻。时正顺风，顷刻之间烈焰冲天。清军无法立足，丢弃大量辎重，向三道桥退却。革命军占领刘家庙，追至三道桥附近，才停止了进攻。第二协因连战

疲惫，遂留一半兵力固守刘家庙阵地，其余人员运送战利品回汉口。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革命军的士气。清军经此挫败后，湖广总督瑞澂一面急电催援，一面借故逃往上海。

（三）革命军转入防御

革命军虽在刘家庙初战获胜，但打的是击溃战。而南下的北洋军正陆续向祁家湾、淞口附近集结。19日夜，军政府调步兵第四协增援汉口，由第五协接替武昌防务。同时，召开军事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在清军尚未全部到达之前，继续发起进攻，首先击退淞口之敌。前线指挥何锡藩，因与少数革命党人意见不合，提出辞职。军政府改任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指挥官。张景良原为八镇步兵第十五协二十九标统带，因策动黎元洪叛变，革命党人曾将其拘留，后被黎元洪保释。由这样一个奸细掌握前线指挥权，给尔后的作战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此时，清军两标正在淞口集结，并陆续有增援部队到达，海军兵舰五艘在阳逻湾待命。张景良到达刘家庙后，故意拖延时间，不作任何作战部署。20日，军政府派人前往检查，发现部队混乱，毫无进攻准备，遂代张下达任务：令步兵第二协从正面进攻，于21日拂晓前先派兵一部潜入三道桥以北，掩护其余部队从正面进攻淞口之敌；步兵第四协（欠第七标）从滕子冈渡河进攻淞口之敌右翼；炮兵第一标在一道桥附近占领发射阵地，轰击三道桥以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在北洋海军中任职。甲午战争时为定远舰驾驶。战后投奔洋务派首领张之洞，颇受宠信，曾三度赴日考察军事，并由管带、统带擢升为统领。由于黎平日常待士兵有“宽厚”的一面，赢得一些人的好感，因而当有人提出由黎元洪做都督时，虽有少数革命党人反对，竟为多数人所接受。

北敌军，支援步兵作战；步兵第七标及敢死队为预备队，在造纸厂西南端集结待命。为了配合这次进攻，军政府还令步兵第三协驻青山的炮兵拦击清舰上驶；在第二协主力通过三道桥后，立即派一支小部队渡江，袭扰淞口清军侧后。汉口军政分府在大智门、刘家庙设立粮台，负责接济械弹粮秣。

10月21日拂晓，步兵第二协第四标在谢元恺率领下，潜行至三道桥北端，发起冲锋。清军以机关枪猛烈扫射，封锁三道桥。革命军既不能前进，又无法机动，伤亡惨重，退守二道桥。步兵第四协从滕子冈渡江到达对岸，因地势低洼，泥泞难行，加之清军防守严密，进展困难。在得知正面进攻失利之后，遂自动撤回。当晚，军政府再次召开会议，鉴于进攻受挫，决定暂取守势。部队在三道桥以南占领险要地形，加紧构筑工事，转入防御。

三、保卫汉口之战

（一）双方调整作战部署

清军从刘家庙退至三道桥北后，一面加固阵地，一面将重型火炮和集结于祁家湾一带的第一军主力调往前线，企图先夺占刘家庙，尔后向汉口市区发展。其部署是：左翼为混成第三协，在铁路以东占领阵地；右翼为第四镇，在铁路以西占领阵地。总兵力约一万五千人。同时，令海军舰艇配合作战。

革命军在三道桥以南转入防御后，其任务区分如下：步兵第二协防守二道桥以东地区；步兵第四协（欠第八标一营）防守二道桥至滕子冈一线；炮兵配置在一道桥附近，并以一部兵力占领戴家山；第八标一个营及敢死队为预备队，配置在造纸厂附近；骑兵在左翼担任警戒。总兵力约一万人。同时，积极筹组步兵第六协，接替武昌防务；令步兵第五协作好支援汉口作战的准备。

10月22日至25日，双方都在积极进行战前准备，除在二道桥一带有零星接触外，未发生大的战斗。

（二）革命军节节阻击清军

10月26日晨，清军水陆协同，向革命军发动进攻。先由军舰数艘，乘革命军青山炮队疏于戒备之际，驶至谏家矶附近，从翼侧向三道桥以南革命军阵地实施火力急袭。革命军猝不及防，牺牲五百余人。淞口的清军在机枪和管退炮火力掩护下，乘机通过三道桥，沿铁路两侧发动猛攻。革命军依托工事顽强抗击，终因减员过多，被迫后撤。上午10时，刘家庙复为清军占领，革命军退守大智门一带。

正当激战之际，前线指挥张景良竟不知去向。中午12时，第四标统带

谢元恺自告奋勇，指挥部队向刘家庙反攻。在距刘家庙五百多米处，战士们上好刺刀，冒着弹雨，齐声喊杀，勇往直前，与敌展开肉搏战。清军不支，纷纷逃窜，刘家庙又被革命军夺回。革命军追至造纸厂附近，遭敌阻击，时已黄昏，遂停止进攻。

26日晚，军政府鉴于汉口的革命军伤亡较大（共计伤亡一千余人），立即从武昌调步兵第五协、敢死队两大队，从汉阳调步兵第一协一部，增援汉口，准备于第二天乘胜进攻，驱逐造纸厂之敌。同时，由新编步兵第六协（统领杨载雄）担任武昌防务。军政府对于临阵脱逃的张景良不作断然处置，仅令炮兵统领姜明经协助指挥。

27日凌晨，清军集中更大兵力，先于革命军发起进攻。其部署是：第四镇从造纸厂正面进攻；混成第三协从戴家山、姑嫂树迂回革命军翼侧。革命军依托阵地，坚决抵抗。而张景良既不亲临前线指挥，又不给部队及时补充弹药，以致战不多久，部队弹药告罄，加之新兵不善于利用地形，部队伤亡过大，不得不从刘家庙逐步后撤，退守大智门一带。清军进至洋商跑马场。

当晚，军政府召集会议，研究配备缺额干部，派炮队二营增援汉口，派工程营帮助驻汉口各部队赶筑和加固工事；并致电湘、赣、陕等省，请速出兵，支援武汉。这时，清廷已召荫昌回京，以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指挥武汉战事；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并由冯国璋亲往汉口督战。

28日上午，清军继续沿铁路向大智门猛扑，并以进占洋商跑马场之清军，绕道三义桥，迂回革命军翼侧。时张景良又不在战地，部队无人统一指挥。革命军与敌反复争夺，因后援不继，被迫从大智门后撤。据守歆生路的革命军，依托坚固房屋，进行顽强抗击，多次以冲杀肉搏打退清军的进攻。

29日，清军以重炮轰击革命军炮兵阵地。由于革命军的炮

兵目标暴露，火炮和人员损失很大。清军在优势炮火支援下，不断向前推进，相继攻占了歆生路口及华商跑马场。革命军分别退守玉带门及歆生路以南街市。此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三）革命军撤离汉口

在激烈的战斗中，代理第四协统领谢元恺、炮兵统带蔡德懋、敢死队队长马荣等率先冲锋，先后牺牲，第二协统领何锡藩亦中弹受伤。革命军的领导骨干不断削弱，张景良又藏匿不出，前线指挥乏人，部队士气开始涣散。这时，黄兴与宋教仁等由上海抵达武汉，黄被推举为武汉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到任后，设总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并立即到前线视察部队，激励士气。

当时，在汉口的革命军尚有六千余人，经过动员整顿，士气复形高涨。时清军已从大智门至玉带门一线不断向市区发动进攻，情况十分危急。黄兴立即组织部队分路反击，一路曾突破清军歆生路防线，但硚口一路为清军所阻。

10月31日，袁世凯抵信阳接任钦差大臣，令冯国璋调集军队猛攻汉口。汉口的革命军依托歆生路一带的房屋树木，与清军逐屋逐段争夺，使敌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受重大伤亡。清军凭借优势兵力火力，节节向市内进逼。军政府急将驻汉阳步兵第一协大部兵力及武昌辎重第二营调往汉口增援。

11月1日晨6时，清军从王家墩发起攻击，革命军依托堤防顽强抗击，使敌一时无法突破防线。上午10时左右，清军利用歆生路附近房屋作掩护，向革命军右翼逼近，同时用火炮轰击革命军防守的据点。革命军遭受重大损失，逐步后撤。清军为使革命军失去依托，竟不顾居民的生命财产，火烧歆生路一带房屋，烧一段进一段，一直烧到沿江一带。繁华的汉口市区顿时湮没在一片火海之中。这时，驻守汉阳的第一协统领宋锡全擅自率部撤往岳阳（一说奉命撤退）。汉口的正面及左翼亦有少数革命军官兵借故退走。下午，汉口市区逐步为清军占领。黄兴见汉口革命军已被打散，无法挽回败局，遂决定退守汉阳，等待援军，再图恢复。11月2日，汉口失陷。此次争夺汉口之战，双方各死伤二千余人。

四、保卫汉阳之战（参见附图二十四）

革命军和清军在汉口连日苦战，均甚疲劳，双方都需休整，作再战准备。加之“海琛”、“海容”、“海筹”等舰于11月1日宣布起义，驶抵九江，加入革命军，使清军的渡江作战增加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暂时形成两军对峙的局面。

（一）清军的进攻部署与“和谈”阴谋

清军攻占汉口后，一面巩固阵地，一面调运枪械弹药及渡河器材，并继续车运援军南下。冯国璋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行动。冯以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时力争武昌的战例，说明“昔日之势，重在武昌，武昌以洪山为扼塞，洪山失则武昌不守，顺流以取汉阳、汉口，如破竹耳。今日之战，则重在汉阳，汉阳之大别（龟山）诸山，俯瞰武汉，如釜底一丸，下擲则全城瓦碎，不待攻而自破矣。为今之计，惟有先取汉阳，为攻心之上策”。他决心先取汉阳，再攻武昌。当时清军的配置是：第四镇和混成第三协驻汉口；第五镇驻孝感；混成第十一协从孝感南下新沟；另有清军五千人进驻祁

谋略处成立不久，即被改组成参谋部，取消了处理重要军政问题的职能。后通过人事安排，不少革命党人被排挤出都督府。

家湾。总兵力约三万人。其进攻部署是：左翼为第四镇，从汉水正面渡江，直接进攻汉阳。右翼为混成第十一协和炮兵十九标一队，分甲乙两支队（各约一标兵力）迂回汉阳翼侧。甲支队从新沟渡汉水，经蔡甸（今汉阳县）向三眼桥进攻；乙支队从舵落口渡汉水，向琴断口进攻。另以第八协步兵一标为预备队，在甲乙两支队后跟进。同时，在汉口歆生路、刘家花园、大智门、招商局、华商跑马场、硃口及沿江一带，设置炮兵阵地，支援渡河部队。又在汉水口附近强索民船，进行佯动，掩护迂回部队渡河。经过十多天的准备，逐步完成了进攻部署。

正当袁世凯、冯国璋部署向汉阳进攻之际，从保定移防石家庄的清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与驻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山西革命党人联络，准备响应武昌起义，回师京城，并在石家庄截留运往武汉的军火一车。袁世凯为了稳住北方，消除北上组阁的威胁，收买凶手于11月7日刺杀了吴禄贞。不久，张绍曾被“开出差缺，解除兵柄”。但此时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已先后宣布独立，清廷正处在四面楚歌之中。面对全国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和武汉革命党人在军事上的暂时挫折，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唆使下，派亲信于11月10日到武昌进行“和平”试探。因其坚持以君主立宪为停战议和条件，虽为黎元洪所接受，却被革命党人拒绝。袁世凯诱和不成，遂令冯国璋积极准备进攻汉阳。

汉口失陷后，军政府内部对是否防守汉阳，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固守汉阳，并电请起义各省迅速出兵，合攻清军。军政府一面整顿队伍，组建新军（即步兵第七协，统领为邓玉麟；步兵第八协，统领为罗洪升）；一面在汉水沿岸及险要地点加紧构筑工事，部署防御。11月2日，黄兴返武昌后，许多革命同志主张战时总司令应与都督平行，而立宪派和革命党人中的妥协分子，为了保持湖北军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坚持总司令要受都督节制，结果后者占了上风，于11月8日效法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演出了一场由黎元洪登坛拜将的“闹剧”。黄兴受命后，即赴汉阳，在昭忠祠组织司令部，在归元寺设立粮台，积极布置守城事宜。当时，退驻汉阳的革命军不足五千人，经过补充，加上新从武昌调来的步兵第六协，共约万余人。适湖南援军王隆中、甘兴典二步兵协（均不满员）于11月6日、9日先后开抵汉阳，总兵力增至二万余人。汉阳革命军沿汉水，背龟山、黑山、仙女诸山，由东向西，自南岸嘴经琴断口至三眼桥一线，划区设防。11月11日，其部署如下：步兵第四协防守南岸嘴至兵工厂一线；步兵第五协（欠第十标）防守兵工厂与钢药厂；步兵第二协第四标防守钢药厂至黑山西麓；湖南援军第一协及工程兵一队防守割丝口至琴断口一线；湖南援军第二协及工程兵两

由萨镇冰率领调往武汉的舰艇，计有“海琛”、“海容”、“海筹”三艘巡洋舰，“江贞”、“楚有”、“楚同”、“楚泰”、“楚豫”五艘炮舰，“辰字”、“宿字”、“湖隼”、“湖鹰”、“湖鹞”五艘鱼雷艇。

个队防守美娘山、三眼桥、扁担山一带，并向蔡甸方向警戒；炮兵在大别山、黑山、仙女山、扁担山占领发射阵地；步兵第六协在七里铺、步兵第十标在归元寺为预备队。由于设防没有重点，因而处处兵力薄弱。

（二）革命军反攻汉口失利

黄兴到达汉阳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湖南援军的到来，汉阳防务的逐步就绪，产生了急于收复汉口的思想。对此，军政府内部很多人表示反对，认为目前新兵太多，又缺乏训练，不宜马上反攻。黄兴不采纳这些正确意见，反而轻信他的军事顾问、日本人大元大佐关于汉口清军“不难击灭”的意见，并受王隆中声言如不反攻即率部返湘的要挟，决定反攻汉口，先发制人，以求打乱敌人的进攻计划。其部署是：以湖南援军第一、二协及武汉革命军第五协（欠第十标）为主攻部队，从琴断口渡河，分左、中、右三队占领博学书院一带堤防，然后向玉带门方向前进，攻击清军右翼。步兵第四协、第六协为助攻部队，俟主攻部队渡河并发起攻击后，即由汉阳东北端渡河，在龙王庙登岸，向中国街前进，攻击清军左翼。炮兵第一标（欠一营）渡河后在博学书院西南占领发射阵地，支援步兵作战。步兵第五协第十标和其余部队为预备队，渡河后，在博学书院西端待命。

11月16日下午5时，工程营在琴断口架桥完毕。当晚10时，主攻部队陆续渡河，抵达预定地点，即向玉带门方向攻击

前进，很快推进至玉带门附近。后由于清军猛烈射击，部队伤亡较大，遂停止前进。17日晨，革命军再次发起冲击。清军不支，逐步后撤。上午9时许，湖南援军第一、二两协进至居仁门一线，武汉革命军第五协进至王家墩。黄兴即令步兵第四协和第六协奋勇渡河，攻击清军左翼，以收夹击之效。但该两协在渡河时，遭到清军机关枪猛烈扫射，抢渡未成，使主攻部队失去了有力支援。不久，清援军到达，在炮火及机枪火力掩护下，向革命军反击。革命军第二协及第五协在清军压力下，首先退却，牵动全线。黄兴下令停止退却，部队皆不听命，不得不率军返回汉阳。这次作战，革命军伤亡较重，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使士气受到很大的挫伤。

（三）革命军退出汉阳

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为了攫取军政大权，施展以退为进的诡计，借口“足疾未愈”，不肯出山。由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加上袁世凯的后台帝国主义的催逼，清廷又于11月1日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组成“责任内阁”。不久，又迫令宣统帝之父载沣“不再预政”。从此，全部权力转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手中。

革命军退回汉阳后，一面从武昌调步兵第七协一个标增援汉阳；一面部分地调整了部署，命第二协第四标专任兵工厂防御，黑山至割丝口一段，令步兵第六协接替。同时，购买麻袋，于各要隘盛土为堡，并在汉江沿岸增架铁丝网、鹿砦，于三眼

桥隘道处埋设地雷，以加强防御。但是，黄兴对清军的进攻部署，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清军主力在汉口龙王庙至玉带门一线，汉阳正面是敌人的主要进攻方向；对于从孝感、新沟南下，迂回侧击汉阳的大批清军，认为是敌人的牵制部队，未予足够重视，仅派少数步、骑兵前往蔡甸设防。这一错误判断，对汉阳的防御作战影响很大。

清军在革命军反攻汉口受挫后，便于 11 月 20 日按既定部署向汉阳发起进攻。其右翼甲支队约二千人从新沟渡过汉水，未遭多大抵抗，即将汉阳的门户蔡甸占领，并迅速推进至汉阳以西的三眼桥附近。乙支队也在舵落口架好浮桥，准备渡河。21 日，甲支队以骑兵营为先导，向三眼桥发起冲击，遭革命军阻击，不得前进。这时，在汉水正面的清军，先以炮火向据守琴断口、美娘山的革命军阵地猛烈轰击，继以步兵抢渡舵落口，进攻琴断口。经近一小时激战，清军乙支队占领了琴断口。22 日，清军甲支队因正面进攻三眼桥失利，于桥南蒋家渡架桥，企图强渡，被驻守汤家山的革命军炮兵击退。乙支队从琴断口向革命军右翼阵地美娘山进攻，亦未得逞。清军在进攻三眼桥接连受挫后，遂集中兵力于琴断口方向，向美娘山发动猛攻，于 23 日下午 1 时攻占该山。革命军趁其立足未稳，实施反击，使美娘山失而复得。这时，汉口硃口一带清军，使用民船十余只强行渡河，企图从正面进攻，结果被革命军炮火击退。为了减轻汉阳的压力，革命军步兵第三协派兵一部，在海军支援下，从武昌青山渡江，占领谯家矶，向刘家庙进攻，袭击清军后方。清军猝不及防，退至二道桥附近。次日，清援军乘车赶到，以机关枪猛烈扫射，革命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退回青山。

24 日，清军陆续增兵于美娘山方向。凌晨，在炮兵支援下，很快攻占了美娘山、仙女山。黄兴鉴于仙女山之敌可以瞰制汉阳，侧击大别山，对汉阳威胁甚大，遂令预备队陆续投入战斗，进行反击。因有的部队不听指挥，以致未能奏效。清军甲支队乘势进攻三眼桥革命军阵地。革命军被迫退守锅底山、扁担山。经反复争夺，终因力量悬殊，锅底山、扁担山及磨子山相继失守。25 日，革命军从各部队挑选敢死队百余人，乘夜进行反击，夺回了磨子山。由刘玉堂率领的湖南援军一标，刚抵汉阳，亦立即投入战斗，夺回了扁担山。清军集中炮火向革命军射击，刘玉堂不幸中弹牺牲，部队相继溃散，磨子、扁担两山复被清军夺占。至此，汉阳周围的制高点已大部为清军控制。革命军在争夺上述各山过程中，伤亡较大，已无力进行反攻。26 日，革命军

《湖北军政府都督命令》，见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 122 页。

在黑山、十里铺一线组织防御。在各路清军进逼下，革命军的防线很快被突破。这时，驻汉口的清军从礄口渡过汉水，侧击黑山。革命军腹背受敌，遂不听黄兴指挥，纷纷撤退。湖南援军第一协退往武昌，第二协从鹦鹉洲返回湖南。黄兴见败局已定，遂下令将兵工厂的武器弹药运往武昌。27日，清军占领大别山，进据汉阳城。

此次战斗，革命军伤亡三千三百余人，清军亦死伤惨重。清军面对长江天险，又无海军支援，同时为了给“和谈”留下余地，没有马上进攻武昌。武汉战场再次呈现隔江对峙的局面。

汉口、汉阳保卫战，革命军在作战指挥上有不少失误，诸如偏重于从正面与兵力火力均占优势的清军争夺阵地和街道，未能充分利用道路纷歧、街道纵横的特点，迂回侧击敌人；让内奸张景良充当前线指挥，并在已经发现其有渎职行为后仍不作断然处置；不顾主客观条件，贸然反攻汉口；将汉阳设防重点放在汉水岸边，未能以更多兵力控制翼侧和制高点，也未掌握足够的预备队，等等。这些，都是导致汉口、汉阳失守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革命军为保卫汉口、汉阳，与敌人进行了四十多天的浴血奋战，充分表现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它打破了清政府妄想以北洋精锐之师，一举将革命起义扼杀在摇篮中的企图。经过革命军的顽强抗击，给维护清王朝的反动支柱——北洋军以重大杀伤，使全国各地革命党人受到巨大鼓舞，为各省组织起义赢得了时间，对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四节 苏浙联军攻取南京和成立中央临时政府 (1911年11月—1912年4月)

当汉阳激战之际，苏浙联军正会攻南京。11月初，上海、浙江、江苏先后宣布独立，但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东南重镇南京，尚为清廷所控制，并驻有重兵。这对临近各省是个很大的威胁。革命党人几次策动守军起义均未成功。苏浙沪革命党人为了减轻武汉的压力，发展东南地区的革命力量，决定联合攻取南京。

一、驻宁新军与旧军的斗争

南京城内，原驻有以徐绍桢为统制的新军第九镇步兵第十七协，第十八协三十六标一个营，及炮标、骑标、工程、辎重等营，总人数约七千人。另有江防会办、江南提督张勋统率的江防军二十营，赵会鹏统率的江宁巡防军五营，王有宏统率的新防军（又称缉私队）十营，由未裁绿营及饥民新编成的巡防军十营，江宁将军铁良新练的步兵一标、炮兵一营及督署卫队等，分驻城内外。旧军总兵力约二万人。

著名的革命党人赵声等曾在第九镇进行兵运工作，因而该镇官兵具有一定的民主革命思想。武昌起义后，该镇官兵进一步向革命方面转化。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认为新军不可恃，不予补充弹药，并派江防营进行监视。10月31日，张人骏又命第九镇限期从市内移防至距城六十五里的秣陵关，由江防营及巡防营负责城内守卫，每人补充子弹五百发。第九镇官兵对此愤愤不平，纷纷要求起事，但苦无弹药，不敢轻动。第九镇移驻秣陵关后，张勋等派人监视，观察动静，并企图谋刺徐绍桢。徐绍桢本无意革命，但被张人骏、铁良所逼，且各标营的革命呼声甚高，遂下决心联络革命党人，举行起义。他一面派人去上海领取弹药，一面入城联络巡防军、督署卫队为内应，相约于11月8日以演习为名，同时行动，袭取南京城。不料城内一些同情革命的人自行于7日仓促发动，被张勋调兵镇压，很多革命党人牺牲。清军紧闭城门，严密戒备，并增派步兵三个营、骑兵一个营防守雨花台，在通济门、汉西门增设了山炮和机关枪。

第九镇闻城内起事，遂于11月8日誓师，兵分三路，进攻南京城。其部署是：右路以步兵第三十六标第三营（缺一队）、骑兵第九标第一营（缺一队），经曹家桥向通济门进攻；进城后，占领督署。左路以步兵第三十三标第三营、骑兵第九标第三营，经铁心桥、安德门向汉西门进攻；进城后，消灭清凉山守军，占领饷械局。中路以步兵第三十四标、骑兵第九标第二营，经姑娘桥、花神庙向雨花台进攻；进城后，分军渡江，占领浦口。同时，约镇江步兵第十八协第三十五标进攻朝阳门；进城后，占领将军署。当时，第九镇官兵每人只有子弹三五发，重武器则有炮无弹。上午11时，各路部队

在无名纬河南岸高地集结待命，准备夜间行动。中路的骑兵因求战心切，竟不顾统一号令，单独北进，在逼近雨花台时，遭清军炮击，退至花神庙。这时，步兵三十三、三十四两标，也先后发起进攻，因无统一指挥，形成各自为战。黄昏，中路部队向雨花台发起冲击，遭敌火力压制，伤亡较大。当晚，革命军连续三次冲锋，终因弹药不足，守军工事坚固，未能奏效。待至9日拂晓，革命军弹药用尽，被迫退往镇江。

二、苏浙联军会攻南京（参见附图二十五）

（一）联军总司令部成立和攻城作战部署

新军第九镇进攻南京失败后，徐绍桢赴上海与革命党洽商。上海都督陈其美与江、浙各省起义军将领集会，决定组织苏浙联军，攻取南京，配合武汉革命军的作战，发展东南各省的革命形势。会议推徐绍桢为总司令，设司令部于镇江，设总兵站于上海。11月15日至20日，各处革命军陆续集中于镇江及其西南地区。计有：江苏军步兵四营、炮兵一队、骑兵一队，约三千人，由刘之洁统带，驻句容、丹阳等地；浙江军步兵二标（缺二营）、游击队二营、骑兵一队、炮兵一营（携炮四门）、工程辎重各一队，共三千余人，由朱瑞统带，驻高资；淞军步兵六百人，由黎天才统带，驻镇江金山河；沪军步兵一千人，由洪承典统带，驻镇江；镇江军步兵二协，约四五千，由林述庆、柏文蔚统带，驻高资、下蜀和镇江。此外，还有前来会师的其它零星部队和起义海军舰艇十四艘。总兵力一万四千余人。

在联军开始集结的同时，总司令部召开了两次军事会议，研究确定先驱逐南京城外清军，夺取各要塞炮台，再攻取南京城。具体部署如下：以淞军为右翼，攻取乌龙山及幕府山炮台；浙江军为中路，由麒麟门进占紫金山，向朝阳门、太平门进攻；江苏军为左翼，经淳化镇向雨花台进攻；镇江军为预备队，随同中路前进，进攻天保城；沪军担任警戒；海军配合陆军进攻，掩护、运载陆军登岸；镇江军一部及扬州徐宝山部进攻浦口，断敌退路。

（二）联军三面进攻，夺占城外各要点

南京城垣高厚，北有乌龙、幕府两山，南有雨花台，紫金山天保城扼其中，均筑有坚固工事。城内外炮台环列，易守难攻。清军司令部设在北极阁。紫金山有野炮十七门，雨花台有要塞重炮一门，各城门配有野炮多门，由江防营分别监守。皇城内有旗兵及巡防兵五营，准备三路机动。其余兵力分驻

当时，军政府中一些“年少气盛者”主张不顾一切，直取武胜关。这从当时兵力对比来看，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于城内外各炮台及交通要道，每处有一营至数营不等。清军昼夜巡逻，防守严密，但士气低落，有不少官兵同情革命。

11月24日夜，右路淞军和浙江军一营，乘兵舰直趋乌龙山麓，在守台官兵内应下，很快攻占了乌龙山炮台。25日晨，又

将幕府山炮台占领。革命军当即用炮台的大炮向清军北极阁司令部及狮子山炮台轰击。清军慌作一团，水师营参将率战船四十只归顺，下关东西炮台守军亦降。同日，中路浙江军进至马群，清军五个营据守四道防线，进行顽强抵抗。经数小时激战，浙江军突破敌人防线，毙伤清军甚众。清军统领王有宏亦被击毙。下午2时，又攻占孝陵卫，前出至紫金山一线。26日，清军以三营兵力向幕府山、以五营兵力向孝陵卫实施反击，均被联军击退，缩入城内。此时，左路江苏军已占领上方镇、高桥门，进逼雨花台。

（三）联军攻占南京城

11月27日，联军进行攻城准备。28日，中路浙江军向朝阳门发起攻击，因攻城器械不足，多次掷放炸药轰城不果，并遭天保城清军炮火袭击，伤亡多人。左路江苏军进攻雨花台，亦未奏效。第一次攻城遂告失败。为了迅速攻下南京城，联军总司令部决定集中镇江军、浙军、沪军近万人，合力进攻天保城。另以江苏军一部进攻雨花台，作为牵制。天保城位于紫金山半山腰，地势险要，上筑要塞炮台，有炮十余门、机关枪四挺，由江防兵一营及旗兵四百人防守。11月30日，联军向天保城发起攻击，清军据险顽抗。在敌火炮和机关枪扫射下，联军

伤亡较大，无法前进。随后，联军组织敢死队，以一队从紫金山正面攻天保城东侧，另一队攻其侧背。第二次攻击发起后，敢死队不怕牺牲，攀岩登壁，勇猛冲锋，各军亦相继跟进。清军不支，遂假示投降。联军受骗，死伤百余人。革命军官兵愤极，冒死前进。经一夜激战，将守敌全部歼灭。联军控制了这一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后，即于次日凌晨用缴获的大炮向朝阳门、富贵山、太平门等处轰击，连连命中目标。此时，雨花台也被江苏军攻占。由于围绕南京的制高点相继为联军所控制，城内清军顿形动摇。张人骏、铁良等于当天夜间逃遁；张勋率部由汉西门逃出，经浦口逃往徐州；城内残存的清军开城投降。12月2日，联军开进南京城，受到城内居民热烈欢迎。

苏浙联军在兵力数量上不占优势，其所以能取得攻城作战的胜利，主要由于来自不同地区的各支武装能够团结一致，在联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发扬了不怕牺牲和压倒敌人的精神；在作战指挥上，注意集中兵力各个攻占制高点，迫使清军丧失守城的信心，从而比较顺利地夺取了南京城。苏浙联军攻取东南重镇南京，对袁世凯是个沉重打击，大大减弱了北洋

军攻陷汉口、汉阳的意义；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个很大的鼓舞，开始扭转了革命军株守武昌的不利形势。从此，革命党人以南京为基地，形成一个新的革命中心，并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三、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反对袁世凯 篡权斗争的失败

武昌起义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但这时，一些革命党人的权势思想、地域观念和宗派情绪有了发展，革命营垒中原有各派系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经过分化、组合，形成了湖北、江浙两大集团。两集团对于临时革命政府的人选和所在地点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以致造成临时政府难产，同时，也丧失了联合起来，共同反击北洋军的有利时机。

袁世凯的北洋军虽然攻占了汉口、汉阳，但已师老兵疲，官兵厌战情绪日益增长。而这时北方和东北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展开，南方独立各省正派出援兵源源向武昌集中。北洋军不仅无力攻占武昌，而且后方不稳，进退两难。在这种局势下，袁世凯便加紧施展诱和伎俩，以达到其扑灭革命和篡夺革命果实的目的。他勾结英国驻中国大使朱尔典，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戈飞出面调停，提出停战议和的建议。当时在国内的革命党某些领导人，不仅看不到有利的革命形势，相反对袁世凯心存畏惧和幻想，加之受到妥协势力的包围，因而表示愿意和谈。12月18日，双方代表在上海开始“南北和谈”。在袁世凯的胁迫和帝国主义的干预下，南方代表表示，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逼清帝退位，就可以将大总统职位让给他。当时，许多革命党人纷纷反对议和，主张组织北伐军，用武力完成南北统一，但他们的正确主张不占主导地位，无法阻止和议的进行。正当南北代表进行和谈之际，革命领袖孙中山于12月25日从海外回到国内。因众望所归，于29日被独立各省代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尽管孙中山对袁世凯有所戒备，但因受到革命政府内部妥协势力的胁迫，和他本人有“但求早固国基”的思想，故在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不得不致电袁世凯，作出了“暂时承乏”，“虚位以待”的承诺。

袁世凯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甚为不满，通电指责南方

先组政府，选举总统，违背和谈协约。袁还唆使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余人发出通电，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声言要以“开战”来解决政体问题。在袁世凯的军事讹诈面前，孙中山针锋相对，激励各地军民，积极准备北伐。他指出：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黄兴为北伐陆军参谋长，并制定了六路北伐计划：“以

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路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晋）、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第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步目的后，再与第五、六军会合，共扑虏廷”。1月13日，北伐军在津浦铁路上首战告捷，败清军于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不战而下。湖北的革命军则由襄樊东下随、枣，并北出河南唐河、邓县，威胁南阳、洛阳。段祺瑞害怕后路被切断，急忙将其大营由孝感撤至信阳。当时，袁世凯所拥有的反革命军队，总数不超过十万，所控制的地区，只有河南、山东、直隶等少数省份。而分别集结在湖北、江苏两省的革命军各约有十万之众，加上其它各独立省的军队，总数不下三四十万人。北方各省的革命党人也在积极活动，准备与北伐军遥相呼应。如果革命军坚持北伐，袁世凯的北洋军有可能被击败，革命形势将起重大变化。但就在这时，帝国主义公开为其新的代理人袁世凯撑腰。它们声称只有由袁世凯统一南北，才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从财政上、军事上、舆论上对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巨大压力。在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旧官僚，则故意制造种种困难，借此胁迫孙中山妥协；革命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在右倾妥协势力包围和影响下，也动摇后退；许多独立省拥兵自重，无意北伐。在内外交迫下，不但使北伐半途而废，孙中山也“心灰意冷”，再次被迫表示，只要得到清帝退位的确切消息，袁世凯公开宣布赞成共和，他就立即辞职，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让权的诺言后，又迫使临时政府承认了关于大清皇帝退位后之《优待条例》，便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下诏宣布退位。13日，袁世凯通电南京临时政府，声称“共和为最良国体”，作出了“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的虚假保证。同日，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随后，又选黎元洪为副总统。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曾想以奠都南京、袁世凯到南京就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条件来约束袁世凯的独裁野心，保证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在袁世凯的欺骗恫吓下，上述目的均未实现。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其他一些同盟会领导人也“相率下野”。在内外反动势力联合进攻下，软弱的资产阶级节节退让，由无数革命志士流血牺牲换来的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仅仅存在三个月，即被扼杀了。政权落到了袁世凯手里，开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第五节 辛亥革命战争的经验与教训

辛亥革命战争是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各次革命战争相比较，是一次具有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发展。这次革命战争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因而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使人民群众在思想上获得了一次大解放，为尔后的革命发展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而且对亚洲和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这次战争却以向封建势力妥协而告终，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任务。因此，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

一、辛亥革命战争取得推翻清王朝胜利的经验

辛亥革命战争所以能取得推翻清王朝的胜利，首先，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革命形势已臻成熟。其次，由于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其它反清团体，进行了一系列推翻清王朝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武装起义斗争，为辛亥革命做好了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再次，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汲取了屡次起义失败的教训，采取了在清朝的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力求掌握有战斗力的武装的方针，为起义准备了骨干力量。而这些武装力量大部分分布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几省，占据着重要的战略要地。特别是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的革命党人，在深入扎实的武装起义准备的基础上，善于审时度势，抓住了起义的有利时机（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清廷抽兵入川，湖北统治力量削弱等），及时制定了起义计划，在中国腹地首先发难，使武昌首义一举成功，并直接推动了其它各省的起义（在全国十四个省的起义中，主要依靠新军或有新军参加的共有十个省），迅速打乱了清王朝反动统治的阵脚。

武昌起义前夕，在领导机关突遭破坏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基层组织，发扬了革命的主动精神，坚持按原计划发难，并采取了正确的战斗行动，以积极灵活的坚决进攻，迅速摧毁了湖北的反动地方政权，夺取了首义的胜利。在武昌首义胜利后，其它各省纷纷响应，及时宣布独立，对辛亥革命的胜利也起了巨大作用。其中苏浙沪的革命党人采取了集中兵力攻取南京的战略方针，及时把几方面的起义军团结起来，统一指挥，勇敢作战，并运用了符合当时情况的攻城战术，攻克了南京城，对扩大武昌首义的胜利和迫使清帝逊位，起了重要作用。

所有这些，都是辛亥革命起义战争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以前各

次起义的地方。

二、辛亥革命战争的教训

辛亥革命战争之所以只把一个皇帝赶跑，而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固然有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阻挠等客观原因，但主要还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敢也不想将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成分复杂，组织松散，意见纷歧，在迅速到来和迅猛发展的革命高潮面前，难于形成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起不了有力的领导作用。同盟会对暂时被迫承认共和制度的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斗争不力，致使立宪派和旧官僚采用“和平篡权”或“政变篡权”的方式，先后窃夺了许多起义省的领导权。一些掌了权的革命党人，也很快丧失革命意志，甚至蜕变成新的官僚政客。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发布的政令军令，无法贯彻执行，甚至公开遭到违抗，致使南京临时政府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重重困难。孙中山积极主张用武力统一中国的北伐，就是因为受到多方掣肘，不得不半途而废。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还表现在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惧怕群众的革命斗争。对农民的自发斗争，不仅不积极支持，反而多方限制，甚至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严重脱离农民群众，得不到民主革命主力军的支持，因而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在内外反动势力的逼迫下，只得妥协退让，将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政权拱手让给封建势力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使辛亥革命的成果付诸东流。

在军事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党缺乏统一的战略部署和积极进攻的精神，这既是资产阶级本质的弱点的表现，也是辛亥革命以妥协告终的重要原因。如武昌起义前，缺乏全国起义的周密计划和部署，武昌首义成功及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后，又未能实行统一指挥，协同作战，致使武汉的革命军不能及时得到其它各地切实有力的支援。在武汉的革命军方面，由于领导权没有完全掌握在真正的革命者手中，并缺乏革命的军事指挥经验，因而在面临优势清军进攻的严峻形势下，未能实行如恩格斯在总结历史上起义经验时所指出的那种方针：“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以致陷于被动境地。例如，起义军在攻占由残敌据守的刘家庙之后，未能及时集中兵力攻歼初到浠口一带的北洋军先头部队。又如，当北洋军分批南下，向汉口逼近时，除湖南外，其它各省均未及时出兵配合。湖北省的革命党人，也未及时将本省各处起义武装统一起来，尤其不懂得将积极反清的农民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实行城市起义与农村起义相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

当时，有人主张放弃汉阳，专守武昌；有人认为汉阳不能放弃，以免汉阳兵工厂资敌，有的要求军政府迁往汉阳，以示固守的决心。

相结合，不停顿地袭击南下清军之侧背，致使武汉起义军陷于孤军奋战，以寡敌众。加上武汉起义军采取了单纯防御的方针，作战部署一再失误，终于被迫退出汉口、汉阳，处于十分被动不利的局面。武汉起义军在军事上的失利，终于成为导致辛亥革命战争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十五章 讨袁战争 (1913年7月—9月)

讨袁战争（也称“二次革命”或“癸丑之役”），是继辛亥革命之后，由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一次革命战争。战争结果，资产阶级革命派遭到失败，北洋军阀势力乘机伸展到南方各省，开始了全国性的封建军阀专制统治。这次战争，遍及南方七八省，本章重点叙述江西和江苏两个主要战场的作战情况。

第一节 袁世凯篡权后的倒行逆施

一、破坏临时约法，实行专制统治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虽然把持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控制了许多省份和大量军队，但还没有控制整个中国；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仍然据有江苏、江西、安徽、广东、福建等七八个省和几十万军队，在临时参议院中还有相当的力量，在人民中间依然具有较大的影响。为此，袁世凯采取各种手段，处心积虑地分化、打击革命力量，破坏民主政治，以便建立专制独裁统治。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前，曾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并对临时大总统的权力作了种种限制。其中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和外交官员，制定官制、官规以及宣战、媾和、缔约等，须经参议院同意；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命令，须经国务员（包括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副署才能生效。孙中山企图用这些条文束缚袁世凯的手脚，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但袁世凯上台不久，就违背了“谨守宪法”的誓言，无视共和政体，肆意践踏临时约法，凡事置内阁于不顾，专横跋扈。1912年6月，袁在王芝祥的任命问题上，公然破坏公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规定，独断专行，将内阁总理唐绍仪逼得弃职出走，农林总长宋教仁和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也愤而辞职。唐绍仪辞职后，由陆征祥任国务总理。不久，又由袁世凯的心腹赵秉钧取而代之，把内阁变成了他的御用机关。

1912年4月，临时参议院由南京迁到北京，各党派经过激烈的争夺、分化和改组，逐渐形成了以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以章炳麟为首的统一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这三党主要由一些立宪派、旧官僚政客、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为骨干组成。它们反对同盟会，拥护袁世凯，力图控制国会。同盟会则在宋教仁等主持下，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于1912年8月建立国民党，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由于孙中山当时表示自己从事实业，故整个党务由宋教仁代理。国民党企图在妥协中求发展，幻想在暂时维持袁世凯个人权位的前提下，通过“新旧合作”、“朝野合作”、政党竞争、发展实业等措施，扩展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实力，进而组织责任内阁，把中国纳入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轨道。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议席。宋教仁大受鼓舞，于是四出奔走游说，宣传“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希望由国民党组织内阁，以分袁之权。宋教仁的活动，触怒了寸权不让的袁世

此次作战，革命军官兵共伤亡八百四十多人，丢失山炮十八门，步枪六百余支，子弹二千三百余箱。（见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66页。）

11月19日，“海容”、“江贞”、“湖鹗”三舰从九江上驶，通过刘家庙清军防线，抵达武汉江面。

凯。他派人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车站将宋暗杀。“宋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一些革命党人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重新走上讨袁的道路。首先主张武力讨袁的是孙中山。3月26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当晚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孙中山认为“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主张立即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袁。但黄兴、陈其美等认为革命派“元气未复”，兵力不足，对于“宋案”，主张“静待法律解决”。当时，不少国民党要人与黄兴持相同态度，孙中山孤掌难鸣，只好暂时作罢。革命党人的犹豫不决，为袁世凯进行战争准备提供了充裕时间。

二、加紧战争准备，策划镇压革命

（一）裁遣革命军，扩充北洋军

以武力消灭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实现专制独裁统治，是袁世凯的既定方针。以欺骗手段削弱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则是袁世凯进行战争准备的第一步。

从武昌起义到民国建立，全国陆军总数约九十八万六千四百余人。这些军队，分别以南京临时政府统辖的南方革命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为中心，形成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军事阵营。南方革命军共有陆军八十个师团，约四十五万人。仅江苏一省就集结了二十多个师，约十五万人。临时政府迁至北京后，黄兴以南京留守名义主持留守府，统辖南方各军。革命军控制的南方各省，地形复杂，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业发达，有比较优越的地理和物质条件。袁世凯的嫡系部队有北洋新军第一至第六师和第二十师，禁卫军一个师和一个混成旅，总数约十一万四千人。北洋军主要驻扎于冀、鲁、豫三省，其势力延伸到长江以北各个地区。这些地区除山东外，多为贫瘠之地，农业产量较低，工商业不够发达。因此，北洋军缺少坚实的经济基础。

靠反动军事力量起家的袁世凯，深深懂得军权的重要性。在他就职之初，首先颁布“训勉军人令”，提出“军人对于本大总统，有服从之义务”

武昌起义之初，黎天才率粤军济字营驻防吴淞。上海起义时，黎率部反正。因光复会的负责人之一李燮和在上海起义后遭到排挤，便在吴淞成立军政分府，任“中华民国光复军总司令”，黎部归李统辖，故另称淞军，亦称济军。由上海都督陈其美统辖的部队则称沪军。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第306页。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86页。

1912年2月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唐绍仪被任为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在组阁时，曾答应同盟会由王芝祥（同盟会员）任直隶都督的要求，袁当初亦表示同意。1912年6月初，袁又以直隶军人反对为借口，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并在唐绍仪未签名副署的情况下，即将委任状公布下发。唐绍仪及同盟会的四个阁员被迫辞职。

1913年5月，梁启超又联络这三党组成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

；接着，袁又借口“南方军队骤增，糜饷过巨”而“倡议裁兵”，同时对驻宁十几万军队扣饷不拨，并散布南京留守府“拥兵自卫”、“势同树敌”的舆论，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迫其撤守、裁军。革命党人看不清袁世凯的险恶用心，认识不到兵权对革命的利害关系，客观上也遇到了军饷匮乏的困难。黄兴等为使“南北嫌疑尽泯”，达到“行政统一，民国基础自趋巩固”，立即对革命军进行裁撤。驻宁军队按照“客军各回原省，留宁之军汰弱留强”的原则，先后解散了十余万人。南京留守府也于1912年6月14日主动撤销。在江苏的影响下，南方各省纷纷效法。如湖南原有五个师两个旅，缩编为五十三个守备营和一个混成旅；湖北原有八个师两个混成旅，先后裁减五个师；江西也裁减八个团以上。到讨袁战争爆发时，由革命党人控制的军队仅剩十余万人。其中，江西有两个师一个混成旅，江苏有四个师两个混成旅，安徽有一个师，湖南有一个混成旅，广东有两个师一个旅，福建、四川各有一个师。

此外，袁世凯还施展种种伎俩，拉拢收买南方革命军的军官，破坏南方革命军的团结，并制造借口，枪杀革命军将领，排斥革命党人，使革命势力受到削弱。

与此相反，袁世凯所控制的武装，非但没有减少一兵一卒，反而大大膨胀起来。在此期间，除继续加强北洋陆军七个师和中央禁卫军一个师外，袁又命冯国璋将原直隶陆军第一标扩编为混成旅，以刘询为旅长；把为镇压武昌起义而招募的备补军五路（每路五营）改为拱卫军，另增募备补军五路（1913年2月改编为护军，直隶中央）；将原驻奉天的陆军第二混成协改编为陆军第二混成旅；令倪嗣冲在皖北编练新军二十余营；另增编骑兵第二旅和陆军混成第一团，直属陆军部。这样，到1913年初，仅北洋军和直、豫、鲁三省军队，就已达二十二万一千四百余人，总数远远超过南方革命军，

陈其美：《致黄克强劝一致服从中山先生继续革命书》，《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卷二，《遗著》，第22页。

根据《北洋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统计。另一说为一百零八万四千零三十人。（见《军事月报》1912年1月号。）

参见《唐绍仪演说词》（《民立报》1912年4月2日）。按：唐所说的八十一个师团，可能系指八十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不是完整的八十一个师。

参见《北洋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按：1912年1月16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改革陆军官制和编制的命令，将陆军镇、协、标、营、队、排、棚，改称为师、旅、团、营、连、排、班。

何宗莲第一师驻察哈尔，王占元第二师驻保定，曹锟第三师驻北京，杨善德第四师驻天津，靳云鹏第五师驻山东，李纯第六师驻信阳，范围璋第二十师分驻辽阳等地。依附于袁世凯的张勋武卫军驻兖州，倪嗣冲皖军驻皖北，姜桂题毅军分驻察哈尔与河南。此外，还有阎锡山的晋军，张凤翔的陕军，张锡銮的奉军，亦归附袁世凯。

《诰诫军人训令》，《袁大总统书牒汇编》（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卷二，第28页。

改变了武昌起义后南多北少的兵力对比情况。

（二）大量购置军火

袁世凯在加紧扩军的同时，还大量购置军火，提高军队战斗力。1913年4月29日，袁指令陆军部派专员赴天津，通过奥国洋行向德国订购大宗军火，计有野炮十八门、机关炮四十门、机关枪八挺、1888年式快枪五万支、各种子弹四百万发。另向奥国订购1895年式曼利夏步枪一万四千支。同时，密令上海制造局将枪弹五十万发解送扬州，交徐宝珍师储存；令福建、德州制造局和汉阳兵工厂赶制枪炮运送北京，装备北洋各师。袁还通过大军火商雍剑秋接收德国艾哈德兵工厂“无偿送给”的步枪六千支，口径为二百四十毫米的大炮十尊（战争打响后，德国公使又通过雍剑秋送给袁世凯步枪一万支、口径为七十五毫米的大炮二十尊和斯密特手枪等军火一批）。另由海军总长刘冠雄出面，向德、美、奥等国订购新式鱼雷艇，其中德国四艘、美国三艘已于1913年初驶达上海。这样，北洋军在装备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南方革命军。此外，袁还秘密派人携大宗款项，到武汉等地购买粮米，以备军用。

（三）举借外债，筹集战争经费

袁世凯大搞扩军，使国家财政更显拮据。根据北洋政府的预算，1913年度的财政收入为四亿一千二百六十六万余元，而支出则为四亿九千七百八十七万余元，赤字八千五百二十余万元。而这一年全国军费开支预算，仅陆军就达二亿元以上，后虽一再压缩，仍达一亿六千余万元。加上海军军费九百八十七万元和各项临时开支，全部军费约占总支出的五分之二。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仍远不能满足袁世凯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需要。为了筹集战争经费，袁不惜饮鸩止渴，以各种手段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据统计，从1912年1月到1913年4月中旬，袁世凯向外国借款共二十八次，其中全部或大部用于购买军火、充当军政费用的借款有十七次。款项较大的有：1912年上半年从外国银行取得的五次垫款（总计银一千二百余万两）；1912年至1913年瑞记洋行的三次军火贷款（共三百五十万英镑）；1913年4月10日与奥国签订的购买军舰借款（三百二十万英镑）。这些借款都是以出卖国家主权或接受高额利息而获得的。但是，袁世凯仍不满足于以上借款，又于1913年4月26日背着国会，与俄、英、法、德、日组织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巨额借款合同，即所谓“善后大借款”。该借款合同规定四十七年还清，以盐税为担保，并由银行团指派外国顾问和会计监督中国

周震麟：《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337页。

财政开支。

袁世凯通过“善后大借款”，博得了帝国主义的欢心和支持，同时更加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满。革命党人尤表愤慨，纷纷通电指责，要求袁“立罢前议”。孙中山向五国银行团写信声明：中国人民不承认非法借款。对于革命党人要求严惩暗杀宋教仁的凶犯和反对借款的呼声，袁世凯斥之为“有意破坏，煽动讹言，逞少数人权利之私图”。5月21日，他公开发表声明，攻击孙中山、黄兴“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除捣乱外无本领”；声言“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6月，他借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三都督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不服从中央，先后下令将三人褫职。与此同时，密令北洋军沿京汉、津浦路向南开进，决心推行其蓄谋已久的“武力统一”计划。

黄兴：《致中央及各省通告解职》，《黄留守书牍》卷下，第18页。

《时报》，1912年6月19日。

第二节 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作战总方针和革命党人的讨袁决策

一、袁世凯的作战总方针和兵力部署

早在 1913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3 日，袁世凯就连续召集段祺瑞、段芝贵，陈宦、江朝宗、冯国璋等亲信及归其统辖的各省军队要人开会，策划武力对付南方革命党人的办法。5 月 1 日，调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确立了“战时内阁”体制。5 月 6 日，再次召开秘密会议，初步拟定了对南方革命党军队作战的总方针。这个方针把用兵的重点放在湘、赣、皖、苏四省；而以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为交通运输线；以武汉、徐州为进攻出发地；以海军策应陆军作战；拉拢滇、桂、黔三省军队作为牵制力量。为实现这个作战方针，确定了如下作战部署：

1、沿京汉路南进的部队，主要攻击目标为湘、赣、皖三省。以驻信阳的北洋第六师（欠一部）为主力，河南第一师及混成旅为预备队，由鄂向赣进攻；以驻皖北的倪嗣冲所部（约步兵一个师、骑兵二个营）、河南雷震春的护军一部（约步兵五个营、炮兵二个营、骑兵一个营）以及赵倜所部毅军（约步兵十一个营、骑兵二个营），进攻皖省；北洋第二师为京汉路方向总预备队。另以北洋第六师一部和黎天才的湖北第一师一部，分别驻守武昌、汉阳、汉口。黎师另一部及雷震春护军备补兵一部，自荆州至新沟、蔡甸一带设置防御阵地，警戒湘省。

2、沿津浦路南进的部队，主要攻击目标为江苏南京。以驻鲁南的北洋第五师、驻兖州的张勋武卫军（约十九个营）为主力，驻天津的北洋第四师、山东混成旅之一部为预备队，经徐州进攻南京；山东混成旅另一部防守济南；扬州徐宝山部（约步兵一个师）为牵制部队。

3、以拱卫军、北洋第二师一部并奉军一部，负责防守北京。

4、以驻张家口的何宗莲第一师为机动部队，防备粤军由海路北上，或准备由海路南下攻粤。

5、姜桂题毅军驻张家口一带，防御蒙军袭扰。

6、调闽军一部进驻上海，并调驻西陵、南苑、定县等处的第三师一部随往，以防不测。

7、第三师及第一师另一部由海路运往南方，登陆地点临时决定。

此外，对由革命党人任都督的湖南、广东，也作了相应部署。对于湖南，一旦谭延闿响应讨袁，即三路出兵进攻：一路由贵州的唐继尧派驻在镇远的

据《北洋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统计。另参见《民国经世文编·军政》第 8—9 页。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 1917 年版）第一编，第 48 页。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08—109 页。

部队直下常德；一路由陆荣廷派广西的部队由南向北进攻；一路由黎元洪派部队由岳州向南进攻。对于广东，若陈炯明宣布独立，则任命副护军使龙济光为广东都督，令其率所部进攻广州。另派海军游弋于闽、粤海面，以防止闽粤两省与南京联为一体。

要进军南方，必先控制湖北，所以袁世凯极力拉拢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李烈钧被免职后，黎又兼江西都督）。而黎此时已完全投入了袁的怀抱，他致电袁世凯，表示“元洪惟知服从中央”，“决无瞻顾”，决计让北洋军开进湖北，并取得了部分作战指挥权。

袁世凯将北洋系统的绝大部分兵力直接用于对南军作战，但按实际编制，各师的兵力只有七成左右，要实现其总的作战企图，兵力仍显单薄。为此，在直隶、河南、安徽、山东设立募兵机构，计划招募新兵二万左右。

这样，袁世凯完成了战争准备和部署，摆出了决心消灭南方革命军的咄咄逼人的阵势。

二、革命党人的讨袁决策

在袁世凯陆续派兵南下，战争端倪明显可察的情况下，孙中山再次呼吁革命党人丢掉幻想，实行武力讨袁。他指出：“除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之外，实无其它办法”。孙中山分别致电湘督谭延闿和粤督陈炯明，要求他们立即宣布独立，进行讨袁，但谭、陈在回电中均借故推诿。孙无奈，欲亲自赴粤发动讨袁，当即被人劝阻。孙又提议由陈其美先在上海宣布独立，打响讨袁第一枪。陈其美、黄兴等人坚不同意，认为“据数里之地以抗敌，犹执卵投石”。此时，驻沪海军前来接洽，愿意宣告独立。孙甚喜，建议海军由海上进攻津沽。陈其美等人反对海军先发，认为“须海陆并起”才行。不久，驻沪海军奉袁世凯命令开赴烟台。孙闻讯后，急欲劝阻，指出：海军“开赴烟台，恐将生变”。陈、黄则认为“海军既表同意于先，断不中变于后”。结果，海军北上后即被袁控制。孙

中山别无他法，决定派人去策动南京第八师几个忠于革命的营长，先“冒险

袁世凯：《通令禁止造谣保卫商民文》，《袁大总统书牒汇编》卷二，第46页。

《时报》，1913年5月24日。

另说共计二十二个营，每营均三百人（见《民权报》1913年5月1日）；又说为七八千人（见《亚细亚日报》1912年6月4日）。

1913年5月9日，徐宝山被炸死。30日，袁世凯将该师改编为江苏陆军第四师，任徐宝山之弟徐宝珍为师长。

1911年，沙俄政府乘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政权交替之际，策动外蒙古“独立”，炮制傀儡政府，协助叛军进占外蒙各要地，进而于1913年入侵内蒙。

一发” ，以树立讨袁的旗帜。黄兴初则力言不可，认为那样将使“八师先自相战斗” ，后见孙中山主意已定，并准备亲往南京，只好服从孙的意见，遂定下武力讨袁的决心。但黄又认为孙“不善戎伍” ，且恐孙“轻身陷阵” ，遭到不测，为留孙“以任大事” ，便自告奋勇代孙前往南京指挥作战。

革命党领导人在要否武力讨袁和如何讨袁问题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结果丧失了战机。7月初，原江西都督李烈钧潜赴上海孙中山处，表示愿意率江西军队首先发难。孙遂决定李烈钧回江西发动，黄兴去南京发动，其它各省伺机响应。

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人虽然确定了武力讨袁的决策，但整个国民党人在思想和行动上并未真正统一。在北方的国民党议员中，少数人离开国会到南方参加讨袁战争，不少人仍呆在国会中醉心于“法律倒袁”。在南方的国民党都督中，也是各怀心计，涣散不齐。湖南的谭延闿、福建的孙道仁及江苏的程德全，非旧官僚即立宪派，他们观望气候，随风摇摆，不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安徽的柏文蔚和广东的陈炯明，内部矛盾重重，没有完全掌握军队；唯有江西的李烈钧态度明朗，讨袁坚决，并掌握着一部分比较可靠的军队，但力量有限，难于影响全局。此外，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没有组织统一的作战指挥中心和制定统一的作战方案；对于与战争有关的其它重大问题，诸如军队的调遣、动员，兵员的训练补充，粮秣弹药的保障等，都未研究和解决。这都对以后的战争产生不利的影响。

此外，宣布独立的各省，曾制定过各自的作战方案。如粤省拟派三个支队出师北伐，以一个旅援助江西；安徽拟以一部兵力阻击倪嗣冲军，另一部兵力渡江援赣；四川拟在攻占重庆后，顺流东下；沪军则准备攻占制造局，控扼吴淞口等等。这些方案也因种种原因，均未能顺利实现。

转引自：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181页。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下卷，第477页。

《国民党二次讨袁之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党二次讨袁之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节 江西讨袁作战 (1913年7月—8月)

一、双方作战部署

(一) 北洋军的部署

早在1913年5月初，袁世凯就命豫南总司令兼北洋第六师师长李纯率该师由信阳向湖北之兴国（今阳新）、蕲春等处移防，王占元之第二师随后跟进。副总统黎元洪指令李纯：“贵师将来开至兴国、田家镇一带，选一待机阵地，一旦有事，即相机直捣九江或南昌”。5月中旬，李纯以该师第十一旅旅长马继增率步兵第二十一团附机关枪、骑、炮各一连开赴田家镇，并分兵一部进驻武穴，警戒九江及安徽方向；以第二十二团团团长张敬尧率所部及机关枪两连，骑、炮各一连，进驻兴国，监视瑞昌方面之赣军；师部及第十二旅之二十三团、二十四团进驻蕲春、蕲州一带，准备寻机渡江。上述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后，即对江西的地形及赣军分布情况不断进行侦察，并进行渡江作战准备。

7月2日，已被袁世凯收买的九江要塞司令陈廷训密电黎元洪，告知他革命党人准备在九江起事，并要求袁世凯“速派军队及兵轮来浔（九江），以资镇慑”。袁闻报后，即令第六师渡江南进，第二师一部迅速由鄂北南下，与第六师会合（两师共约一万五千人）；另调驻辽阳之第二十师一个旅进关赴鄂，作为进攻江西的二梯队；抽调第二师、第三师各一个团进驻武汉设防，奉军一个旅进驻孝感一带，保护武胜关以南铁路线；另由海军次长汤芑铭率“飞霆”号等军舰五艘，驶往江西，策应陆路进攻九江。该路军队由黎元洪节制。

7月6日，第六师所属吴鸿昌第二十三团附机关枪一连并电话、卫生各队，先行渡江，开赴江西。10日，该师主力从官牌夹（九江西约四公里）登陆，全部抵达长江南岸。李纯以萧安国第二十四团两个营驻九江城西部，与驻城东部的赣军四个营同城相峙；以吴鸿昌第二十三团进驻沙河镇（九江西南十五公里）、莲花洞（九江南十二公里）一线，警戒德安方向赣军；以张敬尧率第二十二团第二营一连、第三营及周文炳的第二十一团第一营附机关枪一连，进驻金鸡坡（九江东四公里）、八里坡（九江东南三点五公里）至马宿岭（九江东南七点五公里）一线，警戒姑塘及湖口方向的赣军；以第二十四团一个排进驻洗心桥（九江西二十公里），警戒瑞昌方面赣军；以混成第十一旅旅长马继增率第二十一团第二营、第二十四团第二营、炮二十团第二

陈其美：《致黄克强书》，《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卷二，《遗著》，第22页。

《孙中山致黄兴书》，《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51页。

营、机关枪第四连进驻官牌夹，为总预备队。这样，北洋军第六师约七千余人占据了九江外围诸要点，形成了对九江城的包围和对九江以南赣军的进攻态势。

（二）赣军的部署

战前，赣军共有两个师和一个混成旅，计十个团。江西护军使兼第一师师长欧阳武驻南昌，所部第一旅旅长林虎率第一、二两团驻德安、瑞昌一线；第二旅旅长余维谦所部第三团两个营驻九江，第四团是新兵，随余驻南昌训练。第二师师长刘世钧驻九江，所部第三旅旅长赵复祥部第五团驻南昌，第六团两个营驻九江，一个营驻德安；第四旅旅长蔡森率部驻赣州；混成旅旅长方声涛率周璧阶第九团、金其昌独立营驻姑塘，所属第十团李明扬部驻湖口。总兵力约二万五千人。赣军主要集中在九江以南和南昌以北地区，在长江沿岸的重镇九江只配置了一个师部和四个营的兵力，湖口只有一个团的兵力，省城南昌的防务也很薄弱。

1913年7月8日，李烈钧从上海回到湖口，立即召开高级官员会议，商量讨袁事宜。12日，得知驻守德安之林虎部已与北洋军接火，遂宣布江西独立。同日，省议会在南昌开会，举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江西都督。李烈钧等拟定作战计划如下：将所有在赣北的军队分为左右两军，以林虎为左翼军司令，指挥第一、二团和第六团一个营，进攻沙河至十里铺一线之敌，得手后进取九江，以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率所部第九团和独立营从姑塘进攻九江。另以水巡总监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指挥李明扬第十团守卫湖口，李烈钧亲往督战。部署略定，李又委托欧阳武给广东陈炯明和湖南谭延闿分别写信，要求两省派兵援赣。赣军的战略意图是夺取九江，消灭南犯之敌。

但赣军内部并不巩固。九江要塞司令陈廷训完全投靠了袁世凯；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早与李烈钧不睦，并与黎元洪、袁世凯秘密勾结，表示对李烈钧“阳奉阴违，以作牵制”，准备配合袁军作战；第一师师长欧阳武因受袁世凯拉拢，反袁也不坚决。赣军两师两团中，真正受李烈钧指挥并有点战斗力的，只有林虎从南京带来的步兵第一团（附机关枪两连、炮兵一连）和伍毓瑞的第三团，不足三千人。与北洋军相比，赣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

《黄兴复孙中山书》，《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53页。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册，第1049页。

《黄兴复孙中山书》，《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53页。

转引自：《李纯致陆军部电（1913年5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二、九江、湖口之战（参见附图二十六）

袁世凯侦悉李烈钧回到湖口准备发难的消息后，遂指令李纯师的过江部队迅速向南推进。7月10日，吴鸿昌第二十三团越过沙河，不断向赣军开炮挑衅。

7月11日，驻守德安的赣军旅长林虎致电欧阳武，报告北洋军寻衅情况，请求速发援兵。12日拂晓，林虎分兵二路向在当面寻衅的袁军发动进攻：以主力沿铁路向沙河进攻，另派一部出右翼袭击十里铺，策应正面。从此，揭开了武装讨袁的战幕。袁世凯指令李纯对赣军“即按叛兵剿办”。李纯一面令驻沙河之吴鸿昌团阻击赣军，一面命驻十里铺之萧安国团向沙河迂回前进，抄袭赣军后路。萧团于途中与林虎派出的策应部队遭遇，前进受阻。林虎旅装备比较齐全，部队经过一定的训练。其主攻部队经一昼夜战斗，夺占了沙河镇，进据铜鼓岭、骆驼山等处炮台。吴鸿昌团死伤三百余人，向赛湖方向败退。李纯惊慌失措，从官牌夹逃回停泊在长江中的座舰，急电袁世凯“万乞迅派增援，以救危局”。但林虎旅首战告捷后，没有乘胜追击，丧失了歼敌良机。

沙河方面开战后，驻九江城内的赣军第三团团团长伍毓瑞，与同驻该城的赣军第二师师长刘世钧和第六团团团长李定魁等磋商，计划趁北洋军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之际，以赣军第三团之一营与第六团之两营，迅速歼灭北洋军驻九江城西的两个营，以第六团之另一个营为预备队，监视陈廷训的炮台兵；待解决城西两营敌军后，率部沿庐山开赴德安，从翼侧攻击九江以南袁军，配合林虎旅作战。此计如能实现，将陷李纯师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不料李定魁竟于次日违约，按兵未动。伍毓瑞见情况突变，即弃军逃往湖口，所部一个营转移湖口，一个营投附刘世钧。九江城全为北洋军所占。

当北洋军第六师右路在沙河战败，向赛湖以北撤退时，又得悉姑塘方面方声涛之右翼赣军亦准备向九江推进。李纯急忙调整部署：令马继增率预备队在官牌夹构筑防御工事；令驻九江城西的二十四团迅速抽调兵力，协同二十二团之一、二营加强城南十里铺的防御；令二十一团第一营加强城东南之八里坡的防御；令张敬尧率混成二十二团第三营、第二营第六连及机枪、山炮各一连，协同陈廷训部守卫金鸡坡炮台及普应寺一带。这时，北洋军第六师已呈背水之势，官兵慌乱。李纯也自称“力尽智穷”，一日数电袁世凯，

《黎副总统政书》（上海古今图书局1915年版）卷二十三，第7页。

赣军兵力，众说不一，此处据伍毓瑞《湖口起义的回忆》一文所说，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351页。

据欧阳武后来说：“当时我接到举我为都督的公文，即掷于地，不肯承认”。见《欧阳武供词》（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惟乞援军迅到”。

7月15日，黎元洪致电驻孝感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令该师驻鄂各部迅速开赴九江，其任务是：进攻湖口，并配合第六师进攻德安。王占元接电后，即于当日派朱廷灿第七团由汉口开赴九江；16日，又派步兵第四旅旅长鲍贵卿率步兵第五团一、三营（携管退炮八门）及机关枪连开赴九江。第二师其余部队，拟在第二十师和第三师接防后，再向九江集中。同日，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陆军第一军军长兼江西宣抚使，李纯为第一军左司令，王占元为第一军右司令，以统一前线的作战指挥。

林虎旅进占铜鼓岭、骆驼山后，欧阳武又令第二旅旅长余维谦、第三旅旅长赵复祥，率领驻南昌的第四团和第五团开赴德安，计划与林虎旅会合后，以主力从青山（九江西南十二公里）、瓜子岭（青山北）向正面进攻，分兵一部从铜鼓岭侧击十里铺之敌，然后一举拿下九江。但赣军动作迟缓。16日，赣军与袁军在赛湖一带作战，虽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但因兵单势孤，未敢追击。17日，北洋军第二师的两批援兵已先后赶到九江，会同第六师马继增旅向赣军反扑。而这时赣军担任前沿警戒的第六团一个营忽然叛变投敌，遂使林虎旅军心浮动，放弃铜鼓岭各炮台，退守蓝桥（九江西南二十公里）。

这时，赣军右翼方声涛旅的攻势也已受挫。按预定计划，赣军左右两翼应于7月12日拂晓同时发起攻击，但方声涛之右翼因临时调集部队，以致行动缓慢，迟至16日晨7时才开始进攻。方声涛将周璧阶之第九团和新从湖口来援的伍毓瑞团（欠第二营）分为左右两路，由姑塘向九江东南之八里坡一线发起攻击。张敬尧一面令守卫八里坡的第二十一团第一营在正面组织防御，一面令驻守十里铺之两个连携机枪、火炮绕击方部左翼，自率该团两个连和二十四团一个连抄袭方部右翼。方部第九团团团长周璧阶挥刀跃进，带头冲锋，但因专恃勇猛，不讲战术，致被敌击中，不幸阵亡，使该部士气受到影响。双方激战至下午1时，左路赣军伤亡惨重，士气动摇，部分士兵北向投敌。这时，北洋军第二师第六团又前来增援。伍毓瑞虽率赣军右路奋力抵御，但在北洋军多路夹击下，也力渐不支，遂撤出战斗，退回姑塘。北洋军进至马宿岭，因地形不熟，未敢继续追击。次日，赣军第九团两个营（千余人）绕道至金鸡坡，向张敬尧部缴械投降，使姑塘赣军兵力锐减。

7月22日，王占元率第二师主力（欠第八团）抵达九江，增强了进攻力量。23日，抵达九江的第一军军长段芝贵发布作战命令，定于24日进攻湖口。其部署是：由第二师鲍贵卿旅担任主攻任务，于24日夜乘船从官牌夹出发，在助攻部队掩护下，从湖口东岸登陆，尔后进据钟山，夺取湖口东炮台。以左司令李纯为守势地区司令官，自邱（书阁）南（康）大道经十（里铺）莲（花洞）大道，至沙河镇、洗心桥一线，择地构筑防御阵地，掩护北

洋军右侧后方安全；第六师旅长马继增率该旅第二十一团由八里坡经马宿岭、狭市向姑塘方面攻击前进，掩护左翼进攻部队；第六师二十二团团团长张敬尧率所部由金鸡坡出发，经新港（九江东十一公里）向灰山（湖口西岸）、回峰矶（新港东五公里）进击，相机占领湖口西炮台，封锁鄱阳湖口，协同海军掩护鲍贵卿旅的登陆作战。

7月24日，张敬尧团沿长江南岸向湖口西炮台进攻。该团步炮协同，首先攻占新港。25日，经激战，攻占了三面临水一面依山的灰山、回峰矶赣军据点。接着，又占领了西炮台。24日夜12时，鲍贵卿旅（步兵五营、炮兵二连、机枪兵三连、辎重兵一连、电话和桥梁队各一大排）乘船从官牌夹出发，沿长江东进，偷渡鄱阳湖口；次日凌晨，在汤芑铭所率军舰的掩护下，利用浓雾于湖口以东抢滩登陆，进攻湖口钟山炮台。汤芑铭的助纣为虐和李烈钧的麻痹大意，使湖口的赣军吃亏不小。当江西宣布独立不久，汤即率舰队驶近马当炮台。炮台守兵准备发炮拦击，但李烈钧认为与汤“共事亦颇久，当不致有他故，不欲示以防御”，任其向九江方向驶去。25日拂晓，汤以四艘军舰分成两组，突然轰击湖口东、西两炮台，致使赣军措手不及。不久，钟山炮台部分士兵哗变，更加削弱了湖口的防御力量。午后8时，在北洋军水陆夹击下，湖口终于失陷，李烈钧率余部从水路退守吴城。方声涛所部，在袁军旅长王金镜所率之右翼支队猛攻下，也于26日上午放弃坚守多日的姑塘阵地，退往吴城。

北洋军攻占湖口、姑塘后，段芝贵令第二师旅长鲍贵卿为湖口守备司令，率该旅驻守湖口；第六师旅长马继增以一部驻守姑塘，其主力配置在通南康（今星子）大道上，伺机进攻南康；令第二师第四团由马头镇向瑞昌方向发展，保护九江西侧安全；令王占元为西区留守司令，担任后方警戒兼理后勤事务；令李纯率第六师各团及第二师一部，从沙河、十里铺、马头镇分道出发，进攻扼守蓝桥之赣军。

30日拂晓，北洋军对蓝桥发动进攻。赣军鉴于蓝桥地形开阔，恐遭敌迂回侧击，稍事抵抗，即于当日上午放弃该地，退守黄老门。黄老门位于蓝桥南十公里处，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面山口险狭，铁路穿山而过，是个易守难攻之地。林虎旅在此构筑阵地，组织防御。30日夜，北洋军第六师第二十三团和第二师第五团向黄老门轮番进攻。林虎指挥部队扼守南面高地，顽强抗击，使北洋军进攻受阻。李纯连夜调正在官牌夹休整的第二十二团乘火车赴黄老门助战。31日凌晨，北洋军分三路进攻赣军阵地：以第二十三团攻赣军正面，第二十二团攻赣军左翼，第五团攻赣军右翼。林虎旅竭力抵抗，

林虎团原为南京大总统府的警卫团，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李烈钧请将该团调往江西，后扩编为江西第一旅，林虎为旅长。

《赣案续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第49页。

《李纯致大总统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相持约两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弃守黄老门，经德安退往建昌（今永修）。

这时，湖南已经宣布独立。湖南都督府军事厅厅长程潜等人，鉴于赣军孤军作战，节节失利，便一面组织援赣部队，由团长唐蟒率领赴赣，一面敦促谭延闿与四川熊克武进行电报联系，约其三路出兵，会攻武汉，以配合赣军作战。该电要求川

军趁“北军会攻九江，武昌空虚”之机，与湘军和在湖北沙洋宣告独立的刘铁部联合行动，“乘机直取武汉”，以断绝北洋军南进的通道，威胁攻赣北洋军的侧背，将赣军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但该电被贵州都督唐继尧截获，并于7月31日密告黎元洪，致使三路攻汉的计划成为泡影。唐蟒之援赣部队也迟迟未至。

赣军得不到邻省的支援，在优势敌人进攻下，节节后退，完全丧失了反攻的能力。

三、南昌外围的作战

北洋军攻占黄老门后，乘胜疾进，不战而得德安；与此同时，还分别占领了南康、瑞昌，巩固了后方的安全。8月7日起，北洋军便以南昌为目标，分路攻击前进。其进攻部署是：第六师第十一旅于7日由南康乘船沿水路进攻吴城；陆路则分兵两路进攻建昌，第六师二十二团为右纵队，由拖沟岭（德安南）出发，沿驿南（德安南十三公里）一线开进，第二师第五团为左纵队，由德安沿南浔未竣铁路前进，第六师十二旅（欠二十四团）为预备队，随后跟进。上述各部完成当前任务后，乘势续进，合击南昌。

此时，林虎旅已丧失斗志，不待敌人接近，即放弃建昌，退守山下渡（今永修县城附近），又被北洋军击败，旋即经奉新退往湖南。8月10日，北洋军未遇抵抗，即进占建昌。

李烈钧由湖口退往吴城后，整顿了撤回的部队，复命方声涛负责吴城防务。8月7日夜，北洋军马继增第十一旅的官兵约七十人，乘坐民船，伪装难民，利用夜雾乘风直驶吴城东岸登陆。吴城赣军仓促抵抗。8日拂晓，马旅援军赶到，赣军不敌，慌乱败退。吴城失守后，李烈钧率余部退往南昌。

留守南昌的江西都督欧阳武闻吴城失守，即于9日弃职潜逃。欧阳武的两营护兵被宪兵司令廖伯琅控制。当李烈钧于11日率部退至南昌城下时，廖伯琅紧闭城门，拒绝李部入城。李烈钧一面打电话斥责廖伯琅，一面派兵一营攀城而上，打开城门。廖伯琅仓皇逃往赣州（后被李纯捕杀）。李烈钧进城后，命伍毓瑞率领欧阳武留下之两个营和从吴城撤回之两个营在樵舍（南昌东北二十公里）、乐化（南昌北十六公里）一线组织防御，抗击北洋军。

8月16日下午，李纯令马继增第十一旅（欠二十二团）由灌口出发进攻

樵舍；张敬尧第二十二团由山下渡乘船，沿赣江进攻南昌；其余部队留守建昌。

此时，张敬尧之前锋部队已抵距南昌六十余里之花岩

街，因陆路进展顺利，不愿折回山下渡从水路进军，建议由花岩街经落花街，从陆路进攻南昌。李纯同意了张敬尧的意见。18日上午9时，张敬尧分兵两路夹击落花街。赣军不支，退往高桥（南昌北）。中午，张敬尧以第二营从左侧，第三营从正面，向高桥发起进攻。赣军坚守阵地，竭力抵抗，两小时后，阵地被占，退至赣江以东，企图固守南昌。张敬尧部一面发炮猛轰，压制赣军，一面由第二营征集船只，强渡赣江。下午6时，张部攻入德胜门，向城内纵深发展。伍毓瑞虽率部奋力抵抗，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只得撤离南昌城，掩护李烈钧等人退往湖南。李烈钧、林虎等见败局已定，遂遣散余部，只身潜赴上海，后又亡命海外。

8月18日，李纯部占领南昌。不久，驻赣州的赣军第四旅旅长蔡森率部向李纯投降。至此，首先发难讨袁的江西全省落入了北洋军阀之手。

江西是讨袁战争的重要战场。赣军讨袁作战的迅速失败，对整个讨袁战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兵力对比悬殊。主观方面，一是内部不纯，军心不齐。除陈廷训、刘世钧等暗中与袁世凯勾结外，一些中下级军官也各怀贰心。如战斗刚刚打响，九江城内的第六团团长按兵不动，不久，该团一个营在沙河前线倒戈；之后，又连续发生成建制的部队投降和溃散现象。这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动摇了讨袁官兵的士气。二是准备不足，部署不当。李烈钧宣布独立，是在林虎旅与敌接战后仓促决定的，在军事上缺乏应有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如九江、湖口为长江要冲，湖汉纵横，丘陵起伏，利于防守，赣军如能以重兵扼守，将北洋军阻止在长江以北或牵制在九江、湖口地区，虽不能决定最后的胜利，但必能延长战争的时间，有利于其它省份发动讨袁和支援江西。由于李烈钧等虑不及此，致使九江、湖口迅陷北洋军手中，战局急转直下。三是战术呆板，不善于利用江西的山岳丛林和险要山口伏击歼敌，阻止敌人的进攻，致使敌军长驱直进，迅速占领了江西。此外，江西全省武力的调遣、扩充，人民群众的发动等，均未进行，即仓卒首先发难，这在与敌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是难有取胜把握的。

赣军第二师师长刘世钧反复无常。7月10日，刘致电段祺瑞；表示北军“如有动作”，其所部赣军将“尽力协助”；20日，刘又致电段祺瑞，表示愿将驻九江城内赣军编为一混成旅，配合袁军作战。当湖口激战时，刘又改变主意，令所部开赴湖口助讨袁军，李定魁团违令不从，刘仅率原第三团郑鸣树营开赴江北。27日，刘率部反攻湖口，被袁军击败，遂弃众潜逃。

《李纯致大总统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节 江苏讨袁作战 (1913年7月—9月)

一、江苏独立经过及作战部署

(一) 战前江苏军内部情况

战前，江苏（不含上海）共有军队五个师四个旅，即章梓的第一师，章驾时的第二师，冷遹的第三师，徐宝珍的第四师，陈之骥的第八师，和分别由张振发、赵念伯任旅长的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独立旅，以及清江护军使刘之洁所辖的两个独立旅。第一、第八师驻南京，第二师驻苏州，第三师驻徐州，第四师驻扬州，四个独立旅分驻镇江和清江。

五师四旅中，第四师师长徐宝珍已被袁世凯收买，表面上宣布“以约束军士，保卫地方为主义”，暗中却向袁保证“秣马厉兵，以待调遣”，成为革命军的心腹之患。镇江的两个旅系暂留待裁的部队，军心涣散，不堪倚用。驻清江的两个旅宣称以“以维持地方为宗旨”，实则看风使舵。第一、二、三师系在大裁军时缩编而成的部队，虽然装备较好，兵员充实，但由于1913年3月才组建，且内部派系纷杂，缺乏教育训练，战斗力也不强。第八师系武昌起义后，由分别从桂林、南宁开赴南京的两批北伐军组成，中上级军官多为老同盟会员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训练较好，装备也较齐全。该师原负责警卫南京，后因湖南大搞裁军引起兵变，将该师赵恒惕旅派往湖南进行镇压，事后赵旅即留驻湖南。这样，第八师只剩下陈裕时一个旅，总数不过四千人。1912年底，八师虽又增募新兵，重建了两个旅，但新成分多，缺乏训练，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且师长陈之骥系冯国璋之婿，对于讨袁心怀异志，这就更使该师的战斗力受到影响。

(二) 江苏讨袁的发动及作战部署

1913年7月10日左右，黄兴先派赵正平、何成浚等赴南京，约集驻南京的第一、第八两师高级将领，以及徐州的第三师师长冷遹和前安徽都督柏文蔚，召开军事会议，磋商独立日期，制订军事计划。会上，多数人主张趁进攻南京的北洋军尚未南下时，及早发动。冷遹提出第三师分散在四乡剿匪，南京一旦宣布独立，山东的北洋军势必首先对该师发动进攻，恐难于在

参见张敬尧：《赣征纪略》（新民图书公司1913年印），第28页。

汤芑铭曾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升任海军次长后即投靠袁世凯。

《李烈钧将军自传》（三户图书社1944年版），第25页。

第一线挡住敌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并未引起大家的重视。冷遹只好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决心“苦战徐州”。

7月14日，黄兴由沪抵宁。次日，黄率众将领往见江苏都督程德全，逼其响应讨袁。程德全发出通电，宣告江苏独立，委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为临淮关总司令，并咨委陈其美为驻沪讨袁军总司令。主管沿江各炮台的要塞总司令吴绍璘因反对独立，被士兵枪杀，由洪承点接任。17日，驻镇江的两个独立旅和驻苏州的第二师，也表示响应讨袁。

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后，即着手组织总司令部，委章士钊为秘书长，黄恺元为参谋长，何成浚为副官长，赵正平为兵站总监。他发布了告将士檄文，并作了如下部署：令冷遹率第三师乘驻韩庄（徐州北四十公里）的北洋军第五师一部无备之际，突然向其发起进攻；令第八师骑兵团长刘建藩率该师二十九团附机关枪连及骑、炮、工兵各一个营（编为一混成支队），沿津浦路星夜开赴徐州助战；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戡翼翹率该旅随后跟进；周应时率第一师第二旅开赴临淮关，协助该处的安徽讨袁军进攻倪嗣冲部；派新一师师长洪承点进驻蚌埠，节制第八师之混成支队和开赴徐州、临淮关一带之第一师部队，组织徐州以南铁路沿线要点防御；第一、第八师其余部队分别沿江构筑防御工事，并扼守狮子山、天保城、富贵山诸炮台；将驻守南京的刘福彪的福字营调赴上海，协助陈其美所部攻夺上海制造局。

当时，江苏的主要领导人中，黄兴本来就不赞成武力讨袁，到南京来只是屈从于孙中山等人的意见，并无象其在讨袁檄文中所说的“不除袁贼，誓不生还”的决心；江苏都督程德全是在黄兴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并于16日晚离宁赴沪。17日，程电告北京政府和各省都督，表明江苏宣布独立与他无关。程德全的出走，更助长了陈之骥、朱熙等人的动摇性。此外，黄兴抵宁后，不举孙中山这面鲜明的旗帜，却由省议会联合会推举与袁世凯有矛盾的清末旧官僚岑春煊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规定“凡独立省份都督及讨袁军总司令，一律归其节制”，企图利用岑拉拢两广的陆荣廷、龙济光参加讨袁。但岑却不肯就职。这也造成了政治上的被动。

二、徐州之战

南京会议后，冷遹返回徐州，立即收拢分散的部队，于7月15日晚仓促率部向利国驿（徐州北三十公里）方向运动，并派兵拆毁韩庄以南铁轨数

见张敬尧《征赣纪略》第68页。花岩街疑为华源之误。

同上，第72页。落花街疑为乐化之误。

洪越、殷榕：《癸丑战事汇录》（上海民友社1913年版），《公电》，第28页。

洪越、殷榕：《癸丑战事汇录》，《纪事》，第20页。

《江北护军使致大总统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处，占领徐州电报局，断绝南北交通和通信。山东都督周自齐和北洋军第五师师长靳云鹏闻讯后，立即致电袁世凯，建议趁冷师尚未全部集中之际，令张勋所部沿铁路线对冷师发动进攻，第五师待集中后即行跟进。当时，袁世凯对冷遹还抱有幻想，认为“冷遹向顾大局”，“是否叛变，尚无确音”，因而指令第五师“严守准备，未可轻进”。

7月16日晨，冷遹师冒着风雨突然向驻韩庄的北洋第五师方玉普旅发动进攻，拟从韩庄进取兖州，尔后向济南方向发展。方玉普率步兵两个营（携炮六门、机枪两挺）固守阵地，连续击退冷师多次进攻。这时，袁世凯急令在兖州以南铁路沿线待命的张勋军和驻天津的北洋第四师驰援韩庄。17日晨，张勋之义子张文生所率之四营辫子兵及兖州总兵所派之援兵赶到

韩庄，与方玉普旅分左右两翼向冷师反攻。冷师不敌，向利国驿、孙庄退却。18日晨，北洋军第五师步兵一营、炮兵一连到达韩庄，用炮火向利国驿猛烈轰击，将车站轰毁。冷师又退守柳泉（徐州北二十公里）。

7月19日拂晓，刘建藩所率江苏军第八师混成支队赶到柳泉，从铁路两侧向敌猛攻。北洋军急调五师第二十团前往增援，加强两翼兵力。双方激战竟日，相持不下。20日凌晨，江苏军第一师第一旅赶到，与冷师、刘支队并力反攻，将敌赶回到利国驿一线。当日，黄兴闻扬州徐宝珍师欲从六合进攻南京，急令刘建藩支队撤离前线，回守六合。刘支队撤走，大大削弱了利国驿前线的兵力。

在此期间，黄兴曾于19日致电张勋，要张“外察大势，内顾宗邦”，“率一旅之众，直捣济南”，配合革命军讨袁。张勋是个极端仇视革命的臭名昭著的保皇派，想让他调转枪口配合革命军作战，无异与虎谋皮。张勋对黄兴的规劝不仅无动于衷，相反，于20日派出骑兵部队，由台儿庄绕攻江苏军侧背，配合利国驿的北洋军（时北洋第四师已派出两个团由杨善德率领增援利国驿）夹击江苏军。这时，被北洋参谋部收买的当地大土匪李扒子部（李扒子已被冷遹打死），也抄袭江苏军后路。江苏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遂拆毁铁路、桥梁，退守徐州，拟凭借防御工事进行固守，待机退敌。北洋政府鉴于徐州系苏北军事要地，若讨袁军“择险固守，万众一心”，则其军事强攻必遭顿挫，遂采取“攻间并用，奇正兼施”的方针，派人策动冷师骑兵团团长张宗昌倒戈，从内部瓦解讨袁军。当前线讨袁军退入徐州时，突遭张宗昌团袭击，以致军心大乱。22日夜，江苏军被迫放弃徐州，退往蚌埠。不久，第一师第一旅撤回南京，第三师因师长冷遹离队，由旅长伍

赵正平：《仁斋文选》，第525页。

冷遹：《余与膺白先生交往之经过》，《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第70页。

后因程德全离宁，由第一师师长章梓代理江苏都督职，洪承点改任第一师师长，要塞总司令由马锦春接任。

崇仁率领移驻凤阳。23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统一指挥江苏方向的作战。25日，冯国璋将北洋军主力集中于徐州一带，整修铁路，调集弹饷，进行向南推进的准备。

三、南京保卫战

（一）北洋军分路夹击南京

徐州之战后，先后调往江苏的北洋军计有：第四师第八旅，第五师第十旅，第二十师步兵第七十九团，直隶第一混成旅，张勋的武卫军以及王廷祜的禁卫军、雷震春的备补营各一部，总兵力约二万五千人。7月27日，袁世凯致电冯国璋、张勋，分析了徐州之战后的江苏形势，认为讨袁军在徐州新败，镇江空虚，南京混乱，并据此作出了分兵两路夹击南京的部署：令张勋率部由运河水路南下扬州，会合徐宝珍第四师进攻镇江；冯国璋率四、五两师由津浦路南下，速取临淮关，再趋浦口，与张勋部取得联络，会攻南京。

这时，江苏讨袁领导机构进一步分化。7月25日，程德全在上海再次发表通电，要求江苏各师取消独立；26日，又致电黄兴，要求“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黄兴则因徐州战事失利，又遇军队不服从调动和饷弹难筹等困难，遂失去信心，于28日晚弃职跑回上海。代理都督章梓、第一师师长洪承点等也随即离宁。黄兴等走后，代理江苏民政长蔡寅、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和代理第一师师长周应时，立即宣布取消独立，并电催程德全回宁。程德全急派杜淮川前往南京接任第一师师长。7月30日，撤退至凤阳的第三师也宣布取消独立，投靠北洋军。数日后，张宗昌发表通电，声称由他暂领第三师师长职务，加入北洋军序列，充当进攻南京的先锋队。接着，驻苏州的第二师和驻镇江的两独立旅也宣布取消独立。至此，江苏的讨袁武装已失过半，讨袁作战险象频呈。

属于地方实力派的杜淮川见江苏军大多已取消独立，恐北洋军乘虚而入，将江苏这块肥肉夺走，遂于8月2日致电袁世凯，恳请冯国璋部暂缓前进。袁不肯中途辍兵，于5日电令冯国璋、张勋“仍饬各军迅速前进，克日到宁，以免旷日持久，别生波折”。于是，冯、张率军继续南进。7日，张勋的前卫部队抵达扬州，与徐宝珍的第四师会合。西线冯军，一则由于军队庞杂，指挥混乱，大量兵车拥积徐州，调度不灵；二则江苏军从徐州南撤时，

第二师师长章驾时于16日下午卸职赴沪，由该师第三旅旅长朱熙接任师长。朱虽于17日下午宣布独立，却按兵不动，观察形势。

《讨袁军大元帅之举定》，《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第31页。

《大总统致周自齐、靳云鹏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拆毁铁轨多处，固镇铁桥也被炸毁，因而无法前进。袁世凯因多处分兵，后方空虚，战局持久对其不利，遂于6日电令冯军离开铁路线，由蚌埠经和州（今和县）、芜湖、太平（今当涂）一带绕进；或分兵入淮河一带，会同倪嗣冲军进攻寿县正阳关和安庆，再由长江顺流而下。但冯国璋不愿受远程跋涉之苦，也不肯配合倪军作战，仍沿津浦路缓慢地前进。

（二）保卫南京之战（参见附图二十七）

黄兴等出走，北洋军又已逼近，南京城内动荡不安。时在镇江运动讨袁的国民党激进分子何海鸣、韩恢以及戴天仇（即戴季陶）、詹大悲等人，闻苏北讨袁作战失败，黄兴出走，遂相继赶赴南京领导讨袁作战。8月8日，何海鸣率第一师百余人，占据江苏都督府，再次宣布独立，举陈之骥为江苏都督，何自任江苏讨袁军临时总司令。陈之骥于黄兴离宁后即投靠袁世凯，曾于8月3日致电袁，请他电饬程德全赴宁，“速筹善后”。此次趁受职之机，陈派该师第三十团包围都督府，拘捕何海鸣；10日又到江北，拟与冯国璋商洽献城之策。陈之骥刚离城，从六合退守南京的该师二十九团官兵，击散拥陈的第三十团，放出何海鸣，仍举为讨袁军总司令。11日，第三次宣布独立。戴天仇见何海鸣仍为总司令，竟负气出走。

南京第三次独立后，何海鸣等推举前江苏都督府顾问张尧卿为江苏都督，并下令驱逐杜淮川，命原第十团团团长徐涛为第一师师长，原第二十六团团团长吴浩为卫戍司令，何自兼第八师师长。同时，招募城内及城郊各县的退伍官兵，组成第三军，下辖第五、第六两师，以韩恢为讨袁军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何命第一师驻守富贵山、雨花台等高地，第八师驻守狮子山、天保城诸炮台，其它部队驻防于各城门，决心固守南京。

南京保卫战，在整个讨袁战争中是打得最激烈的。

北洋军东线的张勋部与徐宝珍师在扬州会合后，其先头部队于8月8日渡江进攻镇江。驻守镇江的第三十一旅旅长张振发和第三十二旅代旅长卢祥麟弃军脱逃，部队无人指挥；驻守焦山、象山的官兵稍加抵抗，也慌乱逃散。张勋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镇江。13日，张、徐军进抵高资、龙潭。次日，分

洪越、殷榕：《癸丑战事汇录》，《公电》，第30页。

《蒋廷梓关于徐州之战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参见《中央来电著速取临淮与倪军联络由》，《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第72页。

《程德全为附袁致黄兴电》，《革命文献·二次革命史料》（台湾1968年版），第168页。

《中央来电请仍节各军迅速前进由》，《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第75页。

参见《参陆两部来电奉令妥筹速进办法先复由》，《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第77页。

何海鸣原为《大江报》主笔；韩恢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在上海组织工党。何等曾于1913年4月组织“铁血监视团”，表示袁世凯如敢诉诸武力，该团“誓以铁血相见”。

兵向明孝陵、紫金山和太平门进攻。

14日拂晓，张勋派敢死队十余人，首先将军旗插上紫金山顶，继命旅长方更生、团长赵振东等督大队步兵抢攻紫金山。天保城守军当即以大炮猛轰敌人，炸死赵振东，炸伤方更生及两个管带。张勋不顾伤亡，催令步兵蜂拥而上，终于攻占紫金山主峰，随后，又派兵进攻天保城。

天保城位于紫金山西侧，筑有坚固的炮台工事，是屏蔽南京的重要支撑点。守卫天保城炮台的系第八师工程营。8月17日，张军突袭天保城，工程营不支而退，天保城落入敌手。19日，江苏军八师二十九团向天保城反攻，将该阵地夺回。张勋悬重赏，驱使部队续攻天保城，并分兵一部向雨花台进攻，以分散守军兵力。南、北两军反复争战，天保城三失三得，至21日午后，终被北军夺占。

与此同时，张勋率主力于19日上午猛攻太平门。该门守军悬旗诱降。张勋受骗，挥兵拥入太平门。霎时，城外地雷轰响，张军前队死伤过半，急欲退出，又被埋伏在城外的守军勇猛袭杀。张军死伤惨重，慌忙后撤。接着，张、徐两军又转向尧化门，组织部队反复攻城，均被守军击退。张勋复命部队用云梯、绳索冒着弹雨攀登城垣，结果梯折索断，士兵非伤即死。目睹者讥讽说：张勋军作战“直进直退，以生命为比试之具”，其战法实在“呆笨无比”。

当东线的张、徐军向南京进攻时，西线的冯国璋部已修复了铁路，向南京逼近。8月12日，其先头部队抵达浦口。14日，张宗昌师的两个营从浦口偷渡长江，在下关登陆后，攻占了幕府山。但渡口遭到狮子山守军的炮火猛烈轰击，后续部队无法渡江。冯国璋见从浦口渡江受阻，决定组织部队从下游渡江。16日，冯国璋在滁县发布渡江攻城命令：以张宗昌第三师所余部队（欠第十团）和第五师为主攻部队，于16日晚相继从卸甲甸（老虎山对岸）渡江，上岸后分别向神策门（今中央门）、钟阜门（今无此门）和太平门一带攻击前进，并分兵一部援助张勋部夺取天保城炮台；以何丰林率第四师第十六团和原江苏军第三师第十团赴老西江口，掩护右翼部队的安全，并佯示渡江，牵制江苏军；以第四师其余部队固守浦口至枚管营一线，以炮火轰击南京城，支援由卸甲甸渡江的部队。冯部按预定计划渡江后，即派施从滨为南岸部队总司令官，李奎元为第三师代旅长（张宗昌尚留江北），率部连夺北固山、黄家卫、上元门诸要点。23日，冯军第十九团进逼南京城下，进攻太平门。守军据城抗击。冯军进攻受阻，遂退驻炮火射程以外。

江苏军在保卫南京的作战中，第八师官兵十分英勇顽强，特别是该师第二十九团，始终坚守在最关键的部位，屡次打退敌军的进攻。张勋军畏之如虎，“每见黄帽檐之兵至，立即退却”。当时在南京的一个美国医士说：

《陈之骥致袁大总统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戴见第二次独立失败，欲乘舟返沪，旋闻何第三次独立，遂折返都督府。戴提出：“此间事须以知兵之

第二十九团“足以当英雄之名而无愧”。

北洋军兵临城下，南京城内守军将领再次发生了内哄。第一师师长徐涛和卫戍司令吴浩暗中与敌军勾结，企图叛变献城。18日，吴浩以武力威胁何海鸣离开南京。何被迫躲入金陵医院。当夜，第二十九团一个营围攻一师司令部，捕杀徐涛；次日，又协同第一师士兵击散卫戍团，吴浩潜逃。讨袁将士再一次粉碎了取消独立的阴谋。

这时，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因领导安徽讨袁作战失利，于8月19日率卫队营并携部分粮饷到达南京。何海鸣因与都督张尧卿有矛盾，逼张将都督一职让与柏文蔚，并委柏兼第八师师长。柏接任后，于21日率部向天保城发动进攻，企图夺回已失阵地，后因众寡不敌，未获成功。

袁世凯鉴于南京城久攻不下，乃于8月24日急电海军总长刘冠雄，令其派军舰迅速载运浦镇和老西江口的部队过江，以便全力攻城。25日，刘冠雄派“海琛”号等舰驶往浦口江面，掩护滞留江北的冯国璋部渡江。

8月27日夜，北洋军会攻南京。张勋部和冯国璋部第五师从东面攻太平门和朝阳门（今中山门），施从滨、李奎元率第三师两个团从北面攻神策门，雷震春部从南面攻雨花台，刘冠雄以舰炮配合冯国璋部攻城西北的狮子山炮台。守军固守城垣和诸要点，大量杀伤敌人。张勋见强攻失利，遂在富贵山南侧偏僻处挖掘地道，拟用炸药破城。

值此城防吃紧之际，新任都督柏文蔚深感守城无望，遂带侍从官兵由汉西门退出南京。柏走后，何海鸣任王宪章为第一师师长，自任江苏都督兼第八师师长。但何“不懂军事”，“经济全不公开”，不为某些将领所信服。30日晨，何海鸣召集将领会议，决定于次日晚9时分四路反攻盘踞紫金山、幕府山及朝阳门外之北洋军，夺回制高点，扭转被动局面。其部署是：由第一师派出一个支队由雨花台出击紫金山之敌；第五师派出一个支队至朝阳门，待第一师与敌接战时，出城合击敌人；第八师派出一个支队至太平门，待第五师出发后，猛攻天保城；第六师派出一个支队出仪凤门（今挹江门），袭夺幕府山。翌日，总司令部下令将守城之有关部队集中编组各突击支队，准备出发。但第一师违令不动，第五师进至朝阳门时，因敌人炮火猛烈，不能出城，第八师也就无法进攻天保城。江苏军的四路反攻计划遂告流产。

9月1日上午9时，张勋部用炸药炸开富贵山南侧城墙两丈余，部队蜂拥而入，并分兵三路：一路抢占富贵山，并轰开太平门内守军设置的沙袋，

人为司令”，并提钮永建可任其职，何海鸣不从，戴遂负气而走。详见何海鸣《金陵纪战》（《寸心杂志》1917年第1—6期）。

讨袁战争爆发后，何海鸣、张尧卿等往镇江等地组织讨袁，后何出发至宁，张仍逗留镇江。张勋进攻镇江时，张尧卿无立足之地，遂跑到南京。（《时报》1913年9月25日。）

据《围城杂记》称：韩恢“自为军长，不知第一军第二军何在，乃自命为第三军军长，实则部下人数不过三千”。（《时报》1913年9月20日。）

开门接应城外部队；一路向南，将朝阳门、洪武门（今光华门）夹城轰开，迎接城外部队入城；一路向西，抢占北极阁、骆驼山、神策门、西华门诸要点。城内的江苏军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在张勋部的接应下，冯国璋之第三、第五师分别由神策门、洪武门、太平门攻入城内，并在舰炮掩护下夺占了狮子山炮台。下午，江苏军原朝阳门守城司令胡炳炎和护卫团团团长李维作等相继叛变，引敌进占都督府。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何海鸣率部出聚宝门，退向雨花台。雨花台原由第一师第三团防守，后又增派第八师第二十九团赴援。该两团为江苏军的精锐部队，自9月1日至2日，官兵们忍饥挨饿，日夜苦战，击退雷震春部及冯军第四师多次进攻，毙敌千余人。何海鸣到达后，立即与韩恢等人率二十九团向敌反突击。无奈，该团官兵已精疲力尽，战斗力明显下降，在敌军的密集炮火下，死伤过半。何海鸣只好放弃雨花台，率余部退回城内。旋遭张勋与雷震春部前后夹击，部队溃散，何仅率少数士兵从水西门出走。坚守了二十余日的南京城终于落入敌手。

北洋军入城后，张勋纵兵烧杀淫掠，冯国璋部放火焚烧下关。南京居民继1864年受刽子手曾国荃的湘军血洗之后，又一次遭到惨重蹂躏。

江苏讨袁作战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主要由于：一是缺乏坚强的领导。除程德全从中破坏外，身为讨袁军总司令的黄兴，竟在危难时刻离职出走，对于战争全局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 响。何海鸣虽意志坚决，但因不谙军事，不孚众望，又得不到国民党要人的支持，难于统率全军和指挥全局。二是各部队主要负责人大都为动摇分子，战前却未进行任何调整和防范，以致当敌军压境时，不是弃职潜逃，就是率部投敌。幸有一些坚定勇敢的中下级军官，率部与敌拚杀，否则，南京城早已陷于北洋军手中。三是指挥不力。南京宣布独立后，讨袁军的作战企图是先攻徐州方向之敌，“大举北伐”，但在冷 遯师尚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发起进攻，实属轻率之举。徐州前线作战失利后，何海鸣等虽决心固守南京城，但因内部矛盾重重，且又兵力不足，虽经苦战，终难抵御优势之敌的进攻。

第五节 各省讨袁相继失败

在江西、江苏两省军队与敌鏖战的同时，上海及广东、湖南、安徽、四川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但因独立日期参差不齐，各省内部矛盾重重，讨袁军步调不一等种种原因，都先后归于失败。

上海方面 1913年7月16日，吴淞炮台官兵首先宣告独立。18日，革命党人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这时，前松江镇守使钮永建也带领在松江独立的部队（水师陆师共五营）归附上海。这样，加上已经抵沪的刘福彪福字营和原驻军第三十七、六十一团，上海讨袁军约有七千五百人左右。驻沪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认为兵工厂是军队的命脉，希望通过“磋商”和平接收江南制造局，但遭到驻防该局的袁军拒绝。随后即决定集兵进攻江南制造局。23日凌晨，钮永建等率六十一团、三十七团、松军、镇军及福字营向制造局发动进攻。

驻守制造局的袁军，有新从北方调来的海军警卫队三个营、北洋军第四师两个团和原驻该局之水师一个营，共约一个师的兵力。袁世凯任命派驻上海的海军警卫队总执事郑汝成和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为前敌指挥。郑、李躲在停泊于黄浦江的军舰上，指挥制造局守军抵抗沪军的进攻。由于袁军筑有坚固工事，火炮亦多，沪军虽日夜猛攻，终不能克。30日，一部军队退往闸北，为英军缴械；钮永建、刘福彪等率另一部军队撤往吴淞及宝山一带。

这时，郑汝成率舰至吴淞，海军总长刘冠雄也派四艘军舰到沪。8月2日，各舰环列吴淞江面，轮番轰击炮台。炮台守

军奋勇还击，重创旗舰“海圻”号。旋因刘福彪部企图投敌，虽被钮永建等查觉，将该部缴械，但沪军实力大为减弱。13日，袁军水陆夹击吴淞炮台。钮永建、居正率部放弃炮台，退往嘉定。不久，即解散军队，分赴海外。陈其美在作战失利后逃往日本。

安徽方面 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众推柏文蔚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此时柏文蔚尚未回省，暂由安徽第一师师长胡万泰代理都督。不久，首鼠两端的胡万泰托故辞职，由宪兵司令祁耿寰代其主持军事。27日，柏文蔚返回安庆，就任都督，组织讨袁作战。

袁世凯闻讯，除命倪嗣冲率部进攻外，又电令河南都督张镇芳和屯兵郑州的护军一部“分道进攻”安徽。袁认为，“乘皖省乱党骤起，布置未定之时，如以大兵力捣其空虚，必可致胜”。

据《围城杂记》称：“韩恢既逃，闻何再独立，则又返”。（《时报》1913年9月21日。）

《围城杂记》，《时报》1913年9月25日。

《围城杂记》，《时报》1913年9月24日。按：当时第八师帽檐为黄色，第一师等为黑色。

《马林医生演说词》，《民权报》1913年9月22日。

8月7日，胡万泰宣布取消独立，率部围攻都督府。柏文蔚不敌，率二百余人撤至芜湖。数日后，柏见安徽讨袁形势急剧恶化，遂将指挥权交给驻芜湖的皖军第二旅旅长龚振鹏，自己乘鱼雷艇去南京。29日，芜湖在汤芎铭、胡万泰部水陆夹击下失陷。与此同时，在正阳、凤台等地与倪嗣冲、张镇芳部作战的皖军亦迭遭失利，安徽讨袁作战遂告失败。

广东方面 7月18日晚，广东都督陈炯明宣布独立，通电讨袁。陈任都督兼广东讨袁军总司令。当时，广东有两师一混成旅。陈炯明应欧阳武的请求，派驻韶关的一个旅往援江西，其余部队分为三个支队：原广东第一师师长钟鼎基为第一支队长，第二师师长苏慎初为第二支队长，第五旅旅长张我权为第三支队长。拟从8月1日起出师北伐。但这些部队的师旅长大都无意讨袁，有些与袁世凯早有勾结。

广东起事，北洋军鞭长莫及，袁世凯乃密令广西都督陆荣廷和广东副护军使龙济光率军攻粤，答应事成之后，以粤督相许。龙济光、龙觐光兄弟乐为效命。于是，袁封他们为广东正、副镇抚使，令其率军进攻广东。

8月4日，广东讨袁军中的炮兵团、辎重营等倒戈拥袁，炮轰都督府，陈炯明仓皇出走，钟鼎基、苏慎初、张我权等师旅长当即宣布取消独立，于是广东讨袁也遭失败。龙济光率桂军进驻广州后，建立了效忠于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湖南方面 江西、江苏兴师讨袁后，湖南都督谭延闿迫于形势，也于7月25日宣布独立，响应讨袁。并应欧阳武之请，派兵一团往援江西。但该团踌躇不前，直至江西讨袁作战失败，才抵湘赣边界。8月14日，谭延闿见邻近各省讨袁作战先后失败，遂宣布取消独立。但袁世凯并不因此而对他宽容，10月7日，汤芎铭督湘，将谭解送北京，褫职判罪。后经黎元洪说情，才被特赦。

四川方面 四川在讨袁战争中行动最晚。8月4日，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率该师于重庆宣布独立。熊旋将所部编成四个支队，以龙光为第一支队司令，率部经永川、荣昌进取泸州；范榛为第二支队司令，扼守合川，防御北路；李树勋为第三支队司令，刘植藩为第四支队司令，分率所部防御南路。8日，四川都督胡景翼先派川东宜抚使王陵基率兵五营往攻熊部，继令川军第一、二、三、四师师长各率所部围攻重庆。袁世凯也电令鄂、陕、滇、黔四省都督，“酌拨劲旅，会合兜剿”。熊克武所部与敌接战月余，在泸州、内江、南充等地战斗相当激烈。终因寡不敌众，且又兵力分散，以致各路均告失利。9月10日，重庆北路要地合川又陷敌手。11日，熊克武见败局已定，遂潜离重庆，后流亡日本。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39页。

第三十七团即江苏第二师第七团；第六十一团系辛亥革命时黄郛之浙军第二十三师旧部，后缩编为一个团，留守上海制造局。该两团受革命党人运动，参加讨袁作战。

这一时期宣布讨袁的，还有福建第十四师师长许崇智，鄂军驻沙洋第三十二团团长刘铁，广西柳州巡防营统领刘古香等，但均在敌军的进攻或胁迫下，先后归于失败。

第六节 讨袁战争的教训

讨袁战争，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继续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的正义战争，是辛亥革命战争的继续。这次战争波及江西、江苏、湖南、广东、四川、福建等省，加上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是，这次战争仅仅进行了两个多月，即以失败而告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得以实现了反革命的“武力统一”计划，开始了北洋军阀集团在全国的反动统治。这次战争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

讨袁战争之所以失败得如此迅速，一方面，由于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集团已经控制着中央和相当一部分地方政权，拥有一支数量众多、装备良好、经过训练的反动武装，并且得到帝国主义和以老立宪派为骨干的旧官僚政客的支持。另一方面，软弱的资产阶级，自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便迅速趋向妥协，除少数激进分子外，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因害怕战争影响其实业的发展，竟多方反对讨袁；广大农民群众，虽不断进行自发的反抗斗争，但未能从辛亥革命中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因而没有出现反袁斗争的高潮。这就影响了讨袁统一战线的形成。仅有少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部分军队的孤立作战，是难以敌过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

这次战争的失败，还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自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党的领导人，便产生了妥协倾向。孙中山等主张以在野身分致力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宋教仁等主张实行“政党政治”、“议会政治”以分袁之权。这表明了他们对袁世凯代表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上战争爆发后，在作战指挥上又犯了错误，这就加速了战争的失败。革命党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忽视经营南方几省和建立巩固的革命基地

袁世凯篡权之初，辛亥革命还没有完全失败。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还控制着南方七八个省，倘若他们对革命形势有正确的估计，认识到与袁世凯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实行符合中国当时情况的革命方略，加强对南方诸省的控制和经营，建立起进可攻退能守的战略基地，特别是唤起和组织民众，改革政权结构，使这些省的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忠实可靠的革命党人手中，那就不致在反袁斗争中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

二、忽视军队的整顿和建设，部队

的素质很差

辛亥革命战争期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掌握着几十万军队。这些部队虽然系统紊乱，装备较差，但其中许多中下级军官和部分士兵具有旺盛的民主革命热情，如能加强领导，认真整顿，不难从中造就出一支忠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的有战斗力的军队。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掌握枪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意义认识不足，对军队需要进行革命的改造缺乏认识，以致在兵权问题上犯了错误。首先，对袁世凯瓦解革命军的阴谋丧失警惕，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袁的裁兵减饷“指令”，使南方革命军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军心亦为之动摇。其次，对于保留下来的部队，既未加强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也未抓紧进行整顿和训练，特别是不懂得甄别和选拔忠于革命事业的军官，掌握军队的领导权。部队中不少师、旅、团长不是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而是看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一般士兵仍然抱着当兵吃粮、绝对服从长官等陈腐观念，虽然打着革命军的旗号，但依然保留着旧军队的本质特征。这样的军队，与装备、训练和控制力强的敌军作战，自然难于取胜。作战中虽有些部队表现比较勇敢，但毕竟为数较少，难以影响全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中，注意策动新军反正，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放松了军队的改造工作，这是一大失策。讨袁战争的实践证明，中国的革命政党，如果单纯依赖旧军队而不建立新型的革命武装，要想打败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武装，进而夺取和保卫政权，是不可设想的。

三、仓促举义，各自为战

“宋案”发生后，由于孙中山、黄兴等主要领导人之间在“武力讨袁”还是“法律倒袁”问题上争论不休，久拖不决，因而直接影响了应变准备。从3月20日宋教仁被刺至7月12日江西宣布独立，历时三个多月。在此期间，袁世凯磨刀霍霍，积极进行南下作战的准备。而革命党多数领导人却麻木不仁，既不进行战争动员，又不着手扩充军队，筹措作战物资，白白丧失了宝贵的战备时间。结果，在北洋军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只好被迫仓促应战。此外，在已经确定“武力讨袁”之后，未能制订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进行周密的作战部署，而是简单从事。结果，几省同时起兵的预定方案完全落空，形成各自为战，无法协同配合。江西的李烈钧虽曾与广东、湖南、福建、安徽商定，一省有事，四省支援。但当江西讨袁战争爆发后，福建、安徽一兵未发，广东援兵半途折回，湖南援兵迟迟不进。江西革命军只好孤军作战，以寡敌众，为北洋军所败。江苏虽与安徽、上海境连地接，但也各自为战，互不协同策应，结果被敌各个击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把战争这种极端复杂而又特殊的社会活动，竟视同儿戏，如此草率从事，焉有不败之理！

四、未能实行正确的灵活的作战指挥

江西、江苏两个主要战场的讨袁作战，虽然分别成立了作战指挥机构，但均未能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实行灵活的指挥。结果，不是冒险进攻，便是消极防御。江西战场始则以薄弱的兵力仓卒发难，陷入孤军作战；继而数战失利，即将走兵溃。江苏战场，初则分兵冒进，出师不利；继则困守南京，终至覆灭。革命党人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缺乏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临战不能实施正确灵活的指挥，不能不是讨袁战争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十六章 白朗起义战争 (1911年10月—1914年8月)

1911年秋，正当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之际，河南发生了由白朗领导的宝丰、鲁山等地贫苦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武装起义。在清王朝被推翻，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后，这支起义武装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坚持进行反袁和反帝斗争，使起义成为一次带有较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农民起义战争。这次起义战争扩及豫、鄂、皖、陕、甘五省广大地区，历时三年之久。最后虽遭北洋军镇压而失败，但它在配合和支援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战争、沉重打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起义军进军路线参见附图二十八。）

第一节 起义武装的创立和初期活动

河南宝丰、鲁山一带，是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发源地。这一地区的农民，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十分严重。清末民初，约有70—80%的土地被地主所霸占，地租高达收获量的60%以上。农民除受地租剥削外，还受高利贷的盘剥，比较普遍的是借银一月，索利三分，借粮一季，交息五成。反动政府征收田赋本较苛重，承包人又从中侵吞，中饱私囊，外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为地主、官府服各种无偿劳役，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1911年，宝丰、鲁山地区遭大冰雹袭击，农业歉收，但封建剥削却有增无减，致使广大农民无法生活下去，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出现了“千百成群，揭竿起事”的革命形势。由贫苦农民、采煤工人、“蹠匠”和部分被裁士兵组成的许多小股农民武装，纷纷开展反抗地主豪绅的斗争。

在封建统治阶级巧取豪夺，土豪劣绅横行乡里，不少中小地主遭到破产的情况下，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白朗也被迫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白朗字明心，1873年生于河南省宝丰县大刘村，家有土地二百亩。1908年被人诬告入狱，经变卖土地营救，才被释放。之后，经历了当兵、贩盐、炼铁等活动，比较广泛地接触了贫苦群众。1911年10月，白朗公开扯起义旗，组织了一支起义武装。最初只有二三十人，多为衣衫破烂的贫苦农民。所用武器除一支快枪外，其余尽是“笨炮”（即土铳一类武器）和大刀，因此有人称他们为“笨炮队”或“袄片队”。

白朗起义武装成立后，即于11月联合以张群为首的义军共约一百人，进攻靠近叶县的鲁山张官营地主武装。因遭叶县军队和地主武装夹击，损失八十余人。张群阵亡，白朗负伤。虽然初战受挫，但白朗并不灰心，继续坚持斗争。1912年4月，白朗率起义军二三十人，在宝丰东北交马岭设伏，袭击宝丰卸任知事张礼堂的保镖，缴获快枪十余支。不久，又和郜永成（又名秦椒红）的起义军联合作战，多次击败叶县知事温少良率领的反动武装，使其龟缩城内，不敢出战。

这时，宝、鲁一带各股起义武装活动频繁，声势日益壮大。当地反动政府无力镇压，便使出了招抚伎俩。一些起义军首领中计受骗，惨遭杀害。白朗识破了反动派的欺骗勾当，拒绝“受抚”。他率部北上禹州（今禹县），一举攻克神垕镇。后又南下舞阳县，以母猪峡为基地，往来游击，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鄂豫边境。起义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每到一地，将地主富商的粮食、银钱、衣物、首饰分给穷人，加之起义军的纪律也比较严明，因而深受群众的拥护。当时流传着不少赞扬白朗及起义军的民谣。由于白朗的威望日高，许多小股起义武装纷纷投奔。特别是袁世凯篡权后，变本加厉盘

参见《癸丑祸乱纪略》（上海有益斋1913年版）卷下，第10页。

剥民众，使民生更加凋敝，河南人民“十（之）八九不能自活”。于是，参加起义的群众日益增加，一年之内，部队迅速发展到二三千人。

白朗起义军经过初期战斗活动，建立了一支比较能打游击战的武装，并有一小块游击基地，给了地主豪绅、反动地方官吏以应有的打击。但是，军队的组织形式比较原始，没有正规的编制和番号，只有人数不等的“杆”（分马队和步队），由各杆头统率，以杆头的姓名为旗号，无统一的职称。

该两团及海军警工队，均于7月上旬由北方海运至沪。

第二节 袭击豫鄂两省敌军，配合 “二次革命”战争 (1913年5月—11月)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发动“二次革命”前，已与白朗取得了联系，并派人在白朗的部队中工作。正当袁世凯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南方的革命军之际，河南省国民党干事阎子固曾动员白朗“在淮上起事接应”。白朗也曾派人到武汉，与革命党人接洽。“二次革命”战争爆发后，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又于7月20日写信给白朗，向他提出了“乘虚直捣”豫鄂，配合讨袁作战的建议。虽然信使在开封被反动军警逮捕杀害，白朗并不知道黄兴的具体意见，但这一时期，白朗起义军转战于已被北洋政府所控制的豫鄂两省，积极打击反动地方武装，牵制了北洋军的部分兵力，威胁着被袁世凯视为生命线的京汉铁路，客观上配合了革命党人发动的讨袁战争。

一、克唐县，占禹州

正当北洋军沿京汉路南调，准备向南方革命军发动进攻之际，白朗于1913年5月底6月初分兵两路，积极展开活动。一路由高鑫、宋一眼率数百人，在许昌、襄城、叶县一带袭扰敌人；另一路由白朗亲率二千余人，南下唐县（今唐河）、泌阳一带，声言攻占唐、泌等处后，即“与高鑫、宋一眼合股通南方，以图大举”。河南都督张镇芳急忙商请河南护军使雷震春，派团长任昶武、南阳镇守使田作霖率部“追剿”高、宋起义军；派河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王毓秀率一个团“兜剿”白朗所率的起义军。白朗利用唐、泌守军的离心倾向，事先与唐县守军取得联系，于5月31日夜一举攻克该县，缴获大炮六门、机枪两挺和许多枪械子弹，并争取豫军一个营起义。白朗破唐县后，立即率部北上，连克源潭、饶良、麦北、下洼、金汤寨，直逼裕州（今方城）。雷震春慌忙命右翼帮统王茂元率两个营星夜赶赴裕州堵截；由驻马店下车的王毓秀部亦由泌阳、唐县分路追击。白朗闻讯后，便率部西入檀山，复经南召直趋鲁山。雷震春急令王茂元部由襄城兼程西进，改援鲁山。起义军改变攻鲁计划，转移至鲁山西北的深山密林处，甩掉尾追之敌，然后穿山越岭，采取奇袭战术，直趋禹州。

禹州位于襄城以北。6月14日，该县城内正为不久前被起义军击毙的团勇开追悼会。白朗军混在群众中，趁机入城，攻取南门大街，并向凭借西街寨门顽抗的民团勇猛进攻。城内守军约三百人，惊慌失措，弃械而逃。起义军缴获颇多。15日晚，起义军主动撤离禹州城，直趋郟县、宝丰。在郟县以

《致开封张都督郑州雷护军使电》，《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第62页。
第一师师长周骏，第二师师长彭光烈，第三师师长孙兆鸾，第四师师长刘存厚。

北八里之白庙寺，击退了雷震春所部三个营的堵截，转入鲁山西北山区。这时，起义军声威大振，“一时望风而归者，不数日间达一千五百人。所得军器，亦极精锐”。队伍发展至五六千人。

二、西破浙川，南据枣阳

起义军转回鲁山地区后，雷震春率左翼统领申保亨，于6月21日由许昌进驻宝丰，调集部队，布置对起义军的围攻。其部署是：旅长王毓秀所部开赴鲁山，由东南向西北“搜剿”；左三营管带金聚率部开赴半扎（临汝南三十二里），由北向南“搜剿”；右三营管带雷存修率部开赴大营，由东向西“搜剿”；西大社社董督率社勇堵截山口，防止起义军西走；管带鞠得胜率马队在襄城、叶县、舞阳、裕州、南召、鲁山等处巡逻。此外，还收买和派遣间谍、坐探，进行侦察破坏活动。雷震春把这一部署吹嘘为“四面围剿之法，为一鼓荡平之计”。并向陆军部夸口说：一定要“严缉首要，以期拔本塞源，永绝后患。”正当雷震春调动部队部署围攻之际，起义军悄悄离开山区西行，于6月底奔袭数百里外的卢氏城。7月1日，攻占浙川县的西坪。2日，攻占豫、鄂、陕交界的重镇荆紫关。驻守荆紫关的王天佑率残部向浙川逃跑，起义军乘胜追击，一举攻克浙川城。至此，雷震春的“四面围剿”计划完全落空，而邓州（今邓县）、内乡、镇平等县频频告急，纷纷请派援兵。镇守南阳的周符麟，急不可待地连电袁世凯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声称如不及时增援，不但邓州、内乡等县难保，即南阳亦岌岌可危，进而提出给他“另委一相当之事”，准备临阵脱逃。

起义军攻占浙川后，又挥师南下，进至鄂北的郧县境内。此时已投靠袁世凯的副总统黎元洪立饬鄂、豫、陕三省军队，不分省界，联合“会剿”。7月14日，起义军与三省联军激战于均县贾家寨以东，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弹药消耗甚多，故未紧追败敌。随后，起义军乘船渡丹江东进，消灭了阻拦的敌军，复北入豫境。17日进围镇平县，威逼南阳。张镇芳急电奉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吴庆桐，请他派兵一团救援。8月，起义军又击败周符麟部于百泉山，获大炮数门，枪械甚多。随后，再次进入河南唐县、泌阳、桐柏和鄂北天河口等地，并在桐柏县建立第二个游击基地。

9月下旬，白朗又率部南进至鄂北随（县）、枣（阳）地区。25日夜，在枣阳守军两个连内应下，攻占县城。起义军逮捕了横行霸道、荼毒居民的外国传教士数名。枣阳被占后，吴庆桐电令驻樊城之第五团派步兵一营、驻

《临时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13年8月13日。

蹠匠，系指那些在山间开沟筑堰的工匠。

佚名：《白狼猖獗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白朗起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以下简称《白朗起义》——第351页。

钟祥之第五团第一营派步兵三连，由西、南两个方向进攻枣阳；令驻随县之第四团分扎边界防堵；由帮统李治云和团长赵福汇所率之部队也分别进至枣阳城下，形成四面包围。起义军据城固守，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毙敌团长、副官各一名。黎元洪下令调拨重炮两门，加紧轰城。起义军为保存实力，于10月6日晚从北门突围西行。虽敌军“四面云集”，结果依然“莫之阻也”。大量敌人被起义军牵着鼻子团团乱转。

三、袭鲁山，占宝丰

起义军从枣阳突围后，旋即转移至唐县、泌阳、裕州、舞阳一带，于1913年10月中旬，进入鲁（山）、宝（丰）地区。10月19日晨，进攻鲁山城，因守军有备，攻城不克，遂退至鲁山西北山区。张镇芳急令河南第一师师长张锡元和旅长王毓秀分别率部“进剿”。起义军依托高山密林，与优势敌人周旋。22日，在娘娘山、青条岭、椅子圈一带与“进剿”军激战。23日，又在锯齿岭阻击敌人。“进剿”军既怕起义军夜袭，又怕起义军乘虚攻取鲁山城，所以只能朝发夕归，不敢在山地驻扎。起义军稍事休整后，即准备进攻宝丰城。首先派人潜入城内，主力于11月11日从百余里外向宝丰疾驰。次日凌晨，趁守城民团困倦之际，城内的起义军纵火扰敌，城外的起义军立即架梯登城，一举攻占宝丰。这时，新任河南护军使赵倜正率马步四营前往鲁山途中，忽闻宝丰被占，“即派马飞调赴鲁山之队回剿”。起义军稍事抵抗，即撤出县城，回到鲁山西北山区。随后，又挥师南下，转至南阳地区。不少反袁的进步青年以及基层的革命党人投奔起义军，原季雨霖第八师的士兵也纷纷携械投奔。

自1913年5月至11月，半年之内，白朗起义军转战豫、鄂两省，共牵制了北洋军及地方部队约五个团和十四、五个营的兵力，相继攻破十多个城镇，歼灭了敌人部分有生力量，不仅使鄂豫两省的军政头目惶恐不安，而且惊动了袁世凯和北洋政府。

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近万人，并打起了“中华民国抚（扶）汉讨袁军”的旗号。随着快枪、大炮等新式武器日益增多，部队的编制也有了变化。起义军已分为步、马、炮、工、辎，“扎立营寨，放哨巡逻，悉如军队”。这些重要变化，标志着这支起义武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天津《大公报》，1913年10月28日。

《雷震春致袁世凯电（1913年6月3日）》，《白朗起义》第49页。按：文中所称“通南方”，即与南方革命党人联合行动。

闲云：《白狼始末记》，《中华小说界》第142页。

《雷震春呈陆军部报告（1913年7月5日）》，《白朗起义》第58页。

第三节 转战京汉路两侧，打破敌军 两次“围剿”

(1913年12月—1914年3月)

一、打破第一次“围剿”

讨袁战争失败后，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并积极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但是，声势越来越大的白朗起义武装，对于北洋政府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心腹之患。陆军总长段祺瑞就透露了这种心情，他认为起义军“地处腹心，若不认真痛剿，终无了局”。不仅如此，还由于起义军的活动，“大碍西人商务及传教事宜”，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的重视。1913年11月，驻汉口的各国领事，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建议北洋政府使用飞机，“将白朗军队全行炸尽”。各国驻京公使也“迭经函致政府，要求迅速扑灭”这支起义武装。依靠帝国主义支撑的北洋政府，在“外人注目”的情况下，决定对白朗起义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

1913年11月下旬，北洋政府增兵河南，电饬豫督张镇芳对起义军进行“围剿”。其具体部署：毅军统领宝德全率部驻邙县、宝丰、汝州（今临汝）三县；师长张锡元率部驻舞阳、泌阳一线；王毓秀旅驻裕州、南召、鲁山、伊川一线；成慎团驻襄城、叶县；南阳镇守使田作霖部分驻镇平、内乡、浙川和南阳、邓县、新野六县；南下的奉军驻唐县、桐柏两县；镇嵩军统领刘镇华部驻嵩县、宜阳、永宁（今洛宁）、卢氏县；北洋陆军第二师的混成营驻确山、遂平一线；统领徐占凤、高文贵所部担任京汉路警戒；河南护军使赵倜率马队巡察各处，督饬诸军。上述总兵力约三万余人，妄图将白朗起义军围歼于豫西南地区。原计划12月1日开始“围剿”，于一个月内将起义军“一律肃清”。并要各县知事“赶办清乡，以绝后患”。实际上，“围剿”行动于1913年末才开始。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起义军作了相应的部署：由白瞎子等率部分兵力留在豫西南地区活动，牵制“围剿”军；白朗则亲率起义军主力跳出包围圈，到京汉路以东，打击守备薄弱的敌人。

1913年底，白朗率部向京汉路秘密移动，于1914年1月8日到达京汉路东的新安店。9日上午，在新安店北十里的小为庄，与石振声补充旅之胡

《周符麟致袁世凯、段祺瑞电（1913年7月6日）》，《白朗起义》第59页。

《枣阳县志》卷二十，武备志附民国兵事纪略。

《赵倜致袁世凯、参陆两部电（1913年11月12日）》，《白朗起义》第75页。

季雨霖（？—1917），湖北荆门人，日知会会员，武昌起义后，被委为安襄郢荆招讨使，规复荆襄。南北议和后，回武汉，任第八师师长，不久辞职。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在襄河号召旧部起兵，被捕遇害。天津《大公报》，1913年5月14日。

永奎团遭遇，激战三时许，歼敌一部。后进至新安店东北的蔡庄，兵分三路南下。先攻罗山未克，遂转攻光山。1月11日，在当地小刀会众暗助下，一举攻破光山城。15日，又攻占光州（今潢川）城，缴获枪械四五百支。起义军破光、潢后，即扬言将北上项城，抄袁世凯和张镇芳的老家。袁大惊，立即调兵“护陵”。其实，起义军并未北上，而是继续东进，于16日陷商城，歼团勇三百余人，缴获枪械子弹甚多。旬日之间，起义军连陷豫东南三城，使袁世凯大为震惊。他急令其亲信、新任湖北都督段芝贵先到信阳“统筹全局”。不久又将其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革职，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驰赴信阳“督剿”。段芝贵到信阳后，立即调动部队，作出了“相机痛剿”起义军于光（山）、固（始）的部署。但是，行踪飘忽、惯于避实捣虚的起义军，早已摆脱追堵的敌军，转至皖西，威逼六安、霍山。

六安是皖西的水陆交通枢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当时，皖军主力正在该省东北部镇压起义农民，皖西地区兵力比较薄弱。起义军进入皖西后，皖督倪嗣冲慌忙下令：芜湖镇守使鲍贵卿率部由芜湖至庐州（今合肥）；安徽第一师师长马联甲率部由省城安庆至舒城；安武军中路统领邱昌锦率部由寿州（今寿县）赴六安，准备“会合兜剿”。正当倪嗣冲忙于调集军队之际，起义军打响了进攻六安的战。当时，六安城内仅有巡缉营营长王传禄所部约五百人。起义军东进时，王传禄率部在叶家集、金家寨、流波一线进行防御，仅留数十人守城。1月20日，王传禄部在流波被起义军击溃，经苏家埠逃进城内。此前，该县知事段保森见六安城危在旦夕，携款潜逃。段的卫队中有的与起义军有联系，乘机打开监狱，将犯人全部释放，并将“县署公款什物掳掠一空”，城内秩序大乱。这时，皖北镇守使倪毓棻飞令统领邱昌锦率二营、帮统马联棻率一营由寿州驰援。1月24日晚，马联棻营进驻六安。但起义军一部早已潜入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并四处放火，秘开城门，城外大队也适时赶到，乘机入城。守军不支，弃城逃跑。起义军骑兵三百余人乘胜追击，毙伤敌军颇多。六安城当即被起义军占领。邱昌锦行至六安北五十里之马头集时，闻马联棻部在六安被围，立即兼程往救，以管带陈怀忠为左翼，自率管带李长胜为右翼，从东、北两面进攻六安城。起义军利用城东有利地形，事先设下埋伏。陈怀忠营陷入重围，李长胜营也遭到有力的反击。自下午1时战至7时，邱部“饥疲交加”，“伤亡枕藉，狼狈溃退。在起义军进围六安时，驻舒城的骑兵团团长路靖坤也奉命率一个营驰援。24日晚，该营行抵六安城东二十里铺时，路靖坤不明情况，先带三十余人入城，准备与马联棻接洽守城事宜，结果自投罗网，被起义军俘获处死。路营也被击溃。六安之战，起义军给皖军三个多营以歼灭性的打击，是起义军在外线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的胜利，使士气民心大为振奋。

在起义军主力转至外线，驰骋于豫东、皖西之际，坚持在内线作战的起义军，在内乡、赊旗镇（今社旗县）、南阳等地积极活动，牵制和打击“围剿”军。当时，荆紫关巡防队也加入起义军，被裁汰的政府军士兵及各地小股义军，纷纷“闻风归附或遥为附和”，因而起义军的实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有所发展。

由于起义军采取了比较正确的作战方针，北洋政府策划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

二、打破第二次“围剿”

在袁世凯对起义军进行“围剿”时，英国驻华武官罗伯逊、俄国驻华武官佛多楼夫，先后赴信阳“观战”。罗伯逊提出了以轻便马队跟踪追击，配以步兵围堵和“遍立堡垒”的“剿匪节略”，为北洋军出谋划策。袁世凯还接受各国驻汉领事的建议，不惜以重金购买飞机数架和聘请俄国飞行员来华，并派卫队护送飞机与飞行员到信阳机场，用新式武器镇压起义军。

起义军进据皖西地区后，皖督倪嗣冲一面从安庆、芜湖、寿州调动约十个营的部队，向六安、霍山方向围堵，一面电请段祺瑞增兵英山、霍山、罗田、蕲春，阻塞起义军南下道路。与此同时，河南护军使赵倜率统领高文贵等部到达固始，并令拱卫军、北洋陆军第二师第六团向商城、固始方向集结，与皖军声势联络，“稳慎前进”。这就再次形成了对起义军的“围剿”。白朗等为了摆脱被动不利态势，决定率部突围，向铁路以西转移。

1914年1月27日黎明，起义军从容撤离六安，并再次声东击西，迷惑敌人。军队出城后，先向东行进，声称将进攻庐州，尔后转旗西走，进据豫皖边的金家寨，准备伺机突破敌军防线。此时，赵倜正待拱卫军和二师六团集中后向麻布街（商城东一百八十里）一带进发。但统领高文贵未执行赵倜的命令，于1月28日令拱卫军团长熊文朗率两营单独由固始开往麻布街。熊团于29日出发，在叶家集宿营。起义军侦悉该团孤军冒进，便迅速奔袭叶家集。熊文朗因叶家集无寨垣可守，即在该集东八里的石碑楼布置防御，由管带李凤举指挥左翼，帮带王翰文指挥右翼，熊自带山炮两门居中指挥。熊还派人飞报驻武庙集（叶家集西四十里）的高文贵，请速派兵增援。1月30日上午，起义军集中兵力向熊团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2时，先将其左翼击溃，再转攻其右翼，将帮带王翰文击毙。该部见主官毙命，纷纷溃退。起义军立即包围中路，熊文朗不敢抵抗，率部突围，退回固始。这次战斗，起义军共击毙敌军帮带、副官、哨官、哨长七人，击伤哨长、哨官二人，歼敌百余人，缴获步枪一百二十四支、手枪六支、望远镜两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熊团溃败后，商、固一线的豫、鄂联军便加紧防堵。起义军又于2月6日攻占霍山，继又南下至英山。皖军马联甲师“跟踪数日，竟未追及”。段

祺瑞鉴于“北部兵力已经厚集”，电令马联甲师迅速南下，堵击起义军，令英山、罗田守军严防要隘，令鲍贵卿率部往舒城堵击，令北洋陆军第二师师长兼鄂皖“剿匪”总司令王占元增兵鄂皖边界的松子关一线，以便“约期会合，严行痛剿”，妄图将起义军围歼于霍丘、霍山、叶家集之间。这时，起义军已转移至双河店（金家寨西南四十里）、皂靴河（商城东南四十里）一带活动。驻光州的王占元急令所部第九团进驻瓦庙集（固始西南四十五里）；骑兵第一旅赶赴叶家集，与皖军联络；石振声旅混成第五团待机于商城附近；混成第六团从固始南下。为防止南方的革命党人接济起义军，段祺瑞还请袁世凯派军舰数艘，在长江梭巡。

由于鄂、豫、皖三省的“围剿”军愈集愈多，起义军在内线的回旋余地愈来愈小，白朗等决定率部迅速突出包围圈。先准备从商、固之间的瓦庙集突围，因遭敌第九团堵截，遂进攻段家集、方家集，又遭敌混成第六团阻击，于是集众向酆家集（商城东北二十里）进攻。2月21日，起义军首领之一李鸿宾率步兵四五千、马队三四百人，携火炮两门，从皂靴河经苏仙石向西北挺进，白朗率大队跟进。王占元命驻段家集的混成第六团和商城的混成第五团立即出动，对起义军实行夹击。21日上午，混成第五团与起义军前锋相遇，李鸿宾率起义军占领酆家集南面一带高地，与该团展开激战，至下午5时，起义军被迫后撤。王占元即令第九团扼守商城以南至松子关一线各要隘，阻止起义军南下；令石振声督率五、六两团从苏仙石西、北分进合击。他得意洋洋地向段祺瑞报告：“迄今合围之势已成，进攻之机已熟”。

2月23日，白朗所率之万余人在酆家集南又遭混成第五、第六两团夹击，被迫东撤。起义军集合大队突围，多次受阻，北洋军又步步紧逼，处境十分不利。白朗等决定以部分兵力在当地起义武装配合下，潜行至光州附近，出敌不意地袭击王占元的指挥部，借以调动敌人；其余部队分成几路，乘机冲出包围圈。这一部署果然奏效。当起义军的枪声在光州城外突然打响时，王占元惊慌失措，急令一个营守城，两个营出城迎战，同时命令附近驻军星夜驰援。袭击光州的起义军奋不顾身，与优势敌人激战两日，终于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分路突围的任务。

各路起义军于2月26日、27日跳出包围圈后，日行百余里，兼程西进。其中一路发现有飞机在空中盘旋，部队立即疏散隐蔽，组织对空射击，击伤敌机一架，开创了近代战争史上用轻武器打飞机的先例。

起义军跳出包围圈，至京汉路侧集中后，在武胜关一带破坏铁路，一度造成车运中断，使“中外居民异常恐惧”。随后，起义军从信阳南东双河分兵两路，一由柳林南下，威胁武汉；主力经随、枣西进，直趋老河口。

《白朗起义》第241页。

天津《大公报》，1914年3月10日。

北洋陆军第二师师长为王占元，1914年2月11日被任命为鄂、皖“剿匪”总司令。

老河口位于汉水东岸，是汉水中上游的货物集散地。当时，由黎天才第一师赵荣华团的一个营驻守该镇。赵平日肆意鞭打市民，勒索商户，并经常沉溺在戏院中，不理军务，军队纪律废弛。当起义军越过随县、枣阳，向老河口方向前进时，赵荣华仍不介意。少数起义军便混在一戏班里，潜入镇内。

8月7日，起义军三千余人攻占老河口东南的黑龙集，驻守该集的第二混成旅第五团第三连向老河口溃退。此时，赵荣华才匆忙下令戒严，派部队防守城关。当晚10时许，起义军猛攻大东门，事先进城的起义军立即响应，火光烛天，枪声大作。战至8日凌晨，镇内守军及商团大部被歼。赵荣华仅率马队数十人逃往樊城。起义军共缴获火炮两门、炮弹九十余发、枪弹二十余万发，取得了外线作战的又一次较大胜利。

西进的起义军进展顺利，南下的起义军也接连获胜。当起义军还在路东的鄂豫边活动时，鄂督段芝贵为了防止起义军南下长江与革命党联络，将主要兵力集中在罗田、麻城、黄安一线，因而路西的兵力比较薄弱。广水虽有驻军，但责在保护铁路，不敢轻动。所以，该路起义军出武胜关后，未经大的战斗，就连破应山县的麻烟市、霍家集，直趋安陆。待到鄂军赶来时，部队即转旗北上，与由老河口转移的起义军主力会师。8月14日，起义军再次攻克鄂、豫、陕三省边境要隘荆紫关。守关的巡防营一个营狼狈北逃，退守西坪。

袁世凯先后派出亲信段祺瑞、段芝贵和赵倜、王占元等将领亲临前线指挥，相继调动两万余部队追围堵击，历时两月，妄图将白朗起义军消灭于鄂豫皖边地区，结果再次以失败告终。起义军在反“围剿”斗争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部队扩大至二万余人。这是起义军最兴盛的时期。

第四节 西进陕甘，由胜转败 (1914年8月—5月)

一、北洋军的八路“兜剿”计划和 起义军的西征决策

白朗起义军连战获胜，袁世凯十分惊慌，连电段祺瑞和段芝贵，命令他们加派部队，“酌配利器”，再次组织更大规模的“围剿”，务求“早日荡平”。

1914年3月15日，段祺瑞根据袁世凯的指令，与段芝贵等分析了前段作战情况，认为起义军惯于避实击虚，合围、追击均难于奏效，但也别无良策，只得仍然采取老一套的办法，实行所谓分进合击，八路“兜剿”。其具体部署是：豫皖“剿匪”副司令王汝贤率所部一旅及归其节制的何其慎旅驻裕州，另以一团驻许昌；骑兵第一旅旅长陈文运率所部驻襄城、叶县；河南陆军第一师师长张锡元率部驻舞阳、泌阳；河南护军使赵倜驻洛阳，所部毅军分扎汝州、宝丰一线；镇嵩军统领刘镇华率所部驻卢氏，另以镇嵩军或毅军两营驻于熊耳山、杏花山之间，切断起义军回基地之路；奉军吴庆桐旅驻南阳、唐县；北洋陆军第九师十八旅旅长张联升率所部驻浙川附近，兼防郧县；湖北陆军第三旅旅长卢金山所部之一营并入北洋陆军第二师，以第二师一个团驻新甸铺（新野南三十里），相机前进，另一个团为游击之师，四面策应。

此外，为了保障后方运输，令北洋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徐占凤等率部加强铁路沿线防守。

在北洋军刚刚部署八路“兜剿”之际，白朗等起义军首领作出了西征陕甘，伺机入川的决策，并利用很短时间作了如下准备：

（一）起义军改称“公民讨贼军”，白朗任总司令，李鸿宾为参谋长，建立了统率机关。

（二）区分前、中、后三军，以王生歧为前军总司令，韩世昌为中军总司令，白瞎子为后军总司令。

（三）将分散活动的部队调回，分别集结于豫、陕交界的荆紫关、卢氏一带，作好入陕的准备。

二、攻破商县，威逼西安

《张镇芳致袁世凯、参陆两部电（1913年11月26日）》，《白朗起义》第76—77页。

吕咎予：《白狼扰蓼记》，《白朗起义》第308页。

《段祺瑞致袁世凯、参陆两部电（1914年2月12日）》，《白朗起义》第107页。

起义军在荆紫关停留三日，于3月17日分路西进，连克西坪、富水关、商南、武关。20日，先占龙驹寨（今丹凤），继克商县，歼敌百余人。起义军顺利进入陕西，使段祺瑞的八路“兜剿”计划完全落空。段本人于3月下旬被召回京。

陕督张凤翔见起义军来势凶猛，省城西安受到严重威胁，仓皇率军至黑龙口、蓝田进行防御，以民政长宋联奎会办军务，专守省城。3月25日，宋联奎急电段祺瑞、段芝贵，要求豫、鄂两省速派北洋陆军第二师由荆紫关、毅军由潼关、镇嵩军由卢氏、张联升旅由郟西分路进击。

北洋政府为确保西北重镇西安，除令王汝贤第八师和赵倜毅军分左右两路急赴荆紫关、潼关堵外，又令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将法式双翼飞机四架运抵潼关助战；命京畿军事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率拱卫军十二营及雷震春部八个营共约万人，沿京汉转陇海铁路入陕；命川军加强汉中方向防御；命山西都督阎锡山扼守晋南要隘，并增兵潼关，配合陕军作战；命甘肃驻重兵于乾县、凤翔以西，防堵起义军西进。为了统一指挥，以后又命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赵倜为“会办”。袁世凯调集号称二十万大军（实际十余万人），企图消灭起义军于陕西境内。

白朗在攻克商县后，以一部兵力进攻蓝桥（蓝田东南二十五里）、孝义（今柞水），自率主力指向汉中，准备伺机入川。进攻蓝桥的起义军为陕军所阻，遂西趋引驾回，于3月30日克孝义。进军汉中的起义军，于24日占山阳，29日占镇安。31日，张凤翔返回省城，与宋联奎共商围攻起义军的部署：令张建有团改骑为步，从大峪口（蓝田西南五十里）入秦岭迎头堵击，陈树藩第四旅由商县西杨家斜南下尾追；飞调驻防汉中的两个营驰赴兴安（今安康），催令汉中镇守使张钫率部进至紫阳、洵阳（今旬阳），扼守汉水要口，防止起义军南下入川；催促豫、鄂各军迅速西进，实行四面围攻。

起义军主力进至镇安、凤凰咀地区后，得悉南下入川的道路已被阻塞，遂与攻占孝义的部队会合，决定出秦岭北上。先在孝义以北的营盘岭将张建有团击溃，毙伤敌营长以下官兵一百二十余人。随后，于4月初分别由库峪、大峪口出秦岭入关中。4月6日克整屋（今周至），8日渡渭水，经武功直趋醴泉（今礼泉），闻陈树藩旅已进驻醴泉，遂改攻乾州（今乾县）。9日黎明，起义军炮轰县城，乘敌慌乱之际，大队攻进城内。13日、14日又先后攻占永寿、邠州（今彬县）。此时，陈树藩已率部至永寿，他命第七团团团长率第三营向邠州进攻，亲率第八团二、三两营及军士队二百余人进攻邠州西南之大峪镇（今太峪）。起义军与陈部激战两昼夜，三战皆败，遂撤离邠州城，进入该县所属之西南山中。之后，又乘陕军不备，于18日、19日先后攻破麟游、岐山。驻凤翔的甘军见起义军来势凶猛，相率退避至陇州（今陇县）一带。此时，赵倜所率之毅军已尾随而至，于4月21日抵凤翔。起义军绕过凤翔，于21日、22日先后破麟阳（今千阳）、陇州。毅军紧追不舍，起义军转入固关山中，据险抵抗。毅军越山绕路，四面包抄。起义军拒

敌失利，阵亡一千五百余人，丢失枪支、骡马甚多。在此不利情况下，白朗便率部继续西进，入甘肃境内。

三、入川计划受挫，在甘处境艰危

起义军首先在陕甘边的固关镇与甘肃骁勇军统领崔正午所部近千人接战，一举将崔部击溃，于4月底由张家川进入甘肃境内。甘肃都督张广建急忙在兰州东南地区组织防御，其方针是“一以遏其奔窜，一以跟踪游击”。并作了如下部署：循化、夏河、狄道（今临洮）、洮州（今临潭东）、岷县，由提督马安良所部及原驻循化、夏河等处各营分段扼守堵截；安定（今定西）、通渭、陇西、狄道四县，由镇守使张定邦所率五营分段驻扎，严守省垣门户，并以余力兼顾会宁一带；宁远（今武山）东南各县，由镇守使马国仁及分统马国礼所率各营分守要隘，并抽调一支部队机动驰击；静宁以东各县，由平凉护军使张行志所部各营分别防堵，并抽调“劲旅”机动作战；由统领吴炳鑫率所部在静宁、通渭、安定、狄道、会宁、陇西、渭源等处游动作战，并与统领张定邦及宁远军联络，以壮声势；甘州提督焦大聚为行营总司令，率所部三营以及分统马永祥三营、统领崔正午所余各队、统领陈正魁三营、帮统马忠孝四营，在营务处金承荫辅助下，即时开赴前线“跟踪痛剿”。

起义军在击溃崔正午部后，即翻越高塬深涧，迤迤西行，抵达通渭、马营一带。为了阻止尾追的毅军，所过之处，在井内塞以死尸秽物，实行坚壁清野。赵倜部有的终日不得一饮，有的两天仅食一餐，骡马因饥渴而死者日有十余头，行军宿营造成极大困难。当赵倜部追至马营南山时，起义军于各要隘设卡据守。赵部分左右两队猛攻，夺取了一些要隘。起义军乘赵部用饭之际，突然从四面围攻，激战两小时后，向宁远方向转移。这次战斗，使赵部遭到相当大的损失，起义军也阵亡二百余人，丢失快杂枪百余支。

5月初，起义军兵锋指向宁远以东的洛门镇。当地驻军马国礼、陈正魁部得悉起义军来攻，“马则逗遛不前”，“陈则鹵莽前进，……仓皇迎战”。移时，起义军将陈部三面包围，猛烈攻击，杀伤甚众。陈正魁率残部退守洛门镇，起义军加紧围攻，“逼令缴出快枪四百余杆、子弹约四五万粒，始将该队放走”，洛门镇遂被起义军占领。这时，尾追的毅军因“数十日奔逐，伤病疲劳，为数甚多，随队急追，必多牵累”，乃派三个统领率八个营轻装向陇西“追剿”，赵倜则“带伤病各兵及辎重暂赴安定休息调养”。这支追赶起义军最卖力的部队，已被拖得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洛门镇战后，适值天雨，赵倜的“追剿”部队被暴涨的河水所阻。起义军乘机于5月3日攻破伏羌（今甘谷），然后直趋陇南重镇秦州（今天水）。

《王占元致段祺瑞电（1914年2月22日）》，《白朗起义》第117页。

《段芝贵致段祺瑞电（1914年2月28日）》，《白朗起义》第123页。

秦州守军有总兵马国仁所部五营。马将部队布置在城西之北山、三十里店一带进行防御。4日，起义军先以少数部队进袭，随即且战且退，诱敌脱离既设阵地。马国仁未探明情况，亲自率队追击，结果遭到伏击，被起义军击毙。马部见主将毙命，顿形溃乱。起义军乘势猛追，直逼城下。城内官吏开城投降，秦州遂被起义军占领。

起义军在洛门镇、秦州两战获胜后，士气复振。5月7日取道徽县南下，意欲由此入川。因有川军步兵第十、第十二团、炮兵第三团在略阳一线堵截，随即经成县转趋阶州（今武都）、文县，拟由碧口入川。5月14日，起义军攻占阶州，川军闻警，即由碧口星夜赶至阶州方向防堵。起义军入川的道路又被堵塞，士气受到一定影响。这时，跟踪追击的毅军、甘军又相继赶到。起义军遂北上宕昌，经哈达铺（宕昌西北六十里）、荔川（今理川），于21日破岷州（今岷县），25日破洮州，威胁兰州。

岷州系藏民聚居区，洮州系回民聚居区。藏、回等族人民既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歧视和压迫，又受本民族上层分子的欺骗蒙蔽，与汉族人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和矛盾。起义军进入上述地区后，由于不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因而引起藏、回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如在攻取洮州城时，回族民众和甘军一起据险反击，起义军进城四天，战斗仍未停息。这样，起义军成了与当地人民对立的孤军，人员、械弹无法补充，给养的筹集十分困难，只得杀马充饥。由于提督马安良等所率追兵和地方反动武装已节节进逼，赵倜又率军至狄道堵截，形成首尾夹击之势，起义军陷入十分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这时，起义军领导集团内部在入川还是返豫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地暴露了出来。白朗等主张继续南下入川，李鸿宾、宋老年等主张重返河南。乡土观念浓厚的起义军战士，经过长期艰苦转战，思乡心切，也不愿入川。在众意难违的情况下，白朗不得不同意回师返豫。

第五节 回师豫西，最后失败 (1914年5月—8月)

起义军进占岷州、洮州以后，张广建和赵倜拟定了“洮岷圈制”计划，布兵于河州（今临夏东）、狄道、渭源、巩昌（今陇西）、漳县、伏羌、安定等处，“意在以有定制无定，以围兵作剿兵”，“并严饬各将领据险扼堵”，一遇起义军便立即进攻。根据这一计划，赵倜所率之八营毅军及忠毅军统领马忠孝所率之五营马队，于5月27日进驻巩昌一带，与建威军统领吴炳鑫所部二千人会合；陶云鹤所率之北洋陆军第十五旅和另一个团，于6月1日分别进抵狄道、安定；焦大聚、金承荫所部由礼县经岷州西进，与提督马安良所部扼守河州东境及南境，防止起义军西趋青海；另调秦州之张联升旅扼守西津，防止起义军回走阶州。张广建准备亲赴狄道指挥。5月底6月初，“西路剿匪督办”陆建章所率之北洋军第十一、十三、十四等旅，先后抵达陕、甘边境驻防，陆建章坐镇西安指挥。

起义军自作出回豫决策后，即于5月末从洮州出发，经漳县、宁远趋秦州。前队由白朗率领，后队由李鸿宾、孙玉璋、尹老婆等率领。6月1日，后队进至漳县时，焦大聚、张联升、吴炳鑫所部右、中、左三路前来阻截。左路吴炳鑫部先与起义军接战，焦大聚等部也相继赶到，实行夹击。起义军英勇抵抗，但因弹药不继，伤亡约二千人，马匹枪支丢失甚多，随即渡渭河东走。2日晨，又在宁远西北三十里之鸳鸯咀遭张联升部截击，部队分成两路，一路强行突破张部封锁与先过宁远之前队会合，东走伏羌，一路从小道越过宁远南之滩歌镇迂回东进，奔向秦州方向。两路会合后，再克秦州，并北渡渭河，于6月4日攻占秦安。起义军经过英勇作战，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洮岷圈制”计划，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

此时，陆建章已经以宝鸡为中心，将十一、十三、十四旅和石振声旅部署在北至长武、南至凤县一线，在陕甘地方武装配合下，作好了堵击起义军的准备。陆建章还下令川军司令彭光烈、二十五团团团长王茂元加强阶州方向的防御，防止起义军南下入川；同时派十三旅二十六团步兵一营、骑兵一连，轻装兼程，由武功向麟游、灵台、崇信、华亭之小道间活动，随时准备追击起义军小股突围部队。当得悉起义军于6月7日进占秦安以东之清水县后，陆又令二十六团由崇信改道速赴宝鸡东河，令平凉护军使张行志加派步队一营驻守华亭，增派马队扼守张家川两侧；令凤县之二十五团严密扼守凤县至宝鸡一段隘口，从南北两翼加强宝鸡正面防御。

起义军攻破清水后，每昼夜急行军一百七十余里，直趋陕西宝鸡。而赵倜之尾追部队每昼夜行军一百四十余里，“已劳顿不堪任战”。这就便于起义军集中全力对付正面堵截之敌。6月9日，起义军在宝鸡以北五六里处，

《参陆两部致段祺瑞、段芝贵电（1914年3月11日）》，《白朗起义》第133—134页。

与张敬尧十一旅所属之夏文荣二十三团展开激战，突破该团防御阵地，越过宝鸡防线。起义军随即南渡渭河，进至郿县（今眉县）东南之青花镇附近。继又日行百余里，乘势东进，10日克盩厔13日逼近西安，后又南下进入子午镇一带山地。十四旅之何乃中团急赴该地堵截。起义军向该团发起猛攻，终于突破险关，转向孝义、镇安方向。6月14日，陆建章派出两路追击队伍：西路步队两营、马队一连，由子午谷跟踪追向镇安；东路步队两营、马队四百人，由大峪口绕赴商县。起义军继续兼程前进，于17日攻克镇安。至此，又突破了敌人重兵设防的第二道防线。

当起义军突破宝鸡防线后，陆建章急命几个主力旅转头东追，并要赵倜等速到西安商谈“追剿”计划；同时，致电袁世凯，请求增调部队，结果受到袁严厉斥责。袁还令其将未能堵住起义军的二十三团团团长夏文荣等“从严参办”，以“振刷士气”。

起义军攻占镇安后，陆急忙向袁报告：东路已增派毅军三营，西路增派十一旅步队五营，分别由赵倜、张敬尧率领，于6月19日出发追击；张联升所部三营于21日由子午谷、孝义、蓝田之间的小道前进。起义军于21日进占山阳，直趋荆紫关后，陆又向袁报告赵倜的追军已于24日抵龙驹寨。当时，南阳镇守使吴庆桐见起义军日益接近豫省边境，也向袁世凯报告：在荆紫关只有田作霖的巡防队四营，最多只能另调两营加强该方向的防御。上述情况表明，当时尾追之敌，距起义军少则有一至两天，多则有三至四天的路程，正面堵截的兵力又相当薄弱，这就为起义军突破荆紫关防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尽管袁世凯下令“万勿使匪逼近荆关”，而起义军终于在6月下旬先后越过荆紫关防线，进至豫西地区。6月26日，宋老年等率起义军一部在陕豫边之富水关与刘镇华的镇嵩军恶战一昼夜后，从西坡一带各山口进入河南，30日返抵内乡县境，继又进入鲁山县的娘娘山。白朗则率主力数千人沿丹江东进，于29日越过荆紫关以北数十里之西坪，径赴鲁山山区。

起义军经连续苦战，先后突破岷洮、宝鸡、荆紫关三道防线，返回豫西地区，应该说是又一次重大的胜利。但在此时，起义军内部由农民的狭隘性而产生的宗派和乡土观念，迅速地泛滥起来，竟出现了不可克服的离心倾向。起义军一回河南，便分别由大小杆头带着，多则上千人、数百人，少则数十人，漫无目的地各自返乡。另有不少战士请假探家，结果多数去而不返。

起义军的离散，给反动武装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袁世凯为了镇压分散的起义武装，不仅集中了河南赵倜的毅军、刘镇华的镇嵩军、张锡元师和成慎旅、田作霖的巡防营以及豫西的地主武装，还指令张敬尧旅和驻湖北的刘佐龙旅，总兵力二万余人，全力以赴，进行“搜剿”。他令各部“分派队伍扼守各处要口，另抽拨精锐支队，多购眼线侦探，随处分投搜捕”，“遇

王生歧，原陕西陆军第一师的一个团长，参加过辛亥革命，响应过讨袁战争。1913年10月，王率千余人离陕至豫，参加起义军。

匪巢穴，酌量焚毁”；对于“视匪如家人，视兵如仇仇”的地区，则“分驻重兵，清乡严洗”，实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政策，迫使起义军“无巢可回，无地可居”。北洋军与河南地方武装先在邓州、叶县、鲁山、宝丰、汝州等地进行围山“搜剿”，后又集中兵力“搜剿”分散活动在鲁、宝、郟、汝山区和裕、舞、泌山区的起义军。当地的地主武装，强迫群众摊款出丁，实行联防，进行“清乡”。过去起义军经常活动的娘娘山、檀木沟、老母庵、母猪峡等山区，虽然地势险峻，但回旋余地很小。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分散活动于上述山区的小股起义武装，由于各自为战，互不协同配合，伤亡不断增加，粮弹日益减少，终于有的被击溃，有的“弃械藏匿，改装潜逃”，自行溃散了。

白朗返豫后，先率数百人于7月初在叶县西北的平顶山一带活动，7月8日，在鹅庄、新店遭敌截击，部队损失较大。继在鲁、宝、郟、叶诸县山区流动游击，后又率五六十人转移至宝丰、汝州两县交界的虎狼爬岭。8月8日，反动武装将该山层层包围，白朗率余部在山北三里寨凭险抵抗。“围剿”军进攻两昼夜，未能破寨，便集中炮火轰击。不少起义军战士负伤牺牲，鲜血染红了三里寨。在粮断水尽，子弹所剩无几的情况下，白朗决定率幸存的二三十人于黑夜突围。当行至南山坡时，与汝州民团百余人遭遇，白朗不幸中弹牺牲，余部各自星散。至此，这支曾使反动派惶恐不安的农民起义武装完全失败了。

乔叙五之《记白朗事》称白瞎子为后军总司令。另据《吴庆桐致段祺瑞电》称，白瞎子于1914年5月10日被河南反动地方武装击毙于裕州、舞阳之间的赵钱庄。（见《白朗起义》第153页。）

《统率办事处致张广建电（1914年5月27日）》，《白朗起义》第179页。

第六节 白朗起义战争的经验教训

一、起义战争的特点

白朗起义战争，是在辛亥革命之际，由朴素的“打富济贫”发展到反对袁世凯反动统治的一次农民革命战争。起义之初，起义军每占一座城镇，便“令殷富输纳财物”救济穷人，释放被囚禁的劳苦群众。后受革命党人的影响，白朗等逐步加深了对袁世凯反动本质的认识。从1913年开始，公开打出讨袁的旗号，到处张贴反袁的布告，揭露袁世凯“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指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白朗等还抨击袁世凯对于沙俄入侵外蒙、英国入侵西藏所采取的妥协投降政策，并对外国传教士等采取了惩罚措施，表现出明显的反帝倾向。最后，直接提出了“逐走袁世凯，设立完美之政府”的政治主张。由于起义军的行动既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又顺应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因而得到比较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白朗起义军作战勇敢，具有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同时，在战术运用上也比较灵活，能根据敌众己寡的特点，善于避实击虚，机动作战：或从内线跳到外线，或出敌不意地袭击守备薄弱或孤军冒进之敌。加上行军快速，常使敌军“徒事跟追，疲于奔命”，围追堵截一再落空。追击起义军最卖力的赵倜就曾哀叹：“尾追固非善策，围剿亦难奏功，言念及此，忧心如焚”。起义军在进攻城镇时，注意依靠群众，事先派人潜入，里应外合，或声东击西，长途奔袭，使敌人猝不及防，从而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战果。

这些，是白朗起义武装得以存在、发展和坚持三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二、起义战争失败的主要教训

这次起义战争的失败，客观上由于敌人强大，尤其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统治趋于巩固，得以集中力量对付起义军；主观上由于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缺乏明确的反封建纲领

《赵倜致袁世凯、参陆两部电（1914年5月14日）》，《白朗起义》第170页。

《张广建致袁世凯、参陆两部电（1914年6月8日）》，《白朗起义》第187页。

《统率办事处复陆建章电（1914年6月27日）》，《白朗起义》第197页。

《统率办事处致田文烈、王占元电（1914年7月13日）》，《白朗起义》第205页。

这次起义战争虽然发生在辛亥革命之际，但起义军基本上始终墨守“打富济贫”这种只能满足农民暂时微小利益的行动，而没有发动农民，用暴力夺取地主豪绅的土地，摧毁封建统治的根基。这就影响了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影响了部队的大规模发展，以致无法在群众中扎下深厚的根子。这也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虽然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但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是难于完成彻底反封建任务的，是难于将起义战争引向最后胜利的。

（二）西进陕甘，是战略上的失策

豫、鄂、皖地区，虽然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势力比较雄厚，但工农群众的抗袁斗争相当普遍，群众基础是比较好的。诚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失败后，北洋政府加紧了对起义军的“围剿”，使起义军增加了困难。但是，只要坚决依靠群众，采用灵活的战术，还是有可能克服困难，在原地区继续坚持斗争的。由于起义军的领导者只看到敌人兵力增加，看不到工农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反袁力量，因而作出了西进陕甘的决策，进入了群众条件比较差的地区，使起义军的作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特别是进入地瘠民贫、民族矛盾尖锐的甘肃地区，困难就越来越大。虽然甘军的战斗力很弱，起义军却连遭挫损。战略方向上的这一错误，成了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至于西谋巴蜀，从当时四川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来分析，那里的讨袁战争已经失败，袁世凯已加强了对该省的统治，加上该省的封建军阀势力相当雄厚，在这种形势下，起义军即使实现了入川计划，能否站稳脚跟，也是值得怀疑的。

（三）长期流动作战，没有建立山区根据地

从起义军初期和中期活动的地区来看，是具备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有利条件的。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山高岭险，易守难攻；当地农民的自发反抗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而且对白朗起义军深表拥戴，“穷苦之家，甘为窝主；乞丐游民，愿作彼探”。但由于起义军认识不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致虽有良好条件而不知利用，没有采取有效的方式，广泛深入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垮当地的地主武装，摧毁地方反动政权，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使之成为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根据地。由于没有可靠的后方作依托，三年来总是不停顿地流动作战，得不到可靠的补给和休整的机会，重蹈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中流寇主义的覆辙。

（四）偏重于攻城取物，未能大量歼灭

《统率办事处致田文烈、赵倜电（1914年7月14日）》，《白朗起义》第205页。

敌人有生力量

被强大敌人围追堵截的起义军，在战略上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战斗中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白朗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机动灵活，但没有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来，起义军在五个省先后攻破县城四十座和无数市镇、关隘，但是，歼敌正规军百人以上的不过十多次，歼敌一至三个营的不过六七次，其余多是人数不多的民团、商团等地方武装。起义军所以不断攻城，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粮饷和械弹。正是由于没有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所以在战略上始终处于遭敌围追的被动地位。起义军经常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便于利用山险杀“回马枪”，伏击尾追之敌。可惜，他们不善于运用此种战法，结果，不但丧失了歼敌良机，反被敌军穷追不舍，陷入被动地位。

（五）缺乏巩固提高部队的有力措施

白朗比较强调群众纪律，要求部队不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军队内部的组织始终比较松散，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加上长期流动作战，缺乏必要的训练，未能使之向正规军转化。在思想建设方面，虽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进行了一些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但根本无力改变农民小生产者短浅的政治眼光，克服宗派观念、家乡观念、自由散漫等弱点，以致最后出现了自动解体，被敌各个消灭的惨痛结局。

第十七 章护国战争 (1915年12月——1916年7月)

继“二次革命”(讨袁战争)之后,中国资产阶级又发动和领导了旨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护国运动。护国战争,主要是指作为护国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滇、黔、湘、桂等省尤其是滇省进行武装讨袁的军事行动。本章以滇省护国军的军事活动为重点,着重叙述四川、湘西、滇桂边等地的作战经过及其经验教训。

第一节 袁世凯复辟帝制

一、胁迫选举总统，废弃临时约法

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以为主要障碍已除，便加快步伐向民主共和势力进攻，采取种种卑劣狡猾的手段，为复辟封建帝制、建立袁家王朝进行准备。

首先，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他当正式大总统。为达此目的，他收买一些议员拼凑成“公民党”，与原进步党一道，操纵国会通过了先选总统、后订宪法的提案，并于1913年10月4日草草公布了《大总统选举法》。10月6日进行总统选举时，袁组织便衣军警及地痞流氓数千人，自称“公民团”，包围国会会场，胁迫议员投他的票。从早8时至晚10时，议员们连续投票三次，袁世凯才勉强当选。次日，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认为国会和政党已无存在的必要，决心把它们一脚踢开。11月4日，袁公然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10日，袁又下令停止其余国会议员的职务，每人发给旅费四百元，令其返回原籍。于是，象征民主政治的国会，被袁世凯彻底破坏了。

取消国会后，袁又着手毁弃束缚他手脚的《临时约法》。他匆匆拼凑起一个名为“约法会议”的立法机构，按其意旨草草炮制了一部《中华民国约法》，于1914年5月1日公布施行。该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集内政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年底，袁世凯又炮制了一个《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其中规定总统任期为十年，任期届满时，如认为“政治上有必要”，不用改选即可连任；总统的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成为终身总统，并可世代相传，与专制皇帝没有多大区别。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梦想名副其实地登上皇帝的宝座。

二、签订“二十一条”，寻找复辟靠山

当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之际，欧洲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正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暂时无暇东顾，这就给日本进一步侵吞中国提供了良机。它借对德宣战之机，于1914年秋派遣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登陆，占据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对此，袁世凯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听任日军在中国领土上横行。1915年1月，日本又以赞助复辟帝制为诱饵，向袁世凯提出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

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竟于同年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中除第五部分内容以外的全部要求，其卖国贼的面目已暴露无遗。

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换取了日本的支持，袁世凯以为复辟帝制的条件业已成熟，便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唆使其亲信幕僚杨度等六人，于1915年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冒充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公开鼓吹恢复帝制，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变更国体。袁世凯在各地的亲信也闻风而动，有的上书“劝进”，有的组织各种“请愿团”，拥袁称帝。在袁世凯操纵下，从10月28日开始，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在当地进行所谓“国体投票”，至11月20日全部结束，“一致赞成”改民主共和为君主立宪。12月11日，参议院又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次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并对文武要员大加封赏。31日，宣布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至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达到了高潮。

三、复辟帝制不得人心，全国掀起反袁浪潮

袁世凯的称帝复辟活动，进一步激起了全国各个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打倒袁世凯成为举国一致的目标。

人民群众是反袁的主力军。除上海等城市的工人积极开展反袁斗争外，许多地方的农民也实行武装起义，攻州占县，动摇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基础。

在政治集团方面，国民党被袁世凯非法解散后，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武装讨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成为资产阶级各派中反袁斗争最坚决的革命力量。1915年夏，该党决定组建“中华革命军”，指派干部分赴上海、山东、陕西等地，筹设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等四个军的总司令部，联络军队和会党，策划武装起义或进行暗杀活动。1915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广东革命党人在惠州、博罗、佛山等地组织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1月10日，上海革命党人刺死了袁的重要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接着发动了“肇和”舰起义。1916年2月，山东的革命军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连克十余县，威胁省城济南。此外，由中华革命党人发动的其它零星起义遍布全国各地。但是，由于中华革命党人仍然不注意发动群众，仅仅依靠暗杀或策动一些会党和旧军队进行军事冒险，最后都难免失败，因而并没有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造成重大的威胁，也未能

《白朗起义》第225页。

闲云：《白狼始末记》，《中华小说界》，第152页。

把全国的反袁力量领导起来。尽管如此，这些武装起义，对于全国的反袁斗争起到了激励和鼓舞作用。

在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同时，一部分拒绝加入该党的前国民党骨干，在东京成立了“欧事研究会”。由于他们开始时没有提出反袁的口号和纲领，因而在群众中影响不大。后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等人投入云南的讨袁行列，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李根源、程潜、钮永建、柏文蔚等后来也先后参加了护国战争。

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本为袁世凯的追随者，后来由于遭到袁的冷落和遗弃，同时也看到袁的复辟帝制活动遭到广大群众的激烈反对，一个“普天同愤”的局面即将出现，才决定改弦更张，转而反袁。当时的进步党，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实力和影响，并得到一些官僚、政客和军阀的支持。他们利用革命党人脱离群众的弱点，把领导反袁斗争的旗帜抓到了自己的手里。梁启超与进步党军人蔡锷密商后，决定了一文一武两步方案：梁启超发表文章，夺舆论先声；蔡锷伺机离京回滇，策动军事讨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北洋军阀内部也产生了离心倾向，甚至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心腹干将，亦纷纷离袁自保。1915年5月末，陆军总长段祺瑞称病退居北京西山，不问政事，不久便被免职。江苏将军冯国璋对复辟帝制持敷衍态度，并与反袁势力暗通声气。袁对冯拥兵外省很不放心，12月调其任参谋总长。冯以“害病”为借口，拒不到任。国务卿徐世昌对复辟帝制既不阻止，也不赞成，并于10月辞职离京。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直接削弱了袁世凯的统治力量。

《赵倜致徐树铮函（1914年3月6日）》，《白朗起义》第126页。

王仲霖：《麻黄支队防匪记》，《白朗起义》第277—278页。

第二节 护国战争的酝酿和双方作战准备

一、云南武装讨袁的酝酿和发动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和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历史上屡受英法殖民者的欺凌，是爱国运动发展较早并受辛亥革命影响较深的省份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东南各省相继为袁世凯的势力所占据，唯有西南之云南、贵州、广西等少数省份，尚未被袁全面控制，在军政界仍保留着较多的革命力量，尤其在滇军中保留着一批拥护民主共和的中下级军官，因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当袁世凯的走卒紧锣密鼓，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的时候，就引起滇军中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中下级军官如罗佩金、赵又新、邓泰中、杨蓁、黄毓成、董鸿勋等的强烈义愤。他们秘密商议，坚决反对帝制。1915年8月，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革命党人吕志伊等也积极活动，鼓动讨袁。云南将军唐继尧开始时态度暧昧，意存观望，后来受到广大中下级军官的敦促和梁启超、蔡锷的鼓动，反对帝制的态度日趋明朗。袁世凯的御用工具“筹安会”成立后，云南的部分中高级军官多次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对待帝制的态度和对策。在1915年9月11日召开的团以上军官秘密会议上，一致赞同反对帝制。并议决下列三事：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整理武装，准备作战；严守秘密。在10月7日的会议上，鉴于袁世凯实行帝制日益明显，遂商讨了起义的时机问题。当时决定，在中部各省中有一省响应、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响应、海外华侨或民党接济饷精，这三个条件中具备一个条件时，即举行起义。如以上三个条件均不具备，则云南为争国民人格计，亦孤注一掷，宣告独立。会后，派李宗黄、刘云峰、赵伸等前往江苏、广西、四川、湖南诸省联络讨袁。在11月3日的会议上，推举罗佩金拟制作战计划，同时确定了扩充军队、筹备军械的办法。扩充军队的办法为召集退伍士兵和闲散军官，编练警卫两团，招添讲武堂学员，添练新兵，补充各团营缺额。筹备军械的办法，除派人赴日本购买万余枪支外，组织人力修配库存枪械；令兵工厂赶造枪炮弹子；令各县将所存之快枪全部集中到省，修配备用。除以上两项外，还决定设立筹饷总局，负责办理筹饷事宜。

此外，为控制入川要道，还确定由邓泰中、杨蓁率两支队伍，以“剿匪”为名，于12月提前向川边进发。至此，云南的讨袁战争，已经作好了初步

“二十一条”主要包括五大部分：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长为九十九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附近矿山，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它国家；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在中国有投资修铁路及开矿的优先权。

准备。

12月19日，蔡锷秘密地由北京取道日本、香港，经越南抵达昆明。先期从国外秘密抵达昆明者，还有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革命党人。这样，无论是进步党、中华革命党，还是欧事研究会、西南地方实力派，都有代表汇集云南，形成了反袁统一阵线。特别是蔡锷、李烈钧等人抵滇，对于加强武装讨袁的领导力量和加速护国战争的发动，起了重要作用。

蔡锷向唐继尧介绍了全国日益发展的反袁形势及袁世凯政权的内部矛盾，更加增强了唐继尧等人的讨袁信心。12月21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罗佩金、方声涛等举行秘密会议，共商讨袁大计。会上，蔡锷宣读了梁启超从南京转来的电报，其大意为“外交紧急，袁将卖国，请即发动，是首义之期，不宜在远”。与会者误认为梁启超已在南京，冯国璋已同情起义，可以居中策应，于是决定提前宣布独立。当即议定，先致电袁世凯，令其取消帝制，杀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否则，“即以武力求最后之解决”。会议还议定了组织临时政府以及各种军事计划。

12月22日，唐继尧又召集外来同志、本省上校以上军官及各机关长官三十九人，歃血为盟，共同宣誓兴师讨袁。

23日，按议定计划，以唐继尧和巡按使任可澄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他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并限24日上午10时前答复。袁逾期未复。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召集各界集

会，宣布云南独立，成立护国军，武装讨袁，并联名通电全国。会上群情激奋，欢声雷动。昆明市民自动张贴“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遍悬国旗，并争纳捐款，云南举义，得到全国各地响应，迅速掀起了反袁热潮。海外华侨也积极汇款支援。

二、护国军的战略设想和作战编成

云南宣布独立后，唐继尧、蔡锷等决定仿照辛亥革命的办法，设都督府为全省最高军政领导机关，并推举唐继尧为都督。

参议院系袁世凯解散国会后设立的新机构，参议员多为清朝遗老和袁的亲信幕僚、政客，其职能是“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

1915年12月5日，革命党人在上海策动“肇和”舰起义炮轰上海制造局，并一度攻占电话局。终因兵力悬殊，起义很快失败。这次起义，在全国引起了震动。

1914年8月，原国民党人李根源、陈炯明、李烈钧、熊克武、钮永建、冷遹、林虎、程潜、陈独秀、李书城等百余人，在日本东京组织“欧事研究会”。该会创建之初，闭口不谈革命，只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外局势。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事件发生后，竟把“联袁对外”作为该会宗旨。后来，其中绝大部分成员参加了讨袁行列。

起义的领导者认为，云南之西、南两面与邻国接壤，东、北两面与川、黔、桂毗连，要讨袁护国，应以云南为根本，向川、黔、桂三路出师，以震撼全国。其基本战略设想是：一路由云南入四川，以一支部队出叙州（今宜宾市）、泸州，进据重庆、夔州（今奉节），直下宜昌、武汉，另一支部队出宁远（今西昌），过成都，越岷州（今甘肃岷县）、洮水，趋甘肃、陕西，进据西北。

另一路由云南入广西，驻师梧州，然后以一支部队东下广州，北出震动江左，东出进据闽浙，另一支部队由梧州向桂林，逾衡阳、永州（今湖南零陵），浮湘直下，取长沙、岳阳，震动武汉。

第三路由云南入贵州，直抵湖南辰（溪）、沅（陵）地区，然后以一支部队经新化取长沙，北上岳阳，逾洞庭，迫武昌，另一支部队下沅水，取常德，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阳。

进军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首先进占黔、桂、川三省；第二步进而抵达武汉、闽浙、陕甘；第三步，以闽浙方向取守势，以陕甘之兵相机威逼袁军右侧，以武汉方向之主力大举北向，直捣袁逆巢穴。

上述战略设想，固然反映了起义将领们气吞山河的宏图大志，但以云南一隅之地和十分有限的兵力，要实现这样大的战略目标，显然带有相当的冒险成分和不切实际的空想。

护国起义之前，云南驻军计有两师一混成旅，连同驻防各地的警备部队，总兵力不足一万五千人。护国军领导者根据上述设想，将原有部队扩编成三个军（编制序列见附表一）：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三个梯团入川，拟在分取叙州、泸州后，进攻重庆；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率两个梯团入桂，拟直趋南宁，会合桂军后，分进湘、粤；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遣兵出黔、湘、取武汉。唐先派徐进为先遣纵队长，同戴戡等入黔发动起义；继派赵钟奇率一个梯团入黔，拟会合黔军，直取湘西辰溪、沅陵；又派李友勋率一支队出会理、宁远（今西昌），相机进取成都；此外，尚编组一挺进军，由黄毓成统率，拟直趋辰、沅，取常德，游击于武汉、荆襄一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宝庆人，出身贫苦，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当时在该校任教的梁启超的赏识，后在唐才常、梁启超资助下，留学日本，先后入日本陆军成城、士官两校学习军事。1904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新军和陆军学堂任职。1911年在云南任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时，武昌起义爆发，他支持并领导云南起义，被推为都督。1913年调北京任职。

唐继尧（1881—1927），字冀虞，云南会泽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历任云贵总督府参谋、云南讲武堂教官等职。1911年任新军管带，参加云南起义。1912年，唐受蔡锷派遣，率滇军占领贵阳，颠覆了由革命派自治学社领导的贵州军政府，与贵州立宪派、旧官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出任贵州都督。1913年蔡锷奉调入京，举荐唐继尧任云南都督兼民政长（1914年6月，袁世凯改都督为将军）。

《续云南通志长篇》卷四。按：所谓“外交紧急”，是指袁世凯拟派特使周自齐赴日，向日本天皇赠勋，准备以卖国条件换取日本承认帝制一事。

带。另委原国民党员熊克武为四川义勇队总司令，程潜为湖南招抚使，分别回川、湘两省集合讨袁武装，开辟敌后战场。

第一军是护国军的主力，每支队配有山炮二至四门，机关枪二至四挺，枪支多为德国造，全军共有官兵六千余人，部队一般都经过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强。其余两军的官兵质量和武器装备均差于第一军。

护国军多路出兵，原有兵力已不敷分配，为适应作战需要，遂实行紧急扩军。其办法是：以蒙自道尹兼护国军第二军参谋长何国钧为义勇军司令官，募集当地义勇约四千人，随第二军行动；派马文仲等募集游击队七营，负责省区防务；派马为麟在省城设立征兵事务所，规定征兵区域，选派干员分赴各县督办，除召集退伍士兵外，还募集识字壮丁，带回省城编练；集合各县的保安团、保商团进行正规训练，补充作战部队。由于滇省人民认识到护国讨袁系正义之战，均“志切请缨”，踊跃参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滇省正规部队由原来的两师一混成旅（共十二个团）扩充到三十六个团，约二万二千余人，使三个军的兵力得以充实。

随着军队的扩充，军费开支急剧增加，这对于地瘠人稀的云南来说，是个严重的问题。都督府决定采取以下筹饷措施：向省内各机关提借存款；裁并闲冗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将其所有款项移助军费；将原拨付中央的盐税协款全部截留；设立筹饷局，动员各县殷富绅士捐款，并规定各县应捐数额。通过以上措施，共筹款二百七十多万元。另外，派吕志伊、龚振鹏等前往香港、越南、缅甸及南洋一带向华侨募捐，共得十二万八千余元。至1916年初，加上云南中国银行所存银币二百万元，共筹款近五百万元，初步解决了军费的困难。因此，部队出发时，给每个士兵预发三个月薪饷，官佐按级留薪一半，由其家眷按月到军需局领取。这样，官兵无后顾之忧，参战部队“皆意气奋扬，有不斩楼兰不生还之概”，士气大大超过北洋军。

三、袁军的攻滇方略和兵力部署

誓词曰：“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参见庾恩旻《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云南图书馆1917年版），上册第20页。

护国军之命名，说法不一。一说原定组织“共和军”讨袁，但与“共和党”之名雷同，因在昆明护国寺召开动员大会，乃取名“护国军”。另一说法是：最初定名为“讨逆军”，后有人指出袁世凯既以日本作靠山，袁若失败，可能发展为对日战争，乃改讨逆军为护国军。此外，尚有其它说法。

参见庾恩旻：《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第24—27页。

第一师三千五百人，第二师三千二百人，混成旅约二千人。独立步兵连十余连共约一千人，独立步兵营三百人，警备队九十三队共约四千人，宪兵队五百人，总计约一万四千五百人。参见庾恩旻《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北洋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护国军纪事》第一期。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派大批北洋军南下，控制各战略要地：曹锟的第三师进驻湖南岳阳，王占元的第二师进驻湖北武汉，李纯的第六师进驻江西，杨善德的第四师、卢永祥的第十师进驻淞沪一带。同时，袁又在北方大规模扩军。护国战争爆发前，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军队，已由原来的七个师两个混成旅，猛增至十二个师三十二个混成旅、团，若加上姜桂题的毅军、张勋的定武军、倪嗣冲的安武军和龙济光的振武军，总兵力达三十八万余人。袁还拥有三十九艘舰只的海军和八个较大的兵工厂。袁世凯依靠这架反动战争机器，自以为对云南的护国起义，“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

云南宣布独立后，袁世凯下令褫夺唐继尧、任可澄和蔡锷的职爵，同时密令驻岳阳的第三师师长曹锟、驻南苑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和驻江西的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立即率部分别向四川、湘西开进，准备对滇作战。1916年1月5日，袁又饬令靠近云南各省的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接着，袁在新华宫丰泽园组织“征滇临时军务处”，亲自主持“征滇”军事。关于“征滇”的进军路线，他最初打算调重兵入湘西，取道贵州进攻云南，但遭到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的婉词拒绝。各统兵将领也诉说黔省山岭险峻，道路崎岖，行军困难，要求改道。旋得到滇省向川边进军的消息，遂变更原来的企图，拟定了由湘、川、桂三路攻滇的方略，并作了具体部署：

湘西方向为第一路军。第六师师长马继增为该路军司令，统率所属第六师（欠十二旅）以及原驻湘南的第三师第五混成旅和湘军胡叔麒混成旅。以后奉调入湘者，尚有由河南出发的唐天喜第七混成旅和刘跃龙第二混成旅，驻湖北的卢金山第三混成旅，由奉天入关的范围璋所属第二十师一加强旅和

当时护国军的编制，军以下设若干个梯团（相当于旅），每梯团下设两个支队，每支队下辖两个营，每营四个连。

清末以来，云南共购进步枪八万七千余支，大炮一百门，机关枪六十余挺。起义时，云南兵工厂每日能生产步枪二十支，子弹三万发。参见《云南起义实录》（《滇声报》1916年3月20—22日）及《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第13、17、142页。

参见庾恩旻《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第134页。按：关于新建团每团人数，众说不一。禄国藩回忆说，每支队（团）“约有官兵五百人”（《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23页）；奚济霖文说“全营约六百余人”，以此计算，全团约一千二百余人（同前，第217页）；金汉鼎文说“每个团只有两营，每营虽仍然保持四个连的编制，但每连人数平均没有超过八十人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据此计算，则每团约六百余人；《松坡军中遗墨·泸州会议兵数计划稿》所载各支队人数由三百人至六百二十人不等。此处暂按每团六百人计算，则新组建的二十四个团共约一万四千余人，加上原正规军（两师一混成旅）约八千七百人，护国军总数约二万二千七百人。

此处据庾恩旻《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另有一说：“滇军出发时，携饷不足两月”。（见《蔡锷致梁启超电》，《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第34页）。

由安徽出发的倪毓芬所属安武军十二个营，总兵力约三万九千人左右。该路军队拟先在辰溪集中，然后经湘西入贵州，由东面进攻云南。

四川方向为第二路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为该路军司令，统率所属第七师（欠骑兵两营、炮兵一营）、驻岳阳的第三师（欠第五旅）、驻南昌的第六师第十二旅、驻保定的第八师（欠一个团），取道长江水路入川，在重庆集结。加上已在川南的北洋军三个混成旅和川军两个师又两个混成旅，总兵力约为四万二千人。该路军为北洋军的主攻部队，拟由北而南进攻云南。

虎威将军曹錕被任命为第一、二两路军总司令，负责组织前方作战。

广西方向为第三路军。袁世凯原打算由海路运北洋军到越南，沿滇越铁路抄袭昆明，但遭到法国殖民当局的拒绝。继而又欲派北洋军经广西攻云南，但广西宁武将军陆荣廷以损害商业为词，拒绝北洋军入境。于是，袁唆使广东振武上将军龙济光派粤军入广西，胁迫陆荣廷共同攻滇，抄袭云南护国军的后方。

为加强前方作战的威势，袁世凯还动用了刚刚引进的飞机，分两个航空队（每队飞机两架）。一队进入湘西，建场于麻阳；一队入川，先建场于重庆，后转场于泸州。这些飞机在实战中，仅仅扔了数枚炸弹，虚张声势，并未起重要作用。此外，还在作战部队中增设了无线电，以加强对前线各部队的通信联络，提高指挥效能。

蔡锷：《致梁启超函（1916年1月5日）》，《松坡军中遗墨》（《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
属北京政府陆军部直辖的军队。

根据《（1914）陆军部直辖军队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护国战争前南北军队实数》（《神州日报》1916年1月18日）和《陆军统计简明报告书》（1916年北洋陆军部印刷所印）综合统计。1916年初，为镇压护国军，袁世凯又编成陆军第11、12、13、15师，师长分别为张永成、陈光远、李进才、周骏。这样，其陆军师达十六个。

第三节 四川战役 (1915年12月—1916年3月)

一、护国军第一军的作战企图和部署

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次又是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

1915年2月，袁世凯为控制四川，派其亲信、陆军参谋次长陈宦督理四川军务。陈宦以四川兵少难以镇慑为由，将中央直属第四、十三、十六混成旅带进四川。战前，连同川军两个师两个混成旅及各地警卫部队，在川军队总数已达四万人。其驻防地点如下：川军周骏第一师驻重庆、泸州，刘存厚第二师驻永宁（今叙永）、成都，黄鹄举第一混成旅（后并入周骏师）驻江津，钟体道第二混成旅驻顺庆（今南充），北洋军伍祥祯第四混成旅驻叙州，李炳之第十三混成旅驻綦江，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驻内江。

蔡锷分析了袁军的情况后认为：守叙州的旅长伍祥祯是云南人，不会与护国军死战；守永宁的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已与护国军暗中联络，拟伺机响应；可能与护国军一战的仅有周骏第一师和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而冯玉祥并非真心拥袁，周骏则不服从陈宦的调动。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护国军“趁北方援军未抵川黔以前，速与作战，一举破之”，夺占川边几个战略要地，进而控制四川，是完全有可能的。于是，蔡锷决定分兵二路进攻四川，把攻击重点放在泸州。具体部署是：以第一梯团长刘云峰指挥的邓泰中、杨綦两支队为第一军左翼，出昭通，取叙州，伺机进迫成都；蔡锷亲率赵又新、顾品珍之第二、第三梯团为中路，出叙永，取泸州，得手后顺江而下，进攻重庆。第一军右翼为黔、滇军。1916年1月初，戴戡率滇军徐进先遣纵队东趋贵州，敦促贵州护军使刘显世起义讨袁。1月27日贵州独立后，即委戴戡为第一军右翼军总司令，令率滇军一个支队、黔军两团，出松坎，攻綦江，威胁重庆。

蔡锷原想集中第一军主力，潜动秘行，以突然动作一举突破泸州或叙州，然后乘势东取重庆，“与北洋军周旋于巫峡夔门以外”。但由于各种原因，第一军形成三路出击，分散了力量；又由于云南兵马未动就公开宣战，因而破坏了秘密接敌、突然袭击的作战企图。加之各梯团向战区运动速度太慢，致使护国军主力尚未赶到泸州，袁世凯派往四川的北洋军已先期到达，战场形势发生了不利于护国军的变化。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下同），第298页。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326页。

各部详细兵力无据可查。此处参照《民三年各省军队名称人数驻地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各师旅人数统计。

二、叙州之战

护国军第一军左翼第一梯团两支队出发最早。邓泰中第一团于 1915 年 12 月 16 日离开昆明向叙州进发。五天以后，杨蓁率第七团也离开昆明前往川边。该两团在行军途中，才接到改为护国军第一梯团第一、二支队的电报。1916 年 1 月 16 日，两部顺利通过盐津县，抵达滇川接壤之新场。

驻守叙州的袁军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祯，早已派出军队在新场及纵深设防，但未注意重点控制险关要隘。1 月 17 日，护国军在新场与敌接战，袁军一触即溃。护国军连占燕子坡、黄坡耳、捧印村等要点。18 日晨又占领横江城。当天，护国军分兵两路，向安边镇推进，次日中午发动进攻。第一支队沿横江从正面进攻；第二支队东渡横江，又北渡金沙江攻敌侧背。敌不支，弃安边向柏溪镇和叙州逃窜。护国军乘胜追击，攻克柏溪镇，直逼叙州。21 日，伍祥祯放弃叙州，向自流井（今自贡

市）方向退却，叙州遂为护国军占领。

叙州是云南入川的重要通道，沿途山势险峻，河流湍急，若伍祥祯部凭险固守，将给护国军造成极大困难。左翼护国军如此顺利地占领叙州，颇出意料。

叙州失守，使袁世凯大为震怒。他下令褫夺伍祥祯川南镇守使职务，责令戴罪立功。四川将军陈宦也悬赏五十万元，下令各部分四路向叙州反攻：伍祥祯率残部由自流井回攻叙州北，朱登五率巡防军十二个营由犍为进攻叙州西；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由江安、南溪进攻叙州东，并分兵一部绕高县进扰叙州南；另派亲军团长倪文翰率兵一团另二营，由成都乘船，顺岷江而下，参加反攻叙州作战。以上各路总兵力达万余人。

1916 年 1 月 29 日，伍祥祯部首先由北面迫近叙州。护国军梯团长刘云峰令第一支队前出至宗场（距叙二十余公里）进行阻击，继又令杨蓁率第二支队前往助战。双方激战两日，相持不下。旋侦知东路冯玉祥旅已进抵南溪，有从翼侧进取叙州之势，刘云峰急调第二支队预备队田钟谷营，由宗场赶赴叙东之白沙场组织防御，同时令宗场部队必须在 31 日下午 3 时前击退伍旅。

各部详细兵力无据可查。此处参照《民三年各省军队名称人数驻地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各师旅人数统计。

北洋政府于 1913 年春建立航空学校，最初只有法国“高得隆”教练机十二架。是年冬，北洋军与蒙军作战时，曾以一架飞机执行侦察任务。1914 年，又先后出动过三架飞机，参加“围剿”白朗起义军的作战。护国战争是第三次使用飞机。

蔡锷：《致梁启超函（1916 年 1 月 5 日）》，《近代史资料》1963 年第 4 期，第 24 页。

宗场之部队拚死作战，至深夜始将敌击退。刘云峰立即调动部队，增援白沙场。

白沙场为叙东交通孔道，地势险要。冯玉祥率两混成营由泸州日夜兼程，于 31 日晨抵达白沙场，旋即遭到护国军田钟谷营的阻击。冯部占据白沙场当面之龙头山，集中火炮、机枪火力猛烈轰击田营阵地。田营虽伤亡巨大，但仍坚持战斗。下午，杨蓁率援军赶到白沙场，立即从正面和左翼反击，始转危为安。半夜，第一支队李文汉营也赶来助战。2 月 1 日，护国军从左、右两翼进攻敌龙头山阵地，同时以一炮兵排迂回至敌侧后高地轰击敌人。战至 2 日下午，冯旅伤亡颇重，力渐不支，遂撤往泸州。行至江安，遭到已宣布讨袁的川军刘存厚部的截击，死伤惨重。

护国军击败冯旅不久，由成都顺江而下的陈宦亲军倪文翰部，又在犍为以南登陆，进窥叙州，其前锋于 2 月 6 日抵叙州近郊翠屏山。刘云峰一面令城内守军抗击敌人，一面急调叙东部队沿江西进，从吊黄楼渡到岷江南岸，抄袭敌军后路。敌猝不及防，纷纷溃退。护国军追击数十里，缴获辎重五十余船。2 月 7 日，第二支队长杨蓁带兵三营连续作战，又击败了由屏山方向犯叙的川军朱登五部。至此，护国军第一梯团利用袁军缺乏统一指挥和协同动作的弱点，激战七八昼夜，终将四路敌人各个击破，挫败了陈宦反攻叙州的计划。

2 月中旬，纳溪战场吃紧，蔡锷电令第一梯团增援。刘云峰先后派李文汉、金汉鼎等三营往援，叙州仅留田钟谷营和数营新兵据守。2 月 29 日，冯玉祥旅乘隙由自流井进攻叙州。刘云峰率部凭险抗击，终因兵单不敌，于 3 月 3 日放弃叙州，退守横江。因冯玉祥也有反对袁世凯称帝，响应云南讨袁之意，故在进占叙州后，即顿兵不前，叙州方面的战局遂成相持状态。

叙州之战，护国军第一梯团的官兵先以勇猛突然的动作，快速挺进，轻取叙州；接着又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各个击败围攻叙州之敌；最后在大部兵力调往纳溪，叙州仅余三四百人的情况下，仍然奋力作战，牵制了十倍于己之敌，表现了起义军队的勇敢善战。

三、泸、纳之战（参见附图二十九）

（一）川军第二师响应起义

护国军第一军中路各部队，原分驻滇省各地，确定作战编成后，才分别从驻地向泸州开进，时间参差不齐。蔡锷不待后方准备完毕，即于 1916 年 1 月 16 日率第一军总司令部离开昆明，向泸州进发（其时左翼刘云峰梯团已

此非蔡锷决定。据蔡锷《致唐继尧刘显世等电（1916 年 2 月 23 日）》称：“查黔军东、北两路各部队，编为第一军右翼军，系周、循两公（即刘显世、戴戡——引者注）所主持决定，且经发表后，始行通知照

与袁军接战)。第二梯团第三支队(支队长董鸿勋)作为中路先遣队提前六天出发。

当时,气候多变,雨雪霏霏,护国军“踏雪救国”,穿山越岭,兼程前进。1月26日,董支队抵达毕节。驻扎永宁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即派代表前往董处,密商配合作战的办法。双方议定:董支队先与刘师接战,刘师佯败,董支队尾追,进抵泸州,两军合兵一处,袭取该城。

于是,按商定办法,刘存厚师从赤水河(川黔交界处)节节退守,董支队紧紧跟进。时值袁军四路攻叙,蔡锷因第一梯团孤军无援,深为焦虑,急令董支队“兼程进发,袭取永宁,即阳攻泸州以牵贼势”;“并催促黔军速攻綦江,一面迫刘积之从速发动,以解叙危”。董鸿勋接电后,率部疾速前进,有时日行军达一百一十里,于1月31日进抵永宁,2月4日抵纳溪。这时,刘存厚已于纳溪提前宣布独立。

原来,董支队抵毕节前,刘存厚曾发出请云南护国军速行入蜀之电,不料该电被毕节知事截获,并向陈宦告密,故当刘师回军纳溪时,陈宦已命驻泸州的川军第一师熊祥生旅严加戒备。刘存厚见袭取泸州无望,遂于2月2日在纳溪宣布独立,自称护国军四川总司令。董、刘两部会师后,决定并力强攻泸州。

(二) 护国军会攻泸州

泸州位于长江和沱江的汇合处,东南临长江、北倚沱江,西有龙头关作屏障,南与蓝田坝隔长江相望,地势险要,素有“铁打泸州”之称。

陈宦得知刘存厚附义,泸州危急,急调已经抵渝的北洋军第三师第六旅和驻綦江的北洋军第十三混成旅兼程赴援。

2月5日,董鸿勋、刘存厚二部会攻蓝田坝。刘师团长陈礼门率所部沿大道进攻蓝田坝的正面,董支队绕道双河场、牛背石、南寿山,攻击蓝田坝翼侧。敌在蓝田坝守兵仅一营,稍事抵抗即放弃阵地渡江逃命。2月6日晨,董、刘部占领蓝田坝,进据月亮岩。扫清南岸之敌后,董鸿勋决定立即进攻泸州。鉴于蓝田坝渡口被对岸高地之敌炮火封锁,无法由正面渡江,遂决定陈礼门混成团驻守蓝田坝、月亮岩一带,防敌渡江,董带本支队并刘师两营从下游渡江,向泸州侧背进攻。

2月6日上午,袁军第三师王承斌团和李炳之第十三混成旅两营相继赶到泸州;不久,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吴佩孚率张福来团继至,驻守小市,使泸州防御力量显著增强。

办。其时军事进行最急,无暇细为斟酌”。见《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7页。

何慧青:《护国之役云南起义秘史》,《逸经》(1931年版),第21期。

有的材料称:邓、杨支队于12月21日至24日先后从昆明出发。

2月8日拂晓，董鸿勋率部由泰安场渡过长江，前进二里

许，即与两连敌兵遭遇。董部猛冲猛打，击溃阻击之敌，占领了临江制高点大龙山。9日，董部继续向罗汉场推进。敌以团长王承斌带兵一营往罗汉场阻击。董部背水作战，英勇冲击，于9日下午击退敌军，占领罗汉场。

新任防泸司令熊祥生见泸州侧背形势危急，决定从正面袭击蓝田坝，以调动董鸿勋支队。2月9日下午，熊祥生挑选精锐步兵两连，由沙湾秘密渡江（后又派两连续进），袭击月亮岩；同时命五峰顶之炮兵猛烈轰击月亮岩，掩护偷渡部队。防守月亮岩的陈礼门部猝不及防，慌乱溃逃。陈礼门愧愤自戕。次日拂晓，袁军李炳之旅一个营全部过江，会合已抵南岸的熊旅四个连攻占了蓝田坝。

时护国军第二梯团长赵又新已率部分部队抵达纳溪，闻蓝田坝失守，立即率所部警卫连往援。10日，会合刘师工兵营反攻月亮岩，一度将敌军逼退至江边。熊祥生见状，亲至龙头关高地，指挥炮兵轰击蓝田坝、月亮岩护国军阵地。刘师工兵营遭到炮击，四散奔逃，赵又新部势孤力弱，遂放弃蓝田坝、月亮岩，退守纳溪。

正在泸州侧后作战的董鸿勋支队，闻蓝田坝失守，急忙收缩兵力，于11日夜经泰安场撤回江南。次日晨，董又率部反攻蓝田坝，企图恢复原阵地。激战一日，未能奏效，恐敌迂回纳溪，切断退路，即于是日晚撤出战斗，退往纳溪。护国军出敌不意攻取泸州的计划未能实现。

（三）纳溪保卫战

在蓝田坝争夺战前后，泸州的袁军不断增加。至2月中旬，计有北洋军第十三混成旅一部、第三师第六旅、第七师全部先后抵泸，加上防守泸州的熊祥生旅，总兵力达二万余人。袁军攻占蓝田坝后，立即分兵两路向纳溪攻进。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吴佩孚指挥右翼部队，由蓝田坝经石保沟取道棉花坡，进攻纳溪正面；第七师师长兼第二路军司令张敬尧指挥左翼部队，由南寿山、牛背石向双河场绕进，企图越过永宁河进攻纳溪侧背。

护国军梯团长赵又新仓促组织部队转入防御，以刘存厚师之工兵营防守棉花坡，阻击正面敌人；董鸿勋支队防守高屋基一线，阻击由翼侧进攻之敌。

2月13日晚，护国军第二梯团之何海清支队抵达纳溪，14日奉赵又新之命，会合董鸿勋支队第二营，反击逼近双河场之敌，将敌军击退至高泉场。是日上午，袁军田树勋旅赶到高泉场，占领两侧高地，以猛烈炮火压制护国军。何、董支队反击受阻，遂撤出战斗，退至永宁河以西，于沿岸组织防御。

此次冯旅攻叙者仅两混成营。参见冯玉祥《我的生活》（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在纳溪保卫战中，棉花坡战斗最为激烈。棉花坡系纳溪镇东面一高地，周围丘陵起伏，竹木丛杂，水田环绕，中有石板小路与蓝田坝相通，是纳溪与蓝田坝之间的重要据点。护国军能否控制棉花坡，是保卫纳溪的关键。进攻棉花坡之敌为袁军吴佩孚旅和熊祥生旅各一部。吴旅为袁军精锐，战斗力较强，攻势凶猛。防守棉花坡之刘师工兵营依托壕垒抗敌，渐有不支之势。2月14日，第三梯团之禄国藩支队和从左翼第一梯团调来的李文汉营，相继赶到纳溪，随即增援棉花坡阵地，稳定了防御。2月16日，赵又新又将在右翼作战的董鸿勋支队一部调赴

棉花坡，接替刘师工兵营，增强该方向防御力量。这时，正在开进途中的蔡锷，接到纳溪战斗激烈的报告，立即催令已抵永宁的第三梯团之朱德支队，火速前进，增援纳溪。朱支队冒着雨雪，于17日上午抵达纳溪。由于情况紧急，部队枵腹调上棉花坡阵地。其第二营士气高涨，刚抵战地，即从正面反击敌人，迫敌放弃前沿阵地，后退数里。旋因两翼友军未能配合进攻，朱德支队不便孤军深入，又退回原阵地。

2月18日上午，袁军再次发动进攻。第七师进攻双河场，吴佩孚旅进攻棉花坡。护国军第一军参谋长罗佩金于是日抵达纳溪，即亲赴战地指挥抗敌。各部官兵扼守险要，顽强作战。朱德支队之曹之骅营长阵亡，董支队之董鸿铨副营长负伤，各部士兵也伤亡严重，棉花坡阵地险象频生。幸连日大雨，山路泥泞，给不习惯山地作战的袁军造成意外困难。激战竟日，袁军撤兵回守，护国军阵地始得以稳固。

为了打退袁军的进攻，2月19日拂晓，罗佩金和第二梯团长赵又新指挥部队分四路对敌实施反击：禄国藩率一个营附山炮一门、机枪一排，由黄土坡向蓝田坝进攻；何海清率两个营附炮二门、机枪一连，沿永宁河向双河场进攻；朱德率两个营附炮兵一连、机枪一排，由棉花坡向菱角塘进攻；刘存厚师之一部迂回渡江，佯攻泸西龙头关，掩护主力反击作战。进攻开始后，各路部队猛冲猛打，连续作战。右翼何海清支队进展顺利，第一天即收复双河场，迫敌后退十余里。2月20日，罗佩金鉴于朱德支队反击受挫，便令何海清支队改变进攻路线，由双河场向菱角塘侧后攻击前进，与朱支队夹击菱角塘之敌。反击作战一直持续到22日下午，菱角塘之敌虽被何海清支队击退，但由于袁军援兵源源开到，护国军弹药不济，被迫于23日转入防御。这次反击作战，袁军死伤千余人，护国军也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二三百人。

2月23日，蔡锷赶到纳溪前线，研究了前线形势，决定从25日晨起，再次发动攻势。其部署是：以右翼何海清支队为主攻部队，向朝阳观方向实施突击，其它各支队均依托现阵地牵制当面敌人，同时集中炮火压制朝阳观之敌，支援何海清支队作战。护国军企图以集中火力的方式，首先突破袁军左翼阵地，为全面反击打开缺口。与护国军上述反击行动几乎同时，袁军为打破战场僵局，命川军团长刘湘率所部于25日拂晓从长江北岸的石棚向纳

溪对面运动，企图抄袭纳溪护国军的侧后。蔡锷闻讯后，立即令何海清所部拨出一营，于当夜秘密渡江，协同已在江北的刘存厚师一个营，驱逐江左之敌。护国军迅速击退了刘湘团，占领了石棚附近之方山，以保障护国军翼侧的安全。由于刘湘团的袭扰，蔡锷企图首先突破袁军左翼阵地的作战计划未能实现。

纳溪战线稍趋稳定后，蔡锷对指挥人员作了必要的调整。鉴于董鸿勋初战失利，撤销其第三支队支队长职务，改由第六支队长朱德接任，第六支队长则由第三梯团参谋长王秉钧补任。27日下午，从叙州第一梯团抽调之金汉鼎、马鑫培两营援兵赶到，蔡任命金汉鼎为第一支队长。时熊克武正率四川护国讨袁军取道泸北，向泸州方向前进。纳溪护国军的兵力得到一定的加强，蔡锷遂决定于28日组织一次总攻，以改变僵持局面。其作战部署是：何海清支队携炮二门、机关枪二挺，为主攻部队，从棉花坡翼侧攻击袁军防御阵地石保沟；朱德、王秉钧支队配合主攻部队行动，从所在阵地攻击前进；何支队发起攻击后，其它支队的炮火即向石保沟集中射击。另第二梯团长赵又新指挥防守双河场之部队（共约三个连），实施阵前反击，策应正面行动；金汉鼎支队为总预备队，在双河场附近待命。为确保反击作战顺利进行，蔡锷与刘存厚亲自带领督战队，在进攻部队后面督战，明令“凡无命令后退者，立即当地枪毙”。

2月28日上午开始，护国军在左起长江边右至双河场绵亘十余里的战线上，冒着绵绵细雨，不顾料峭春寒，夜以继日地奋力猛攻，多次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格斗。经数日激战，护国军在左右两翼取得一些进展，但由于袁军兵力较厚，注意纵深设防，并占据石保沟、朝阳观等险要据点，以致始终未能攻破敌之正面阵地。这次作战，护国军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本身也伤亡和失踪不下千人，兵力大为减弱。蔡锷感慨地说：

“此三星期之剧战，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

（四）护国军退守大洲驿一带

2月下旬，护国军几次反攻均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且因连日激战，官兵伤亡颇重，弹药消耗殆尽，又得不到后方接济，形势极为严重。此时，罗佩金、刘存厚等人“深以子弹不给，士气不扬，疲劳太甚为虑”，建议暂时退

根据《统率办事处关于川湘战事通告·成都来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另说为倪聘卿，见刘云峰《护国军纪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又说为丁搏霄团，见冯玉祥《我的生活》（上）。

一说14日（见庾恩旻《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此处从蔡锷《致潘惠英书》：“十六号启行，按站北进”（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第402页）。

却，“俟子弹续到，元气稍固，再行进取”。蔡锷起初不以为然，认为退却对战争全局影响甚大，恐一退而不可收拾。后由于部下多方促迫，遂于3月6日下令后撤。除第三梯团留少数部队担任阻击任务外，各部队分路撤至叙蓬溪（今护国镇）、白节滩、大洲驿一带。蔡锷等积极整顿队伍，构筑防御工事，并电催唐继尧迅速接济弹药，以便伺机转入反攻。

袁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虽然依仗兵力优势，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袁军遇到的主要困难，除士气低落外，就是对战场条件不适应。川南地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且时值气候多变，雨雪连绵。在北方平原地区训练出来的北洋军，来到崎岖泥泞的山地作战，经常打滑跌胶，行动非常困难。据称，袁军进入川南以后，由于山路险窄，所有枪炮弹药和急需物品均雇民夫抬运，陆炮每尊需民夫七十人，山炮每尊需三四十人，一个混成团需民夫一千一百余人，以致一个营开进，行军长径十余里。由于地形不熟，机动困难，所以护国军退却时，袁军只占领了纳溪等地，未敢继续追击。

护国军退至大洲驿一线后，蔡锷总结了纳溪作战的经验教训，决定将下一步的作战方针改为“扼守要点，集结主力，多张疑兵，以分敌势，俟有隙可乘，分头击破之”。据此，护国军设总司令部于大洲驿，并调整了兵力部署：以朱德等三个支队守卫永（宁）、泸（州）大道，为中路；以何海清支队和刘存厚部为左翼，沿江安西进，准备增援叙州作战；罗佩金指挥金汉鼎支队和川军张煦支队并加强一个营，防守右翼，在白节滩构筑阵地，警戒牛背石方向之敌，“守则固我右侧，出则冲彼侧背”。

护国军在大洲驿一带经过休整，兵力和弹药得到补充，士气有所恢复。而袁军方面，由于护国军右翼戴戡所部进攻綦江，急调李炳之旅前往增援，纳溪的兵力有所减弱。其部署在第一线的部队不过二三千人，分别防守鹞子岩、牛背石、双河场、棉花坡、纳溪各要点，兵力分散，士气低落。其次，袁军后勤保障也遇到了极大困难。北洋军远离北方到西南作战，部队的弹药、物资、粮秣供给和技术保障等问题接踵而来。至3月初，袁军枪械损坏甚多，“缺乏机关枪子弹及山炮、子母、开花各弹甚伙”，张敬尧等向袁

刘存厚，字积之，四川简阳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清末时，是蔡锷所属第三十七协的一个管带，与蔡有较深的历史关系。在云南护国起义前，蔡锷多次与刘存厚联系，希望他“热忱爱国，志切同仇”，与云南起义军采取一致行动。刘当即表示：“袁氏称帝，蔡公反对，事极正当。况蔡公系旧长官，兵戎相见，非义也”。见雷 《蔡松坡先生事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17页）。

《革命文献》（台北1969年版）第四十七辑，《讨袁史料》（二），第285页。

一说被炮弹打死。

《护国之役总司令部命令钞》，《文献》1979年第2期，第5页。

世凯迭电告急，请求接济。然而“川江道路遥远，输运倍极困难”，一些作战物资，从北京运到武汉，再由武汉逆江而上运到四川，需六十余日。沿途激流险滩，又遭民军袭击，所运辎重往往损失过半，能补充到作战部队的所剩无多。即使毫无损失地前送至部队，当时一次补给量也只能维持一个师激战十天之用。3月中旬，前线袁军再次面临弹尽粮竭的困境。蔡锷决定趁此时机，对敌展开全线反击。3月15日，蔡于大洲驿发布作战训令：以右翼之朱德、金汉鼎、张煦、廖廷桂四个支队为主攻部队，由第二梯团长赵又新为前敌指挥，从白节滩进攻牛背石，进而向纳溪、蓝田坝侧击；以中路顾品珍梯团由本道“阳攻”，占领茶塘子一带高地，相机进攻鹞子岩之敌，以牵制当面敌人，掩护护国军右翼行动；刘存厚部进驻牛滚场，威胁江安方向之敌，并掩护中路顾梯团的进攻；以何海清支队为左翼，进驻合面铺、中兴场，警戒叙州、江安之敌；另以屯扎赤水的黔军杨汝盛营，相机规取合江，得手后进袭江津，切断綦江之敌的后路。蔡在训令中强调指出，此次攻击，“我军对其正面只宜配布少数之兵，而以主力冲其侧背，彼自溃走。宜切谕诸将领，务多留预备队在指挥官之掌握，俾便运用”。

3月17日，各路部队同时发起进攻。右翼赵又新所部四个支队，由于步队之间以及步队与炮队之间协同配合较好，先后攻占了沙山、大小山坪和牛背石，并于19日下午进占高洞场。袁军一部退往蓝田坝，主力退守双河场，依托阵地进行抗击，并出动飞机进行侦察轰炸。赵又新命金汉鼎支队猛攻双河场之敌，朱德、张煦支队进攻朝阳观之敌，廖廷桂支队向分水岭、先市方面进攻。战至22日，右路朱、张支队已推进至距蓝田坝仅四公里的南寿山；金汉鼎支队也攻占双河场，与敌隔永宁河对峙；廖廷桂支队进据分水岭。此时，赵梯团因“弹药已损耗十之八九”，遂停止进攻。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顾品珍梯团，于发起进攻后，迅速冲入敌阵，与敌白刃格斗，占领了茶塘子、鹞子岩，迫敌退守纳溪镇后面之光山（今观山）。在左翼担任掩护任务的何海清支队，乘机攻占了江安城。

3月23日，蔡锷发现袁军新援之第八师一个旅已至合江，有沿赤水河抄袭护国军侧后之势，乃下令全线停止进攻，“暂取攻势防御”。护国军遂退守茶塘子至红花地一线，整顿部队，休养兵力。袁军在占领双河场至纳溪城东一线阵地后，亦改取守势。

在这次作战中，护国军共毙伤敌九百余人，缴获大炮七门、机枪九挺、步枪九百余支、炮弹二百余发及子弹无数。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争夺，袁军死伤惨重，其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之能力”

庾恩旻：《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下册，第10页。

蔡锷：《致李日垓何国钧函》，《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第25页。

蔡锷：《致唐继尧等廿四电》，《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第28页。

。正在这时，袁世凯迫于国内外形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在四川方面，陈宦也派人到大洲驿护国军第一军司令部，要求停战议和。蔡锷鉴于护国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兵员军需均待补充，遂同意停战。先议定从3月31日至4月6日停战一周，以后又派刘云峰与张敬尧谈判，双方继续休战。

泸纳之战是护国战争中最为激烈的一战。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护国军以劣势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间断的情况下，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连续奋战，勇猛打击北洋军的精锐之师，虽未能按预定计划夺占泸州，却顶住了袁军的攻势，牵制了袁军的主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的作战。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抱病亲临前线，废寝忘食，运筹决策，其舍身精神，大大鼓舞了全军将士的战斗热情。

四、綦江之战

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在黔军团长王文华等促逼下，赞成讨袁，因黔省兵力薄弱，又毗连湖南，恐袁军由湘入黔，难以抵御，故暂时隐忍不发。自戴戡率滇军徐进先遣纵队于1916年1月24日到达贵阳后，刘即亮出讨袁旗帜，于27日宣布独立。众推刘为都督。当时，贵州省仅有步兵六个团、炮兵一个营及巡防军数营，共约六千余人。贵州宣布独立后，刘显世等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订黔军出师计划，决定编滇军炮队、机枪队及黔军第五、第六两团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以戴戡为总司令，率部攻打四川綦江，威胁重庆。另升任黔军第一团团王文华为贵州护国军右翼东路司令，率黔军三个团和滇军徐进先遣纵队之步兵及部分湘军，进攻湘西。

（一）黔军进攻綦江

黔军进攻綦江，是为了由此突破，进取川省门户重庆。袁军以重庆为前进基地，对叙、泸方向采取攻势，对綦江方向采取守势。扼守綦江，主要为了防御从贵州攻川之黔军，保障重庆的翼侧安全。为此，袁军以綦江为重心，右至江津、荣昌，左至南川、涪州（今涪陵），组成一道弧形防线，配置重兵防守。其兵力部署是：川军周骏师之第五十九团（团长伍德明），以一营驻荣昌，两营驻江津；第六十团（团长张鹏舞）一部驻南川，一部驻涪州；北洋军第十三混成旅之第三团（团长刘虎臣）驻綦江。贵州独立后，袁军又以北洋第三师之阎相文团增援綦江，以北洋第六师之齐燮元旅由湘西增援南川。这样，袁军在川黔交界地区的兵力达五六个团。黔省护国军仅以两团多

该支队系由张煦在川边地区募集其旧部编成，曾称义勇军第一支队，武器装备比较低劣。

《张敬尧要求增拨武器弹药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的兵力，企图实现由綦江进攻重庆的计划，显然是很困难的。

1916年2月2日，戴戡率队由贵阳出发，13日抵松坎。他将黔军第五、六两团编成三个支队：熊其勋之第五团为左支队，进攻敌九盘子阵地，得手后向东溪、綦江方向发展；胡忠相指挥第六团一、二营为右支队，进攻青羊寺（今青羊市），尔后向南川发展；另以第六团第三营为一个支队，取道新洲袭击南川，策应主力行动。各支队同时于14日发起进攻。

熊其勋率左支队于2月14日拂晓前秘密接敌，6时对九盘子之敌发起进攻。九盘子为川南天险，两山壁立，仅通一线小路。黔军攀藤附葛，缘崖而上，节节仰攻，至午后2时占领九盘子。黔军乘胜推进，三路皆捷，连克青羊寺、赶水、东溪等要地，并冲过分水岭、柑子桠等险隘，于15日午前攻占马口垭，前锋进逼桥坝河（今桥河镇），距綦江仅十余里。袁军在

桥坝河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以重兵伏壕据守，封锁河谷平地。黔军左支队进攻受阻，退守两路口。

（二）龙台寺攻守战

袁军见黔军以主力进攻綦江，急欲改变不利态势，遂遣驻江津之伍德明团第一、二营，于2月24日由江津向綦江西南之龙台寺、高庙一带进攻，拟从翼侧抄袭攻綦黔军之后路。时防守龙台寺的黔军仅一个连，以寡敌众，使两路口之黔军主力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戴戡急命驻青羊寺之胡忠相支队西进，在龙台寺东北之分水岭一带组织防御，以保障攻綦部队的侧后安全；另调已于23日抵达东溪的滇军华封歌支队之部分兵力前出至高庙，增援龙台寺作战，以主力增援正面之熊其勋支队，拟合力攻下綦江，使袭击龙台寺之敌“不攻自退”。

无奈，战况并未如戴戡所预想的那样顺利。龙台寺方面的护国军，由于袁军攻势猛烈，无法守住阵地，被迫于2月24日晚退守东溪。在此情况下，护国军不得不放弃攻綦计划，而以主力于25日晨反击进据龙台寺、高庙之敌。经一日激战，终于夺回龙台寺，解除了侧后威胁。

2月27日，綦江袁军反攻马口垭，华封歌支队奋勇迎战，将敌击退。时已抵南川的北洋第六师齐燮元旅出南川，拟经油萝坪、青羊寺向护国军右翼进攻，企图夺回赶水、东溪。护国军再次面临两面受敌的威胁。董鸿勋、华封歌等召开前敌会议，一致认为：护国军出战以来，连战皆捷，勇敢精神诚属可嘉，“惜乎地方太宽，兵力单薄，防守不足，若一味进攻，綦江固不难取，而敌人左右转袭，我军即将受困”，且“黔军已无后继”，于是决定“暂

退东溪，缩小范围，聚集力量”，以便“防守出击，较有把握”。当夜，各支队悄悄撤出阵地，于28日退驻东溪一带。

（三）护国军退守松坎

护国军撤至东溪后，重新调整部署，以熊其勋第五团防守右路，阻击由南川进犯之敌；华封歌团防守中路，警戒綦江方向之敌；胡忠相第六团防守左路，防御由江津来犯之敌。

袁军于护国军撤退后，进占龙台寺和分水岭。旋在右路和中路暂取守势，集中兵力进攻护国军右翼。3月1日，齐燮元旅进袭油萝坪，威胁青羊寺。熊其勋率部前出至玉皇观抵御敌人。此后，双方在油萝坪至青羊寺一线展开拉锯战，互有进退。9日，袁军李炳之旅一个团从泸州来援，与齐燮元旅改从中路进攻，占领扶欢场。护国军连日激战，伤亡严重，且因战线过长，兵力过单，渐呈不支之势。

3月中旬，北洋第八师等部队又进抵川境，增强了前线兵力。蔡锷判断敌可能在泸州方向取守势，綦江方向取攻势，遂于16日电示戴戡，指出：“近日敌军纷纷向重庆进发，恐泸州取守势，綦江取攻势，我军既是单弱，尽可竭力将范围缩小，以免将来腹背受敌”。护国军本已是强弩之末，接蔡锷电后，立即从东溪退守松坎一线。袁军进占东溪、九盘子等要点后，未再追进。护国军的攻取綦江、进规重庆的作战计划，终因兵微力弱和未能集中兵力歼敌有生力量而无法实现。

在此之前，已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刘伯承与王伯常等人在涪州一带起义，建立川东护国军。他们攻长寿，打丰都，袭击袁军运输线，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川东袁军，对在川南正面战场作战的滇、黔护国军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四川战役历时两个多月，护国军第一军虽然不畏强敌，打得非常勇猛顽强，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战果，达到预期的目的。其主要原因在于过早地对袁宣战，未能实现秘密接敌、先发制人的作战计划。其次是多路出击，分散了兵力。攻川之滇、黔、川护国军，总数不足万人，却分兵三路，各自为战，致使各个突击方向上的部队皆无法完成预定的作战任务。后来，尽管蔡锷认识到这一失误，提出了“以重兵趋綦渝”的主张，但因各路护国军都已遭到重大消耗，并被袁军牢牢拖住，已难于集中兵力于綦渝方向。再次，护国军主要着眼于攻夺城市，并未立足于运用灵活的战法调动敌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蔡锷等为了攻占叙州、泸州，不惜以有限兵力在正面与敌反复争夺，死打硬拚，而不注意发挥滇、川、黔军队善于在山岳丛林地带运动作战的特

3月7日，江安为川军刘湘团占领。

《护国军第二梯团战斗详报·蔡锷之第二号训令（3月15日）》，北京图书馆藏。

点，采取乘隙捣虚、迂回包抄等多种战法打击敌人，致使护国军付出很大代价而战果甚微。

第四节 湘西之战（参见附图三十） （1916年2月—4月）

一、双方作战部署

护国军湘西一路的作战任务，按原定计划，系由贵州入湘，直抵沅州（今芷江）、辰州（今沅陵）地区，然后以一部兵力经新化取长沙，迫武汉，另一部取常德，规荆州以指襄阳。

云南护国军初定的湘西作战预案，是以第三军参谋长韩凤楼率赵钟奇的第一梯团两个支队入黔，与黔军会师后攻取全湘；黄毓成率领挺进军由黔省出湘西，直捣武汉。后由于四川、广西的战局发生变化，临时改变部署，湘西方面的作战，主要由护国军右翼军东路司令王文华所率的黔军第一、二、三团进行。

辛亥革命以后，湖南军队几经更迭，混乱复杂。1913年底汤芑铭督湘后，又对湘军裁减整编，解散原有陆军，按行政区划成立六个守备区。每守备区保留陆军若干营，设司令一人统率，负责该区防务；另成立一模范营于省城。1915年夏，又组建一暂编陆军混成旅（旅长胡叔麒），驻长沙。云南起义后，汤芑铭根据袁世凯的命令，将暂编混成旅调往湘西，准备与护国军作战。

袁世凯原打算调集重兵，经湘西取道贵州，作为进攻云南的主要方向。后改变主攻湘西的计划，仅命部分“征滇”部队向湘西运动。因湘西山高林密，瘴气袭人，陆路崎岖难行，水路船少水枯，袁军开进速度异常迟缓。至1916年2月上旬，抵达沅辰地区的部队，仅有北洋第三师第五混成旅一部（原驻湘南）和第六师先遣队四个营，兵力比较薄弱。

二、护国军进军湘西

护国军东路司令王文华接受进攻湘西的任务后，早在贵州宣布独立之前，即率所部秘密离开贵阳，掩旗疾进。第一团经镇远、玉屏秘密进抵湖南晃州（今新晃）城外，第二、三两团也分别向湘边集结。护国军拟分三路，从晃州、溆滨、铜仁三处突破，进攻湘西。

1916年2月2日（农历除夕）夜，王文华所率之中路部队乘晃州守敌（仅湘军一连）不备，突然发起进攻。湘军惊慌失措，稍事抵抗，便退守蜈蚣关，护国军顺利攻占县城。次日拂晓，护国军继续推进，猛攻蜈蚣关。前湘省镇

蔡锷：《致梁启超江电》，《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第34页。另据战后张敬尧的一封电报透露：“七师川滇战役阵亡官兵六百五十三员”。参见《北洋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时蔡锷身患喉疾，说话困难。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因喉疾转重，赴日就医，不久病逝。

远道尹林炳华，率湘军一部和北洋军第五混成旅两营在蜈蚣关恃险顽抗。护国军昼夜强攻，于4日下午克蜈蚣关，毙敌八十余人。护国军初战获胜，军心振奋，王文华乘胜挥兵继进，直逼沅州；同时令右路吴传声第三团由黎平、天柱攻下洪江后，立即向中路靠拢，与第一团钳击沅州。

吴传声团于2月3日发动进攻，顺利攻下湘黔边境据点漠滨、坳口，并于5日攻克黔阳（今黔城镇），6日夺占洪江镇后，即折赴沅州。

沅州守敌为汪学谦第五混成旅。晃州、黔阳失守，沅州首当其冲。汪学谦迭电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由麻阳（今锦和）派兵救援，并哀告湘督汤芑铭说：“职旅兵单分驻，较远炮兵，察看近日情形，竟有不幸料中之势。各处函电纷纷告急，实难措置”。汤芑铭手中无兵，只能以“希力持镇定，相机因应”等空话敷衍了事。

2月13日，护国军第一、三团分左右两路会攻沅州。战斗十分激烈，经夜不息，汪学谦部弃城而逃。14日午前，黔军占领沅州。在此次作战中，团长吴传声不幸阵亡。

占领沅州后，王文华令第一团二营营长胡瑛率部由沅州北进，配合铜仁方向之第二团进攻麻阳。

护国军第二团原任团长彭文治反对起义讨袁，于战前弃职潜逃，由卢焘接任团长职务。护国军开始进攻后，卢团由铜仁出发，连克米沙、小坡等边界据点，逼进麻阳。时麻阳守敌仅有一营。该营以一连守城，两连前出至距城七里的童湘溪，据险顽抗。护国军连攻数日不下。2月8日后，袁军第三师之第五团和第六师一个营，分别从沅州东和辰溪增援麻阳。护国军寡不敌众，于9日下午6时撤出战斗。第一次进攻麻阳失败。16日晨，在第一团援兵的配合下，卢团对麻阳组织第二次进攻。这时，麻阳守敌因前分兵一部救援沅州，兵力减弱，经不住黔军的猛攻，遂放弃麻阳，退守高村（今麻阳）。黔军随即进占麻阳。

这时，护国军游击队司令王华裔联络原湘西守备司令周则范起义讨袁，乘正面战场胜利之机，连克靖县、通道、绥宁等城，敌军退守武冈。

这一阶段作战，护国军以敏捷的动作，连续发动进攻，所向披靡，击溃敌人约三个混成团，攻占湘西八座县城。护国军攻下麻阳后，便进行补充休整。王文华将所部扩编为四个团，分驻所占各县。

三、英勇抗击袁军反攻

湘西连失数县，袁世凯大为惊恐，迭电催促第一路军司令马继增督率各部兼程赴援。袁军进入湘西，沿途烧杀抢掠，民怨沸腾。2月29日，马继增

原属赵钟奇梯团，后蔡锷命随军参议处长殷承 率该支队改道援黔。

杜叔机：《护国军松坎、綦江战纪》，《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在途中暴卒，袁世凯命第六师第十一旅旅长周文炳代理师长和第一路军司令，继续向湘西进发。

3月中旬，袁军第一路军各部陆续抵达湘西，遂分四路向黔军反攻：卢金山第三混成旅和奉天骑兵一部由辰溪向沅州进攻；汪学谦第五混成旅和湘军第二团由中火铺、江口向怀化、沅州进攻；周文炳第六师由高村向麻阳进攻；刘跃龙第二混成旅和湘军第一团由武冈向绥宁方向进攻。

3月31日，卢金山旅首先对沅州发起攻击，继而奉军参战。护国军在沅州与敌苦战，终因兵力单薄、子弹缺乏而被敌破城。与此同时，周文炳部已逼近高村，准备攻击麻阳。

4月2日，王文华令第三团及第一团第二营、第二团第二营由麻阳前出，在高村一线阻击周文炳部；令第四团、第二团第一营及敢死队数百名反攻沅州。由于袁军重兵云集，来势凶猛，护国军兵力分散，弹药不继，各路作战均不顺利。反攻沅州的护国军，与敌激战四昼夜，多次展开白刃搏斗，歼敌四百余人，但自己也遭巨大损失，不得不于6日退守斐家店一带。麻阳方向，袁军约三个混成团，于3日上午8时进攻高村护国军阵地。护国军顽强抗击，至下午3时，战力不支，遂撤离高村，退守岩门。袁军乘势反扑，攻破岩门，于7日陷麻阳。黔阳方向，护国军独立营也退守瓮洞一带。

4月7日夜，贵州护国军奉蔡锷电令，与当面之敌停火休战，双方遂成对峙状态。

这时，湘西一带，在护国军湘西招抚使程潜、陈强等人发动和领导下，讨袁烈火方兴未艾，湘西二十余县都已宣布独立，加入护国讨袁行列。此外，已于3月中旬宣布护国讨袁的桂军，其攻湘部队二十余营已抵达湘南之龙虎关、黄沙河一带，有攻取零陵，沿湘江直捣衡阳、长沙之势。这样，湘西袁军已呈孤立突出之势，其后路及两翼受到桂军及湘省地方讨袁武装的严重威胁，故在攻克湘西数县后，开始收缩兵力，未敢深入黔境。

湘西之战初期，贵州护国军以勇猛的战斗精神，采取突然袭击、迂回包抄、短兵相接等作战方法，连克湘西数县，一度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旋因护国军兵力单薄，弹药不继，且又分散兵力，与优势之敌进行阵地战，以致虽初战获胜而不能持久，终于在敌人重兵反攻下节节败退。尽管如此，贵州护国军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牵制了约两个师四个混成旅的敌军，有力地配合了四川、广西方向的作战，其战绩是显著的。

第五节 滇桂边之战 (1916年2月—3月)

1916年2月21日，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率所部方声涛梯团千余人，由昆明出滇南，趋广西，东征粤浙。唐继尧将准备开往湘西的第三军一部也调往桂粤方向，以增加第二军兵力，保证攻粤计划的完成。

袁世凯之由海路运兵南下，取道越南进攻云南护国军后路的计划受阻后，即任广东第一师师长龙觐光（广东将军龙济光之兄）为云南查办使，令其率军经广西进攻云南。1916年1月中旬，龙觐光以广东陆军第二旅第三团团团长李文富为先锋，以虎门要塞司令黄恩锡为前敌司令，率粤军四千人（沿途又招募四千，约计八千）经梧州到达南宁。龙觐光与广西将军陆荣廷系儿女姻亲，他劝陆效忠袁世凯，率兵攻打云南。陆佯为应允，并派其子陆裕光带领桂军五个营协助龙军。龙觐光喜出望外，遂令李文富为第一路司令，率一千五百人由百色进攻云南剥隘；以黄恩锡为第二路司令，率一千五百人经西林（今定安）绕攻云南广南；张耀山、吕春绶各率二千人（编成第三、第四队），为主攻部队之后援；以朱朝瑛率兵千人，北趋西隆（今隆林），阻断黔省援兵进路。龙济光则派其子龙体乾潜回云南蒙自老家，组织武装暴乱，以策应龙军的正面进攻。

正在开进途中的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闻报，即命张开儒、方声涛两梯团迅速在云南之富州（今富宁）、广南一线展开，准备阻击来犯之敌。另请待出湘西的黄毓成挺进军（一个梯团）和准备增援贵州并已进至沾益的赵钟奇梯团（欠一支队），经贵州兴义折向广西西隆，从翼侧进攻龙军。

1916年2月底，龙军分兵两路进窥云南。黄恩锡率四个营为右翼，由西林经龙潭乡向广南县城潜进；李文富率该团主力为左翼，进攻剥隘、皈朝。

剥隘地形险要，为滇桂边界较繁盛的商埠。驻守该处的滇军张开儒梯团两个连于3月2日遭到李文富部突然攻击，势孤力单，于下午3时撤离，退守皈朝。不日，张开儒亲率梯团主力（步兵三营、炮兵一连）驰赴皈朝，构筑阵地，据险扼守。11日，李文富部猛攻皈朝，护国军坚守虹山阵地，英勇抗敌，鏖战七昼夜，彼此呈僵持状态。

与此同时，护国军方声涛第二梯团也与敌在龙潭激战。龙潭是由西林进攻广南的咽喉要地，先被龙军第二路司令黄恩锡派兵控制，其主力则由龙潭继续向广南攻击前进。李烈钧命方声涛梯团迅速由广南前出，迎击该敌。该部在龙潭以南之石洞与敌遭遇，激战数日，始将敌击退。

广西将军陆荣廷，政治上倾向进步党，与袁世凯素有矛盾。当袁进行复辟帝制活动时，陆表面上敷衍应付，暗中则与反袁势力互通声息。云南独立

赵钟奇梯团之华封歌支队，改出松坎，协攻綦江；赵钟奇率李植生支队配属于黄毓成挺进军，改出西隆，助第二军出桂省攻百色；徐进先遣纵队入黔后，被分散配属于各路黔军中。

后，他在其老上司岑春煊和梁启

超等人的鼓励下，于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广西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护国军第二军的士气大振。3月16日，方声涛部举行反攻，收复龙潭。时赵钟奇部也由贵州兴义进入广西西隆，进而抄袭黄恩锡部后路。黄部腹背受敌，失败而逃。

与此同时，黄毓成之挺进军也出兴义，经潞城向百色挺进，于黄南田一带与袭扰黔边的龙军朱朝瑛部遭遇。经一夜激战，击溃朱部，遂直趋百色，与桂军会师。时坐镇百色的龙觐光及其所率部队，已被马济、陆裕光等率领的桂军包围，缴械投降，接受改编。

在皈朝与滇军作战的龙军第一路司令李文富，战败退至者桑，旋见右路兵败，后路遭袭，龙觐光被擒，感到大势已去，遂率所部投降。

3月上旬窜扰云南蒙自、个旧、临安（今建水）一带的龙体乾叛乱武装，也遭到滇军刘祖武梯团和唐继尧组织的援军迎头痛击，迅速土崩瓦解，逃离滇境。至此，袁世凯的进攻云南护国军后路之计划完全破产。

滇桂边作战结束后，李烈钧遂督师东进广东，黄毓成、赵钟奇部则奉命援川。

滇桂边之战，虽然规模较小，持续时间不长，但由于李烈钧部及时赶到富州、广南一线，阻止了龙军的入侵，从而打破了袁世凯迂回袭滇的计划，保障了护国军大后方的安全；同时，对陆荣廷之宣布独立，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团团团长王文华，原驻贵阳；第二团团团长彭文治，原驻镇远、铜仁；第三团团团长吴传声，原驻榕江、黎平。

第六节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与护国战争之结局

一、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袁世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复辟帝制活动，在国内主要依靠北洋军为后盾，在国外则主要依靠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

为了镇压云南护国起义，袁世凯调动了北洋军和地方部队的五个精锐师和十几个混成旅、团，分道进行“讨伐”。他原以为云南这支“兵仅万余，饷难月给”的军队，是不难一举荡平的。孰料经过三个月的较量，不但未能将云南护国军消灭，反使本身的军事力量受到了削弱。接踵而至的则是贵州、广西两省相继宣布独立，其它各省也在酝酿响应，人民群众的反袁烈火愈烧愈旺。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日益不稳，财政经济情况更加恶化，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在国际上，日、英等帝国主义在袁世凯开始酝酿复辟帝制之际，曾表示积极支持。但当袁积极推行帝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强烈反对时，帝国主义各国恐中国发生内乱，危及其在华利益，便一改初衷，由支持转为反对。1915年10月28日，日、英、俄三国公使对袁政府发出第一次警告，声称若骤立帝制，将立起变乱，望暂缓改变国体。然而利令智昏的袁世凯没有估计到局势的严重性，仍于同年12月12日正式宣布实行帝制。15日，日、英、俄、意、法五国公使联合对袁发出警告，宣布“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此时，袁世凯始感事态严重，决定派遣特使（农商总长周自齐）赴日，准备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日本政府不仅拒绝特使赴日，而且在通知中责备袁世凯“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各国外交公使还一致指出，以后凡具有“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一概拒绝接受。外交上接二连三的挫折，以及西南诸省护国起义的爆发，迫使袁世凯改变原定于1916年元旦或春节登极的计划。2月23日，不得不公开宣布延缓登极。后随着国内军事、政治形势的继续恶化，更使袁世凯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迫使他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并于次日宣布废除“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纪年。袁世凯自1915年12月12日宣布承认帝位至3月22日取消帝制，前后仅一百零二天。其“皇帝梦”的破灭，充分表明了历史潮流不可逆，人民意志不可侮。

二、停战与备战

《汤芑铭致统率办事处电（1916年2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汤芑铭致统率办事处电（1916年2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袁世凯取消帝制后，鉴于对西南护国军的作战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内政外交亦处于困境，为了求得喘息的时机，乃于3月25日借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名义，致电护国军，要求停战，商议善后。护国军方面，经过三个月的战斗，兵员、枪械、弹药、饷精都有很大消耗，急待补充休整，也需有一个休战时期。因此，从3月底开始，四川、湘西前线先后实行停火。到4月初，护国战争实际上已经停止。

对袁政府的停战建议，护国军方面有较高的警惕。蔡锷等认为：“袁逆之撤销帝制，一因兵事挫衄，外交逼紧，财政困穷，人心鼎沸，乃迫而出此；一因独立省份逐渐加多，护国军势力继涨增高，无力抗御。故借此下台，以和缓国人之心，孤我军之势力，仍盘踞现位，以为卷土重来之地”。因此，在同意停战之后，护国军的领导者仍加紧进行军事准备，扩大军队编制，补充训练新兵，筹集军械给养，并向日本订购军械，以备再战。到5月底，云南护国军即由原来的三个军扩编为八个军，共约五万余人。

对于尔后的战略方针，护国军领导人进行了较充分的酝酿。唐继尧的战略设想是五路出兵，会师武汉。具体计划是：以第四军加强第一军兵力出川，第六军加强第二军兵力出粤，第五军由会理、宁远出陕西，第七军由桂林出长沙，唐继尧则自率第三军及警卫军经黔出湘，各路护国军会师武汉。这一设想，与起义之初的战略大致相似，其问题主要是多路分兵，张口太大。蔡锷则不同，他经过战争实践，对多路分兵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已有所认识，故对下一步作战，坚持其“滇师尽全力以出黔渝为当”的主张。他说：“凡大军作战，首在将其主力摧破，其余自迎刃而解。次在夺据其咽喉重地，……现逆军主力之七、八两师，悉集泸纳，我若将此军击破，则成、渝唾手可得。其次则重庆为逆军唯一之咽喉重地，我若得此，则在川逆军接济立断，久将不战自溃。故滇中增援之师，以全力趋泸或出黔渝为当。就现在形势论，兵出黔渝较易得手。”

李烈钧则坚持以该军主力出湘，控制长江中游。他认为：“粤东方向，桂已独任，我军似可迅速出湘；果能冲断江流，则影响大局，获益犹巨。且川南得遥应之势，逆军将不战自溃。”

比较起来，蔡锷的主张较之唐继尧的计划要实际可行一些。因为，袁世凯的主要征滇部队集中在川南，而在这一方向与袁军对峙的护国军，经过战争的消耗，兵员不足，饷弹缺乏，战斗力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势下，如能按蔡锷的主张，将增援的兵力集中于泸州或黔江正面，则进可以消灭袁军主力，控扼重庆，退可以阻截袁军入滇之路，因而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当然，李烈钧的主张也有其可取之处。此时，广西已经独立，滇省无后顾之忧，若

其死因不详，有“为部下所杀”、“自杀”及“因病暴卒”各说。

该军之张开儒梯团驻滇东待命。

转引自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98页。

以桂军攻粤，以李烈钧的第二军由广西进军湖南，如能攻下长沙、岳阳等要地，进而控扼长江，也足以威胁四川袁军之后路，使其进退两难。总之，蔡、李的主张较之唐继尧的多路分兵计划，都要高明一些。

此后，由于双方没有重新开战，蔡、唐、李的上述计划，均未受到实战的检验。

三、护国战争的结局

在停战期间，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展开了紧张的纵横捭阖，焦点是袁世凯的下台问题。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较大的力量：一是袁世凯及其少数追随者。他们继续策划由川、湘向西南进攻，进行垂死挣扎，妄图继续保住最高统治地位。但是，历史的发展与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虽然由孙提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的正确主张，表示要与所有同袁世凯一样的反动派斗争到底，但因无实力，且严重脱离群众，因而影响不大。二是掌握着护国讨袁的军事实力，并左右战局发展的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他们除了“倒袁”和拥立黎元洪为总统外，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政治主张，给护国战争的结局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袁世凯的一些顽固追随者也开始离袁而向护国军方面靠拢。1916年4月6日，广东将军龙济光在桂滇军的军事压力和广东革命党人领导的民军胁迫下，被迫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也自下而上地轰走了将军朱瑞，推举嘉湖镇守使吕公望为都督，宣布独立。4月16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此后，不少军政头目也纷纷劝袁下台。袁世凯虽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却仍死抱住大总统的宝座进行垂死挣扎。

南方已独立各省为了加强与袁政府的对抗，于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宣布成立军务院，遥戴黎元洪为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和西南各独立省分的督军、总司令等为抚军。军务院的任务是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全国庶政，实际上是一个与袁政府相对峙的临时政府，其主要目的在于逼迫袁世凯交出政权。军务院将两广境内的军队统编为护国军，共五个军、一个师、一个旅和一个独立团，准备分别向湖南、江西、福建开进，大举北伐。同时，进行坚持要袁世凯下台的南北交涉。

军务院成立不久，又有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芑铭相继宣布独立。陈宦、汤芑铭本是袁世凯的忠实爪牙，他们的倒戈，使

转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卷，第73页。

蔡锷：《致唐继尧等辰电》，《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第30页。

袁更加沮丧。1916年6月6日，袁世凯这个独裁者和卖国贼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和唾骂声中病死，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袁世凯死后，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开始与北洋军阀寻求妥协，加速了南北相持局面的结束。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原副总统黎元洪于6月7日继任总统。29日，黎元洪召开国会，恢复国务院，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14日，护国军方面宣布撤销军务院。25日，中华革命党发出通告，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护国战争至此正式宣告结束。

第七节 护国战争胜利的原因及其在军事上的得失

一、护国战争胜利的原因

由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在云南首先发难的护国战争，在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图谋，达到了“铲除帝制，推倒袁氏，重建共和”的预期目的，取得了共和势力对封建专制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其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一）全国人民拥护共和，反对帝制

护国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先由于广大人民对于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记忆犹新，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思想已深入人心，因而，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一传开，迅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和反对。这股强大的反抗浪潮，有力地鼓舞和支持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袁斗争，同时促使过去追随袁世凯的一些政党，为了小集团的私利，也打起了反袁的旗号，甚至袁世凯的一些心腹干将，为了个人利害，也纷纷离袁自保，使袁世凯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而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等不同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势力，在反袁的大目标下，暂时地联合了起来，使反袁斗争得以顺利展开。此外，帝国主义列强也察觉到了中国反袁势力的强大，预感到袁世凯这条走狗将被中国人民反复辟的浪潮所吞没，因而也改变了支持帝制的态度。所有这些，都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放弃复辟帝制的图谋。

（二）护国军英勇作战

护国军的领导者以云南一省之地和二万余人的军力，敢于反抗袁世凯的全国政权和数十万正规军，充分表明他们具有藐视强敌的胆略和必胜信念。这支军队于宣布讨袁不久，即先后进军川南、湘西和滇桂边界，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在北洋军抵达之后，又勇敢地抗击了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反攻。他们的坚毅战斗精神，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倒袁的信心和勇气，推动了一些省分先后响应起义，迅速扩大了讨袁阵线，确实起到了“用军事上之态度表示国人反对帝制之意”。

除原有之三个军外，将原挺进军改编为第四军（军长黄毓成），另扩编第五军（军长叶荃）、第六军（军长张子贞）、第七军（军长刘祖武），并增编一警卫军（军长庾恩旻）。

二、护国军击败袁军进攻的主要条件

护国军之所以能勇敢地抗击北洋军的进攻，挫败了袁世凯妄图消灭护国军，进而扑灭反帝制烈火的图谋，主要由于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一批忠于民主共和的中下级军官

在滇黔护国军中，从梯团长到支队长以至营长，大多为辛亥革命前后的同盟会员、国民党员，少数还是中华革命党员。他们具有民主共和思想，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强烈不满；他们大多为云南讲武堂毕业生或留日士官生，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并参加过辛亥革命战争。由这样一批军官掌握部队和指挥作战，是护国军比较有战斗力的主要原因。

（二）习惯于山地作战，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护国军对于川黔桂山区潮湿多雨的气候和山岳丛林的地形条件比较适应，惯于在崎岖的山道中行军，和在林木丛杂的山区作战。而北洋军无论对气候还是地形都不适应，以致士气低落，难于发挥兵力火力优势。此外，护国军的成员大多来自贫瘠地区，具有吃苦耐劳的习惯；加之相当一部分老兵受过民主革命的熏陶和正规的军事训练，使用的武器也较精良，军政素质较好，因而在作战过程中虽然遇到粮饷短缺等困难，基本上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

（三）纪律比较严明，得到群众的支持拥护

护国军高举反帝制义旗，加上各级领导注意约束部队，不准侵犯群众利益，因而军行所至，人民群众主动当向导、递情报、送茶饭、运粮弹、抬伤员，不少青年积极要求参军杀敌，涌现出不少拥军支前的动人事例。群众的积极支持，也大大鼓舞了广大官兵的战斗意志。

三、护国军将领在作战指导上的主要失误

护国军将领们在作战指导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举义宣布过早

本来，云南的领导者计划先将滇军秘密开进至滇川边境，然后宣布举义，对川边各重要据点实行突然袭击。后由于梁启超一电的催促，遂在战备

尚未就绪的情况下仓促宣布举义。这一欠审慎的决定，丧失了通常武装起义所应有的对敌进攻的突然性。而且由于部队的集中和调动尚未完成就分散开拔，致使各路部队发起进攻的时间参差不齐，未能在战争初期对敌形成兵力优势。以川南战场而言，左、中、右三路接敌的时间相差一个多月，这就使敌军得以在各据点之间调动部队，互相支援，并得到了后续部队的及时增援。当护国军主力抵达前线不久，袁世凯的援军也已源源开到，造成了兵力对比上更大的劣势，使护国军在作战中增加了更多的困难。

（二）战略计划与主客观条件不相符合

护国军一开始以二万余人的兵力，分向川南、湘西、桂粤三个方向进攻，由于兵力过于分散，结果在四川这个主要作战方向，不但没有达到攻占叙、泸、綦进而攻占重庆的作战目的，反而在袁军的反击下被迫后撤。其实，举义之初，护国军的领导者在已经了解到黔、桂两省准备响应起义的情况下，对黔、桂方向只需部署少量兵力（一以策动起义，一以防敌袭扰），而应集中更多的兵力于四川方向，争取在兵力上缩小与敌人的差距，造成局部的兵力优势。果能如此，护国军在川南的作战将会取得更大的战果。

（三）兵员、军械和粮饷的补充不及时

由于战前准备不足，战线又拉得太长，以致战争打响之后，在兵员、枪械、弹药和饷精的补充接济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困难。以云南这样一个贫瘠的省分，要支持数万军队进行战争，确有很多困难，而战线太长，后方太远，又使这方面的困难显得更为突出。幸 1916 年 3 月底敌方提议停战，使护国军得到了补充休整的机会，人员和作战物资补充方面的困难，才暂时得以缓解。

护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成功的革命壮举，但这次战争的目的和成果是很有限的。它虽然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图谋，推倒了袁世凯，并在人民的压力下，继任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被迫宣布继续遵行《临时约法》，表面上又暂时恢复到袁世凯解散国会以前的局面，但未能摆脱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也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政治和经济权益。中国的民主革命任务仍有待以后的革命政党和人民去奋斗和完成。

附表一：

云南护国军编制序列表

护国军政府	都督唐继尧	参赞任可澄
	参谋厅长张子贞	军务厅长庾恩暘
	秘书厅长由云龙	政务厅长陈廷策
	财政厅长籍忠寅	

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总参谋长罗佩金	第一梯团长刘云峰	第一支队长邓泰中
		第二支队长杨秦
	第一梯团长刘云峰	第三支队长董鸿勋
		第四支队长何海清
	第三梯团长顾品珍	第五支队长禄国藩
		第六支队长朱德
	第四梯团长戴戡	第七支队长熊其勋
		第八支队长王文华

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总参谋长何国钧（兼）	第一梯团长张开儒	第一支队长钱开甲
		第二支队长盛荣超
	第二梯团长方声涛	第三支队长黄永社
		第四支队长马为麟
	第三梯团长何国钧	第五支队长林开武
		第六支队长王锡吉

兼护国第三军总司令唐继尧总参谋长庾恩旻（兼）	第一梯团长赵钟	第一支队长华封歌
		第二支队长李植生
	第二梯团长韩凤楼	第一支队长吴传声
		第二支队长彭文治
	第三梯团长黄毓成	第一支队长司令杨杰
		第二支队长司令叶成林
	第四梯团长刘祖武	第一支队长杨体震
		第二支队长李友勋
	第五梯团长庾恩旻	第一支队长赵世铭
		第二支队长唐继禹
	第六梯团长叶荃	第一支队长马

附表二：

袁军参战兵力统计表

蔡锷：《致唐继尧等麻丑电》，《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第36页。

作战方向	部队番号	统兵将领	人数
四川方向	北洋第三师第六旅	吴佩孚	约五千人
	北洋第七师（欠一团）	张敬尧	约六千人
	北洋第八师（欠一团）	李长泰	约八千人
	北洋第六师第十二旅	齐燮元	约四千人
	北洋第四混成旅	伍祥祯	约四千人
	北洋第十三混成旅	李炳之	约四千人
	北洋第十六混成旅（欠一团）	冯玉祥	约二千人
	四川第一师（后改为北洋第十五师）	周骏	约七千人
四川第二混成旅	钟体道	约三千人	
湘西方向	北洋第三师第五旅	汪学谦	约五千人
	北洋第六师第十一旅	周文炳	约四千人
	北洋第二十师（欠一旅）	范国璋	约六千人
	北洋第二混成旅	刘跃龙	约五千三百人
	北洋第七混成旅	唐天喜	约五千七百人
	湖北第三混成旅	卢金山	约三千人
	湖南混成旅	胡叔麒	约四千人
	安徽安武军	倪毓芬	约六千人
滇桂方向	粤军混编师	龙覲光	约八千人
总计			约八万九千人

第十八章 护法战争 (1917年7月—1918年11月)

护法战争，是继护国战争之后，由孙中山发动的旨在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反对北洋军阀独裁专制统治的革命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桂、滇、粤、湘、鄂、川等省的军阀，打着护法的旗帜，在湘、川、鄂、粤、闽等省与北洋军阀集团的军队及依附于该集团的地方势力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军事角逐。本章着重叙述双方在主要战场湖南的作战经过，并简要叙述川、粤、鄂、闽战场的作战情况。

第一节 护国战争后的国内形势和 护法运动的发生

护国战争结束后，中国在表面上出现了南北统一的局面，但实际上社会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激烈，突出地表现为军阀集团之间的纷争加剧，以及民主革命势力与军阀势力之间在维护与毁弃《临时约法》方面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控制中国的总代表，便各自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达到其继续侵略中国的目的。于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各派军阀，乘机扩大权势，割据称雄。在北洋军阀内部，逐渐分裂成两大派系，即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皖系军阀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控制着北京政府和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在各派军阀中势力最大；直系军阀逐渐投靠美、英帝国主义，占有江苏、江西、湖北等富庶省分，实力仅次于皖系。除以上两大军阀集团外，还有在东北崛起的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和在护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以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滇、桂军阀集团，它们都具有相当的实力。此外，尚有盘踞于某一省或某一地区的军阀势力，如山西的阎锡山、徐州的张勋和琼州（今海南岛）的龙济光等。这些大小军阀为了各自的私利，招兵买马，争权夺利，纷争不已。

中央政权是军阀争夺的焦点。自1917年3月开始，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围绕着要不要对德宣战问题而展开的“府院之争”，标志着这种权力斗争进入了白热化。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后期。日本政府为了控制中国，积极怂恿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了捞到帝国主义的“参战借款”，以便购置军械，扩充实力，便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决意”对德宣战。4月25日，段祺瑞召集“督军团”成员到京举行会议，拟定了对德“宣战案”，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参战。当参战提案遭到国会抵制后，段便以督军团的名义要求大总统解散国会。黎元洪则在国会的支持下，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于是，段祺瑞愤然离京，当即唆使八省督军宣布“独立”，并于6月2日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处，以武力威胁总统。黎元洪为了摆脱僵局，邀请徐州的张勋入京“调停”。

6月14日，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三千辫子兵开进北京。接着，便演出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复辟丑剧。7月1日，张勋带领清朝的旧臣遗老数十人进入清宫，将十二岁的已废皇帝溥仪重新拥上黄龙宝座，宣告清帝

李烈钧：《致唐督电》，《武宁文牍》第25页。

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后，于4月下令恢复内阁制，由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他自己则仍赖在总统的位置上，企图继续保持其统治地位。

复辟。黎元洪发现受骗，逃离总统府，躲进日本使馆，电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委托冯、段合力筹划“救国大计”。复辟消息一经传出，“全国民情，莫不反对”。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以示抗议。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人民也纷纷口诛笔伐，愤怒声讨。本来暗中支持复辟的段祺瑞，见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图谋已经得逞，于是摇身一变，马上打起反复辟的旗号，于7月3日在天津马厂誓师，宣布出师讨逆。12日，段亲率“讨逆军”进攻北京。辫子兵一触即溃，张勋逃往荷兰使馆，其余复辟分子也作鸟兽散，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于是这一复辟丑剧仅演出十二天，就迅速破灭了。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站在反对复辟帝制，反对北洋军阀，为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而斗争的最前列。早在袁世凯死后第三天，孙中山即发表《规复临时约法宣言》，表示：“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不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1917年3月起，孙中山又接连发表声明或通电，反对对德宣战，维护国会职权。当段祺瑞和督军团怂恿张勋进京“调停”时，孙又揭露张勋将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推翻约法的阴谋，并吁请西南各省督军“克日誓师，救此危局，作民保障”。西南军阀懂得，对他们威胁最大的乃是北洋军阀，因而在“府院之争”中，表示拥护黎元洪，支持国会，维护《临时约法》，反对北洋军阀专权擅政，客观上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当同年4月段祺瑞逼迫国会通过“宣战案”，北洋八省督军企图以武力倒黎时，云南督军唐继尧即发出通电，反对武力干政，拥护总统和国会。6月11日，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和驻粤滇军总司令李烈钧联名通电，宣布联合西南各省，兴师讨逆。6月20日，陈、谭两督军以国会解散为由，宣布桂、粤两省“自主”，不承认非法内阁。张勋复辟后，孙中山立即在上海召开会议，主张武力讨贼，并制定兴师北伐的军事计划。西南各省也同仇敌忾，纷纷组织军队，准备出师北向，戡定复辟逆流。7月6日，孙中山偕同廖仲恺、章太炎、朱执信等人自上海乘“海琛”号军舰启程赴粤，准备以广东为基地，组织护法讨逆。但孙中山等尚未抵粤，张勋复辟丑剧即告结束。

经过张勋复辟这场风波之后，黎元洪被迫下台，冯国璋为代理大总统，

孙中山：《第二次讨袁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01页。

蔡锷：《致陈宦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第86页。

各部兵力参照《民三年各省军队名称人数驻地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和由云龙《护国史稿》综合整理。

1916年7月6日，北洋政府下令将各省军事长官由“将军”更名为“督军”。1917年4月25日起，各省督军以开军事会议之名，干预国家政务，时人称其为“督军团”。

宣布“独立”的八省督军是：安徽倪嗣冲、奉天张作霖、山东张怀芝、福建李厚基、河南赵倜、浙江杨善德、陕西陈树藩、直隶曹錕。

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中央政府实权仍操在皖系手中。段祺瑞一上台，就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顽固地坚持专制独裁统治。同时，为了对付革命势力，段祺瑞进一步投靠日本。他对日本首相寺内表示：“中国政府几经变化后，我再度出任总理。将来一切施政，当按预定方针进行。中日两国如欲加紧协作，确保亚洲的和平和安宁，舍此当无更好的时机。”寺内马上“表示出会心的满意”，决定以更多的借款和武器支持段祺瑞政府。于是，段祺瑞更加有恃无恐，大肆扩充军备，调兵遣将，企图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

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便将斗争的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决心坚持在南方领导护法斗争，以“建造真共和国家”。7月17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广州。当晚，孙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阐述了护法宗

旨，提出“以海陆军之力量，为国民争回真正共和”，并呼吁各界人士共同为维护约法，再造共和而斗争。19日，孙电邀国会议员赴粤集会，组织护法政府。22日，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率该舰队由吴淞口驶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一个月之后，一百五十余名国会议员到达广州，响应护法；驻粤滇军和广东地方派军人也多被吸引到护法的旗帜之下，或采取中立态度。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到粤议员，议定召集“非常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在《临时约法》未恢复效力以前，中华民国的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

8月25日至9月1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认为“拥护约法，实唯西南是赖”，把护法的希望寄托在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身上。

两广和云贵军阀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是由于他们清楚地看到，段祺瑞推行的武力统一政策，除对付革命派以外，也是为了吞并西南各省。因此，他们都想借助孙中山的威望，与段祺瑞相抗衡，并趁

《英文京报》，1917年7月6日。

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中册，《宣言》，第25页。

《孙中山先生护法通电》，《民国日报》1917年6月9日。

李烈钧于1916年6月率云南护国军第二军进入广东。护国战争结束后，李烈钧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于8月通电解职赴沪。1917年6月8日，广东督军陈炳焜又电邀李烈钧赴粤，会商时局问题。

6月24日，陈炳焜又将“自主”改称为“自治”，并解释说：“自治与独立不同，两广乃自治而非独立”，“自治云者，乃吾人不承认违法内阁之谓，至地方秩序维持，应由本督军专责其成。”（见《晨钟报》1917年6月28日。）

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但是，他们又不想完全搞僵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因而提出只反“非法内阁”，不反大总统，并注意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把军政府作为筹码，随时准备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进行“一番交换”。正是出于这种动机，故在军政府成立的第二天，陆荣廷即发出通电，反对以元帅名义另设政府；9月8日，唐继尧也通电表示不受元帅职。军政府成立伊始，内部就出现裂痕，表明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联盟是非常脆弱的，护法运动的前途将不会是平坦的。

尽管如此，孙中山并未却步。9月10日，他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发布就职宣言，表示“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业，雪数岁无功之耻”。并随即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国叛逆。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暂时有所缓和。9月29日，冯国璋下令对军政府成员“一体缉拿交法庭依法迅办”。10月1日，段祺瑞宣布“出师剿灭”南方的军队。

不久，护法战争的战幕正式拉开，并先后遍及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而以湖南战场打得最为激烈。

第二节 南北政府的战略方针 及兵力部署

护法运动兴起后，段祺瑞政府决定对西南各省用兵，企图实现袁世凯未能实现的“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

护国战争结束后，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拚命扩编军队。到1917年6月止，全国正规陆军已由护国战争时的五十万人增加到六十余万人。其中北洋政府陆军部直辖的部队，已由护国战争前的十二个师、二十个混成旅增加至二十一个师、二十三个混成旅；加上张勋的定武军七十营、倪嗣冲的安武军四十余营、姜桂题的毅军二十营，总兵力达三十四万余人。其中能调往前线作战的部队，约在十万以上。这是段祺瑞赖以发动内战的基本力量。

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所统辖的军队及响应护法的军队，主要有由陆荣廷控制的驻广东的两师两混成旅、驻广西的两师一旅，由唐继尧指挥的分驻滇粤川的六个师，还有贵州的一师一旅和湖南的两个师，以及由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率领的第一舰队（包括巡洋舰三艘，炮舰六艘，其它辅助舰只四艘）和陈炯明统带的二十营海军陆战队，总兵力约十五万人。与北洋军相比，南军总兵力虽居于劣势，但由于在本地区作战，可将大部兵力投入战斗，因而在战场兵力对比上与北军不相上下。

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广东，因广东不仅是护法军政府所在地，也是滇、桂、粤军的联合基地和西南各省与海外交通的枢纽。关于北洋政府的战略意图，段祺瑞的心腹智囊徐树铮后来透露说：“盖欲定大局，非谋统一不可，欲谋统一，非川粤同受政府节制不可。以川较粤，川可稍缓，而粤宜急，粤定川或随之而自定。我之争湘者，为图粤计耳；粤不定，湘即危，湘有事，鄂亦不安，大局则时有摇动之虞”。简言之，段祺瑞要想武力统一全中国，必须征服粤、川，并以征粤为先，而征粤又必先攻湘。因此，湖南就成了北洋军阀进攻的首要目标。

〔日〕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46—147页。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建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因不足约法规定人数，故称非常国会。

孙中山：《团结川滇一致抵御北军之通电》，《国父全集》（台北供应社1973年版，下同）第三册，第482页。

《军政府公报》第1号，广州1917年印本。

根据《全国陆军一览》（《东方杂志》1917年第十四卷第九号）所载，当时全国陆军（不包括各省警备、巡防营、队）共约有四十一个师，五十六个混成旅、团。若按每师一万人、每混成旅四千人、每团一千九百人计算，则全国共有陆军六十一万余人。再加上张勋的定武军、倪嗣冲的安武军和姜桂题的毅军共约四万二千人，则全国陆军达六十五万余人。

湖南北通江汉，南接两广，西邻川、黔，是北军攻取西南诸省的必经之地。早在广州军政府成立之先，段祺瑞便利用北洋政府的“合法”地位，于8月6日下令免去湖南省长兼署督军谭延闿的督军职务，以皖系人物前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代之，并调北洋军第八、第二十师随傅入湘，企图不战而控制湘省。与此同时，段还派部分军队入川，企图控制川省；并令闽、浙、赣抽调军队攻粤，以策应湖南战场作战，使南军首尾不能相顾。

谭延闿是个介于进步党与国民党右翼之间的“八面玲珑”的政客，由于利害关系，和桂系头子陆荣廷关系甚密。谭被免职后，忙向陆荣廷求救。陆荣廷等桂系军阀清楚地看到，“湘省为两粤门户，又系滇黔咽喉，湘失则西南腹背受敌，不特进取之机全无，且（北军）得湘实足以制西南之死命而有余”，故一面令桂军向湘边运动，做出援湘姿态，一面致电冯国璋，请冯设法收回撤换湘督的命令，维持湖南现状，并提出划湖南为南北军事缓冲地带，以保持南北和平。冯国璋把电报转给段祺瑞，段严辞拒绝，说：“今日文人不能将兵，已成各国通例，为军事计，为湘省计，为组庵计，皆以专办民事为宜”；并声称“明令早颁，势难反汗”。

谭延闿并不就此甘休，他电请西南各省迅速派兵援湘，以与段祺瑞兵戎相见。唐继尧、陆荣廷对谭的主张表示赞同。8月16日，陆致电西南各省说：“湘督易人，北方疑忌西南之心业已揭露。唇亡齿寒，急应力筹对待。”次日，滇督唐继尧复电陆荣廷，表示：“湘危则全局破坏，亟宜协力援助”。唐、陆虽表示援湘，但又各保实力，不愿在作战中打头阵。桂军陆裕光第一师进抵湘桂交界之黄沙河后，便顿兵不前，观望形势。

滇、桂不及时发兵增援，湘军主要将领对抵抗北军也表示冷淡，谭延闿出于无奈，于9月9日向傅良佐移交督军印信，微服潜往上海。至此，北军势力得以首先伸入湖南。

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即接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出师北伐的战略方针问题。10月9日，提出了基本战略设想，即：1.派员与陆荣廷及两广督军等磋商抵御龙济光的计划；2.以滇军第三师援湘；3.以滇军第四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闽；4.饬陈炯明、朱执信两军长加紧招募训练部队，为滇军、海军后援；5.电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大军，会师武汉。

不久，护法军政府确定了基本作战方针：“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先

参见《全国陆军一览》，《东方杂志》1917年第十四卷第九号。

参见《全国陆军一览》，《东方杂志》1917年第十四卷第九号。

参见《全国陆军一览》，《东方杂志》1917年第十四卷第九号。

此二十营军队原为广东省长朱庆澜的亲军。1917年8月，朱受桂系军阀排挤辞职出走，行前应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的要求，将二十营亲军改编为海军陆战队，由陈炯明统带。

《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2页。

《粤桂军援湘确讯》，《民国日报》1917年9月21日。

克武昌，次定南京，击攘敌军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 据此，拟动员南军约十个师，组成中央、左翼和右翼军，分三路北伐。同时，拟定了分期作战的计划。第一期作战计划是：中央军由两广进击长沙，肃清入湘北军，待左翼军（滇黔军）进据四川并东入湖北时，与之合攻武昌；左翼军首先攻占四川，尔后派一支队扼守川北，牵制晋陕之敌军，主力乘势东下，与中央军合攻武昌；右翼军与海军协同，合攻闽、浙，再取淞、沪，待中央军、左翼军攻克武昌后，与之会攻南京，并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海军在随右翼军占领淞沪后，即以吴淞为根据地，封锁长江门户，并消灭江内之敌舰，配合陆军进攻南京。第一期作战计划预计在 1917 年 11 月下旬全部完成。尔后，各路南军在长江以北过冬，补充给养，休养兵力。第二年春季开始实行第二期作战计划：中央军由津浦路北进；左翼军由京汉路北进，其川北支队出秦晋，袭击北军侧背，策应正面行动；右翼军则由海路北进。三路军分道并进，会攻北京。上述作战计划，虽然反映了孙中山的革命气魄和军事胆略，但以有限的兵力，分散于广阔的战线上，企图一举破敌，囊括全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后来由于军政府“有府无兵”，西南各省军阀“有兵无府”，根本不听孙中山的调度指挥，这一作战计划也就未能实行。

第三节 北军第一次攻湘之战 (1917年9月—1918年1月)

一、湘南宣告自主

谭延闿督湘时，湖南共有军队六万余人。其中归督军直辖的有第一、第二两个师及六个区的守备队（每区的守备队三至十余营不等），加上各道尹、总兵所辖的守备部队共四万余人；另有全省警备队二万余人。两个正规师中，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下辖第一、第二旅。第一旅旅长李佑文，所属第一团驻湘阴、平江，第二团驻长沙；第二旅旅长林修梅，所属第三团驻宝庆（今邵阳市），第四团驻衡阳。第二师师长陈复初，下辖第三、第四旅。第三旅旅长陈嘉佑，所部驻常德；第四旅旅长朱泽黄，所部驻长沙、湘潭。

谭延闿离职前，任命刘建藩代理零陵镇守使，并调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由衡阳移驻衡山，以便随时配合桂军作战。刘建藩和林修梅都是革命党人，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在湘军中威望较高。傅良佐于1917年9月9日到任后，知道刘建藩、林修梅是谭延闿安排的两个心腹，将威胁其在湘南的统治，于是下令免掉了他们的职务。在此情况下，刘建藩、林修梅被迫于9月18日联衔宣布湘南自主，通电揭露段祺瑞“违法横行，破坏国纪。……易湘督以为武力征服之图”；声明“特率湘南军民子弟，宣告自主，与段政府脱离关系，一切军民政务，均与海军、两广、云南各省一致进行”。接着，湖南第一区守备司令吴剑学、第二区守备司令周伟和铁道守备司令李仲麟，相继宣告自主。孙中山致电刘、林等人表示祝贺，并派革命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林修梅之弟）为湖南劳军使，前往湘南慰劳举义部队。

湘南宣告自主，傅良佐异常惶恐。此时北洋军仅有第八师先头部队两个营抵达湘阴，傅只得先令湘军第一师代师长李佑文，率该师第一旅开赴衡山“相机剿办”。

9月20日，李佑文率第一旅离长沙南下，命第一团团团长梅倬敏率部从株洲沿湘江东岸开进，李随彭树煌之第二团由湘潭沿湘江西岸南进。22日，第一团在衡山县七里滩与林修梅部接战。该团第三营不愿“以湘人攻湘人”，于28日在衡山石湾起义，加入护法军。第一、二团大部官兵立即响应，少数携枪逃散，李佑文仅带十余人逃回长沙。傅良佐欲迅速扑灭湘南护法军的企图就此落空。

《国务院致陆巡阅使电》，《晨钟报》1917年9月1日。

《陆督军来电》，云南《痛报》1917年9月3日。

《唐继尧促桂军出师电》，《民国时报》1917年9月2日。

二、衡山、宝庆之战（参见附图三十一）

（一）双方作战部署

由于湘军第一师第一旅官兵参加护法，使湘南护法军声势大振。1917年9月27日，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从家乡赶赴衡阳，投身护法；28日，刘建藩率所部十营开抵衡阳；29日，程潜由广州抵达衡阳。10月6日，湘省护法军各路将领齐集衡阳，决定组织“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公推程潜为总司令。

傅良佐之进攻湘南护法军，表明南北军队在湘决战已势不可免。桂系军阀决定组织军队援湘，以武力“驱逐傅良佐，收复湖南，以固两广门户”。9月底，桂军陆裕光师先头部队进抵衡阳。10月2日，陆荣廷在广西南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援湘问题，广东督军陈炳焜、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议定了援湘军事计划：由两广出兵八十营（其中广东三十五营，广西四十五营），分编成五个军（由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任军长），由广西督军谭浩明任两广护国联军总司令”。进军路线是：马济率粤军出韶关入湘，经攸县、醴陵取长沙。桂军分成两路：韦荣昌军由三江入湘，经新宁逼宝庆；陆裕光、林俊廷二军则出全州入湘，经永州（今零陵）、祁阳增援衡阳。两广军总的目标是会攻长沙。

正当两广护国军准备援湘之际，傅良佐也在积极备战。9月28日，傅以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各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负责组织指挥湘南作战；以第八师十五旅（旅长王汝勤）和第二十师三十九旅（旅长张纪）从正面进攻衡山；以湘军第二师朱泽黄旅和即将抵湘的二十师之第四十旅（旅长张建功）进驻永丰（今双峰）。10月初，北军第八师之第十五旅和第二十师之第三十九旅相继开抵长沙。嗣后到达的还有倪嗣冲之安武军二十营、晋军商震混成旅以及北洋第三师阎相文旅。

10月上旬，南北两军之间的交战，在朱亭、衡山至永丰一线全面展开。

（二）衡山战斗

湘潭是北军进攻衡山的前进基地，有三条道路可通衡山：一由湘潭经株洲，沿三门、淦田、朱亭一线；一由湘潭经茶园铺，沿熊家桥、护湘关一线，此为陆路大道；一由湘潭沿涓水至福田铺一线。为了抗击北军进犯，护法军的布防如下：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指挥该师之第一、二两团（欠一营），在衡山、护湘关至茶园铺沿线设防，另将一个营配置于福田铺担任翼

龙济光于1916年10月为滇、桂军所迫，退守琼州。此时准备抄袭桂、粤军后路，配合北军作战。

《西南统一作战计划》，《革命文献》（台北1969年版）第五十辑，第4页。

侧警戒；刘建藩所部数营防守淦田、朱亭；林修梅率该旅之第四团驻守岳后，防敌由永丰方向窜犯。

10月6日晨，南北两军开始在湘潭县属之西倪铺接战。护法军在衡山以北只有不足两个团的兵力，却要防守从福田铺至湘江边宽约十五公里的正面，力量分散；加上装备较差（除步枪外，仅有二门炮、二挺机枪），难于阻止敌人的进攻。北军王汝勤所部由中路进攻，集中兵力，重点突破，连占茶园铺、中路铺和白石铺等要点，逼近护湘关。护湘关位于衡山北十二公里处，

两侧山势险峻，湘（潭）、衡（山）大路从山间穿过，是易守难攻之地。护法军在护湘关两侧高地构筑工事，重点设防。8日晨6时，北军分三路攻打护湘关。护法军凭险抗击，“顽强异常”，“抵死不退”。战至次日凌晨，北军从侧翼突击，仰攻肉搏，护法军力不能支，遂弃关撤退。护湘关落入敌手。

10月10日晨，北军进攻护法军在衡山北面的最后一个要点石桥铺。护法军控制附近高地，顽强抵抗。临近中午，刘建藩派数营援兵赶到战地，让正在奋战的第一师士兵撤下吃饭。但这些援兵多数是新兵，未经严格训练，缺乏作战经验，以致一有伤员，就惊慌后退。北军乘势冲击，护法军大败。

10月11日上午7时，北军向衡山外围发起攻击。王汝勤亲率该旅第二十九团及工兵营、炮队由正面实施突击，以第三十团由翼侧抄袭。护法军据守城外据点的部队经不住敌军的猛攻，纷纷逃进城内，并牵动了守城部队。护法军只得放弃衡山，分向湘江以东和衡阳退却。王汝勤旅遂轻取衡山。

北军张纪旅行动迟缓，10月11日由湘潭进抵株洲，翌日沿湘江东岸向南攻进。13日在淦田乌鸦山与刘建藩之警戒部队遭遇。双方激战两小时，刘部不支后退。张旅乘势追击，于下午7时攻占朱亭。14日，张旅向衡山靠拢，拟配合王汝勤旅向衡山以南进击。但王汝勤由于作战顺利，便不等张旅跟进，即率所部向贺家山进攻。

贺家山位于衡山与衡阳之间，左接巍巍衡山，右倚滚滚湘江，北面是宽约数里的开阔地，山势虽不高峻，但北陡南缓，易守难攻，是防卫衡阳的天然屏障。护法军控扼贺家山，封锁山下开阔地，进行顽强阻击，遏止了王旅的推进。10月15日，北军张纪旅也投入战斗。在此前后，桂军第三军副司令贲克昭率领的先锋团和粤军第一军副司令邱渭南率领的三个营，也先后赶到贺家山一带，增援湘军。

从10月15日起，南北两军各投入兵力万余人，在贺家山一带连日激战。北军旅长王汝勤和张纪组织部队对贺家山轮番进攻，但由于不讲战术，士兵盲目射击，徒耗枪弹、炮弹，因此虽付出很大代价，但战果不佳。团长傅良

傅良佐抵湘后，将陈复初师改编为中央第十七师，划归北洋系统。

藻（傅良佐之弟）战歿，部队死伤过半。加之秋雨连绵，山地泥泞，给不习惯江南气候的北军造成意外的困难。北军连日强攻，毫无进展，只好转攻为守。湘南护法军在桂、粤军支援下，经数日激战，挫败了北军的进攻，但苦于弹药不继，也未发起新的攻势。

10月21日，程潜与陆裕光、贛克昭、邱渭南等桂、粤军将领在衡阳举行会议，商定下一步作战计划。鉴于贺家山至衡山方向北军云集，护法军反击困难，而宝庆已为北军攻占，遂决定由赵恒惕指挥两团湘军并桂军贛克昭部，在原地实行坚守防御，刘建藩部出守大浦，警戒江右，而将主力向宝庆方向转移，拟出敌不意，收复宝庆，再图长沙。计划甫定，即由林修梅率所部湘军与桂军一部直趋宝庆；邱渭南之粤军三营右出攸县、新市，趋醴陵，威胁敌之后路。

（三）宝庆战斗

傅良佐派兵进攻衡山时，对宝庆方向暂取守势，仅派湘军第二师之朱泽黄旅进驻永丰，并控扼永丰与宝庆间的险要山地界岭（永丰西南三十公里），拟待援军赶到后，再行进攻。湖南第二区守备司令周伟、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宋鹤庚于10月2日在宝庆宣告自主后，为了先发制人，立即率部东进，袭占界岭（时朱旅派一营防守），前锋逼近界岭东面的青树坪，另以原永州守备司令谢国光率兵三营，经洪罗庙进逼马屋岭，袭击永丰之敌翼侧。

朱泽黄见要地界岭失守，关系重大，立即转守为攻。10月5日，朱旅倾巢出动，反攻青树坪。战至次日上午，护法军不支，退守界岭。朱旅乘胜追击，猛攻界岭。护法军立足未稳，弃守而退，界岭复陷敌手。

朱泽黄夺回界岭后，以主力驻守该地，另以参谋长周诗率兵二营迎击进逼永丰翼侧之护法军。10月10日，周诗部于马屋岭击败谢国光之护法军，进据洪罗庙。朱泽黄见翼侧威胁已经解除，遂于18日组织部队由界岭向宝庆进攻。朱将所部分为两路，以第七团团团长毛树峻为左翼指挥官，第八团团团长周崇岳为右翼指挥官，两路相互策应，齐头并进。19日，朱旅攻占黑田铺（宝庆东三十公里），继陷洪桥（宝庆东十八公里），直薄宝庆城下。护法军据城抵抗一夜，于20日撤离宝庆，退往杜家坪。朱泽黄进占宝庆后，接到傅良佐令其速率主力增援贺家山北军的电报，遂留两个营守宝庆，亲率四个营于10月25日出两市塘（今邵东），拟经洪罗庙趋援贺家山。

这时，贺家山战场已呈胶着状态。10月21日，桂军韦荣昌部抵达衡阳。程潜为打破战场僵局，商请韦荣昌派出所部一个团，会同湘军李仲麟、谢国光部（共六营），由衡阳左趋渣江，拟经洪罗庙攻取永丰。31日，韦、李、谢所部湘桂军于洪罗庙与朱泽黄旅相遇。双方激战竟日，朱旅不支，退守界岭，旋又退至永丰。数日后，林修梅也指挥所部湘军，在桂军陆裕光部配合下，向宝庆发动反攻，于11月4日下午克复宝庆。尔后，林修梅派宋鹤庚

团东进，拟配合在洪罗庙地域待机的韦、李、谢军进攻永丰。

永丰守敌除朱泽黄所部一个旅（欠二营）外，还有新从长沙赶到的晋军商震旅和北洋第八师第三十二团。上述守城兵力虽约一师之众，但由于朱旅已成惊弓之鸟，不堪再战，商旅新到，立足未稳，加上相互之间互不统属，所以防御能力并不很强。11月8日，湘桂护法军攻克界岭，继下青树坪。11日，护法军分四路进攻永丰：李仲麟部由青树坪攻敌正面，桂军一部由石头山经下五里牌攻敌左翼，谢国光部由上五里牌攻敌右翼，另以桂军一部出三甲塘抄敌后路。护法军四面围攻，勇猛作战，北军渐呈不支之势。下午又有由宝庆开来的湘军宋鹤庚团和桂军二营投入战斗，护法军攻势更猛。永丰守敌见后援不继，孤城难守，遂于傍晚弃城而逃：朱泽黄旅逃向湘西，商震旅和第八师之第三十二团逃往湘乡。

与此同时，南、北两军在湘东醴陵、攸县方向也展开了激烈战斗。安徽援湘司令李传业率安武军十营于10月底抵长沙，傅良佐令其由醴陵进攻攸县，得手后“由攸县进攻衡州之背”，策应贺家山正面战场。李传业以帮统高世续率兵五营自醴陵出发，帮统马联甲率兵三营由朱营出发，对攸县分进合击。11月7日，高世续所部首先进抵距攸县二十公里之新市。这时，广东护国军第一军副司令邱渭南已进驻攸县，在攸县至新市地域内派兵设防，严阵以待。8日拂晓，双方在新市西侧山地展开激战。战至10日，邱部因兵少不支，遂放弃新市、攸县，退守耒阳。安武军于10日上午占领攸县。

（四）北军停战主和

正当南北两军在湘南鏖战之际，陆荣廷于11月10日在梧州召开有桂军、驻粤滇军、海军和军政府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鉴于北军源源入湘，湘南战事吃紧，决定由李烈钧率领驻粤滇军、海军和陈炯明之粤军，联合进攻闽浙，以分散北军兵力，减轻湘南护法军的压力。但梧州会议刚结束，忽然传来攻湘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宣布停战议和的消息。原来，王汝贤、范国璋都是接近直系的将领，对段祺瑞的武力政策持有异议，对傅良佐督湘深表不满，在“兵疲力尽”、损兵折将的情况下，不愿意再替段、傅火中取栗，乃于11月14日发出通电，主张南北军立即停战议和。通电发出后，王、范二部自行停战，并从衡山撤退。

王、范突然主和，使湖南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傅良佐因对王、范的主和行动“既非空言所能挽回，又无实力以资镇压”，于14日夜与代理省长周肇祥乘军舰匆匆逃离长沙。段祺瑞对王、范之擅自停战求和更是大为恼怒，但为了不使湖南轻易落入护法军之手，便采取笼络王、范的办法。他一面将傅良佐、周肇祥免职查办，一面加委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

“所有长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贤督同范国璋完全负责”。这一任命颇合王、范心意。他们宣布停战，本意就想逼走傅良佐，取代督军和省长的地位，于是，一面在湘潭、株洲一带集结兵力，一面向南军提出按现有界线先行停战，一切问题留待和平解决。

湘粤桂联军识破王、范的缓兵之计，继续向湘潭、株洲进攻。此时，北军斗志已丧，望风披靡，纷纷北逃。当王汝勤的兵车驶过一铁路桥时，“正值徒步溃兵拥塞桥上，王命火车直冲过去，当即轧死轧伤官兵七、八百人，血流数日，惨不忍睹”。11月17日，联军攻克湘潭、株洲。这时，从湘乡败退的商震混成旅，不知湘潭已被护法军攻占，全旅蜂拥入城，遭到护法军伏击。商旅几乎全军覆没，仅二百余人逃往长沙。20日，赵恒惕、程潜、刘建藩等部进占长沙。王汝贤、范国璋率残部逃往岳阳。

程潜进入长沙后，马上召集湖南各界代表会议，推举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兼军务会办。军事方面，除留少数部队镇守长沙外，立即令刘建藩、贛克昭等部分别向湘阴、平江方面开进，准备乘北军溃败的有利时机，收复岳阳。同时迭电进驻衡阳的联军总司令谭浩明“火速来省，指示方略”。但谭浩明一则对程潜任省长不满，二则刚收到直、鄂、苏、赣四督军呼吁停战议和的电报，便以“尚未准备停妥，未便操之过蹙”为借口，故意在衡阳迁延不进。桂军按兵不动，湘军也未敢单独深入，致使北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得以在岳阳完成了防御部署。12月8日，程潜自动解除省长兼职，谭浩明才于17日到长沙。谭抵长沙后，应各方要求，将粤桂护国军改称为护法军。18日，谭宣布他本人以湘粤桂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兼管湖南军政事宜。这个目不识丁的“草莽英雄”，依仗桂军势众，攫取了湖南的军政大权。

衡宝之战是护法战争中南北军队的第一次交战。作战伊始，湘南护法军就表现出了积极顽强的战斗精神。在初战失利、衡山失守的情况下，湘南护法军利用贺家山有利地形，扼险阻敌，为扭转战局创造了条件。当战斗进入相持阶段后，护法军领导人鉴于正面反击难于取胜，遂及时调整部署，在坚守贺家山的同时，抽调相当兵力转攻守备薄弱的宝庆，连克宝庆、永丰，逼使北军前线将领停战求和。接着，又乘势反击，连克衡山、湘潭、株洲等地，并在中途伏击溃敌，取得了全歼晋军一混成旅的辉煌战绩。这说明程潜等护法军领导人具有一定的组织指挥能力，其战术运用是成功的。此外，桂、粤两省及时出兵支援，与湘南护法军并肩作战，勇敢杀敌，对夺取衡宝之战的胜利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该师师长赵恒惕因奔丧返回原籍，故由李佑文代理。

《粤桂军援湘确讯》，《民国日报》1917年9月21日。

此时仍袭旧称。

三、岳阳之战（参见附图三十二）

（一）南军顿兵待和，北军积极备战

王汝贤、范国璋通电主和，以及衡、宝作战失利，打乱了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计划，使其陷入尴尬的境地。在王、范通电主和的次日，段即向大总统冯国璋请求辞去国务总理职。11月18日，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时称“长江三督”），秉承冯国璋的旨意联衔通电，主张北京政府与西南各省撤兵停战，并表示愿负调停之责。22日，冯国璋批准段祺瑞辞职，并装出准备同西南当局议和的姿态。

北洋政府停战议和的表示，在护法军政府和西南军阀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孙中山于11月18日发表时局通电，明确表示“此次西南举义，既由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之余地”。非常国会也致电程潜，揭露北洋政府“阳托调和，阴则厚增援兵”，要程潜等迅速进攻岳阳。联军占领长沙后，孙中山又动员驻扎湖北的北洋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和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响应护法，与长沙联军向岳阳、武昌对进，“以成腹背夹攻之势”，争取出现“控扼武汉重镇，湘鄂连为一体”的形势。黎天才等接电后，立即部署起义，准备与护法联军协同动作。然而，桂军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针。11月28日，在陆荣廷授意下，谭浩明擅自发出了停战议和的通电，声称“段祺瑞奉令免职，根本已得解决，自应照约法停战”。孙中山对此十分愤慨，一针见血地指出：“陆此次出兵，本在攫取湘权，长沙既得，其欲已偿，故一再电冯停战，而未及旧国会之应恢复，对于岳州北军，亦无驱逐之意，于军府始终无诚意之表示，致冯意益肆，局势如此，危险实甚”。程潜等湘军将领虽对议和持有异议，但因湘军兵力不足，且恐进一步搞僵与桂系的关系，故亦未及时发兵进攻岳阳。于是，孙中山又把希望寄托在滇系军阀身上。12月10日，他致电滇督唐继尧，促其疾速率领滇军沿长江东下，与黎天才、石星川之鄂军会攻武汉，指出：“陆主停战议和，全出于自便私图”，“望冀帅迅出宜昌东下，进击武汉，则长江以北将来属军府范围，届时陆虽单独议和，亦无能为也”。

《傅督军来电》，《北洋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傅良佐自讼文》，《民国日报》1918年2月15日。

《湘灾纪略》第一卷，第17页。

《关于调查北军在湘省失败原因之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赵恒惕等致陆荣廷、谭浩明电》，《民国日报》1917年12月3日。

通电署名原有直督曹锟，后他用长途电话向段表白，说此电未经他本人同意，不能负责，否认列名主和一事。

转引自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四册，第1079页。

唐继尧却回电声称：“川中逆军尚未悉数荡平，猝难东下”。这样，孙中山的计划便无法实现，并使湖北黎、石起义军因孤立无援而处境日益危险。

段祺瑞下野后，不甘心于对西南用兵的失败。他策动各省皖系军阀，并拉拢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实力派曹锟，于12月2日在天津召开会议，一致主战，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湘粤。会议初步制订了两路进兵湖南的计划：第一路推曹锟为主帅，率所部由京汉路南下，经湖北进攻湖南；第二路推张怀芝为主帅，率军由津浦路南下，经江西进攻湘东。会议还确定了各省出兵的数目：直隶（今河北）、山东、安徽各出一万，奉天（今辽宁）出二万，山西、陕西各出五千。军费由各省自行承担。

冯国璋等人唱着“议和”、“停战”的高调，不过为了敷衍南方；在死守岳阳，维护北洋军阀根本利益问题上，与主战派并无分歧。在天津会议的胁迫下，冯国璋赶紧声明：“本大总统对于湘事决不能尾怜求和”。12月15日，冯正式任命曹锟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张怀芝为第二路军总司令，令各率本路军队南下攻湘。18日，冯又委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并规定关于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送还段祺瑞。

这时，日本政府也表示全力支持段祺瑞和北洋主战派。12月30日，与北洋陆军部签订了一千八百余万日元的军械借款合同。日本帝国主义出面撑腰，大大助长了北洋军阀的内战气焰。1918年1月8日，冯国璋通电北洋各督，同意继续对护法军作战。喧嚣一时的南北停战议和活动，为北洋政府赢得了调兵遣将的时间，却使南方军政府内部扩大了矛盾，并丧失了会攻武汉的有利时机。

（二）南北双方在岳阳地区的兵力部署

1918年1月，陆荣廷和护法联军将领见冯国璋附和主战派，且有“先挫西南声威，然后言和”的企图，感到求和无望，遂决定在北军主力抵湘之前，先发制人，收复岳阳。岳阳为湘鄂交界的军事要地。当湘南战事吃紧之际，段祺瑞就已调派北洋第二师师长王金镜为岳防总司令，指挥该师之第三旅（旅长孙传芳）、第七师之第十四旅（旅长吴新田）、第十一师之第二十二旅（旅长萧安国）和直隶之第二混成旅（旅长阎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长萧耀南）防守岳阳。王汝贤、范国璋两师在衡山、宝庆作战失利后，其余部亦退往岳阳。这样，据守岳阳之北军已达六七旅之众。

王金镜将主要兵力配置在新墙河至油河诸要点，利用有利地形，构筑防御阵地。其具体部署如下：北洋第二师之混成第六团防守坡塘（今破垄口），第五团担任南津港至坡塘沿湖警戒；吴新田旅防守山桥岭；阎相文旅防守枫

《致襄阳黎天才等电》，引自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三集，第46页。

《湘灾纪略》第一卷，第21页。

树桥；萧耀南旅防守乌江桥；第十一师之四十四团为左翼总预备队，暂驻岳阳城内。范国璋师之三十九旅防守岳阳至蒲圻铁路沿线，四十旅守板桥至托坝（今长塘）一线；王汝贤第八师余部移驻江北监利一带，为总预备队。王金镜的第一线兵力共约一万三千人，基本上沿新墙河一线配置，且左翼比较薄弱，这就给联军的进攻留下了可乘之隙。

湘粤桂联军进占长沙后，其总兵力约有四万余人。随着和谈逐渐无望，联军除以湘、桂、粤军各一部留防长沙，粤军马济部移驻永安，并分防浏阳、醴陵方向外，主力则于1917年12月中下旬分别向平江、湘阴、福临铺一带运动，准备进攻岳阳。

1918年1月上旬，湘军总司令程潜于新市（湘阴东北）两次召集前线高级将领会议，拟定攻岳作战计划。根据北军各旅接合部空隙大、左翼兵力薄弱等弱点，决定以桂军佯攻北军右翼，牵制该方向敌军；令赵恒惕率湘军主力集中到北军左翼，以托坝为主要突击方向，由该处突破，进取乌江桥。得手后兵分两路，一路向左卷击，配合桂军夹击坡塘之敌，一路向右进占桃林，威胁临湘铁路线。其具体部署是：湘军赵恒惕率所部一旅和陈嘉佑之独立第三旅进攻托坝、西塘，为主攻；林修梅旅进攻箬口，为助攻；桂军韦荣昌部佯攻坡塘，陆裕光部佯攻新墙、山桥岭，牵制当面之敌；湘军刘建藩所部警戒通城方向，并相机策应赵部；吴剑学、李仲麟部为总预备队。程潜要求各部队于1月13日前作好战斗准备。

（三）联军会攻岳阳

1918年1月18日晨6时，程潜对湘军下达进攻命令，同时颁发训词说：“夺得岳州，湖南必生，不得岳州，湖南必死。我胜敌人，国家必存，敌人胜我，国家必亡。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凡我军人，努力杀贼”。并把这个训词印在白布上，发给每个士兵佩戴于胸前。湘军为复土而战，在开进途中“高声唱歌，悲壮激昂”。

担任主攻任务的赵恒惕所部约六千五百人，其进攻正面由托坝至石头嘴，宽约十五公里。赵恒惕将所部分为左、中、右三路：以林修梅为左翼队司令，率部进攻箬口至石头嘴之敌；宋鹤庚为右翼队司令，率部进攻托坝、西塘之敌；廖家栋为中路队司令，率部进攻白湖岭之敌，并策应右翼队行动。

北军岳防司令王金镜探悉南军主力向乌江桥方向运动，于1月22日晚令担任总预备队的第十一师四十四团两个营、机关枪一连携山炮四门增援乌江桥之萧旅，加强该方向的防御力量。

孙中山：《致章炳麟转促唐继尧分兵东下电》，《国父全集》第三册，第494页。

唐继尧字冀庚，故称冀帅。

《孙中山促唐继尧东下电（1917年12月10日）》，云南档案馆藏。

1月23日拂晓，联军进攻岳阳的战斗全面打响。湘军右路和中路部队首先突破当面之敌，上午10时攻克托坝，守敌第二十师八十团一个营逃往岳阳，余部退守桃林。湘军乘胜推进至白湖，威薄北军防御重点乌江桥；左路林修梅旅也于午后攻克箬口，迫使守敌阎相文旅退守后山坪一线。

岳阳左翼防线被湘军突破后，王金镜颇为震惊，又下令警备岳城的四十三团一营增援乌江桥，同时令二十七团一营进驻普济桥，加强该方向之纵深防御，并令萧耀南赴乌江桥担任前线指挥。

1月24日上午，湘军调整进攻部署：以中、右两翼部队合攻乌江桥；调预备队一部迂回至岩前湖（今岩泉湖），配合左翼部队夹击后山坪之敌。同时，令李仲麟率五营向右迂回，进袭桃林。王金镜一面令防守桃林的第二十师死守阵地，遏制南军，一面增派岳城南关警备队四十三团另一营附机关枪一连往援枫树桥。旋接乌江桥守军萧耀南告急电话，又令四十三团一营中途折援乌江桥。湘军左翼林修梅部在援军配合下，趁势发起猛攻，于当日攻占后山坪，迫敌退守南木冲（今楠木冲）。这样，作战重点便移向乌江桥。

乌江桥是岳阳东南的重要通道，四面环山，中间开阔，背倚白湖岭高地。北军扼守白湖岭高地，顽强阻击。湘军久战不克，遂一面在乌江桥继续组织进攻，一面派出小部队，从右翼楔入岳阳城附近，实行小群攻击。王金镜十分恐慌，忙将守普

济桥、冷水铺的部队调回岳城防守。1月25日下午8时，萧耀南电称乌江桥被湘军三面包围，急乞援兵，王金镜又将新抵岳阳的北洋第十一师二十一旅之两营派赴乌江桥，并派出飞机两架助战，但刚飞临战区上空，即被湘军枪弹击伤，被迫返航。

1月26日拂晓，湘军以一团跃过白湖迂回至乌江桥背后，另两团在乌江桥右侧和正面，同时发起猛攻，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搏斗。激战竟日，毙俘敌数百人，湘军也伤亡官兵五百余人。当日下午，北军萧旅因伤亡惨重，疲惫难支，不得不放弃阵地，退往三眼桥。其左翼守桃林之第二十师一部和右翼守南木冲之阎相文旅，见中路乌江桥失守，也无心再战，纷纷弃阵后退。三眼桥是通向岳阳城的最后一个要点，王金镜命萧旅死守，“作背城一战，以挽回危局”。然而，萧旅残部已无力再战，于午夜弃守逃命。此时，守坡塘、新墙一线的吴新田、孙传芳两旅，见乌江桥失守，恐后路被南军切断，也争相撤退。湘桂联军长驱而进，直抵岳阳城下。王金镜见岳阳已经难保，遂指令吴、阎、萧旅沿铁路退往湖北蒲圻，孙传芳旅退往嘉鱼。王本人逃往武昌。

1月27日上午，湘桂联军占领岳阳，俘敌一千三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火炮四十余门，以及大批枪枝弹药。战后，程潜赋诗志庆：“严冬十二

《唐继尧复孙中山电》，《民国日报》1918年1月26日。

月，晨起临前营，诸将环我立，受命各成行。指途向岳阳，攻其所必争。先趋白湖荡，猛力洞厥膺。鏖战五日夜，我锋不可撓。伏尸遍原野，直抵巴陵城。壮哉甲冑士，誓死秉吾城”。反映了南军的勇猛和战斗激烈的情景。

护法联军之所以能攻克北军重兵防守的岳阳，除了联军在兵力上居于优势和有较高的士气外，在指挥上亦有其可取之处。首先，掌握了敌人的防御部署，将主攻方向选在敌之防御薄弱处乌江桥，使敌军频繁调动，打乱其整个防御部署；其次，将主攻任务交给士气较高的湘军主力执行，在部队的使用上也是得当的；再次，除正面进攻外，还组织小股武装深入敌后活动，对于配合正面作战，打乱敌人的兵力部署，也起了一定作用。

护法联军攻下岳阳，独立各省人心振奋，希望护法军长驱直下攻取武汉。而此时鄂省北军主力正集中力量“围剿”荆、襄靖国军，武汉空虚，如果联军乘虚径取武汉，与湖北靖国军协同作战，将使湖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无奈桂系军阀仅以夺取湖南为满足，不想进攻直系督军王占元的地盘。在联军占领岳阳的当天，谭浩明又擅自下令严禁前线各军跨入鄂省一步。他在致苏督李纯的电报中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并称如“北不攻岳”，则“南不攻鄂”。这样，联军就丧失了乘胜北进的大好时机。

四、荆襄之战

（一）湖北组成“靖国军”参加护法

1917年12月，正当南北酝酿议和之际，湖北境内的部分军队宣告自主护法，牵制了北军驻鄂部队，对湘桂粤联军进攻岳阳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护法战争前，湖北共有军队三个师、四个旅和两个独立团。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和襄郢镇守使兼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早年参加同盟会，后又参加辛亥革命，与革命党有较深的关系。在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人的激励下，石星川和黎天才分别于12月1日和16日宣布自主。同时，原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也潜回枣阳，召集旧部举义护法，共同成立“湖北靖国联军”。公推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兼第一军总司令，石星川为第二军总司令，王安澜为第三军总司令。这种革命形势的出现，使孙中山极为振奋。12月26日，他致电黎天才，提出湘、鄂、川护法军队夹击武汉的作战方略，指出：“执事据荆襄重地，地扼江汉之形胜，南与滇黔川湘桂军互为声援，合力并进，以

《冯国璋讲话纪录》，《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117页。

桂军第一军五千人，第二军三千五百人，第三军三千五百人，粤军马济部三千人；湘军第一师四千五百人（包括林修梅一旅），刘建藩部六千五百人，张学济部七千人，程潜部（包括陈嘉佑一旅）四千五百人；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卫兵三千人，（以上参见《联军进窥岳州记》，《民国日报》1918年1月7日。）

《湘粤桂联军攻克岳州血战史》，《民国日报》1918年2月22日。

成腹背夹攻之势，则必胜之算操自我手。”^①

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和当时战场的客观形势，湖北靖国军拟定了基本作战计划：由第二军分兵出荆州，攻宜昌，以打通长江上游航路，接应滇黔靖国军出川，进逼武汉；第一军一部会同第三军合攻武汉；黎天才率第一军另一部北规信阳，控扼武胜关，切断京汉铁路，阻止北军南援。但是，湖北靖国军虽号称三军，实际参加护法者不过万人左右。以此有限兵力，企图分兵作战，实现上述作战计划，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更为困难的是，此时湘桂粤联军正屯兵长沙，等待议和，无意援鄂，滇黔靖国军正全力争夺四川，无暇东下，黎天才等只好率靖国军独立作战。

湖北之襄阳、荆州和武汉素称“一鼎三足”。荆、襄宣布独立，武汉便陷于孤立。湖北督军王占元一面致电北洋政府乞援，一面组织鄂省部队防堵靖国军。1918年1月10日，北洋政府正式下达“武力戡定荆襄令”，命“第一路总司令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各派得力队伍，克日分路会剿”，“河南督军赵倜派兵相机协剿”。在王占元主持下，北军拟定了基本作战计划：将襄阳、荆州地区划分为第一、第二“清匪”区。北洋第三师代师长吴佩孚为第一区司令，指挥该师两个旅和驻南阳之豫南总司令吴庆桐混成旅，“围剿”黎天才部。北洋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为第二区司令，指挥北洋第二师之第四旅、吴光新所部两个旅和第十八师一部，“围剿”石星川部。总兵力约二万七千人。

（二）靖国军荆、襄作战相继失利

黎天才宣布自主后，未能按既定计划出兵河南信阳，控扼武胜关，而于1917年12月20日率兵一部进攻南阳。在南阳外围遭到豫军阻击，遂退据新野，数日后又撤回襄阳。

1918年1月初，北军开始对襄阳发起总攻：第三师第六旅由信阳西进，吴庆桐旅由新野南进，另以反对独立的原第九师第十八旅（旅长张联升）由老河口（今光化）东进，第三师第五旅由孝感经钟祥北进，对襄阳实行向心攻击。

这时，黎天才所部靖国军不足一旅，鉴于敌军四面围攻，难以抵御，便于1月20日主动放弃襄阳，经南漳南进。驻守枣阳、随县之王安澜军也向南转移，以图与驻守荆门的第二军靠拢。

石星川宣布独立时，该师驻守荆州、沙市的兵力只有一个师部和第一旅第一团，共有步兵三营、机关枪两连。不久，驻仙桃镇第一旅第二团响应独立，总兵力也不过六七营。鉴于兵少力单，石星川一面匆匆招募新兵，扩充力量，一面迭电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学济，请派军队出石首、公安，策应荆

^①《王金镜关于守岳北军失败经过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沙靖国军行动。张学济接电后，立即率所部二十营出桃源，趋澧县，增援荆州靖国军。1917年12月30日，其前卫司令胡瑛所部进抵湖北公安，遭到北洋第十八师阻击，无法接近荆州。

当时，驻鄂省之北军主力集中于武汉和岳阳，武汉以西仅有第十八师之一旅（驻监利、公安）、第二师之第四旅（驻宜昌西北），和刚从重庆退到宜昌的吴光新所部之李炳之、刘跃龙两个旅。为了围攻荆、沙靖国军，王占元令朱廷灿第四旅从当阳沿漳水南下，李炳之第十三旅沿长江东进，刘跃龙第二旅之一团助攻宜都、松滋，第十八师负责拦击湘西护法军，并袭击荆沙靖国军后路。

北军兵力虽居优势，但系统杂乱，互不统属，多路进攻，缺少协同。荆沙靖国军如能利用这些弱点，集中兵力，机动作战，有可能将敌各个击破。但石星川面对强敌进攻，却派出一团兵力到荆州以西，沿长江北岸分散设防，形成了分兵防堵、被动挨打的架势。

1918年1月14、15两日，北军朱廷灿、李炳之旅开始向荆、沙进攻。靖国军节节后退，朱廷灿部连夺当阳、河溶、清溪河等要点。李炳之旅未遇任何抵抗，直薄荆州城下。

石星川见北军兵临城下，而张学济率领的湘西护法军在公安遭到北军阻击，远安的王安澜军也迟迟不能向荆、沙靠拢，遂丧失信心，于1月22日自行解职而去。石星川出走后，其部下大多逃散，余部在副司令唐克明带领下退出荆州，会合湘西护法军后撤往宜都。22日夜，荆州城被李炳之旅占领。

湖北黎、石等部举义，正值湘桂粤护法联军攻克长沙之后，如当时湘省护法联军迅速攻取岳阳，进规湖北，则可以得到湖北靖国军的有力配合，护法战争的局面将会有很大改观。无奈护法联军在克复长沙后，即顿兵不前，致使北洋政府得以调集部队“围剿”荆、襄靖国军。湖北靖国军之所以遭到重大损失，本身兵力薄弱和指挥不当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湘省护法联军既不配合作战，又不及时救援，也难辞其咎。邵元冲断言，襄、荆失败是“湘中桂军按兵不救之罪也”，此话不无道理。

程潜：《养复园诗集》。

转引自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四册，第83页。

包括北洋第二师（师长王金镜）、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和北洋第二、第六、第二十一混成旅及湖北第三旅，另有驻武汉的两个独立团。

第四节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 (1918年2月—5月)

一、护法军内部矛盾日趋激化

经过半年的奋战，到1918年2月，各路护法（靖国）军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湖南战场上，护法军占领了长沙，攻克了岳阳；在四川战场上，靖国军占领了重庆和成都。与此同时，其它各省的护法势力也有很大发展，“独立”、“自主”的通电接连不断。在湖北，石星川、黎天才的靖国军虽遭挫损，但尚有革命党人蔡济民率领的民军在广济等地活动；在陕西，陕军团长郭坚在凤翔宣告自主，革命党人于右任、胡景翼在三原宣布独立，陕西靖国军一度攻占了西安；在浙江，驻宁波的旅长叶焕华宣告独立，温州、处州（今丽水）、绍兴等地的军队一度响应；在河南，原京津总稽查长王天纵在临汝宣告独立；在山东，部分陆军起义，一度攻占了东平；在福建、安徽，也出现“靖国军”、“讨倪军”，响应护法。短短几个月内，护法烽火遍及十几个省，形势十分有利。这时，如果参加护法的各种势力能够团结一致，在护法军政府统一领导下，协同作战，共同对敌，未尝不能发展大好形势，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但是，广东军政府的政治基础十分脆弱。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缺乏经济和军事实力，没有力量组织和领导全国的护法武装。而具有较大实力的两广军阀和云贵军阀，各自怀有自私的动机，不愿把自己的军队置于军政府领导之下。因此，护法战争名义上虽由军政府领导，实际上各省护法势力各自为战，始终未能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

不仅如此，随着护法战争的节节胜利，以陆荣廷、唐继尧为首的两大军阀势力与军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和表面化。尤其是桂系军阀，竟对军政府的活动进行百般限制与刁难。1917年8月，广东督军陈炳焜逼走倾向军政府的省长朱庆澜，并极力拉拢广东地方派军人，对军政府搞“釜底抽薪”；9月，又以提供军饷和煤炭为诱饵，拉拢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从组织上分裂军政府。11月，桂军统领沈鸿英借故杀害军政府任命的潮梅军第一支队司令金国治。11月21日，原广惠镇守使莫荣新继陈炳焜代理广东督军后，变本加厉地破坏护法军政府。莫先以不准私自招募民军为由，驱逐逮捕军政府派往各地的募兵委员，继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连的排长多人为“匪”，擅自逮捕枪杀，借以恫吓孙中山。孙中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3日晚率少数卫士登上军舰，指挥舰炮轰击观音山督军署，迫使莫荣新于次日亲至大元帅府“谢罪”。但是，桂系军阀对军政府的破坏活动并未因此而收敛。面对异常险恶的环境，孙中山愤激万分，但为了护法大业，仍忍辱负重，勉强支撑着岌岌可危的军政府。

孙中山：《致襄阳黎联军总司令等电》，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集，第46页。

桂系军阀与护法军政府的矛盾，直接反映到护法战争的湖南战场。自联军占领长沙后，其内部矛盾便开始尖锐起来，主要是湘军与桂军的矛盾，也有湘军内部的矛盾，严重影响着护法联军的协调统一，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更为严重的是，联军自占领岳阳后，“军纪之紊乱达于极点”。尤其是桂军，以功臣自居，纪律涣散，横行无忌，“掠夺杀伤之事件屡有所闻”。该军第一军总司令韦荣昌一进岳阳，即嫖妓酗酒，大施淫威，其所属官兵也群起效尤，无所不为。对此，不仅湖南人民侧目而视，而且湘军官兵也极为反感，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

二、北军第二次攻湘前双方的作战部署

（一）北军的作战方针及部署

北军在岳阳遭到惨败后，皖系军阀和主战派纷纷责骂李纯等主和督军“损失国家资格，玷污军人名誉”，积极策划罢免王（士珍）、李（纯），推倒“大树”（冯国璋）。冯国璋和“长江三督”在主战军阀的围攻下，处境十分困难，又鉴于岳阳失守，湖北危急，直系的地盘也受到威胁，于是纷纷“引咎自责”，倒向主战派。

1918年1月27日，冯国璋离京“出巡”济南、徐州、蚌埠等地，与皖系督军张怀芝、倪嗣冲等人会商时局，于29日返抵北京。31日，冯国璋下达对南军“局部讨伐令”，特命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著总司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痛予惩办”。2月2日，北京政府下令对湘桂粤联军进行作战，宣称“非将长沙完全克复，不能议和。”北军第二次攻湘的作战企图，是攻下岳阳、长沙，进而占领全湘。

2月中旬，各路北军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开进。

曹锟之第一路军分为两队：吴佩孚率第三师及三个混成旅，由襄阳乘船沿汉水南下，经武汉进至鄂南蒲圻待机，准备进攻岳阳；张敬尧率第七师另两个补充旅和安武军一部进至鄂南通城，准备进攻平江。此路兵力共约五万人左右。

张怀芝之第二路军分为左右两翼：施从滨率山东暂编第一师（欠第一

《民国日报》，1918年1月14日。

直到1918年1月底联军攻克岳阳后，谭浩明才派随军高等顾问李书城为湘鄂边防督办，令其组织湘西护法军援鄂，但此时荆沙靖国军已经失败，加上湘西的张学济与李书城不和，致使李书城无功而返。

元冲，字翼如，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1917年护法军政府成立，邵任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职。

旅)及张宗昌之江苏第六混成旅,出江西铜鼓进攻湖南浏阳;江西第十二师之张之杰第二十三旅和由攸县退守萍乡的李传业所属安武军二十营,经江西萍乡进攻湖南醴陵。此路兵力共约二万人。

冯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约六千人,从浦口溯江而上,拟经常德进攻湘西。

此外,又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率五艘军舰由水路开进,策应陆路进攻。加上随后入湘的奉军五个混成旅和李奎元之十一师,北军攻湘兵力共约十万人。

北军源源南下,气势逼人。护法联军见和谈无望,只好仓促分兵御敌。

(二) 护法联军的兵力及防御部署

护法联军占领岳阳后,各路军队进行了扩编,截止北军攻岳前,在长沙以北屯集的联军总数达二百五十余营,约合十个师八万余人。其中,粤桂军队除原有韦荣昌、林俊廷、陆裕光三个军和马济之粤军十八个营外,又新组建两师一旅,比刚入湘时增加六十余营;湘军也大力扩充,总数达一百五十余营(其中湘西军队六十营)。联军在数量上虽与北军相差无几,但武器装备不如北军,加之部队新成分大量增加,缺乏训练,纪律松弛,战斗力已大不如前。

护法联军在北军可能进攻的方向进行防御部署:平江、通城方向之防御由湘军刘建藩、李仲麟所部担任;浏阳至醴陵方向之防御由粤军马济部担任;常德至益阳方向之防御由桂军林俊廷部担任;岳阳至羊楼洞方向之防御由湘桂军主力部队担任。联军在岳阳至羊楼洞约五十公里的防区内,布设多道防御地带。第一防御地带从新店、滩头至赵李桥、羊楼洞以南,长约二十公里,由湘军第一师(欠第一团)和独立第三旅第五团防守;第二防御地带设在羊楼司(又称羊楼市,今羊楼司公社东)、廖平铺铁路两侧,由独立第三旅之第六团和桂军韦荣昌所部之一旅防守;第三防御地带设在临湘(今陆城)至桃林一线,由桂军贲克昭旅和湘军第一师之第一团防守;陆裕光所部一混成旅和程潜所部五营驻守岳阳。联军的防御配系,基本是以岳阳为中心,以武(昌)岳(阳)铁路为轴线,实施重点设防,以对付嘉鱼、蒲圻方

邵元冲:《广州护法日志》,《建国月刊》第十二卷,第六期,第9页。

1917年10月23日,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在段政府唆使下,宣告与广东自主政府脱离关系,并派兵攻打惠州。孙中山以军政府名义任命邹鲁为潮梅军总司令,金国治为第一支队司令兼前敌总司令,领兵讨莫。11月29日,沈鸿英以金国治破坏作战计划为由,将其诱捕杀害。

谭浩明于1917年11月进驻长沙后,宣布以湘桂粤军总司令名义兼管湖南军政事宜。称霸湖南,引起湘军将领的不满。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当即致电谭浩明,指出此举“尤碍官制之通行”,请“立予废止”。湘、桂军矛盾由此而生。

向之敌的进攻；平江、醴陵方向的防御兵力则比较薄弱。

三、岳阳攻防战

1918年2月5日，冯国璋任命吴佩孚署理陆军第三师师长，令其率所部向蒲圻、嘉鱼一带开进。2月23日，吴佩孚率先头部队抵达蒲圻。在此之前，张敬尧率第七师等部已进抵通城。第二路张怀芝部因被在武穴顿兵主和的冯玉祥旅所牵制，滞留九江，未能按期进入湘东待机地域。

吴佩孚对这次攻湘作战最为卖力。他刚任师长，踌躇满志，急于想利用这次作战树立声威，发展个人权势。因此，他不待所部全部进入待机地域（第二、第三混成旅还在开进途中），便迫不及待于2月28日发动了进攻。

吴佩孚将进攻部队分为三路：以王承斌之第一混成旅出嘉鱼，经太平口、鼓花洲（今谷花洲）沿江岸进攻联军翼侧；以第三师第六旅（欠步兵第十一团两个连）和曹瑛之第四混成旅进占羊楼洞，牵制羊楼司方面之联军；吴佩孚亲自指挥暂编第五混成旅（由第三师第五旅及炮团、工兵营等组成）、骑兵第三团（易骑为步）和第十一团两个混成连，组成突击部队，向联军防守薄弱的新店镇、滩头（今坦渡）方向进攻，拟从中路突破联军防线，尔后与左路部队钳击羊楼司之联军。2月28日晨，北军发起进攻，于当日击败了守卫新店、滩头的湘军第一师之第二旅，向纵深推进。联军急以湘军第一师之第二团和独

立第三旅之第五团，进入滩头以西之万峰山阵地阻击敌人。3月2日，北军再次突破湘军阵地，攻占万峰山。至此，联军的第一防御地带被敌攻破，羊楼司暴露在敌人面前。这时，岳阳地区雨雪交加，山险路滑，给北军的进攻造成了困难。吴佩孚决定息战数日，等待天气好转，同时电令后续部队赶紧向战地集中。

羊楼司位于万峰山与大药姑山之间，周围山势陡峭，铁路横穿狭谷，是由武昌入岳阳的咽喉要道。联军原将湘军第三旅之第六团、桂军韦荣昌所部一旅，部署于羊楼司至廖平铺铁路两侧的高岭上，控扼险要，林修梅、韦荣昌亲至羊楼司指挥。新店、滩头失守后，赵恒惕部也退守羊楼司。联军以羊楼司为中心，在南起港口，北至黄盖湖一线，构筑了由堑壕、石垒和铁丝网组成的四道防御阵地，准备坚守；同时，派出敢死队，深入太平口、新店一带，袭敌后路。

湘军在占领长沙后，派系斗争日益尖锐。1918年1月9日，陈嘉佑之第三旅发生兵变，变兵攻击旅部。湘军总司令程潜认为陈嘉佑“甘心为乱”、“心怀异志”，遂派赵恒惕率兵前往镇压，陈嘉佑潜逃。

3月5日左右，吴佩孚所部后续部队相继抵达战地。吴便令曹瑛之第四混成旅由太平口沿江西进，增援第一混成旅。3月10日，吴亲率第二、三、五混成旅和湖北第三混成旅，左起朱楼坡（羊楼洞南）右至黄盖湖，对联军第二防御地带发动进攻。吴部沿山梁推进，攻势猛烈。联军虽依托阵地顽强抗击，仍抵挡不住北军的冲击，当天即有三道阵地被敌突破。11日上午9时，最后一道阵地也落入敌手，联军只得放弃羊楼司，向岳阳方向后撤。这次战斗，北军死伤三百余人，南军伤亡更为惨重。

北军攻占羊楼司后，便于3月11日上午以第三混成旅为第一追击队，经长安驿（今临湘）向新墙方向追击，抄袭联军后路；以第二混成旅为第二追击队，由平水铺经长安驿、路口铺向云溪推进，尔后窥取岳阳；吴佩孚亲率第三师第六旅，于12日向新墙方向续进，企图切断联军退路。

云溪是通往岳阳的最后一个要地，由桂军陆裕光部一混成旅和湘军第一师第一团防守。3月13日，北军阎相文之第二混成旅开始沿铁路向云溪进攻。云溪守军竭力抵抗，阎旅进攻受阻。这时，从北面的临湘（今陆城）和东面的通城方向向云溪撤退的联军，乘机从侧后袭击阎旅，毙伤其官兵四百余名。吴佩孚急令第五混成旅和张敬尧师之补充旅驰援阎旅。北军四个旅并力合击，终于在15日下午攻占云溪。

北军攻占云溪后，立即对岳阳城发起总攻。其进攻部署是：以第一混成旅之第一团为右纵队，沿江岸进击；该旅之第二团和第四旅之第八团（欠第二营）为左纵队，从云溪向岳阳正面进攻；湖北第三混成旅之第五团进驻对岸之白螺，防联军退往江北；海军第二舰队派“楚观”号等四舰沿江梭巡，配合陆军进攻。3月16日上午总攻开始。右路第一混成旅第一团在舰炮配合下，一举攻占要隘城陵矶，其少数先头部队乘胜突入岳阳城内。后见联军溃兵纷纷退入城内，恐被城外北军误攻，又退至城外。17日，各路北军会攻岳阳。这时，联军前线总司令程潜分析战场形势后认为：“一、二两路的敌军兵力皆比我雄厚，……如果我军与曹张部队在羊楼司和平江作胶着战，不能迅速解决，让张怀芝率部长驱进入湘东，我军势必腹背受敌，全军成俘”。据此，他电令前线部队：“如不能进取，可退后暂将岳阳让出，再行相机进击”。于是，守城联军于17日夜弃城退守新墙。18日上午，北军进占岳阳。

3月21日，联军在新墙遭到北军第二、第三混成旅的夹击，稍事抵抗即向长沙败退。

在守卫岳阳的战斗中，联军防御部队约有三师之众，又有便于防守的地形和事先构筑的工事，本可以打个漂亮的防御战，但结果却完全相反。联军作战之所以失利，主要由于湘桂军将领间矛盾重重，相互掣肘；其次是兵力

上海《申报》，1918年2月1日。

参见《刘建藩君之战事谈》（《民国日报》1917年12月6日）和《湘粤桂联军之大扩张》（《民国日报》1918年3月27日）。

分散，消极防堵；第三是装备落后，士气不振，骤遇北军新锐，便难于招架。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在这次作战中，他指挥部队对联军的阵地实行猛打猛冲，对联军的据点实行分路夹击，战术运用比较得当，致使联军陷于被动，连连败退。联军在岳阳的失败，使湘省护法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也给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扬名的机会。

四、平江阻击战

平江是北军攻湘作战的辅助方向。在吴佩孚部向羊楼司发动进攻的同时，由张敬尧指挥的北军约二万人也开始向平江发起进攻。

平江地处幕阜山脉南麓，山峦起伏，地势复杂，北与湖北通城相通，是长沙东北方的重要屏障。护法联军在平江方向担任防御的部队，有湘军刘建藩部十八个营、谢国光部六个营、罗列开部八个营、李仲麟部五个营，共计四十余营约一万五千人。护法军在通城至平江之间设置三道防线：由詹家桥、梧桐山经九岭至白米山为第一道，由大洲、倒流滩经张元岭、梅仙市到桃花洞为第二道，由新市经平江至浏阳为第三道。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配置，因险设防。

3月上旬，张敬尧所部第七师和李奎元之第十一师、陈德修之安武军各一部，在通城一带集结完毕。11日，北军分兵多路向平江进犯：以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田树勋为中央纵队司令，率四个团由三埠桥经上塔寺、五里牌、梧桐山、梅仙市向平江进攻；以第十三旅旅长吴新田为右纵队司令，率两个团由詹家桥经长乐街向平江进攻；以第四十二混成旅旅长张敬汤为左纵队司令，率三个团经天岳关、虹桥市向平江进攻；以安武军陈德修所部五营为预备队。

北军发起进攻后，两翼进展较为顺利。3月11日，右纵队击退了防守花凉亭的两营湘军，推进到古米山、金家坳一线。中央纵队进占阿婆岭、梧桐山；其第一团进至潭下时，遭到联军英勇阻击，14日拂晓，在一营安武军支援下，始将当面联军击退。左纵队于11日进占麦市，次日攻占盘石铺，直插天岳关。至此，湘军第一道防线全被突破。

天岳关是平江北面的重要屏障，“悬崖绝壁，高耸群山，鸟道羊肠，艰危万状”。护法军占据山顶，严密防守。3月14日拂晓，张敬汤部在炮兵掩护下，分两路强攻天岳关。护法军居高临下，猛烈射击，连续粉碎敌人三次进攻，毙伤敌营长以下官兵五百余名。16日，北军派第十一师之四十四团由杨芳林市进攻龙门关，得手后抄袭天岳关之侧后，同时派预备队一营由绝

参见《湘粤桂联军之大扩张》。按当时编制，湘桂军每师二十余营，每营三百至四百人。

参见《刘建藩君之战事谈》（《民国日报》1917年12月6日）和《湘粤桂联军之大扩张》（《民国日报》1918年3月27日）。

壁攀藤附葛而上，与守军展开白刃格斗。护法军两面受敌，遂放弃天岳关退守梅仙市。

3月18日，北军继续进攻，相继占领了大洲、倒流滩、张元岭、桃花洞等要地。21日，田树勋之中央纵队进逼平江以北十六公里之梅仙市。该处奇峰突起，形势险要，护法军有六千余人扼险据守。北军连续发动进攻，激战两日，仍无进展。张敬尧急令陈德修率安武军由月田赴援，田树勋亦令所部第二十七团迂回至梅仙市西南，袭击护法军侧背，正面部队趁机猛烈进攻。护法军腹背受敌，向平江撤退。

张敬尧不让护法军有喘息机会，除令正面主力部队冒雨追击外，又令左纵队司令张敬汤率一个团连夜向平江侧后穿插，抄袭护法军后路。3月22日拂晓，穿插部队进抵三阳市，抢占附近高地，猛烈袭击护法军侧背。护法军后防空虚，又见岳阳已经失守，遂无心再战，放弃平江南撤。22日上午，平江为北军占领。

在北军疯狂向岳阳和平江进攻时，驻长沙的湘桂粤军“联帅”谭浩明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在岳阳被占之日，谭曾发布安民告示，声称“岳阳小挫，兵事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但到了25日，这位“自有主张”的三省“联帅”竟惊慌失措，率所属桂军慌乱地撤离长沙。

桂军撤走后，长沙成为不设防的城市。3月26日晚，吴佩孚第三师不费一枪一弹开进长沙，张敬尧部也随后赶到。这时，冯国璋已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于3月27日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同时电令吴佩孚立即率部向湘南进军。

护法联军平江之败，除兵力对比居于劣势外，同样由于分散设防，单纯防御的结果。加上所守据点又忽视保障侧后的安全，以致险要之地屡遭北军迂回夹击而被迫撤守。

五、湘东反击战

1918年4月初，段祺瑞政府见湖南战事发展顺利，而琼州的龙济光和福建的李厚基都已出兵攻粤，在此形势下，确定了北军下一步总的作战方针：“定湘、援龙同时并举”，“虚攻衡宝，以掣敌势。一面阳出郴州援粤，阴由闽急攻潮惠，奇兵制胜”。根据以上方针，除令浙江派一师赴闽，江西编一混成旅趋大庾岭，以牵制粤军，“遥增龙军之气”外，令在湘的北军分三路向南推进。以吴佩孚之第三师及一、二、三、四、五混成旅为中路，出长沙经湘潭向衡山、衡阳进攻；以张敬尧之第七师及补充旅、混成旅为右路，由长沙经湘乡、永丰攻宝庆；原第二路军之施从滨第一师、张宗昌第六混成

1918年2月14日，奉命攻湘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在湖北武穴通电主和，要求南北罢兵休战。程潜：《回忆护法战争》（未刊稿）。

旅、张之杰第二十三旅及李传业安武军十五营为左路，经醴陵南下，攻攸县、茶陵；另调奉军两旅驻守长沙。北军企图于旬日之内占领全湘，然后直趋粤省。

联军自弃守岳阳、长沙后，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决定：湘桂粤联军全部退驻衡山、永州一线，“暂取守势”；商请川、滇、黔靖国军立即出川东下，进取鄂西，以分敌势；桂粤两省集中全力进行讨龙作战，以肃清后方隐患。这时，潭浩明已率桂军退到祁阳、宝庆地区，把湘军甩在湘潭、衡山一带。

湘军退守衡山等地后，程潜、赵恒惕、刘建藩、林修梅、林祖涵等举行紧急会议，决定依靠湘军自己的力量，对敌组织顽强抵抗，确保湘南。他们分析认为，在南犯的三路北军中，中、右两路是主力，唯左路张怀芝所部系由四省军队凑合而成，指挥关系紊乱，战斗力较弱，如将该路敌军击破，则其余两路必不敢轻进。于是决定以赵恒惕为湘东前线总指挥，刘建藩为总参谋，集中退到衡山一带的湘军一万一千余人，并联络退守安仁的马济所属粤军和李书城之援鄂军，共约二万人，对北军左路军实施反击。程潜、林修梅、吴剑学等率四千人扼守衡阳，阻击从正面进攻之敌。

北军左路军进展迟缓，在吴佩孚、张敬尧部进占长沙后，才由赣西进入湘东。该军企图由醴陵南下，沿湘东大道进取攸县，然后直薄粤省。4月15日，其先头部队施从滨师占攸县，不久，李传业之安武军和张之杰的赣军一旅也进抵攸县，分别驻于攸县城外之马鞍山、桑田、小集、朱亭等地。20日，施从滨师第一、第二旅由攸县分别经马子坡、桑田继续南进，企图进据安仁，进而攻取永兴、郴县，尽快实现直指广东的作战计划。

根据敌军上述行动，赵恒惕等率部于4月20日由萱洲渡湘江，秘密进入霞流市、吴集和青山冲地域，待机歼敌。湘军拟由五个方向对正在行进中之施从滨师发起突然攻击：驻安仁之

马济率粤军自渌田经桑田出和尚坳、五里牌，攻攸县之南；刘建藩所部由草市、杨林出马鞍山，经马子坡、皂角市攻攸县之西；赵恒惕所部部分成两路，一路出黄泥塘以配合刘建藩部出击，一路由毛陈桥攻敌之侧背；李仲麟部攻小集；李书城部为总预备队。

4月21日，刘建藩率部首先深入到攸县与桑田之间的皂角市，与粤军一道，完成对施从滨师部队的合围。双方激战两昼夜，施师损失大半，余部向茶陵逃窜。

4月23日，驻攸县之北军一部，向刘建藩部侧后迂回，适与赵恒惕师出毛陈桥之部相遇，遭到迎头痛击，缩回攸县。下午，湘军合力向攸县城发起总攻，守敌不支，分向醴陵、茶陵方向逃窜，湘军一举攻克攸县。这一仗，共毙敌千余名，俘敌数百名，夺获飞机两架。湘军也伤亡数百人。

4月24日，湘粤军分数路追击敌人。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沿新市、黄土岭（今皇图岭）大道向醴陵攻进；第一师第一旅由新市出贺家桥，作为

策应；马济粤军一部守攸县，一部进击茶陵；李仲麟部攻克小集后，即会合李书城部反击朱亭之敌，尔后向涑口推进。

北军为掩护部队后撤，以一部兵力扼守要地黄土岭。4月25日，湘粤军与扼守黄土岭之敌展开激战。赵恒惕命刘建藩部攻敌左翼，湘军第一师第二旅和马济粤军一部攻敌右翼。同时，逼近醴陵的第一师第一旅也举旗南下，回击黄土岭。27日，湘粤军发起总攻，据守黄土岭之张宗昌第六旅及李传业安武军拼死抵抗。赵恒惕亲临督战，指挥湘军从正面连续突击。北军终于不支，遂放弃黄土岭，分别逃向萍乡、浏阳和株洲。湘军乘势猛追，连克醴陵、株洲，前锋距长沙省城仅数十里。经此一战，北军左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施从滨师仅剩七百余人，张宗昌混成旅仅剩两营，李传业安武军也死伤过半，损失枪炮弹药不计其数。张怀芝只身逃回汉口，向攻湘军总司令曹锟诉说因张敬尧不出兵救援，致遭失败，为自己开脱。

湘军反击获胜后，准备从株洲渡河抢攻白石港。刘建藩在渡河时不慎落水身亡。张敬尧闻左翼兵败，一面急调进攻宝庆之田树勋旅退保长沙，一面令正在宁乡“清乡”的李奎元第十一师和奉军一部前往株洲阻击湘军。同时，令已于4月21日攻占衡阳的吴佩孚部向江东卷击，威胁湘东护法军之后路。这时，湘军因遽失勇将，又有腹背受敌之虞，赵恒惕遂下令放弃株洲、醴陵，留李仲麟部在茶陵担任警戒，主力撤往酃县和永兴。北军乘势逼进，田树勋旅再次攻陷宝庆，吴佩孚部连陷安仁、攸县及耒阳。至此，湖南大部又为北军所占。护法联军全部退守湘桂边界地区。

湘东反击战是护法战争中一次最出色的作战。湘军将领在岳阳失守，桂军南撤，北军气势逼人的情况下，不畏强敌，决心联合粤军，坚持实行反击作战，并能冷静地分析敌情，决定集中兵力，打敌比较薄弱之一路，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此外，在战法上，汲取了前次作战失利的教训，由单纯防御改为主动进攻，在统一指挥下，对正在运动之敌实施多路突击，攻其不备，出奇制胜。首战获捷后，又乘胜追击，不给敌人以喘息时机，从而取得了歼敌万人的重大胜利，其战斗精神和指挥艺术都是值得肯定的。

六、湘西争夺战

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后，湘西辰沅道尹张学济派人赴广州谒见孙中山，表示愿意响应护法。孙中山遂任命张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1917年10月下旬，张学济和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镇守副使兼第五守备区司令周则范、第二师第三旅旅长陈嘉佑，在沅陵、洪江、常德等地相继宣布独立。张学济推旧友胡瑛为护法军湘西招抚使，永绥镇总兵谢重光为护法军副总司令。湘西护法军共有一万一千余人。

《北军克复岳州始末记》，《晨钟报》1918年3月26日。

张学济响应护法后，率本部东进桃源。不久，应湖北石星川吁请，率部援鄂，旋随荆沙靖国军退往鄂西。

1918年3月，护法联军在岳阳战败，大军南撤，湘西护法军便受到严重威胁。这时，据守常德一线的湘西护法军有田应诏、胡瑛所部共六千余人，周则范部约三千余人。北洋政府令原第十七师师长陈复初，在湖北长阳招抚旧部，恢复该师建制，然后会合原湖南第四守备区司令王正雅所部，进攻湘西。4月2日，陈复初率十三个营约六千余人由沙市出发，经渔洋关进窥湘西。

湘西护法军急电唐继尧、刘显世，请求滇、黔军赴湘救援。唐、刘以湘西系滇、黔门户，不能见危不救，遂派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卢焘和游击司令王华裔分别率部开赴辰州（今沅陵）、洪江，支援湘西护法军。

4月23日，北军陈复初与王正雅率部从临澧出发，经朱日桥进攻常德；并电请张敬尧令李奎元第十一师分由益阳、宁乡进逼汉寿，“俾壮声援”，请吴光新旅一部进驻公安及津市、澧县一带，相机策应。

4月25日晨，北军陈、王部在八里铺与湘西护法军接战，田应诏、周则范率部且战且退，扼守鳌山。下午3时，北军夹击鳌山，护法军不支，弃鳌山后撤。

田、周两军在鳌山失利后，拟与北军妥协，电邀张敬尧派人到常德谈判，表示护法军移驻桃源，将常德让给北军。这时，已进至麻阳、辰州一带的援湘黔军闻田、周有妥协撤退之意，急在辰龙关至兴隆街一线展开，准备防堵，并警告田、周，如“遇有后撤者，必将迎头痛击”。田、周只好继续对北军作战。

5月4日，田、周派人持函赴陈师司令部，诡称护法军将按前约移驻桃源，欢迎陈复初军入驻常德。陈见函不疑，率军入常德城。及至城内，突然伏兵四起，田、周则率部从外面包围该城，实行内外夹攻。北军突遭攻击，军心大乱。陈复初率部左冲右杀，夺路而逃，后只身逃往长沙。陈部朱泽黄旅退保津市。田、周联合林德轩、胡瑛等部，乘胜追击，于6日克复临澧。5月15日，田、周致电冯国璋，要求“休兵息战”，划地自守。此时，抵达津市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也致函田、周，希望湘西各军停止进攻，让出常德、桃源，作为南北两军缓冲之地。湘西军队已无心再战，同意与冯妥协。5月下旬，田、周率部撤出临澧、常德。冯玉祥旅进入常、澧后，也不再向南进攻。李奎元十一师则于6月中旬乘机占领了益阳、汉寿。

北军在第二次攻湘作战中，共投入兵力约十万人，并起用吴佩孚为主战

该旅由北洋第十一师之第四十二混成团和第七师之第五团合编而成。

《张敬尧通报战况电》，《民国日报》1918年3月28日。

《湖南省志》第一卷，第370页。

场指挥，取得了明显战果。尽管北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终于占领了湘省大部地区，基本上实现了预定计划。

护法联军之所以遭到失败，一是由于战前顿兵乞和，内部矛盾加剧，部队士气下降；二是缺乏战略协同，先是不与湖北靖国军配合作战，后又不与湘西护法军密切协同；三是在岳阳、平江防御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后来虽然取得了湘东反击战和湘西伏击战的局部胜利，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颓势，不得不退守湘桂边界地区。幸好北军主将吴佩孚在攻占衡阳后，以部队久战力疲为借口，顿兵不前，并于5月25日起在耒阳与湘军师长赵恒惕秘密谈判，约定从6月15日起，双方于宝庆至茶陵一线停止交火，才使护法联军有了喘息的机会。

吴佩孚的自动停战，虽然打乱了段祺瑞的进攻部署，加剧了直皖军阀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加速了桂系军阀与北洋直系军阀的勾结，因而不仅没有给孙中山的护法事业造成有利条件，反而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徐树铮电稿》，第99—100页。

张学济、谢重光部共有巡防营队四千余人，田应诏部有镇 军、屯垦军共四千余人，周则范部有原守备队二千人，又收编水警队和地方团队一千余人。

第五节 滇黔靖国军攻川之战 (1917年7月—1918年3月)

一、战前滇、黔军与川军的矛盾

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8月，蔡离川去日本治病，由罗佩金代理督军，戴戡代理省长。当时，驻川军队共约八个师，其中川军五个师，滇军两个师，黔军一个旅。罗佩金利用北京政府下令裁军的机会，将滇、黔军改编为“国军”，川军则仍为地方军，并缩编为三师一旅，废除特种兵。此举引起了四川军政各界的严重不满，滇川矛盾随之迅速激化。

1917年4月，罗佩金将川军第四师遣散，令第五师缩编为旅，第一、第二师裁减兵额，并拟以滇军将领刘云峰接替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刘存厚参加过护国战争，在川军中有一定影响。他对罗佩金缩编川军，排除异己，心怀不满，于4月17日秘密召集所部军官会议，决定联络川军第一、三、五师，实行武力驱罗。

4月18日，刘存厚部突然袭击押运第四师枪械回成都的滇军。双方在成都城内持续战斗了七八天，最后达成妥协，确定川、滇军均撤出成都，刘存厚免职，罗佩金辞职，由戴戡暂兼四川督军。成都由黔军填防。

双方撤兵后，刘存厚仍留一部兵力驻守成都西、北两门。戴戡到成都后，多次催促川军留城部队撤走，刘存厚执意不从。戴与罗佩金密谋以武力驱逐成都川军，进而解决刘师全部。7月1日，张勋在京复辟，授刘存厚以“四川巡抚”伪职。戴戡认为时机已到，便于7月5日以“讨逆”为名，命城内黔军攻击西、北两门的刘军。刘军里应外合，夹击城内黔军。黔军战败，弃城退走，行至仁寿县时，又遭川军截击，戴戡被击毙（一说自杀），黔军余部溃散。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川军与滇黔军之间的矛盾。

二、云南靖国军的兴起

当刘、罗、戴军阀在四川混战之际，全国各派政治力量正围绕着要不要坚持《临时约法》问题展开新的尖锐斗争。此时的云南督军唐继尧，由于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关系，还多少保留一些维护约法、拥护共和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反对北洋军阀破坏约法、解散国会，指斥北洋军阀“以宪法不良为借口，以暴民专制为号召，实则不嫌于民党，不甘于共和，时思破坏，以复

该部朱泽黄旅在1917年10月“衡宝之战”中遭到失败，退到宁乡时，被张学济收编，随张部援鄂，进驻湖北长阳，旋又脱离张学济投奔陈复初。

杨思义：《护法时期的湘西动向》，《湖南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23页。

其北派把持顽固之旧，民国之危，有如累卵”。唐继尧决定联合滇黔川军，对段祺瑞组织的督军团实行武力“干涉”。为了全力对付北洋军阀，唐继尧对于川省混战，最初采取调解态度，多次致电刘、罗、戴等人，要求他们“尽释前嫌，共同携手，以维大局”。

1917年6月上旬，唐继尧积极进行“北伐”准备，对滇军实行战时扩编。旬日之间，即将驻滇的三个师、一个警卫军扩充为五个梯团（每梯团相当于一个混成旅），共约二万余人。6月12日，唐继尧致电孙洪伊（后任护法军政府内务部长），告其滇省“已下动员令，克日开拔”。同时，致电叙州（今宜宾市）罗佩金，要求驻川将领“严守纪律”，注意“联络川滇感情，共维大计”。

当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云南，并闻刘存厚“甘受伪职，叛攻成都”，唐继尧感到“义愤填膺，匡扶有责”，立即打起“讨伐复辟叛逆”的旗号，声明将滇军改称为靖国军，准备“躬率三军”，借道川境，讨伐张勋。其实，讨伐张勋是假，借机入川是真。这从唐继尧对李曰垓一封电报的批复中可以得到印证。7月3日，原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垓，从广东致电唐继尧，指出：北方政局混乱，派系纷歧，陆荣廷正在“巩固两粤”，“先谋自固”，全国“已渐呈割据之势”，因此，滇军应先发制人，进占四川。李还提出“由镡（罗佩金）与川军开衅，即借口进兵，占领成都”，这是取川的“第一策”。唐继尧批复道：“刘已叛，当然取第一策”。表明了以“讨逆”为名攻占四川的用心。7月16日，唐继尧以护法讨逆的名义通电讨伐刘存厚，川滇之战全面爆发。

由于唐继尧响应护法是为了借机扩张地盘，发展个人势力，因而在以后的战争中，实际上既不奉行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也不服从军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照顾护法战争的全局利益，却与桂系军阀沆瀣一气，阻碍护法战争的顺利发展。

三、双方的兵力编成及部署

冯旅行至湖北武穴时，即顿兵不进，于2月14日通电主和，要求南北罢兵休战。由于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冯玉祥不得已于3月23日通电照常供职，继续率兵开向常德，5月中旬抵津市。

此次作战，北军官兵死者三千三百九十一人，伤者数以万计，其中吴佩孚所部死者一千零八十九人，伤者数千。参见《丁巳湘役阵亡将士追悼录》（附录），第3页。

吴佩孚在攻湘作战中出力最大，却未能当上湖南督军，因而愤愤不平，不愿再为皖系军阀卖命。吴宣布停战后，攻湘总司令曹錕也于5月29日以“养病”为名，离开汉口返回天津。

第一师师长周道刚，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第三师师长钟体道，第四师师长陈泽霖，第五师师长熊克武。滇军第六师师长顾品珍，第七师师长赵又新，黔军旅长熊其勋。

作战动员令下达后，唐继尧即将滇省的五个梯团改编为六个混成旅，两旅为一军；并令顾品珍、赵又新立即在川省招兵买马，将所部两师扩编为两军。其编制序列如下：顾品珍为靖国军第一军军长，赵又新为第二军军长，罗佩金为总司令；庾恩暘为第三军军长，黄毓成为第四军军长（以上两军由唐继尧直接指挥）；驻粤两师扩编为第五、第六两军，张开儒、方声涛为军长，拟以叶荃为总司令。与此同时，黔督刘显世也令师长王文华率黔军两个旅入川协同作战，并推唐继尧为滇黔联军总司令。滇黔军入川兵力约五万人。唐继尧的对川作战计划是：顾、赵两军扼守川南资中、内江和叙州、泸州诸要点，牵制当面川军；由滇入川之第三、四军和黔军伺机夺取重庆，然后进攻成都，或分兵东下，攻取武汉。

“刘罗、刘戴之战”后，川军分为三股势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明守中立，实助刘存厚；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亦称中立，但倾向滇黔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和许多绿林武装，公开站在刘存厚一方。刘存厚在原第二师两个步兵旅和骑兵、炮兵团基础上，招收了被遣散的原第四师士兵，新组建三个混成旅和一个独立旅，总兵力约二万人，加上钟体道之第三师，共约三万余人。在“刘戴之战”后，第二师沿岷江向南推进，占领岷江下游各要点，其前锋距叙州仅三十华里；第三师进据金堂、乐至、潼南、遂宁各要地，控制沱江至涪江之间广大地域，其前锋与防守资中之滇军对峙。

四、川南争夺战

（一）战前态势及双方作战企图

戴戡死后，冯国璋特任四川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督军。这时，北洋政府表面上要周道刚调解滇、黔、川军间的冲突，实际上企图利用四川的混乱局面，扩充亲北洋的势力，把滇黔势力排挤出川。1917年8月6日，北洋政府任命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带领两个旅入川“查办”滇黔川军冲突。不久，又命陕南镇守使管金聚率一混成旅入川，支援川军作战。

在北洋政府的怂恿下，刘存厚等有恃无恐，决心继续对滇军作战，达到将滇黔军赶出川省的目的。其作战方针是：先打滇军，后攻黔军，三路出兵，分进合击。具体计划是：第一师由东向西、第三师由北向南，夹击据守资中、内江一带之滇军，尔后第二师攻叙州，第三师攻富顺，第一师攻合江，得手后三路对进，会攻泸州。

8月下旬，第三师之张鹏舞、李挽澜两旅，由安岳向资中推进，第一师

唐继尧：《致成都刘师长等释戈御侮电》，《会泽靖国文牍》第一卷，第4页。

唐继尧：《致成都戴督军刘师长等电》，《会泽靖国文牍》第一卷，第6页。

第一梯团长马3，第二梯团长邓泰中，第三梯团长李友勋，第四梯团长杨体震，第五梯团长赵式铭。

刘湘旅进占隆昌。代督军周道刚乘机劝说滇军顾品珍部让出资中，退往叙州以南。顾因所部防区孤立突出，如固守资中，有被川军包围吃掉的危险，遂答应周的要求，于9月6日撤离资中、内江，退守自流井（今自贡市）。第三师乘机进据资中、内江。

在此前后，云南靖国军五个混成旅，分别抵达叙州和泸州。9月22日，第四军军长黄毓成也进抵泸州。此外，黔军师长王文华也率所部进抵綦江，准备配合滇军作战。10月4日，唐继尧由昆明启程赴贵州毕节，亲自指挥对川作战。

但是，这时四川战场的形势对滇军十分不利。其一，川民视滇军为侵略军，实行坚壁清野，骚扰袭击，配合川军打击滇军，使滇军四面受敌；其二，滇军曝师他省，军心不齐，官兵思归，斗志衰退；其三，滇省连年用兵，弹药匮乏，粮饷不济。面对这种情况，滇军将领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滇军应“克日进取，速攻渝城（重庆）”；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暂谋收束，审机观变”。唐继尧坚决反对收束，他认为：“（1）我军若不进取，则北军集中重庆后，联合川军协以谋我，使我措手不及，进退均极困难……；（2）我军内容不整，若不冒险进取，愈缓愈馁，必至不战而溃……；（3）两广正在进行，陆（荣廷）且极力援湘，龙（济光）亦积极筹备，我军若不进取，他方进行，必受影响”。因而坚决主张滇军“冒险进取”，“速取渝城”，以先声夺人，争取主动，改变滇军的不利态势。据此，命黄毓成军之李友勋旅和顾品珍军之何海清旅，分出合江、永川，向江津潜进，配合黔军王文华师会攻重庆。

刘存厚尽管已经识破滇、黔军的战略意图，但认为江津、永川有周道刚之第一师，重庆有熊克武之第五师驻守，而且北洋军吴光新部已经入川，重庆必无大虑，决定乘虚进攻叙、泸，先收复川南要地，尔后再回攻窥渝之滇军。

从双方作战方针看，川军重前轻后，潜伏着危机，只有在既能攻取叙泸，又能迅速抽兵回顾重庆的情况下，才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滇军分兵作战，要想争取主动，固然叙泸之战关系甚大，但攻渝之战关系更大。如能攻克渝城，既可切断北军援川之主要通道，又可置川军于腹背受敌之困境，出现全盘皆活的有利态势。而滇黔军能否顺利克渝的关键，在于守渝之川军第五师的态度。于是，唐继尧加紧联络熊克武，促其响应护法，配合滇黔军作战。

（二）内江、荣县之战

唐继尧：《复叙府罗将军激励将士严守纪律电》，《会泽靖国文牍》第一卷，第16页。

《李曰垓致唐继尧密电（1917年7月3日）》，云南档案馆藏。

10月10日，滇军缴获川军10月9日的一份作战命令，得悉川军将于一周内实施攻取荣县、自流井、威远，并相机进攻綦江的作战。为了先发制人，滇军决定提前发动进攻。10月12日，顾品珍令金汉鼎率三个团夺回内江。金旅于当晚出发，隐蔽开进，13日与川军在白马庙接战。次日攻克白马庙，直趋内江城。激战两日，守城的川军张鹏舞旅弃城逃走。滇军于15日占领内江。当晚，川军第三师李挽澜旅偷渡沱江，占领内江城郊白塔寺高地，向城内发炮轰击，掩护步兵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滇军损失较大。后金汉鼎组织敢死队攻下了白塔寺，李旅被迫退走，内江防御始趋稳固。

由于滇军进攻内江，四川代理督军周道刚公开放弃“中立”立场，通电声讨滇军。10月22日，川军第一、二、三师约四万余人，对滇军发动全面进攻。其部署是：第一师之第一旅（加强第二旅一个团）由永川直攻泸州；第二师与陈洪范、刘成勋两混成旅及赖心辉等四个支队进攻荣县；汪可权、舒荣衢两旅进攻威远，尔后向叙州发展；第三师反攻内江，另以龙光独立旅进攻自流井，得手后与一师夹击泸州。23日，第三师顺利攻下内江，滇军金汉鼎旅分路撤往自流井和泸州。10月26日，川军第一师经永川攻占北雅镇，尔后进逼泸州。中路第二师之第三旅于25日攻占威远后，以主力配合第三师进攻自流井，以一部兜击荣县。防守荣县的滇军第一军田钟谷旅奋力抗击，毙伤川军千余名。后因川军抄袭后路，遂于31日放弃荣县，退往叙州。川军第二师各旅乘势追击，兵临叙州。

（三）泸州、叙州之战

泸州驻有滇军赵又新、黄毓成两个军部及所属两个旅。但是，赵、黄两军不相统属，各自为战；其中一个旅又多新兵，无作战经验。因此，滇军在泸州的防御薄弱，除防守城区外，城郊各要点未置一兵。11月10日，周道刚委徐孝刚为川军第一师总指挥官，指挥该师从泰安场进攻泸州；另有第三师分别由富顺、荣昌向泸州进攻。16日，川军第一、三师对泸州发动总攻，迅速控制了五峰顶、小市诸要点。在川军攻势面前，滇军各级官长“各为顾货财、保妻子之计，不知勇猛督率所部，生死与争”，以致素称“铁打泸州”的坚城，于21日轻易失守。滇军经蓝田坝、纳溪向南溃退，拥挤践踏，互不相顾，沿途又遭棒匪袭击，“死伤相继，尸血载道”，部队损失过半。川军渡江追击，于11月23日攻占纳溪。

在川军第一、三师攻占泸州两日后，第二师也对叙州发动了总攻。滇军

由邓泰中、马3、李友勋、杨、赵式铭、杨体震分任旅长。

后叶荃入川，改任第八军军长。另任川边屯垦使张煦为第七军军长，赵钟奇为第九军军长。

据《李曰垓致李烈钧电》称：“此次滇军入川，数约六十营，加黔军十营”。连同原驻川滇军两军，共约五万人。

守叙总司令为赵钟奇，下辖马3、赵式铭两旅，分别防守宗场、炊锅山、白沙场、真武山、翠屏山等高地。11月23日上午，川军第二师以三旅之众，并联络棒匪数千，分别从白沙场、宗场两个方向对叙州发动进攻。防守宗场之滇军一个团初抵战地，不熟地形，在敌两路夹击下放弃阵地，撤往吊黄楼。防守白沙场、象鼻场之滇军闻宗场失守，因翼侧暴露，亦弃守后退。吊黄楼系叙州北面之咽喉要地，滇军竭力据守。川军见吊黄楼难于攻取，遂一面在此佯攻，牵制滇军，一面派兵由上游渡过岷江，从翼侧攻击翠屏山，同时派遣便衣队潜入城内，袭击滇军司令部。防守吊黄楼之滇军见敌人兜击侧后，军心摇动，纷纷放弃阵地，向叙城撤退。赵钟奇等将领下令紧闭城门，不知所措。28日，滇军放弃叙州城，“分头乱窜，有由柏树溪退者，有向筠连退者，有经牛街镇雄方向退者；沿途均被团防、棒匪堵击，枪支大半散失”。此战，滇军伤亡二千余人，弹药辘重损失殆尽。11月29日，赵钟奇率残部退至安边，旋又退守横江。川军占领叙州后，乘势南进，连陷高县、庆符、珙县、筠连、兴文等县，大有进窥云南之势。

滇军在泸州、叙州之战中所以遭到惨败，主要由于防守泸、叙的兵力弱于川军；其次是唐继尧远驻毕节，却直接指挥各旅作战，以致前线各部队之间互不协同，举措紊乱；此外，士兵普遍存在厌战惧战情绪，以致稍战即溃。泸、叙失守后，唐继尧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攻渝作战上，他一面下令攻渝部队加紧作战，提出“我军可胜不可败”，一面令新组建的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火速入川，牵制川军，准备一旦重庆得手，立即反攻叙、泸。

五、重庆之战 (参见附图三十三)

川军攻占泸州、叙州后，未能按预定计划牵制住攻渝之滇军，反使自己被牵制在叙、泸等地，进退两难。同时，川军的后方也动荡不安。1917年11月1日，川边屯殖使张煦在西昌宣布独立。唐继尧委张为靖国军第七军军长，令其率所部三十营进攻汉源，威胁成都。不久，由孙中山派遣入川的中华革命党人黄复生、石青阳和前川军将领卢师谛、颜德基等人，招集旧部、散兵游勇和绿林武装，组成四川靖国国民北伐军，在永宁、合江和綦江一带活动，配合滇黔军进攻重庆。于是，四川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不利于川军的变化。

滇黔军攻渝之战早于1917年11月初即已开始。滇军何海清、李友勋两旅乘川军第一师西进攻泸之际，迅速由两翼袭取永川和合江，切断了攻泸川军与江津、重庆守军的联系。与此同时，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指挥该师和石青阳之四川靖国军一部，由綦江分兵两路向重庆推进：一路经广兴场、夹滩场进迫江津；一路出龙岗经界石进攻三百梯，拟从正面进攻重庆。该路部队约

两个团，秘密开进，隐蔽接敌，顺利通过龙岗、界石，突然于11月12日晨将防守三百梯的北军吴光新部一个营团团包围，并发起猛烈进攻。北军旅长李炳之亲率一团驰援，凭险顽抗。黔军见正面进攻受阻，便分兵一部，企图从侧翼经鹿角场、黄角桠袭击重庆，结果遭到北军李旅另一个团的节节抗击，进展缓慢，其后路又受到自土桥方向迂回而来的一营北军的威胁，被迫于14日退守鹿角场。

此时，另一部黔军向江津发动了进攻。江津位于长江南岸，距重庆数十公里，是由长江北岸进攻重庆的重要通道。黔军以四个营的兵力，于11月11日秘密进抵江津外围，并控制了龙门滩、夹滩场等要地。12日晨，向江津城发起进攻，顺利攻占了城南高地。这时，防守江津之川军仅第一师一个营，周道刚急令刚抵重庆的管金聚之陕军第二梯团（步兵两营，骑、炮各一连）增援江津。陕军赶到江津后，以一营扼守沿江要隘，另一营配合川军仰攻城南高地，经两昼夜战斗，终将黔军击退。20日，滇军李友勋旅赶到，配合黔军一举攻克江津。

11月26日，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抵达江津，与黔军师长王文华商定协同攻渝作战计划。其要点是：滇军负责阻截可能由泸州援渝之敌，并以主力从江北分由走马岗和江津指向重庆，为助攻；黔军以一部固守江津、白沙，其主力沿长江南岸进攻黄角桠、连山一带，为主攻；电请唐继尧转饬赵又新、黄毓成所部反攻泸州，以牵制叙、泸之敌，掩护攻渝部队之侧后安全。唐批复：“叙泸方面，正力图恢复。重庆须早日攻下，方有办法。计划既商定，此间不为遥制”。由此观之，唐继尧似乎汲取了叙泸之战的教训，改变了对前线部队统制过死的做法。

11月30日，滇黔川靖国联军按计划分路向重庆发动了进攻。江北滇军分为两路：右路李友勋旅由江津向白市驿方向推进。当日克铜罐驿，12月1日进占陶家场、福寿场，次日克白市驿。左路何海清旅由永川进击，于12月2日克走马岗、老关口，3日进迫浮图关。与此同时，长江南岸之黔、川军也对铜元局、黄角桠之敌发动了进攻。该方向有北军吴光新所部之李炳之旅和川军第一师之两营特种兵，共约千余人。黔军投入作战的部队共九营，加上石青阳所部四川靖国军，共约二千人。12月1日，黔川军分左右两路奋勇进击，王文华“严令前敌各军，虽伤亡至五六营以上，不准稍退一步”。血战数日，黔军共伤亡营长以下官兵约千人，终于在12月4日上午进据真

《唐继尧手稿》，云南档案馆藏。

作战命令要点：“1、第一师以一旅驻永川，一旅驻江津；2、第一军（即第二师）以主力取荣县、自流井、威远；3、第三师以一有力支队助攻威远；4、第五师以一团或两团由南川向綦江相机进攻；5、李炳之旅分驻巴属，暂取守势。以上计划定于一星期内实行。”（《会泽靖国文牍》第二卷，第42—43页。）按：文内李炳之旅，属吴光新部，该旅前锋已于10月3日抵达重庆。

《段廷佐致唐继尧函（1917年12月2日）》，云南档案馆藏。

武山和黄角桎，与重庆仅一江之隔。

周道刚、吴光新见滇黔川联军兵临城下，感到重庆难保，遂弃城而走。吴光新部于12月3日夜乘船退往宜昌，周道刚率所部于11月4日晨退往合川。4日下午，滇黔川联军进占重庆，请熊克武出面维持秩序。13日，熊克武致电孙中山、陆荣廷、唐继尧等，宣布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

六、成都之战

滇黔川联军攻占重庆后，即确定了以占领成都为主要目标的全线进攻作战计划。进占重庆的部队分兵三路向成都进发：四川靖国军为右路，由重庆出璧山，经青木关、合川西攻成都；贵州靖国军为中路，由重庆出璧山、大足，经安岳、乐至进逼成都；滇军顾品珍部为左路，由重庆西攻永川、荣昌，进取内江、资中，尔后北攻成都。与此同时，退驻川南的滇军赵又新、黄毓成等部由永宁北攻纳溪、泸州，然后一路循长江反攻叙州，一路经富顺进攻自流井，得手后，再进取威远、荣县，经仁寿进逼成都。

联军发起进攻后，进展颇为顺利。12月15日午前，滇军赵又新部攻占纳溪，继向泸州进逼。18日，川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王 在合川发出通电，宣布护法，驻守泸州之刘湘第一旅随之动摇。19日，滇军一举攻占泸州，刘湘旅退往永川。22日，顾品珍部攻占永川，川军第一师代师长徐孝刚暨刘湘旅退往隆昌。

12月18日，冯国璋特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1918年1月1日，甘心附逆的刘存厚在成都正式就职，并电饬徐孝刚固守隆昌，阻止滇军前进，准备调集兵力，调整部署，进行反击，夺回泸州、重庆。然而，未等川军反攻，滇黔川联军先敌发动了更为强大的攻势。其部署是：滇军顾品珍部由永川沿大路攻取隆昌、内江；赵又新部一由泸州攻富顺，一向叙州进攻，以为牵制；黔军王文华师之一部出大足，经吴家铺助攻隆昌、内江；川军石青阳部进攻安岳、乐至；熊克武部一由安岳取遂宁，一攻顺庆；叙南赵钟奇部牵制盘踞叙州之川军，策应主要战场行动。据此部署，顾品珍所部于1月2日占荣昌，8日下隆昌，15日占内江；熊克武指挥之川省靖国军于1日克渠县，3日克遂宁，9日克顺庆（今南充）、保宁（今阆中）；黔军王文华师占领了大足等地。此后，赵又新所部于14日占富顺；叙南赵钟奇进占屏山、筠连。靖国联军的强大攻势，不仅打破了刘存厚反攻泸州、重庆的计划，而且进一步削弱了他的实力。刘、钟、周各部被压缩在叙州、自流井、简阳至成都的狭长地域内。

刘存厚面对险恶形势，一面迭电北京政府，请速接济枪支弹药，并请转令陕、甘、鄂三省督军迅速抽调劲旅增援；同时再次调整兵力，准备对联军实行局部反攻，企图夺回部分失地，稳住阵脚，坚守待援。1月16日，刘存厚军北路司令杨肇锡反攻遂宁获得成功。20日，南线之舒荣衢旅打退赵又新

部的进攻，夺回富顺；中路钟体道师也击败进攻安岳之黔军，推进到永清场。刘存厚军反击作战，给滇军造成较大损失，但其

所属部队亦因数月激战，已成强弩之末，局部反攻虽获小胜，终因兵力不敷，无法摆脱被动态势。

1月23日，冯国璋任命刘存厚兼北洋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舒荣衢为该师第四十一旅旅长，陈洪范为第四十二旅旅长，刘成勋为陆军第二十二混成旅旅长，汪可权为第二十三混成旅旅长，企图用将刘存厚所统之川军纳入北洋军序列的办法，继续把刘牢牢地拴在“武力统一”的战车上。北洋政府这一招果然见效，刘存厚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即致电北洋政府，声称要作战到底，“决不与滇黔议和”。然而，这种顽固态度，并未给川军带来任何希望。

1月25日起，川南滇军分兵四路向叙州、富顺、内江和资中等地发起猛烈进攻。刘军因伤亡惨重，弹药匮乏，后援不继，战力锐减，整个防线呈瓦解之势。30日，刘存厚急电段祺瑞，谓“饷械全罄，各军退却，叙州、遂宁相继失陷，维持力竭，乞速援救”。但此时北军在湖南新败，岳阳失守，北洋政府本其必先争湘图粤的既定方针，正急于改变湖南战场的被动态势，无力顾及四川方向，因此，对刘存厚的告急电，未予回音。

1月31日，滇军攻占叙州，2月2日攻占内江、富顺，6日攻占自流井。刘军一、二、三师龟缩于乐山、简阳至成都：间狭小的地域内。

为了保存实力，应付危局，刘存厚于1月31日通电宣称：将四川督军一职让给熊克武，“自己解甲归田，以明素志”，要求与联军停战议和。这一缓兵之计当即被联军识破，认为“所云停战，实系缓兵”。唐继尧、熊克武要求刘克日率部撤出四川，退往陕西。刘存厚默而不答。于是，各路靖国军继续挥兵前进。

缓兵之计落空后，刘存厚决心以所余兵力固守成都外围要点，等待北洋政府救援。他分析战场形势，认为滇军在南路，黔军及熊克武所部在北路，“两相比较，实南强而北弱”，因而决心对南路之滇军取守势，对北路之黔军取攻势。为此，决定抽调防守资中的部分兵力至简阳方向，准备伺机反击。

2月上旬，防守简阳的川军第三师未等资阳之援兵赶到，就仓促协同第二师之第三混成旅，对乐至之黔军发动进攻，攻占该镇后，又继续进攻安岳。中途遭到黔川联军迎头痛击，旋即放弃乐至，回守简阳。联军乘势追击，在乐至以西之施家坝遭到由资中和乐山赴援之刘存厚军猛烈阻击。

正当简阳刘军顽抗联军进攻之际，第二师所属之刘成勋、陈洪范两旅于

《段廷佐致唐继尧函（1917年12月2日）》，云南档案馆藏。

《马鈇关于叙府滇军溃败情形给唐继尧详呈（1917年12月28日）》，云南档案馆藏。

《唐继尧对王文华来电的批语（1917年11月29日）》，云南档案馆藏。

2月16日在乐山宣布参加护法。18日，第一、三两师全体军官和第二师之汪可权、舒荣衢旅，也宣布与西南靖国军一致行动，并推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事务。

刘军纷纷参加护法，滇黔军得以长驱直入，于2月18日占领简阳，进逼成都。熊克武所部也乘势攻占淮镇，向成都挺进。

刘存厚见所属部队分崩离析，无法再战，遂于2月19日伙同城防司令田颂尧等撤离成都，退往川北。3月8日，孙中山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历时八个月的四川护法战争，至此告一段落。

滇黔川联军攻占成都后，唐继尧于3月下旬开始组织部队援鄂援陕。但这时湖北靖国军已败退鄂西，滇黔援鄂军遂与北军相持于宜昌、夔州间，不再前进。

滇黔军所以取得攻川之战的胜利，主要由于其作战指导比较正确。滇黔军入川伊始，针对刘军主力集中于川南的情况，把注意力放在防守薄弱的重庆方面，兜击刘军的后方。这一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以后虽出现了叙州、泸州相继失守的危局，进攻重庆的初旨仍不动摇，结果重庆一经攻占，战场形势马上发生变化。在攻占重庆后，联军以一部兵力牵制叙州刘军，集中主力分由重庆、泸州迅速攻取成都，使刘军陷入困境，从而完全夺取了战场主动权。此外，中华革命党人在四川组织反刘武装和联军注意开展分化川军的工作，也为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刘存厚军的失败，主要在于政治上逆历史潮流而动，军事上急功近利，缺乏全局部署。他只顾争夺叙、泸，而忽视对后方要地的防守，结果虽得叙、泸，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既不能向纵深发展，又不能回兵救渝，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地，终于招致最后失败。

滇黔军进攻对抗护法运动的刘存厚所属川军，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以护法为名，行吞并四川之实，这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四川人民的反对，因而其胜利也是暂时的。滇军进占四川后，耀武扬威，专横跋扈，与黔、川靖国军的矛盾逐渐加深，开始酝酿一场新的军阀混战。

第六节 粤、闽、赣地区的作战 (1917年10月—1918年11月)

一、作战双方的企图及部署

夺取广东，是段祺瑞“武力统一”战略中最根本的任务。段政府认为：“欲谋统一，必先收粤，粤不下，湘不安，战局不了，国是不定”。因此，在1917年9月傅良佐带北军入湘时，北洋政府就同时指令闽、赣、浙省军队和琼州龙济光部，对粤省“同时并举，协力进攻”，以策应湘省作战。其攻粤部署是：龙军直取钦（州）、廉（州）、高（州）、雷（州）地区，东图广州，并切断粤桂通路；福建派两混成旅沿汀江入粤，进占嘉应州（治今梅州市）、惠州（治今惠州市）地区，西攻广州，江西派一混成旅逾大庾岭，入韶州（治今韶关市）地区，南攻广州，形成三面夹击之势。10月23日，北洋政府收买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宣告“对省独立”，与广东省政府脱离关系，直接听命于北京政府，并立即派兵攻打惠州。

莫擎宇发难兴兵，为北洋政府大举图粤制造了契机。10月24日，闽督李厚基在段政府授意下通电支持莫擎宇，并令汀漳镇守使兼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长臧致平率兵十营进援。此后不久，龙济光也由琼州出兵，抄袭粤省侧背。于是，段系军队攻粤之战全面展开。

1917年11月10日，陆荣廷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粤省攻防作战计划。参加会议的除桂系要员外，还有孙中山的代表胡汉民、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广东省长李耀汉等。会上，军政府代表提出应将屡与军政府为敌的广东督军陈炯明调离，并要求将已编为警卫军的原省长朱庆澜的二十营军队，重归陈炯明统带。陆荣廷表示“让步”，建议调陈炯明为讨龙军总司令（后改为李烈钧），但同时要求陈炯明率所部二十营协助攻闽，借以削弱军政府的势力。会议推举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兼广东督军，陆自称“年老多病”，派其亲信、原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

莫荣新上任后，鉴于莫擎宇盘踞潮汕，李厚基出兵援潮，在陆荣廷的授意下，决定在进剿莫擎宇部之同时，实施大规模攻闽作战，以策应湘省军事。11月27日，由程璧光出面，召集滇军总司令李烈钧、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督军署参谋长郭椿森以及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广州海珠开军事会议，商订攻闽方略。决定成立“征闽海陆联合军”，以程璧光为总司令，指挥海军、

此处川军指石青阳等四川靖国军。

《刘显世致唐继尧电（1917年12月4日）》，云南档案馆藏。

顾品珍部仅存约五千人，赵又新部仅余四千人，叶荃部只剩二千人，以上各部“存者仅半数而已”。见《叶荃致唐继尧电（1918年1月26日）》，云南档案馆藏。

《民国日报》，1918年2月14日。

滇军、粤军三支部队，分五路攻闽。兵力包括驻粤海军全部，陈炯明之粤军二十营，驻粤滇军全部，和粤省地方军八营，桂军一支队。具体部署是：以陈炯明部二十营进攻漳州，为第一路；李烈钧统率滇军两个师进攻汀州（今长汀），为第二路；沈鸿英率“平潮军”十二营进攻上杭，为第三路；刘志陆率“平潮军”十五营进攻诏安，为第四路；程璧光率海军舰队袭击福州，为第五路。计划确定不久，得悉龙济光于12月11日由琼州出兵攻粤，遂重新调整部署：由攻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继续率所部进攻闽省；以驻粤滇军第六军军长方声涛为征闽靖国军总指挥，率所部第八旅（旅长伍毓瑞）、第九旅（旅长夏述唐）进驻潮、汕，策应陈炯明部作战；以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率沈鸿英、林虎两支部队赴粤东南抵御龙济光部；海军则全部参加讨龙作战。

二、攻闽之战（参见附图三十四）

（一）双方兵力及作战部署

陈炯明于1917年12月8日就任攻闽粤军总司令职后，便着手进行作战准备。由于原二十营粤军装备低劣，每营仅有枪二三百支，莫荣新又从中掣肘，除拨少量开拔费外，饷弹方面概不负责。陈炯明等深感实力单薄，出兵困难，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施行一项扩充实力的方案：一面向地方士绅借枪，一面向海外革命人士募捐饷款。其中规定，能募到人枪二百者为营长，人枪六十者为连长，人枪二十者为排长，不愿担任军职的按枪付钱。经过一番努力，共筹集到各种枪二千余支，子弹数万发。这样，加上滇军方声涛部，攻闽军总数达二万人左右。陈炯明将攻闽军编为若干个支队，每支队辖二至四个营不等，任邓铿为参谋长。

1918年1月25日，陈炯明在广州誓师攻闽。27日，率主力部队离开广州，开赴汕头。

这时，闽省全部军队约有三个师的兵力，其中有福建第一旅（旅长姚建屏）驻福州；北洋第十混成旅（旅长唐国谟）驻厦门；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长臧致平）驻诏安；闽省清乡队（总司令张清汝）驻延平（今南平市）。另有巡防队约四个团分驻各地。总计二万二千余人。闽督李厚基得到粤军将要攻闽的情报后，一面调唐国谟等部开赴永定、上杭一带赶筑工事，准备抗击粤军，一面迭电北洋政府派兵援闽。

早在1917年11月底，北洋政府看到潮梅的莫擎宇部将被粤军剿灭，闽

唐继尧：《劝刘存厚交出印信离去成都电》，《会泽靖国文牍》第三卷，第38页。

《徐树铮电稿》，第255页。

参见《庆原璜为用兵湘省攻守意见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省兵力单薄，岌岌可危，感到“闽或有失，浙必动摇，粤、闽、湘、桂联成一片，大局益不易收拾，斯时政府处置愈难”，于是急派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由直隶廊坊南下援闽（冯旅到江苏浦口后又改援湘西），继而又令浙江童葆暄师赴闽助战。

（二）粤军三路攻闽

1918年2月中旬，攻闽粤军进抵潮州（今潮安）、汕头一带。但是，陈炯明对攻闽作战并不热心，部队进抵潮汕地区后，忙于招兵索饷，培植个人势力，迟迟不向闽省发动进攻，致使北军得以从容调遣兵力，扩充力量，加强并完善了在闽西南的防御部署。3月22日，孙中山致电陈炯明，指出：“若乘敌军初到，地形未谙，利用内应，犹可先发制人”，宜“速下攻击命令”。

但陈炯明以“布置未周”为借口，对孙中山之电令置若罔闻。4月5日，孙中山再次致电陈炯明，严厉指出：“援闽之举，准备已久”，“惟攻击之令，至今寂然无闻，敌备日增，且狃于岳长之役，虜气益骄，我军顿兵不进，足以示弱”，“况段贼复出，积极图南，我军从事准备，增力几何？而彼则恃有外援，愈久则力愈充，及今图之，惟在速战”。孙中山着眼全局，晓以利害，催陈速战，是很有道理的。

陈炯明部在粤闽边境滞留三个月，确已错过了大好战机。在此期间，其它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湘省，北军陷岳阳，占长沙，正向湘南推进；在江西，陈光远已调遣兵力，袭占广东南雄；在闽省，不仅防御准备日臻完善，而且浙江援军已经入闽，军事力量已得到较大加强。总之，整个形势对攻闽粤军越来越不利。

到5月初，攻闽粤军已扩充至三十营，约一万二千人。在孙中山和粤军将领的逼促下，陈炯明才下达进攻命令。其第一阶段作战计划是：许崇智第二支队四个营为左路，从蕉岭向武平、上杭进攻，得手后，进规长汀、连城；陈炯明亲自指挥第一、三、四支队和预备队为中路，分两路进攻，以第一支队和预备队共五营，从大埔进攻永定，得手后，进规龙岩，第三、四两个支队共六营，从饶平（今三饶）进攻柏嵩关以规平和；右路则由参谋长邓铿指挥，包括第五支队三营和游击二营，集中于澄海、黄冈（今饶平）以监视诏安、云霄之敌。粤军指挥部设在三河坝。

5月10日，粤军发动全面进攻。由于许崇智在民国元年曾任闽军师长，较有声望，战前已运动驻武平的一个营和驻上杭的一个大队倒戈附粤，故该

11月初，广东护法军政府派邹鲁、金国治，广东督军派沈鸿英、刘志陆，各率所部进剿莫擎宇。

1917年9月间，朱庆澜在辞省长职之前，将所辖省防军二十营改为省长亲军，任陈炯明为司令。朱走时，允将该部改编为海军陆战队，归大元帅府直辖，陈炳焜不允，强令编为警卫军，隶属于广东督军。

为进攻潮梅之莫擎宇部而组建，故名“平潮军”。

路进展顺利，当日即占领武平，三日后占领上杭。因中路李炳荣第一支队进攻永定受阻，许崇智当即派出二营增援，始克永定。中路第三、四支队也顺利攻占柏嵩关。这样，闽军第一道防线完全被突破，粤军向闽省推进达五十公里，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粤军稍事休整后，即准备实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左路许崇智部分为二支，一从上杭进攻连城、永安，规取沙县；一取长汀、清流、归化（今明溪）、将乐、顺昌，然后进占延平；中路李炳荣第一支队和熊略预备队分别进攻龙岩、南靖；罗绍雄、邓本殷第三、四支队进攻平和，攻取漳州；右路洪兆麟第五支队进攻云霄、漳浦。各路若进展顺利，则继续向纵深发展，夹击福州。不料部队尚未行动，从浙江援闽的童葆暄第一师已抵前线，闽、浙军队联合发起反攻，战局急剧逆转。

（三）闽浙联军大举反攻

1918年5月20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援粤副司令，调集北方各省军队组成援粤军，拟分三路攻粤。段祺瑞野心勃勃，企图一口吞并粤省。但是，吴佩孚对任其为援粤副司令一事不予理睬；张怀芝则在湘东作战时吓破了胆，已无攻粤的勇气；各省“援粤”军也相互观望，迟迟不动；只有东线李厚基，处在粤军进攻正面，为保住地盘，不得不拚力作战。

5月底，童葆暄率浙军第一师赶到前线后，北洋政府任命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司令。6月4日，闽浙联军分兵三路，向粤军发动全线反攻：以臧致平旅为左路，拟突破诏安、黄冈粤军阵地，进窥潮汕；童葆暄师为中路，从平和进攻柏嵩关，然后进取高陂，控扼韩江，威胁粤军总指挥部所在地三河坝；唐国谟旅为右路，收拢被许崇智部击散之溃兵，拟先取龙岩、上杭、永定，然后改取守势，牵制粤军左翼兵力。闽浙联军投入反攻之总兵力约一万五千人，基本企图是左攻右守，首先进占潮汕，同时袭取大埔、三河坝，将粤军南北割裂，进而各个击破。

此时，陈炯明与方声涛之间已出现隔阂，滇军隔岸观火，消极怠战。粤军右路兵少力弱，饷弹不继，在闽军臧致平旅的反击下，放弃黄冈，退守汕头。陈炯明急调许崇智之左路军一部增援，企图趁臧旅立足未稳之际，收复黄冈。不料闽军右路又乘虚而入，攻占永定，许崇智部退守岩前；粤军中路防线也被浙军突破。激战日余，粤军在初期攻取的闽西南要地又全部丧失。接着，闽军左翼先锋深入到汕头一带，其中路已突破峰市，进逼大埔。粤军被动挨打，形势岌岌可危。

这时，已经离开广东护法军政府的孙中山，鉴于闽粤战场形势恶化，极为焦虑，于6月27日致电陈炯明，指出：粤省北面，张怀芝已组织军队屯集赣南；南面，北军已由海路运兵二千至汕头；东面，李厚基、童葆暄大兵

压境。攻闽粤军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此时敢冒险进攻则生，不冒险则必致坐困。以攻为守，则士气壮，响应多，敌胆寒，一进必收奇效。否则士气日丧，响应日微，敌胆日壮，而我以可胜不可败之兵，据能战而不能退之地，必无幸免也”。然而，陈炯明此时对北洋政府已有“内附之意”，因此，一面消极防御，节节退守，一面暗向北军传递函电，以示妥协。

但是，这时北军在军事上迭获胜利，气焰正盛，对陈炯明“内附”之表示置之不理，拟乘其斗志动摇之机，“一击破之”。于是闽浙军队继续穷追猛打，并以主力从左翼楔入粤境，于7月18日攻占大埔，威胁粤军总指挥部驻地三河坝。

在此危急时刻，孙中山再次写信给陈炯明，向其分析敌我形势后指出：“兄身当敌冲，后援难恃，强敌在前，所部又饷械俱乏，处此局势，万难操全胜之算，若审慎求全，则我之兵力有限，敌之增援无穷。为兄今日计，惟有奋力前进，冒险求胜，规取闽中”。孙中山一面反复劝导陈炯明，一面派广东军政府参谋部长吕公望（原浙江督军）往前线策动浙军倒戈起义，分化瓦解北军。

（四）粤军转败为胜

陈炯明见“内附”之意不被北军理睬，当面敌军又步步进逼，因而不得不听从孙中山的劝导，重新组织兵力，从军事上寻找出路。7月23日，他将右路之洪兆麟支队调至中路，增强三河坝一线防御力量。8月初，陈炯明集中中路粤军反攻大埔，以一部兵力从正面仰攻，分兵一部由漳溪下游攻敌侧背。经两昼夜激战，闽军不支，弃城溃逃。这时，驻守饶平的浙军第一团团团长陈肇英，在吕公望等人的策动下率部起义，成立“援闽浙军”总司令部。浙军师长童葆暄仓皇率部撤离前线，退往厦门。粤军乘势全线反攻，右翼邓铿部连克诏安、云霄、漳浦等城，直逼漳州。左翼许崇智部乘势向闽西进攻，连占武平、上杭、龙岩等地，与主力部队会攻漳州。8月31日，粤军攻克漳州，继而向厦门推进。李厚基惊慌失措，逃回福州。9月12日，李致电段政府，报告闽军处境危急，请辞闽浙援粤军总司令职。段政府一面电令李厚基坚守待援，一面急调北军从三路援闽：赣省抽调军队开赴上杭，浙省增派军队驰往厦门，海军派舰队进入厦门海面。

1917年12月14日，刘志陆之“平潮军”和伍毓瑞之滇军攻克潮安、汕头，莫擎宇率残部退往福建。

攻闽军各支队主官及所辖营数如下：第一支队司令李炳荣，辖三营；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副司令关国雄，辖四营；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辖三营；第四支队司令邓本殷，辖三营；第五支队司令洪兆麟，辖三营；预备队司令熊略，辖二营；游击司令徐连胜，辖二营。

《冯国璋致李纯电》，《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115页。

孙中山：《致陈炯明望利用内应攻击武杭敌军电》，《国父全集》第三册，第551页。

10月3日，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福建省宣抚使兼攻闽军总司令。11月，粤军与闽浙联军在福建前线划界停战。

三、讨龙之战

龙济光同张勋一样，是反动愚顽的“怪物”之一。在护国战争后期，面对滇桂军的强大军事压力，龙济光走投无路，后由黎元洪出面调解，才得以两广矿务督办名义率残部移驻琼州。龙在琼州招兵买马，企图卷土重来，重作广东的土皇帝。

护法战争爆发后，段祺瑞调动北军进攻湖南，龙济光认为时机已到，迭函冯国璋，表示愿充攻粤前驱。他声称：“惟冀钧座排除群论，速定方针，……济光秣马厉兵，敢惮征缮。各将领枕甲请缨，勿灰其气，望钧座有以策厉之。”

北洋政府也很赏识龙济光这只鹰犬，于1917年11月8日任命龙为两广巡阅使，令其出兵攻粤。

龙济光受命后，立即以所部二万余人分三路进攻：任李嘉品为第一路司令，拟从阳江登陆，经合山、恩平进图广州，并控扼西江中段，断绝桂粤联系；任段尔源为第二路司令，马存发为第三路司令，拟从海安登陆，先占雷州半岛，尔后向桂粤边界发展，伺机攻取南宁。

1917年12月14日，李嘉品率部在阳江秘密登陆成功，即以一部兵力驻守阳江，主力向恩平和阳春推进。龙济光则亲率第二、三路军从海安登陆，向石城（今廉江）、化州方向发展。

广东督军莫荣新得知龙军大举进犯，急令沿海粤军抗击登陆之敌，以待后援；继令驻粤海军分别开赴闸坡、崖门等地，堵截龙军后继船队。旋于12月16日召开军事会议，商订讨龙作

战计划。12月30日，莫荣新任命钦廉镇守使沈鸿英为讨龙军第一军司令，令其率所属十二营在石城至化州一线阻击龙军；以原高雷镇守使林虎为讨龙军第二军司令，令其率警卫军十二营开往恩平方向迎敌。以上两支军队兼程开赴前线，在预定地点展开并完成防御部署，阻止和迟滞向前疾进的龙军。嗣后，莫荣新又分任督军署参谋长刘志陆和粤省警务处长魏邦平为讨龙军第三、四军司令，李根源为讨龙靖国军（由滇军三个团组成）司令。以上讨龙军总数共五十营约二万余人。

东路阳江方向作战非常激烈。林虎所部讨龙军开赴前线后，猛冲猛打，曾一度收复阳江，迫敌前锋退守织篁。1918年2月初，李嘉品之后续部队驰

孙中山：《致陈炯明促速下攻闽令电》，《国父全集》第三册，第551—552页。

转引自《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37年版）第二册，第28页。

赴织箕，会合退守该地之先头部队并力反扑，于 25 日复占阳江，东路战局再度恶化。3 月 7 日，粤督莫荣新任命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统一指挥阳江方向之作战。

3 月 11 日，李烈钧拟定了全线反攻作战的计划，基本企图是：集中主力部队于开平至阳春一线，分兵四路围歼李嘉品所部龙军，收复阳江，再进击石城、化州之敌。具体作战部署是：第四军由那扶进逼阳江东部，负责牵制敌人；第三军由恩平、那龙出合山，进逼阳江东北部；第二军于恩平与阳春之间前进，攻击阳江西北部；李根源靖国军由黄泥湾至阳春大道前出，配合第二军进击阳江西北部，并负责警戒高州、雷州方向之敌；沈鸿英之第一军进抵石城一带，袭击龙军之二、三路，阻敌增援阳江。

3 月 16 日，刘志陆指挥第三军克复恩平，为其它各路军跟进展开扫除了障碍。李烈钧当即决定第三军从正面牵制敌人，而以李根源之靖国军作为主攻部队，于 24 日前插到阳江北部，从翼侧攻击敌人。同时令第二、三、四军均按原计划分别于 23 日前向阳江推进，掩护李根源部之进攻行动。

讨龙军四路进攻，海军舰队也协力堵剿。李嘉品见难于抵抗，遂于 3 月 25 日放弃阳江，逃向电白（今电白东）。讨龙军乘胜追击，于 4 月 12 日占领电白。

这时，龙济光主力麇集在高州、化州、石城一带，准备顽抗。讨龙军攻克电白后，立即分兵两路，以左翼部队配合沈鸿英部扼制化州东北部，并向化州、石城之正面攻击；以步兵一营、工兵一连组成别动支队，在海军掩护下，在雷州半岛南部登陆，攻击龙军侧背；另以军舰载步兵一部，在琼州登陆，袭击龙军老巢。

龙济光部四面被围，已无斗志。讨龙军步步推进，势如破竹，于 4 月 25 日收复化州，27 日攻克石城，28 日下遂溪。与此同时，琼东县（今琼海东北）警卫营长杨锦龙，联络本部及当地黎族人民宣布独立，反对龙济光在琼州的统治。龙济光见所部弹尽粮绝，进退失据，只好弃军逃走，赴北京投靠段祺瑞，其部下多缴械投降。

四、南雄之战

1918 年 4 月，江西督军陈光远遵照段祺瑞三路攻粤的命令，派兵攻入广东南雄。南雄位于大庾岭南麓，是江西进入广东的通道之一。4 月 18 日，陈光远派赣南镇守使吴鸿昌为攻粤总司令，混成旅长丁效兰为副司令，率兵两旅向南雄进攻。广州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靖国军第五军军长张开儒，鉴于南雄只有守兵四营，难于抵敌，急调驻韶关、仁化等地的第五旅、第六旅及炮兵一团，向南雄增援。但援军立足未稳，即被赣军击溃，南雄陷落。莫荣新得报，急任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令率所部滇军由讨龙战场疾速北上。

李根源率靖国军赶到韶关，将所部布置在韶关以北，接替第五军防务。5月初，李烈钧又奉命率讨龙部队增援北线。由于张开儒南雄之败，莫荣新乘机排除异己，撤掉了张的军长职务，将第五军交给李根源统率。李烈钧、李根源整顿部队后，决定分兵三路反攻赣军。命滇军朱培德旅出仁化、扶溪，杨益谦旅出都坑、罗坝，威胁赣军两翼；第五军为中路，从正面进攻南雄。为加强攻击能力，李烈钧从广州调运数门重炮配属部队。

6月3日，靖国军发动全面反攻。激战四昼夜，赣军向赣境败退，靖国军克复南雄。

靖国军反攻获胜后，李烈钧联络在衡、宝以南屯集的湘、桂军，拟相互策应，大举北进：由湘桂军负责攻取衡、宝，滇军负责攻取赣州；另调驻守潮梅的方声涛部由梅县出武夷山，直捣宁都。但此时粤、桂军意见纷歧，俱无战意；陆荣廷则主张“湘边现状，宜取守势，虽有生力军到，亦不必汲汲进攻，但以保守桂边，静待为上”。不久，李烈钧奉调为广州军政府参谋长，其三路反攻计划遂成泡影。此后，滇、赣军相持于大庾岭及信丰、崇义之间，再无大的战事。

徐树铮：《致李厚基齐电》，《徐树铮电稿》第267页。

徐树铮：《致李厚基齐电》，《徐树铮电稿》第267页。

第七节 护法军政府改组与孙中山离粤

在粤省四周军事斗争激烈进行的同时，广东护法军政府内部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在桂系军阀和非常国会中的政学系的干扰破坏下，护法军政府的处境日趋困难，终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经济上，桂系军阀对军政府实行财政封锁。广东本为富裕省份，每年收入约在一千五百万元以上，居当时全国之首。孙中山曾期望：“若能就其中筹款数十万为国会经费，则国会之基础定矣”。但是，桂系军阀控制着全省的财政收入，根本不让军政府插手，并分文不给。军政府所负担的国会议员的薪水、陈炯明所统粤军的军饷和各项行政开支，仅靠从海外华侨中募捐，以致“极为竭蹶”。粤督莫荣新看到军政府经济拮据的窘状，幸灾乐祸地说：“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之时，自然解散而去”。充分暴露了他的险恶用心。

军事上，桂系军阀对服从军政府领导的军队进行分化打击和排挤。在这次护法战争中，军政府本身的军事力量屈指可数。当时，北京政府密探马凤池曾向段祺瑞报告说：“查孙文在粤另立政府，所恃陆军势力，只有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及林虎一旅。林逆远驻雷州，形势隔禁；实仅张、方之两师，可资号召；他则魏邦平之警察兵，可凑数耳”。实际上，真正听从军政府号令的军队远少于该密探的报告。当时，林虎已死心踏地地为陆荣廷效命，方声涛也唯唐继尧之令是从，真正属于军政府管辖的只有程璧光的部分海军，张开儒所属部分滇军和陈炯明之粤军。就是这一点军队，还不断受到桂系军阀的拉拢、分化与打击。程璧光在1917年10月接受陆荣廷每月馈赠十万元军饷后，就投靠了桂系军阀，进而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加以掣肘。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坚决拥护孙中山，遵从孙中山的领导，却遭到莫荣新与政学系骨干李根源的诬陷。后来莫竟背着孙中山擅将张开儒囚禁，把驻粤滇军的领导权交给了李根源。军政府刚刚组建的二十营粤军，也不断受到莫荣新的打击和排挤，被调往攻闽战场。这样，拥护军政府的部队，不是被桂系军阀拉走，就是被挤走或窃夺了领导权，使孙中山成了无兵可统、无将相随的空头元帅。

孙中山：《民七年致陈兢存函》，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集，第313页。

《龙济光致冯国璋函》，《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第104页。

据李根源《雪生年录》称：1918年2月18日，李由陕南赴粤，滇军官兵推其为驻粤滇军总司令。李25日就职，26日出师讨龙。实际上，李此时仅接任了方声涛之第四师师长职务。到3月27日，唐继尧才发布命令，取消了张开儒为军长的靖国军第五军编制，合驻粤滇军三、四两师为靖国第六军，由李根源任军长，统一指挥驻粤滇军。

张开儒从前线返广州，正值军政府改组，被莫荣新借故逮捕囚禁。护法军政府陆军次长崔文藻被莫枪杀。

《大公报》，1918年6月11日。

政治上，桂系军阀阴谋改组军政府，挤走孙中山。桂系军阀千方百计干扰破坏军政府行动的目的，是要赶走孙中山。当他们发现孙中山意志坚决，拒不离粤时，遂采取拉拢国会议员中的政学系成员，阴谋改组军政府的办法，剥夺孙中山的领导权。1918年1月，桂系军阀勾结滇、粤、湘等省军阀，拉拢非常国会中的政学系议员及革命党中持不同政见者，发起成立“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作为西南护法各省的统一组织，阴谋夺取护法战争的领导权，架空广州护法军政府。由于“联合会”不受军政府领导，并议定由岑春煊担任议和总代表，公然主张南北妥协，放弃武装斗争，因而遭到孙中山和国会中部分议员的坚决反对。

政学系议员和旧国民党中的不坚定分子如吴景濂、褚辅成之流，见以“联合会”取代军政府的阴谋难以得逞，又秉承桂系军阀的旨意，提出了改组军政府的主张，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借以排斥孙中山对护法战争的领导权。孙中山坚决反对改组军政府，指出军政府的大元帅制是符合民国约法中“元首政治”这一规定的，改变此制，“与约法相违背”。陈炯明、孙洪伊等也相继通电反对改组军政府。但是，在政学系的活动下，非常国会于1918年5月4日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决定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当即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并发表通电揭露西南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种种罪行，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5月20日，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懌、陆荣廷和岑春煊七人为总裁，废除大元帅制。21日，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同日，孙中山愤而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表示与西南军阀决裂。自此以后，护法军政府完全为军阀官僚所控制，成了与北洋政府妥协的议和机构。

在南方护法军政府内部矛盾激化的同时，北洋政府内部直、皖两大派系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1918年8月，吴佩孚等公开通电主张“和平”，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护法军政府也复电赞成和平。此后，各地区的战争基本上均已停止。

1918年9月，冯国璋总统任期届满，安福系操纵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徐上台后，为了顺应国内外要求和平的空气，免去了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11月16日，对北军前线部队发布停战令，并倡议召开南北和平会议。1919年2月，南北政府代表开始在上海议和。双方代表表面上是讨论恢复约法和旧国会，实际上却在如何划分地盘等问题上进行新的角逐。

政学系由国民党右派分子所组成，骨干是原欧事研究会部分人员。以李根源为领袖，包括章士钊、谷钟秀、张耀曾等人。它拥戴岑春煊，与西南军阀关系密切，是非常国会中主和派、妥协派的政治代表。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建国月刊》第一卷，第3期。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建国月刊》第一卷，第3期。

第八节 护法战争的历史意义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护法战争的历史意义

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护法战争，主要是围绕着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在孙中山看来，《临时约法》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本依据，区别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拥护约法，即所以拥护民国”，对约法的态度即是对中华民国的态度。因此，自从袁世凯篡权以后，孙中山一直为维护它的尊严和地位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护国战争之后，孙中山又倡导护法，这对抵制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粉碎一切复辟帝制的阴谋，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斗争口号，在现在看来无疑是十分软弱无力的，但在中国人民尚未找到新的思想武器的情况下，它仍然代表当时先进人们追求的方向，代表当时拥护民主、反对专制、谋求真共和的社会思潮，仍不失为一面革命的进步的旗帜。这场斗争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近代史上，仍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护法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没有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没有触及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

讨袁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改组国民党，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其目的在于改变国民党派系林立、涣散无力的状态。但因中华革命党人数有限，力量微弱，其政治影响远不如昔日的同盟会，也不如原来的国民党。在护法战争中，中华革命党虽然发动了一些武装起义，但都旋兴旋灭，影响不大。由于该党既忽视宣传和动员工农群众，又无力组织和掌握军队，甚至连非常国会也不能左右，其领导作用微乎其微。至于许多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老同盟会员，虽有不少人继续坚持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背离孙中山，有的加入进步党或西南军阀的行列，有的成了拥兵自重的军阀，有的充当军阀的幕僚或打手，有的成为操纵国会的投机政客。他们为着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反对和阻碍孙中山对护法战争的领导。事实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已四分五裂，不可能重新集结成为一个新的领导核心，担当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

此外，护法口号取义狭窄，没有触及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孙中山表示：

邵元冲：《广州护法日志》，《建国月刊》第十二卷，第6期。

《马凤池密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

“护法之唯一主张，在恢复旧国会，并使之完全行使职权”。把恢复官僚政客麇集、早已声名狼藉的旧国会，作为护法的唯一任务，既不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也不反对封建主义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这就不能不使护法这面旗帜黯然失色。它不能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激发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当然也得不到强大而可靠的同盟军的支持。孙中山等少数革命党人在茫茫黑夜中孤军奋战，其最后失败势所难免。

（二）没有建立起强大的革命武装

孙中山虽然一贯重视武装斗争，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的思想始终停留在争取会党和利用旧军队的阶段，不懂得用革命军队代替旧军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而始终没有建立起为民主革命而战斗的坚强的革命武装。

这次护法战争，孙中山把希望寄托在滇、桂军阀身上，殊不知军阀集团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支持下，实行封建割据，扩张个人权势，什么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一概置之度外。依靠这样的武装集团去执行民主革命的任务，岂非南其辕而北其辙？通过这次战争的惨痛教训，孙中山斥责南北军阀乃是一丘之貉，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历史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革命的阶级或政党，不建立自己的武装，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

（三）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和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

南方参加护法的军队共约十几万人，并不少于北洋军的实际参战兵力，如果能服从军政府的统一指挥，按照统一的作战计划，集中兵力于主要战场，互相协同配合，是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的。根据北军先图湘、再图粤的作战企图，粤、桂护法军如能与程潜所统湘军密切协同，从正面反击北军，并在攻占岳阳后，在湖北黎、石所部配合下，迅速攻鄂，滇黔军方面，以部分兵力牵制刘存厚所统之川军，以大部兵力出湘西侧击攻湘之北军，或经湘西出鄂西，与黎、石所部一起东攻武汉，对北军实行战略夹击，那么整个战场的形势就将为之改观。无奈，桂军的作战目的仅在控制湘省，滇军的作战目的意在攫取四川，根本不服从军政府的领导和指挥，只顾各自的政治需要，在不同的战场独立决定战守进退。结果，湖北的黎、石部因得不到援助而失败，从而使北军毫无后顾之忧地向湘南节节进逼，如果不是吴佩孚中途顿兵，粤省也将难保。滇黔军虽然攻占了四川，却对于战争全局毫无裨益。

由于参战南军主张不同，各怀私图，因而不仅缺乏战略协同，而且也缺

乏战役协同。当北军攻占岳阳时，桂军竟弃长沙而走；后湘、粤军组织反击，虽然取得了击败北军左路军的重大胜利，但因退驻衡阳的桂军按兵不动，致使湘粤军在反攻奏捷后，又被北军中路抄袭后路，不得不退守桂边，丧失了扭转战局的大好时机。

以上说明，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如果没有明确一致的战略目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和协调一致的作战行动，要夺取战争的胜利也是困难的。

在护法战争中，南方军政府固然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北洋政府也未能实现其“武力统一”的图谋。究其原因，除了战争的非正义性、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外，还由于北洋政府内部直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对护法政府的态度各异。战争之初，段祺瑞驱使直系军队打头阵，本想一箭双雕，既实现其“武力统一”南方的计划，又借机削弱直系的力量。直系军阀也不甘为段祺瑞火中取栗，为了保存实力，参战部队消极怠战，以至自动停战，致使段祺瑞的作战计划一再受挫，武力统一的目标未能实现。此外，北洋政府所遣各军，是由各省各地抽派的，数量虽多，武器也较优良，但大多军事素质低下，作战指挥拙劣，士气低落，军纪败坏，一遇南军的认真抵抗或进攻，就屡屡败北。在攻湘作战中，先受阻于贺家山，继败于岳阳，再挫于攸县，损失都相当惨重；至于四川，北洋政府虽多方扶植刘存厚，也未能挽回败局；粤闽方向，虽调兵遣将，也未能阻止陈炯明部的深入。这一切表明，北洋军的战斗力也极为有限。

为期一年零三个月的护法战争，以其失败的结局最后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彻底破产，宣布了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失败。此后，中国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的惨祸之中。面对严酷的现实，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为国家和民族积极寻找新的解放道路，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第十九章 反对沙俄侵略蒙古的战争 (1911年8月—1915年11月)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正当中国人民为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而斗争之际，沙俄帝国主义乘机策动被它收买的外蒙古某些反动王公和活佛搞外蒙“独立”，煽动内蒙古和黑龙江某些蒙古族反动王公叛国投俄，进而唆使和支持外蒙叛军进犯内蒙，妄图侵占我国整个蒙古地区。在我国人民包括蒙古族人民的激烈反对和强大舆论压力下，当时的中国政府调集军队，进行了反击侵略和平息叛乱的战争。经过爱国军民的英勇奋战，终于击退了进犯内蒙的俄军与叛军，镇压了叛乱武装，收复了内蒙全境。迨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沙皇政府垮台，外蒙傀儡政权失去了靠山，中国才恢复了对外蒙的主权。本章着重叙述沙俄策动外蒙“独立”，煽动内蒙某些反动王公叛乱，以及中国政府军反击入侵内蒙的俄军和外蒙叛军，粉碎内蒙和黑龙江蒙古族贵族叛乱势力的作战经过。

1913年10月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为五年。该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由黎元洪接待袁世凯，冯国璋接替黎元洪，累计至1918年10月，届满五年。

第一节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

一、炮制外蒙傀儡政府，攫取种种特权

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沙皇政府即制订了吞并满蒙的计划，并不断派人与一些蒙古王公接触，灌输亲俄思想；同时，向蒙古地区进行经济渗透。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以“调停”为名，用卑鄙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取得了在蒙古通邮、通商，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设立领事等特权。1862年，沙俄又通过《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进一步取得了俄商在蒙古全境免税贸易的特权。与此同时，沙俄不断向蒙古地区派出“探险队”、“考察队”、“旅行团”，进行间谍活动，收买蒙古活佛及上层喇嘛、王公，培植亲俄势力。十九世纪末，沙俄公开叫嚣要进一步改变中俄边界，妄图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我国大片领土。1900年7月，沙皇政府在派遣侵略军大举入侵我国东北地区的同时，派哥萨克骑兵一大队（约五百人）强行进驻库伦。其后，由于沙俄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它在我国东北的扩张受到挫折，便集中力量转向蒙古地区。1907年，沙俄同日本签订了以沙俄侵占我国外蒙、日本吞并朝鲜为内容的密约。1910年，日俄双方又订立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第二次密约。同年8月，日本吞并了朝鲜，沙俄则进一步向外蒙扩张。

1910年，清政府在外蒙古实行“新政”，沙俄乘机煽动一部分王公和活佛，进行分裂蒙古的罪恶活动。1911年7月，沙俄驻库伦领事操纵哲布尊丹巴活佛和亲俄分子杭达多尔济亲王等人，利用喀尔喀各盟王公、喇嘛会盟大典之机，密议外蒙“独立”，脱离中国，投靠沙俄，并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代表团”，冒充代表外蒙全体王公的公意前往彼得堡（今苏联列宁格勒），以“承认俄国保护”和给俄国种种特权为代价，换取沙俄以武力支持外蒙“独立”。沙俄政府为了支援外蒙“独立”，令伊尔库茨克军区将步枪一万五千支、骑兵军刀一万五千把、枪弹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外蒙叛国集团。10月初，沙俄借口保护领事馆，又派步骑兵八百余人侵入库伦，使其在库伦的驻军增至一千三百余人。另外，还有由沙俄武装的外蒙军四千余人。接着，沙俄又要求清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不在外蒙驻军和建立行政机构，不得俄国同意不准在外蒙进行任何改革。这种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政府便利用中国政权交替、政局混乱之机，加紧炮制外蒙傀儡政权。同年12月1日，沙俄侵略军带领外蒙军队闯入办事大臣署，对办事大臣三多进行威胁利诱。3日，散发所谓“独立宣言”。4日，

1918年春，北洋政府片面举行“临时参议院”议员的选举，段祺瑞指使皖系军阀徐树铮、王揖唐等组成的政客集团进行操纵。该集团最初活动地点在北京安福胡同，故名“安福俱乐部”，社会上称其为安福系。

将三多等驱逐出境，并收缴了驻库伦防营（有步骑兵二百五十人）的枪械。28日，在沙俄一手操纵下，哲布尊丹巴“行登极礼”，自称“大蒙古国皇帝”，以“共戴”为年号，成立傀儡政府。

外蒙的“独立”，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多次电告外蒙的王公、活佛，要求他们立即取消“独立”，勿被沙俄利用。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后，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于1912年11月3日，与外蒙傀儡政府非法签订了《俄蒙协约》和《商务章程》，宣称“蒙古对中国的过去关系已经终止”，规定俄国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汉人移居蒙地。通过不平等条约，沙俄在外蒙古取得了广泛的特权。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对俄蒙所订“条约”概不承认，并抗议沙俄侵犯中国主权。中国各族人民强烈反对《俄蒙协约》，蒙古爱国王公亦宣布“现在共和成立，正宜联合为一大国，蒙古断无独立之理”，强烈要求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

二、支持叛军侵占外蒙要地

外蒙傀儡政府成立后，沙俄为了进一步控制外蒙，一面非法向外蒙增兵，一面援助外蒙傀儡政府，武装外蒙叛军，企图阻止中国政府军向外蒙进军。当时，沙俄在外蒙库伦驻有步、骑、炮兵十个大队，恰克图驻有步兵两个大队，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哈朗特）驻有步兵两个大队，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驻有步兵一个大队、炮兵一个中队。

库伦傀儡集团在沙俄的援助下，也大力扩充军队。外蒙的土谢图汗部、三音诺颜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等地，原有蒙军九千七百余。宣布“独立”以后，哲布尊丹巴向四汗部各抽调一千人，另招募土匪二千人，以后又下令四汗部各征兵一万人，共五万余人。其中多系未经训练的贫苦牧民，且散处各地，较有战斗力的不过数千人。其统兵官为土匪首领白差尔、乞卡尔、陶什陶胡等。所有叛军均受沙俄军官指挥。

库伦傀儡政府的成立，不仅激起了外蒙古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和反抗，也引起许多上层爱国王公、喇嘛的不满和抵制。当时，外蒙的某些要地仍驻有政府军队。外蒙傀儡政府依恃沙俄的支持，决心进行武力进攻，并煽动叛乱，迫使政府军和各地王公屈服，进而控制整个外蒙。

孙中山：《护法之役》，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第927页。

在非常国会中的原国民党议员分裂为客庐系、丙辰俱乐部和韬园派三个派别，其中只有丙辰俱乐部属中华革命党势力，在国会中占极少数。

《孙中山致唐继尧电（1918年4月）》，云南档案馆藏。

（一）科布多之战

1912年1月，沙俄驻乌里雅苏台领事策动该地反动王公叛乱，并派兵将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驱逐出境，占领了外蒙西北重镇。

同年春，在科布多附近杜尔伯特各旗活动的沙俄特务丹必占灿，勾结杜尔伯特反动王公发动了暴乱。当时，科布多驻军不足三百人。面对外蒙叛军的威胁，科布多参赞大臣溥 在附近各旗爱国蒙民的援助下，迅速征集了蒙族士兵一千人，加强科布多城的防御；同时，急电北京政府派兵前往，并派人到新疆求援。北京政府令新疆都督杨增新、阿尔泰办事长官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伊犁镇守使广福派兵驰援。帕勒塔先派连长吴得山率三十余人赴科布多侦察军情，继派骑兵营长广肇率兵一营兼程向科布多进发。杨增新不顾沙俄驻新疆领事的干涉，先派马步各一营由古城（今新疆奇台）出发，继今后续部队三营陆续向科布多开进（为了在沙漠戈壁地区行军不致缺粮，步兵每人配一驼，骑兵每人配三驼，驮运三个月料粮）。广福也派兵从伊犁（今新疆伊宁市西惠远）赴援。

沙俄侵略者和库伦傀儡集团先派“使者”到科布多劝降，结果被当地爱国蒙民将其绑送官署，斩首示众。由于劝降失败，库伦当局决计出兵向科布多发动进攻。6月21日，由库伦派出“俄官教练之精兵二百，杂以俄兵二十名，佐以大炮两尊，子弹十余驼”，向科布多进发。抵达后，因见守军防御严密，未敢进攻，立即派人回库伦请求增援。傀儡集团又加派“精兵”三百名，并令其“沿途多方征调，足成四千之数”。^{〔俄〕廓索维慈：《库伦条约之始末》（王光祈译），第5页。}

7月底，俄军和外蒙叛军开始进攻科布多城。溥 率军坚决抵抗，并乘隙发起反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将其击退。8月2日，阿尔泰援军广肇骑兵营进至距科布多十余里之黑山头，与叛军三千余人遭遇，卒以“寡不敌众，全军覆没”。8月中旬，敌又从库伦增兵三千人，继续围攻科布多，终未得逞。沙俄领事库斯敏斯齐鉴于城坚难下，遂致函溥 ，要求出面“调停”，溥 中计。8月20日，库斯敏斯齐带领俄兵三十人、外蒙叛军二百人，骗开城门，进入科布多。俄、蒙兵进城后，大肆抢掠，城内居民被杀过半。9月中旬，溥 和所部官兵及内地商民约七百人，被沙俄领事派兵“护送”出境。

（二）察罕通古之战

科布多失陷时，新疆援军步骑两营在管带严保清、有世率领下，已进至距科布多五站路之大营盘，因闻科城已失，大营盘又无险可守，遂于8月

〔俄〕廓索维慈：《库伦条约之始末》（王光祈译），第5页。

哲布尊丹巴称帝日期说法不一。唐在礼、唐在章《蒙古风云录》称系在壬子正月初一，即1912年2月

30日退守阿尔泰区之要冲察罕通古（科布多南二百五十公里），以待援兵。杨增新电令后续部队由古牧地（今新疆米泉）取道绥来（今新疆玛纳斯），改援阿尔泰，并要求各部一到驻地，即仿照湘军办法，挖壕修垒，以备不虞。

俄军和外蒙叛军侵占科布多后，便调整部署，准备向阿尔泰进犯。当时，阿尔泰驻军不满千人，帕勒塔亲王惶恐动摇，企图后撤。北京政府一面电令帕勒塔“静守待援，力保疆土”，一面急电新疆的杨增新和广福迅速派兵援阿。10月中旬，新疆援军十个营（二千余人）先后到达阿尔泰。杨增新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即进攻科布多城，牵制外蒙叛军，使其不敢直趋阿尔泰。为此，除令严保清、有世两营驻守察罕通古外，又急电步队杜发同和李华桢两营、巡防马队李策胜一营、古城旗兵步队全象一营，迅速进扎锡伯图（察罕通古西南五十公里）、察罕通古一带，“相机进取”；并令哈密之马队一营、炮兵一队，立即起程，令库车等地添募马步数营，均作为收复科布多城之预备队。同时，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元湖（古城东北一百二十五公里）、绥来等地增设了马步炮队，并改善了台站、电讯及后方补给工作。

10月下旬，严保清、李华桢率步队两营向科布多开进。当时，北京政府正准备与沙俄谈判，因而下令“切勿轻率进兵，致碍大局”，严、李两营被迫于11月24日退回察罕通古。于是，收复科布多的计划遂被搁置。

1912年12月10日，丹必占灿率叛军数千人在科布多城附近大肆抢掠，并声言不日进攻阿尔泰。杨增新增派步马队各两营，进驻元湖、察罕通古一带；并令严保清营开往布尔根河，与帕勒塔拨出的一营共同守卫该处；派团长张键到察罕通古统一指挥该地驻军。杨增新根据袁世凯的旨意，下达了“敌来则痛击，敌去则严备”的“正当防御”方针，一再告诫部队不要向科布多进军。

1913年1月末，丹必占灿率千余人侵入阿尔泰区境内，驻扎于距布尔根河两站的乌梁海大庙。同时，由沙俄领事出面，阻止政府军进驻乌梁海的萨克赛河一带（今蒙古乌列盖西南一带），并派俄军官兵九人“假道”政府军驻地赴科布多，借以侦察军情。

4、5两月，叛军趁天暖雪消，积极整修道路，前送武器弹药，筹备给养，作进攻作战的准备。

6月17日，叛军近万人由蒿不都喀勒五苏山分三路窜犯：一路由乌梁海大道进攻布尔根河，一路由包墩庆（察罕通古北约三站地），一路由五云集（察罕通古东约一站地）夹攻察罕通古。当时河水暴涨，叛军先头部队被阻

18日。

远东外交研究会编：《最近十年之中俄交涉》，第139页。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十一号。

唐在礼、唐在章：《蒙古风云录》，第八章。

《帕勒塔给袁世凯电（1912年8月26日）》，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

于包墩庆。杨增新立即调元湖炮队赶赴察罕通古支援。7月4日夜，叛军四五千人在俄军协助下，向察罕通古发起进攻。张键率部依托工事抵抗，5日拂晓发起反击，毙敌二百余人，将敌击退。这时，丹必占灿正率叛军三千人由乌梁海向布尔根河开进，并拟分兵绕道切断杨军后路。杨增新为了缩短战线，决定将驻布尔根河之马步两营撤至察罕通古，使该处兵力增至马步七营、炮队一连；同时，调马步七营分驻元湖、乌什克等处，加强察罕通古后方之防御。

7月11日晨，叛军马队三千余人再次从察罕通古正面发起进攻。张键率部反击，敌败窜山中。另路叛军七八百人，绕至察罕通古南面山中，向守军第四营发炮轰击。张键急派备补营长马得贵、团副杨庆明率队前往支援。经四小时激战，将敌击退，营长马得贵不幸阵亡。是役，先后击毙叛军三百余名、战马五百余匹。

外蒙叛军连遭失败，锐气大挫。不久，其统兵官“照会”政府军，提出两军“各辑地界”，并约“趁机退兵”。杨增新亦列举不利于继续作战的各种“理由”，密陈北京政府，主张妥协停战。因此，丧失了乘胜反击的时机。

9月间，沙俄侵略者乘伊犁援军回防之机，以中国士兵刺伤俄领事为借口，出动俄军一混成旅（约千余人），侵入阿尔泰首府承化寺（今新疆阿勒泰）一带，又派俄兵数百人，侵占了布尔根河。同时，威胁利诱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背叛祖国，宣布“独立”。10月初，帕勒塔盗用“阿尔泰办事长官”的名义，与沙俄驻阿尔泰领事签订了所谓《临时条约》；12月，又签订了《中俄军队停战条约》，允许俄军和外蒙叛军驻扎阿尔泰区东部，规定新疆援军撤出察罕通古。消息传开，全国舆论哗然，纷纷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北京政府不得不下令将叛国分子帕勒塔撤职，并宣布由帕勒塔与沙俄非法签订的“条约”一概无效。经多次交涉，直至1915年3月，才确定外蒙叛军退出阿尔泰地区，新疆援兵从察罕通古退驻元湖，沙俄撤走部分侵略军，但仍有两连骑兵留驻该地。

蒙古驿站，其距离依道路和人口分布情况而异，近者七八十里，远者一百三四十里。

第二节 沙俄策动呼伦贝尔“独立” 和乌泰叛乱 (1912年1月—11月)

一、呼伦贝尔“独立”与胪滨之战

沙俄一手导演外蒙“独立”之后，即唆使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君主”的名义打电报和写信给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的王公，煽动他们率众叛乱，脱离中国。1912年初，沙俄驻呼伦贝尔领事乌萨蒂操纵和指使额鲁特旗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旗总管车和扎、索伦旗总管成德等人，调集附近各旗蒙兵一千人，以“大清帝国义军”的名义发动叛乱。1月15日，叛乱武装在俄军暗助下，进入呼伦（今内蒙海拉尔市）城内，占领官署，逼迫政府官员交出行政权和撤出当地驻军。当时，呼伦道台准备率兵反击，沙俄领事公然威胁说：“双方交战，炮弹若落入站界，即行调兵干涉”。道台害怕引起中俄争端，被迫退出衙署，并电告黑龙江巡抚“速派兵剿办”。胜福等占领呼伦后，立即宣告“独立”，并成立了伪“自治政府”。哲布尊丹巴授胜福以“参赞大臣”头衔，作为伪“大蒙古国”驻呼伦的“总督”。

北京政府得知上述情况后，立即派人劝说胜福取消“独立”，同时电令黑龙江巡抚“派兵弹压”。沙俄驻齐齐哈尔领事照会黑龙江巡抚，声称：对于呼伦贝尔事件，依照俄国政府的训令，如果中国政府与蒙古兵开战，俄国将守中立，但不许在东清铁路开战，不许用火车运送中国军队。显然，沙俄竭力阻挠政府军的行动。

1月下旬，黑龙江巡抚多次派人劝说胜福取消“独立”。因沙俄从中阻挠，胜福不但不听劝说，反而继续发动武装进攻。2月2日晨，叛军四百人和化装成叛军的沙俄侵略军约一个营向胪滨城（今内蒙满洲里）发动进攻。守卫胪滨城的巡防兵一个营立即还击，毙沙俄西伯利亚第十五号联队军官劳喀普林斯基及俄兵四名、叛军二十名，伤敌多名，缴获沙俄军用地图十幅。

2月4日黎明，沙俄“马步兵二千余名，大炮六尊，并残败蒙兵二百余名”，将胪滨府衙包围。上午11时，沙俄官员进入府衙进行威胁，“限12点钟交枪马，否则开炮轰击”。北京政府害怕中俄冲突进一步扩大，遂命胪滨等地的驻军撤走。沙俄的侵略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

1915年11月6日，在沙俄的胁迫下，北京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关于呼伦贝尔之协定》。该《协定》虽然承认呼伦贝尔为直属中央政府的“特

阿尔泰包括阿勒泰乌梁海、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三部，原属科布多大臣管辖，以后科、阿分治，设立阿尔泰办事大臣，民国成立后改为办事长官。1919年，中国政府把阿尔泰区改为阿山道，划归新疆省。

当时新疆驻军共有二万三千余人，即杨增新所部一万七千人，伊犁镇守使广福所部六千余人。

《国务院致杨增新、广福、帕勒塔电（1912年11月14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别区域”，但仍由沙俄扶植的胜福叛国集团的武装所控制，政府军队非经俄国准许，不得进入该地区。《协定》还规定除关税和盐税归中央政府征收外，其它一切税收和各业收入，均作为地方经费；北京政府承认沙俄与胜福集团订立的各种“合同”。这样，实际上使沙俄对呼伦贝尔地区的控制合法化。

二、乌泰叛乱与洮南、镇东之战

沙俄和外蒙叛国集团侵占了呼伦贝尔地区后，又指使早被它收买的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即札萨克图旗治，今内蒙乌兰浩特东南）郡王乌泰发动叛乱。

1912年4月，乌泰拟联合哲盟十旗发动叛乱，因缺乏武器，遂派协理台吉诺庆额（即色楞旺保）和葛根庙的锡勒图喇嘛等为“特使”，赴库伦求援。哲布尊丹巴答应“兵力武器，尽力援助”，并任命乌泰为“进攻中华民国的第一路总司令”。乌泰与外蒙傀儡集团私通的情况，被洮南（今吉林洮安）知府孙葆璠侦知，报告了奉天都督赵尔巽。赵令孙严加查防。孙葆璠要私赴库伦的“特使”到府谈话。乌泰认为“事已泄露，无法掩盖”，“与其受制于人，莫如先发制人”，遂与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约定，由两旗首先发动叛乱。8月上旬，乌泰发布了征兵及编组叛乱武装的布告，令所有军队在洮儿河东岸集结待命，并发布了所谓“东蒙古独立宣言”。乌泰认为洮南、镇东（今吉林镇赉）位居要冲，夺占两地后，其它各县即可唾手而得。

乌泰计划分三路进兵：以锡勒图喇嘛为元帅，那孙德格吉勒胡为副元帅，硕代喇嘛图布新阿木尔为参谋，率四百人为中路，由乌泰王府出发，直取洮南；命葛根喇嘛为统领，协理巴图吉尔嘎拉为副统领，乌勒木吉为参谋，率五百人为左路，由葛根庙出发，进攻白城子；命嘎钦喇嘛为统领，孟和朝克图为副统领，布呼吉尔嘎朗为参谋，率三百人为右路，由嘎钦庙出发，进攻突泉，并夹攻洮南；命周福堂、陈辅廷为统领，招集民兵为预备队，并负责后勤补给。同时，催促其它各旗出兵接应。但各旗均抱观望态度，未敢马上附从。

8月中旬，乌泰叛军迅速逼近洮南。知府孙葆璠急电赵尔巽告急求援。赵尔巽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奉天（今辽宁沈阳市）成立军政筹备处，在昌图设立兵站部；命驻郑家屯（今内蒙双辽）巡防队后路统领第二骑兵旅旅长吴俊升为先锋，率八个营驰援洮南，都统金寿山部为后续部队；电请黑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防蒙编二”，第4页。

《王云骥报告上月俄领酒醉被伊军打伤已了结等情电（1913年9月11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呼伦贝尔志略》“兵事”。站界，即属车站管辖的地界。

龙

江都督宋小濂派兵在嫩江西岸警戒，并进攻镇国公府；电请吉林都督陈昭常派兵进至伯都讷方向，监视沙俄的动向，并经安广夹攻札萨克图旗（乌泰王府）；命新民屯（今辽宁新民）的第二十师抽调步、骑、炮、工兵共二千人（携大炮九门），第二十四师调骑兵一个旅及右路巡防队四营，溯辽河北上，至郑家屯集结待命。

在各路援军尚未到达前，孙葆璠鉴于形势紧张，兵力单薄，决定采取缓兵之计，先派人与叛军谈判议和。结果，被叛军拒绝。孙又用疑兵计，将仅有的二百名城防队扮作援军，夜出昼入。乌泰受骗，迟迟未敢进攻。但孙葆璠恐日久被敌识破，遂率队弃城而走。

在乌泰部署向洮南进攻的同时，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纠集本旗五百余人，集结于镇东城东二十余里之包特敖瑞村，以商谈民族纠纷为名，邀请城防队军官李把总赴宴劝降。李不允，被扣留。8月20日，拉喜敏珠尔率叛军攻城。该县知事命哨官李家成率军警二百余人竭力抵抗。已通敌的蒙古族士兵乘机在城内放火策应，城防队不明真象，纷纷溃散，县知事及李家成遂率余部撤往白城子。镇东城被叛军攻陷。8月22日，李家成部乘夜发起反攻。叛军疏于戒备，慌忙弃城东窜，于是镇东失而复得。

8月28日，由带队官王伯龙率领的黑龙省援军三百余人向镇国公府发起进攻。经一日激战，占领了镇国公府。叛军向西北方向溃退。拉喜敏珠尔非常沮丧，携家眷逃往札萨克图旗的葛根庙。

8月底，吴俊升部到达洮南，立即向乌泰叛军发起进攻。中路叛军节节败退，左右两路也闻风溃逃。最后，叛军大部撤至归流河北岸设防。此时，归流河北岸有乌泰叛军约五千人，南岸有吴俊升等所率之巡防队约七千人，双方形成对峙。9月12日，吴俊升决定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协同下，向乌泰叛军发起进攻。在炮兵掩护下，吴部步骑兵强渡归流河，直下王爷庙（札萨克图旗西北十五公里）。乌泰见库伦援军不到，败局已定，遂率残部数十骑，携带家属仓皇外逃，经索伦山（今内蒙索伦）入呼伦贝尔境，后乘车经俄境到达库伦。拉喜敏珠尔也率家属及少数残兵外逃。

乌泰等北逃后，札鲁特左旗的协理台吉官布札普和郭尔罗斯左旗的台吉多尔济公，纠集乌泰余党和部分土匪共千余人发动叛乱，于11月10日攻陷开鲁。这些叛乱武装很快被政府军镇压。至此，乌泰残部全被肃清，沙俄和库伦叛国集团苦心策划的这次暴乱彻底失败。

第三节 政府军抗击外蒙叛军 向内蒙的进犯 (1912年12月—1913年12月)

一、双方作战部署

沙俄煽动哲里木盟某些反动王公响应库伦“独立”的阴谋失败后，即唆使哲布尊丹巴集团出兵进攻内蒙古。外蒙叛军在向内蒙进攻之前，沙俄前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伊尔库茨克军区哥萨克骑兵队长葛布利克大尉等，亲自参加了库伦王公大臣会议，出谋划策。会议确定分兵三路向内蒙进攻：一路由反动王公松木彦、内蒙叛匪头子巴布扎布、渠魁苏带领叛军和土匪七八千人，沿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昭乌达盟的林西一线向内蒙东南及东北部进犯；一路由原内蒙科尔沁左翼后旗叛国王公那逊阿尔毕吉呼、原呼伦贝尔叛国分子达木丁苏伦带领叛军四千余人，沿库张公路向内蒙中部进犯；另一路由土谢图汗部盟长察克都尔札布和内蒙叛国分子海山、锡勒图喇嘛、陶什陶胡、东西盟统帅班的达（即王德呢吗）等率领叛军数千人，进犯内蒙西部的中公旗（今内蒙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武川、四子王旗、陶林（今内蒙察哈尔右翼中旗）等地。各路叛军中均有沙俄军官充当军事顾问，进行指挥。

1912年底，叛军窜入内蒙，气焰极为嚣张，在很短时间内，先后侵占了昭乌达盟北部和多伦、张家口以北及阴山北麓广大地区。叛军所到之处，焚毁村落，抢掠寺庙集镇，残杀居民，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内蒙各族人民不堪叛军的蹂躏，纷纷逃亡。内蒙驻军也频频告急。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却认为“库兵虽有南犯之耗”，但“为数无多，防剿尚易”，只需“扼要防堵，以杜窜扰，毋庸派兵会剿”。并把希望寄托在中俄谈判上。

沙俄指使叛军入侵和大肆骚扰内蒙的严重罪行，激起了我国各族人民的义愤。北京政府在国内舆论的谴责下，才命参谋部、陆军部统一指挥热河、察哈尔、山西、绥远等地的驻军进行反击。当时的兵力分布如下：

开鲁、赤峰、朝阳、承德、古北口至丰宁一带，驻有热河新军、毅军、第四师和第二十八师各一部，以及直隶、奉天、热河、古北口巡防队等，共二万一千四百人，乌珠穆沁、多伦、打马诺尔（今河北张北东三十五公里）一带，驻有第一师、第四师各一部以及淮军、毅军、察哈尔马队、禁卫军、宣化巡防队等共四千人；张家口、宣化、丰镇、阳高一带，驻有第一师一部、淮军、保卫军以及山西、宣化巡防队和巡警、绿营等，共九千一百人；陶林、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市）、包头一带驻有第一师一部、山西巡防队、绥远陆军、禁卫军、绿营兵等，共五千四百余人。总计共有官兵三万九千九百余人，大炮五十四门，机关枪四十八挺。以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又陆续增

调大批援军。

二、内蒙中、西部的作战

1913年8月,王德呢吗等率叛军数千人进犯内蒙中、西部地区,滂江(今内蒙苏尼特右旗东二十五公里)、拜申图(今内蒙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东北三十公里)、大余太诸要隘相继失陷,匪氛颇为猖獗。王德呢吗还遣军一部窜犯后套地区,胁迫各盟旗出兵,绕道围攻包头,于是“晋甘边境,骚然不靖”。

绥远将军张绍曾任命驻大同、包头一线之晋军第一师旅长刘廷森为西路司令,旅长陈希义为东路司令(以上两路仍归该师师长孔庚指挥),驻归化之朱泮藻为中路司令,各率所部协同防御,相机进剿。以上总兵力约四千余人。

(一) 粉碎叛军对后套的进攻

1913年5月下旬,内蒙西部地区的形势日益紧张。西路军已退到鄂尔多斯旗(今内蒙包头西南一带地区),包头等地相继告危。张绍曾立即派兵增援。

6月初,得到增援的西路军与叛军进行多次战斗,均获胜利,遂采取分进合击之策:赵守钰团从中路、谭涌发团从北面、宁双安团从南面,向大余太等地发起进攻。6月9日,刘

廷森所率之赵守钰、宁双安两团,与叛军千余人于老爷庙遭遇,将该敌击退。次晨,叛军分三路来犯,刘廷森率部迎击,再败叛军,收复台梁(大余太东南二十三公里)。此时,谭涌发部由北路袭占了二分子(今内蒙固阳西北三十公里),威胁叛军后路。13日,刘廷森令各团继续发动猛攻。叛军不支,纷纷逃窜。刘廷森率部乘胜收复大余太和台梁南面的乌拉山。此时,宁夏镇守使马福祥率百人路过河套赴京,与王德呢吗叛军遭遇。马福祥所带兵力虽少,但能随机应变,以接洽“助战”为名,于7月2日智擒了匪首王德呢吗及其参谋官彭索胡鄂木加和统领韩福海等十人。该股叛军因无人统率,遂全部溃散。

(二) 黑沙土庙、百灵庙之战

在西路军肃清窜犯后套叛军的同时，中路军亦开始反击。5月下旬，叛军二千余人盘踞百灵庙东南之黑沙土庙（今内蒙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东南三十五公里）一带，另有千余人据守百灵庙，并由库伦派后续部队继续南来，准备进攻归化。朱泮藻决定由新到援军第八十混成团团长徐廷荣率所部为右支队；二团团副堵雪笠率该团为左支队；另将所有马队编为一团，由团长特克慎指挥，为预备队。计划“先将黑沙土庙之匪歼灭，再进攻百灵庙”之敌。

1913年7月7日，徐廷荣率右支队进攻黑沙土庙。叛军依托工事负隅顽抗。徐廷荣部先以大炮轰击，继由营长王庆麟率部猛冲。自下午2时一直战至5时半，叛军不支，向西北方向退却。8日晨，左右两支队分头向后厂汗（黑沙土庙南三十八公里）前进。上午11时，与叛军一千二百余人接战。两个支队和骑兵团互相协同，奋勇冲击。直至下午3时，叛军仍拚命顽抗，不稍退缩。朱泮藻令炮兵与机枪连变换阵地，以火力侧击敌人两翼，敌始披靡，向百灵庙逃窜。朱部随即进驻后厂汗。

黑沙土庙之战获胜后，朱泮藻部用一天时间进行了进攻百灵庙的战前准备。7月10日晨，各部由后厂汗轻装出发，10时抵达百灵庙南面一带高地，并立即发起攻击。此时，百灵庙已集聚叛军五千余人，并筑有防御工事。战至下午1时，朱部攻击未能奏效，而部队已甚疲劳，又值天雨，无法露宿。朱泮藻电请暂返后厂汗，“候令行止”。张绍曾接电后，除令朱泮藻部继续进攻外，又令乌兰花（今内蒙四子王旗）一带部队向西北相机剿堵。朱泮藻接电，立即率队冒敌猛烈炮火奋勇直前，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阵地。下午4时许，叛军从百灵庙溃走。此次战斗，共毙敌四百余名，缴获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给叛军以沉重打击。

（三）西苏尼特和滂江争夺战

1913年5月间，察哈尔军队在滂江、西苏尼特（今内蒙温都尔庙）作战失利。察哈尔都统、陆军第一师师长何宗莲派支队司令李奎元率步骑兵各两营，炮兵、机关枪兵各一连，开赴前线，加强防御。李奎元探知西苏尼特王府有叛军数百名，于5月16日下午率军往剿。17日，进至西苏尼特王府以南，与叛军遭遇，毙敌数十人。李奎元又派骑兵从侧翼抄袭叛军后路，自带各营连从正面进攻。当进至距敌三百米处，忽然狂风大作，尘沙迷目，进攻受挫。李奎元和骑兵团一营营长均受重伤，军心因之动摇，“全军哗溃”。战后，何宗莲命什巴台（今河北张北东十公里）独立骑兵团曹团长暂代支队司令，率步兵三营、骑兵一营又四个连，于镶黄旗、大马群山（今河北张家

直至1920年1月，呼伦贝尔才重新回归祖国。

博尔古德：《札萨克图旗和镇国公旗的叛乱》，《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第74页。

口东北)、马王庙(今内蒙化德西南二十公里)、太仆寺、察罕霍罗(今内蒙化德东南三十五公里)一线进行防御。5月22日,驻守陶林以北的绥远东路司令陈希义派刘虎臣团往攻西苏尼特,中途与敌遭遇,因弹粮不济,又退回四道沟(今内蒙四子王旗东七十五公里)防御。张绍曾为了防止该敌与西路叛军会合,便调中路之孟效曾旅进攻西苏尼特、滂江等地。参谋部、陆军部增调二十师混成团赶赴阳高,加强后方防御;6月间,又任命卢永祥为察防前敌总司令,率混成第五旅出张家口,负责剿办事宜。此时,东、西苏尼特王公均已降附库伦叛国集团,盘踞在西苏尼特王府一带的库伦叛军已增至二千余人,另在镶黄旗驻有叛军千余人,彼此互相策应,气焰甚为嚣张。随后,正白旗、镶白旗王公亦相继降附,形势十分严重。6月17日,孟效曾率部由陶林出发,进攻西苏尼特王府,同时要求驻马王庙之卢永祥部进攻孤山庙之敌,以为声援。6月23日,孟效曾旅攻克西苏尼特王府,继克滂江。但由于卢永祥部配合不力,致使孟旅孤军深入,陷于困境。

滂江、西苏尼特王府距陶林兵站四五百里,驻孤山之敌多次截击孟旅之运输车队,使该旅的供应异常困难。7月初,陶林兵站再次向孟军运送粮弹,中途又遭叛军截击,被迫退回陶林。孟旅因后路断绝,“马匹已倒毙三分之一,人多病,粮已告罄,子弹因连次受敌夜袭,所余无几”。张绍曾一面令东路派兵护送粮弹,一面令孟旅打通粮道。陆军部也急电卢永祥迅速派兵赴援,并令孟效曾“相机进止,如不能久待,即移扎就粮,免生溃变”。卢部为敌所阻,一时不能往援,孟旅被迫于7月中旬撤至乌兰花北面的四子王府一带。于是,滂江、西苏尼特王府得而复失。

9月间,卢永祥部在古鲁巴诺尔(镶黄旗东北三十二公里)与叛军交战,又遭失败,官兵伤亡较多,遂由马王庙退守托罗盖(今河北公会)。镶黄旗、马王庙、大马群均为叛军占领。袁世凯将卢永祥“褫去中将(衔),责令戴罪立功”。时奎苏(今多伦西北约六十公里)方向之叛军鉴于多伦守军兵力较强,便往西南方向窜犯。张家口“附近要塞,已无得力兵队防守,危险情形日甚一日”。直至10月间,高在田骑兵团冒雪力战,将新苏木庙(今多伦西北约三十公里)之敌剿平后,才制止了叛军的进攻,使内蒙中部的形势稍有好转。

三、内蒙东南部的作战

内蒙东南部之林西、经棚(今内蒙克什克腾旗)、多伦一线,是库伦叛军进攻的重点。1913年4、5月间,在游格吉庙(今蒙古额尔德尼察干附近)、

博彦满都：《乌泰王叛乱事件》，《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第94页。

《总统府致热河都统熊希龄电（1913年5月13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尚秉和：《辛壬春秋·外蒙》，第6页。

达里岗崖（今蒙古达里甘嘎地区）之叛军数千人，经贝子庙（今内蒙阿巴哈纳尔旗）等处南下，窜至大王庙（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西六十公里）、什巴尔台、米思庙（两地在内蒙林西北约五六十公里）、浩勒图庙（今内蒙西乌珠穆沁旗南三十公里）、黄瓜梁（今内蒙克什克腾旗北三十公里）等地。政府军迎战连连失利，林西、经棚、多伦前线形势紧张。为了制止叛军的进攻，北京政府先后从各地调集大批援军。5月上旬，于有富混成旅、陈文运骑兵旅从张家口赴援多伦。察哈尔副都统兼多伦镇守使傅良佐令陈旅骑二团留守多伦，骑一团赴援经棚，于有富旅驻守大王庙。此时，热河剿匪总司令、毅军统领米振标率所部一千四百余人及热河北路巡防马队两营、步兵一团，亦已进抵林西附近之刘家营子及什巴尔台一带。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一）收复他他庙、浩勒图庙

1913年6月初，米振标、傅良佐商定了反击作战的计划：米振标从什巴尔台向他他庙、乌泊罗河（两地均在什巴尔台西）进攻，为了防敌南窜，令淮军统领乔建才率骑兵五百人从经棚向北堵截；傅良佐率部专攻黄瓜梁之敌。

6月14日，傅良佐率骑兵一团攻占黄瓜梁，不久又退防经棚。与此同时，米振标与热河北路巡防队统领张玉春、第一团团团长奎文率马步炮兵三千余人，于6月26日攻占他他庙后，继续向喇嘛罕庙、浩勒图庙一带进剿。喇嘛罕庙有叛军一千五百人防守，共分三股：一股在山前正面，一股占据右翼山顶，一股在左翼。6月27日，米振标留步兵一营保护辎重，亲率步马炮兵猛攻正面之敌，迅速攻占了山头，遂用炮火轰击敌之左翼，同时派骑兵一队从右翼迂回敌后。经九小时激战，连占山头十余处，毙俘敌四十余人。叛军退向王子庙。28日，米部再克王子庙，击溃叛军二千余人。因该庙无险可守，于30日撤回米思庙。7月2日拂晓，叛军四千余人突至，分三路向米部进攻，所有险要之处均被占领。米振标立即指挥部队反击。叛军依山据险，拚死抵抗。下午1时，米部步队与叛军展开白刃格斗，骑兵从旁包抄，间用火炮轰击，连夺山险十余处，击毙叛军头目四名、士兵二百余名。叛军不支，向东北浩勒图庙败退。米部以炮火实施火力追击，又毙敌数十人。之后，米振标鉴于敌众己寡，决定回防什巴尔台。乔建才亦率部返回经棚。

（二）克里更、大王庙失守，多伦告急

7月10日，叛军进至大王庙外围据点克里更。该地驻有于有富混成旅沈广聚团所属三百一十余人。11日晨，叛军二千人发起猛攻。经一日激战，未分胜负。次日，沈广聚率骑兵两连、步兵一营增援，抵达克里更后，立即抢占山头，与敌展开激战，将敌击退。沈乘胜率部追击，结果误入敌围，伤亡

甚众。后被迫突围，退守大王庙，叛军乘势侵占克里更。

7月13日上午，匪首苏木亚公爷等率叛军进攻大王庙，守军于有富混成旅张凤鸣团步队怯战，一触即溃，牵动全军，大王庙遂即失守。于旅伤亡四百余人，损失步枪四百余支、火炮一门、机关枪二挺、子弹十余万发，余部退到经棚休整。

8月2日，盘踞于大王庙之叛军三四千人，分窜五花城、罗陀庙、蓝旗（今内蒙那日图）等地，准备向多伦进攻。

大王庙失守不久，王怀庆接替傅良佐为多伦镇守使。8月25日，王怀庆侦知叛军千余人在蓝旗等处集结，遂以淮军和练军步骑炮各队千余人编为混成支队，由淮军纵队司令李际春指挥，陈文运骑兵第一旅一团（携机关枪四挺）为另一支队，由陈文运指挥，于27日出发，分路进攻蓝旗。

8月底9月初，李、陈两支队先后在力不胡图格、哈噶蹋拉、奎苏等地与叛军激战，共毙伤敌千余人、马百余匹。叛军虽然受到重创，但仍愈聚愈多。此时，多伦城防空虚，恐为敌所乘，李际春、陈文运遂率部返回多伦。为了加强多伦的防御，陈文运、李际春等要求将驻防经棚的淮军撤回多伦，经棚则由毅军接防，并请卢永祥、米振标派部队向蓝旗、白旗、大王庙、克里更进攻，使敌首尾不能相顾，以减轻叛军对多伦的压力。9月12日开始，叛军分四路昼夜不停地向多伦进攻。王怀庆等率部固守，以待援兵。

（三）林西被围，经棚失陷

在多伦前线激战的同时，林西方面的战斗也日趋紧张。

9月初，叛军千余人在巴林王府一带集结，企图进袭大板（今内蒙巴林右旗）。土城子（林西南六十公里）一带亦时有叛军出没。热河会办陈光远令文管带率所部前往迎击大板之敌，并命驻乌丹城（今内蒙翁牛特旗）之骑兵营李管带所部及步队一营分扎巴林桥、土城子等处，以为前方之援应。当时，奎文团步马炮一千五百余人防守五十家子（今内蒙新林镇东北二十五公里）、白塔子（今内蒙新林镇东北四十五公里）等处。9月10日晨，热河剿匪司令米振标又派毅军统领常德盛等率骑兵两营、李管带率步兵一营（携炮两门），从什巴尔台驰援五十家子等地，并将调往经棚之骑兵部队调回，作为预备队。是日，常德盛率领骑兵占领了乌泥江左岭，步兵营占领了珠尔沁庙，叛军退向五十家子。11日，常德盛率队攻占了五十家子东十里之太白庙后，乘胜追击，在石门沟（距太白庙十余里）突遭叛军两千人围攻，部队遭到很大伤亡。常指挥骑兵奋力冲杀，始将敌击退。随后，退守珠尔沁庙。

9月14日上午9时，坝后叛军分四路进窥林西。另一支叛军由巴林桥南渡舍力摩河（即西拉木伦河），窜入乌丹附近，劫夺军需，骚扰后路。接着，什巴尔台、汤上（今内蒙热水汤）、刘家营子、大桥上、珠尔沁庙的守军均

遭到叛军的围攻。当时，“多伦吃紧，经棚空防，林西方向岌岌可危”，乌丹、赤峰、围场皆受威胁。护理热河都统舒和均急派参谋兼第二团团团长杨裕三率所部三连（携机枪二挺），于9月16日开赴赤峰、围场，以加强后路之防守；并要求北京政府速派重兵援剿，并催促新任热河都统、毅军军统姜桂题迅速到任，“专固热河，徐图援多”。

9月17日，米振标部将围攻林西之叛军击退。18日拂晓，叛军又分十余股向林西猛扑。米振标令部队抢占山险，分头抵抗，经两昼夜激战，给敌以重大杀伤，再次将敌击退。米振标恐叛军绝其坝外守军退路，遂将坝外部队撤回林西。

在叛军围攻林西的同时，另股叛军趁经棚驻军回防多伦、米部尚未接防之隙，侵占了经棚，并攻占了五十家子等地。于是，林西形势更加危急。

四、击退窜犯内蒙的叛军

自1913年9月以来，叛军集中主力，围困林西，猛攻多伦。北京政府也不断增调援军，力图摆脱被动局面。当时，在多伦方向，先后集中有淮军和于有富混成旅、陈文运骑兵第一旅和练军等部队共约七八千人；在林西方向，计有毅军步队九大营，骑兵和炮队各一营，新收土匪马队四大营，另有热河混成旅奎文团等，共约万余人，分别驻于什巴尔台、刘家营子、林西、汤上等地。为了粉碎叛军对多伦、林西的重点进攻，北京政府参谋部、陆军部于9月底10月初又令河南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率第十六混成旅及归其节制的七十九混成团，经张家口赴援多伦；奉军骑兵第二旅旅长兼洮辽镇守使吴俊升率所部及巡防队步马六营径赴林西。为了保障翼侧的安全，参陆两部还电吉林护军使孟恩远从吉林抽调三千人，协同吴俊升留下的巡防队马步九营，加强洮辽方向的防御；并令归绥方向之驻军积极配合作战。

（一）林西解围和收复经棚、大王庙

1913年10月初，叛军围攻林西日急。10月1日，常德盛所部在北大营子（今内蒙林西东北十公里）与叛军激战竟日。2日，叛军千余人三面围攻刘家营子，毅军以步骑炮五六营之众全力抵抗，将敌击退。林西三面被围，毅军坚守孤城，“兵力已疲，子弹将尽，危险万状”。

10月12日，吴俊升旅团长石得山率骑兵第四团由辽源经开鲁、乌丹驰援林西。姜桂题亦督师出关，于17日抵朝阳。姜以巡防队五个营留驻朝阳，

《张绍曾给袁世凯电（1913年7月6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何宗莲给袁世凯电（1913年5月25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张绍曾给袁世凯电（1913年7月10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亲率五个营赴赤峰，另以五个营驰援林西。10月21日，驻守刘家营子的毅军向叛军反击获胜。22日，米振标令毅军步队和石得山骑兵团进攻珠尔沁庙，中途与敌军接仗，连战皆捷。叛军焚巴林王府西遁，林西之围遂解。姜桂题令米振标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先迅速肃清林西周围百余里内之残敌，解除后顾之忧，再规复经棚。

10月29日凌晨4时，石得山团与毅军会攻经棚。经棚驻有叛军三千余人，环城修筑了围墙、堡垒，工事比较坚固。石团从左翼进攻，连夺外围哨卡十四处，并于经棚后山击毙叛军统领三吉迷吐、五喇嘛等大量官兵，攻入经棚街东关帝庙。上午11时，毅军从中路攻入，两军联合奋战，于下午5时收复经棚。叛军向西逃窜。

吴俊升与帮统陈锡武、骑兵三团团团长诺门巴图率队经黄花庙（今内蒙巴林右旗东五十公里）、大板等地，粉碎了叛军的阻击，于11月9日驰抵林西。11日，吴俊升率军赴经棚，与米振标研究具体作战计划，决定分三路实施进攻：左路以诺门巴图、石得山率骑兵三、四两团，经毛盖他拉、白土井子向大王庙进攻；右路以奉军巡防队帮统陈锡武、毅军营务处张殿如各率所部，经太子府等处向大王庙进攻；中路由吴俊升、米振标统率，取道水头前进。

11月18日，吴俊升、米振标率奉、毅两军进抵水头，侦知叛军二千余人在驼罗庙、沙坑一带据险设卡，准备顽抗。吴俊升、米振标当即令诺门巴图、石得山率骑兵三、四两团由左路迂回沙坑东、南两面，陈锡武、张殿如等各率所部由右路驰赴驼罗庙北面，切断叛军后路；吴俊升、米振标率本部从正面进攻。当中路行至沙坑附近时，忽然尘沙四起，蔽不见人，叛军又突然以密集火力射击。吴、米指挥部队发起猛攻，叛军后退。中路军乘胜前进，接近沙坑时，叛军援军亦已赶到。这时，诺门巴图、石得山所部已迂回到沙坑西面，占领了南山阵地。但叛军仍拚死顽抗。吴、米激励士兵，指挥步骑炮各营密切协同，分割包围叛军，迫使其退守后山。下午5时左右，陈锡武、张殿如所部从北面迂回袭击叛军后路。在左中右三路奋力夹击下，叛军由沙坑、驼罗庙退向大王庙。

攻克沙坑、驼罗庙后，吴俊升和米振标率部于当晚12时分三路向大王庙进攻。大王庙“前临鱼泽，后枕崇山，附近百余里中，沙深没膝，随高下俱成坑塹”，先有大股叛军盘踞，又有驼罗庙等处残军麇集，共约三千人。叛军在南面沙堤中层层设卡，东据莽牛泡子沿岸高山，扼险防守。吴俊升和米振标将中路步炮各队分成两路，攻击敌东、西两侧；另以一部兵力居中直进，连破敌卡六处，复仰攻山上之敌；诺门巴图、石得山率左路部队从左翼猛攻西南沙梁一带之敌。叛军乘西北风正猛，纵火烧草，企图阻止中路军的进攻。吴俊升和米振标亲率部队冒火冲锋。叛军退守庙前断墙破堡，继续顽

抗。中路军集中炮火连续轰击，庙宇中弹起火。叛军无法存身，败退后山。与此同时，南北两股叛军亦被左右两路军击退。奉、毅两军乘势分三路追击，毙敌五六百名，俘敌三十余名，夺获大批军用物资。至下午4时，攻克大王庙。

战后，米振标率部回防林西，吴俊升率部返回经棚。盘踞黄瓜梁之叛军得知大王庙失守，遂“闻风远颺”。不久，政府军将巴林王府、什巴尔台、五十家子、经棚、驼罗庙、大王庙等处的残余叛军先后剿平。

（二）昭苏乃木城和奎苏之战

在奉、毅两军反攻经棚、大王庙时，多伦方向的政府军亦展开了反攻作战。

第八师师长王汝贤所率之第十六混成旅及二十师第七十九混成团，自10月初受命北上后，因赶制皮袄皮裤，迟至30日才全部到达多伦。王汝贤与多伦镇守使王怀庆等研究了对昭苏乃木城（多伦西北三十公里）、奎苏、黑风庙（多伦北三十公里）之敌的进攻方略。其部署是：以淮军步马炮各营二千七百余人为一纵队，由李际春指挥；以第八师步兵四营和山炮、陆炮、机关枪各一连共二千五百余人为一纵队，由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何锋钰指挥；以陈文运骑兵第一旅八百余人作为总预备队；为了保障多伦之安全和后方粮道之畅通，以第八师步兵三营、炮兵两连、机关枪一连、马队两连及淮军新兵五百名、骑兵二百名防守多伦；另以第八师步兵两营，分驻后方要道闪电河（今河北沽源东北十公里）与大梁底（多伦西南六十公里）；淮军马队三营往来巡逻，负责联络。李、何两纵队及陈旅于11月2日同时出发，依次向昭苏乃木城、奎苏、黑风庙发起进攻。

11月3日，何锋钰、李际春两纵队自带柴水，履冰踏雪，合力进攻昭苏乃木城，击毙叛军指挥官那木斯赖巴图鲁及其所率官兵数百名。叛军二千余人退守奎苏。11月6日晨，何锋钰纵队由乌苏台沟（多伦西北四十公里）出发，向奎苏及札克苏台（多伦西北五十公里）方向进攻。11时，在奎苏南端与敌接触。叛军集中札克苏台、黑风庙的驻军以及从经棚、昭苏乃木城撤退的部队共七千余人，防守奎苏。奎苏三面环山，地势十分险要。何锋钰率步兵三十二团附陆炮、山炮各一连为主攻部队，以步兵两营、机关枪一连为预备队，进攻中央山顶阵地；李际春率淮军步兵支队附山炮队进攻右翼山顶；团长张建功率第七十九团附山炮队进攻左翼山顶；陈文运率骑兵旅负责后方掩护，防敌迂回；高青云率骑兵百余人，迂回叛军之右翼。进攻开始后，叛军以猛烈火力进行拦阻。政府军以炮火进行压制，掩护各营团进攻。至下午5时，叛军不支，纷纷向西北方向逃窜。此次战斗，共毙伤叛军官兵二千余名，俘虏百余名，毙敌马六七百匹，夺获敌马九十余匹、牛车二百余辆。

正当奎苏前线激战之际，叛军二千余人突然袭击政府军的后方。骑兵第

一旅苑尚品、郑后彦两团协同何锋钰所派预备队步兵一营，奋勇迎战，将敌击溃。

奎苏之战后，叛军大将军忙乃巴图率残部向蓝旗一带窜逸，乌拉玛等率残部退回黑风庙。11月15日，王汝贤、王怀庆命第八师步兵团长朱文藻率步兵两营、炮兵和机关枪各一连，淮军骑兵统带甄文龄率骑兵六百名、山炮一队，于21日出发，进攻黑风庙。届时，黑风庙叛军闻风向西北逃窜。王汝贤立即将步炮改作后梯队，交朱文藻带领，将多伦所有骑兵统一编为前梯队，由甄文龄率领，星夜追击，截住敌辎重队，夺获牛马羊三百余头、枪支弹药一部。至此，昭苏乃木、奎苏之战遂告结束，多伦附近的叛军全部被肃清。

叛军为了策应经棚、多伦方向的作战，曾向内蒙中、西部的托罗盖、石拉干（大余太北十五公里）、大余太等地发起进攻，在百灵庙一带再次发生了激战。结果，均被当地守军击退。从此，内蒙各地的政府军改变了被动不利的态势，由防御转入了进攻。1913年底，外蒙叛军陆续向库伦败退，沙俄妄图控制整个蒙古地区的图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第四节 《恰克图协约》的签订和击退 巴布扎布匪军对内蒙的窜扰 (1914年9月—1915年11月)

一、《恰克图协约》的签订

在沙俄政府的压力和日、法、英、德等国的“调停”下，中俄两国从1912年11月起开始就蒙古问题举行谈判。由于沙俄政府态度蛮横，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谈判曾一度中断。1913年9月，在北京重开谈判，于11月5日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在《声明》中，袁世凯卖国政府承认外蒙古“自治”，声明不干涉外蒙“内政”，不在外蒙驻军、移民和派遣文武官员。在中俄互换的照会中，还规定以后“凡关于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允许和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俄国则承认了中国对外蒙古有名无实的宗主权。

根据《中俄声明》，于1914年9月8日在恰克图举行了中俄蒙谈判。在会议上，俄国代表名为“调停”，实则对中国北京政府代表进行刁难要挟。经过九个多月的谈判，于1915年6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亦称《恰克图协约》）。该协约实际上是《中俄声明文件》的进一步具体化，规定了中国在外蒙古行使宗主权的一些表面性条款，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称号及“共戴”年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采用民国年历。北京政府则承认沙俄在外蒙古取得的各种特权，事实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殖民统治。

沙俄在策动外蒙古“独立”的同时，还派军队开入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强行霸占了我国十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915年恰克图会议时，北京政府代表提出了唐努乌梁海问题，沙俄代表竟拒绝讨论。沙俄侵占我国唐努乌梁海地区，历届中国政府均未予承认，亦从未声明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二、击退巴布扎布匪军对内蒙的窜扰

在《中俄蒙协约》签订后，沙俄侵吞内蒙古的野心仍然不死，不断指使外蒙叛军进行武装骚扰。沙俄政府利用中国北京政府与它互换照会时所发表的对于叛逃外蒙参与库伦“独立”的内蒙人员，允许他们返回内蒙原籍，不予治罪的声明，于1915年冬派遣巴布扎布率领叛匪数千人，以返旗名义窜入内蒙，大肆骚扰抢掠。当北京政府令其解散匪众，停止骚扰时，巴布扎布竟进行武力抗拒。北京政府遂令多伦、林西一带驻军进行围剿。在政府军的

《何宗莲给袁世凯电（1913年9月10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沉重打击下，巴布扎布于同年 11 月中旬率匪众逃到外蒙境内的游格吉庙。多伦镇守使萧良臣率部跟踪追击，于 11 月 16 日进占堪布庙（距游格吉庙百余公里），侦知巴布扎布准备进行反击。当时，萧良臣所率兵力仅及巴布扎布匪军的三分之一，若向后路调兵，相距千里，缓不济急，若采取守势，又将被动挨打。萧良臣考虑到与其“坐以待困，莫若先发制人”，遂一面发电请示上级，一面行文驰送巴布扎布，“以缓其攻我之心”。同时，激励将士积极进行袭击巴匪的准备。萧良臣在得到上级允许后，于 11 月 20 日夜，冒风踏雪，率部由山间小道兼程前进。萧部昼匿沙窝涧谷，日落继进，越过匪卡堡垒，于 22 日黎明出敌不意地直捣匪巢游格吉庙。巴匪于睡梦之中突遭袭击，惊惶失措。萧部“奋勇直前，势如潮涌”，当场毙匪千余名。上午 11 时，巴匪向东北逃窜。萧良臣下令分头追击，又生擒七百余名，夺获大炮一门、机枪一挺、步马枪千余支，其它物资无算。

沙俄惟恐巴匪残部被全部消灭，便指使外蒙“自治”政府“总理”赛音诺颜汗及“外长”辅国公车林多尔济，到北京政府驻库伦的都护使公署进行交涉，要求政府军退出外蒙古。这种无理要求，当即遭到都护使的驳斥。事后，外蒙“自治”政府派出蒙兵一千名赴游格吉庙，另一千名赴乌得、巴尔虎东北各处，名为防堵巴匪，实为防堵政府军。11 月 28 日，沙俄驻库伦总领事米勒尔又亲自出马，与中国驻库伦都护使进行交涉，胡说中国政府军进入外蒙违反了《中俄蒙协约》，狂妄声称“外蒙为中国领土，不过是条约上之名词，内外蒙本有界限，自不应随意侵越”。米勒尔还以沙俄政府的名义，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军退出外蒙古。库伦都护使当即给予批驳，并揭露沙俄支持巴匪的种种事实。沙俄领事无言对答，狼狈而返。后来，北京政府在沙俄压力下，下令政府军停止追剿。巴布扎布率残匪逃到外蒙与呼伦贝尔交界的喀尔喀河一带，受到沙俄侵略者的直接庇护。以后，巴布扎布又投靠日本，充当俄、日帝国主义的双重侵略工具。1916 年 10 月，在其窜犯林西时，被政府军击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外蒙傀儡集团失去了靠山。在这种形势下，外蒙古“自治”政府的王公大臣，于 1919 年 11 月联合上书民国政府，“情愿取消自治”，宣布与沙俄所订的条约、协定“概无效力”。1920 年 1 月，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亦要求撤销“特别区域”，废除与沙俄政府订立的“协定”与各种“合同”。沙俄妄图侵占我国蒙古地区的阴谋终以失败而告终。

《舒和均给袁世凯电（1913 年 9 月 18 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舒和均给袁世凯电（1913 年 9 月 18 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第五节 反对沙俄侵蒙战争的经验教训

反对沙俄侵略蒙古的战争，不仅对于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政治、军事上也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

一、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沙俄选择中国辛亥革命前后国内政局动乱之际，策动外蒙“独立”，并唆使外蒙叛军向内蒙大举进犯，这对于我国反对沙俄的侵略扩张活动，确实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中国仍然具有不少有利的条件。首先，库伦集团的卖国投敌活动，不仅遭到广大蒙古人民和许多爱国王公、喇嘛的反对，而且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因而反击沙俄侵略，乃是民心所向。其次，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俄国的主要力量用于对欧洲的争夺，其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沙皇的反动统治已面临崩溃的边缘。尽管沙俄的侵略野心很大，但也有不少困难。俄国外交大臣沙佐诺夫曾直言不讳地供认：“今亟欲并吞蒙古，其势有所不能”。因此，如果中国政府能在外交上军事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可以挫败沙俄帝国主义对蒙古的侵略扩张活动的。无奈，当时的北京政府完全承袭了清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沙俄的威胁面前，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步步退让妥协，结果反而助长了敌人的气焰，使沙俄策动的“独立”和暴乱接连得逞，未费多大气力即占领了外蒙及内蒙的广大地区。

政治上退让妥协，军事上必然消极防御。当新疆大量出兵阿尔泰，准备收复科布多之际，北京政府竟电令部队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从而失去了攻歼敌人和收复失地的时机。当沙俄参与并指挥外蒙叛军大举进犯内蒙时，我国在内蒙前线的兵力，就其数量与质量来说，都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分兵把口，消极防堵，结果很快丢失了大片土地。后来，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调动军队进行反击。结果，非但没有引起中俄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而且仅经半年多的时间，即打退了叛军的进攻。可是，在军事反击胜利之后，袁世凯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实现其独裁专制统治，不但不敢继续用武力收复外蒙，反而很快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和《中俄蒙协约》，使外蒙的权益几乎全被沙俄攫取。如果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外蒙早已成为沙俄的殖民地。这些事实再一次表明，国家不能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便难于在外交和军事上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就难于捍卫领土主权的完整。

《舒和均给袁世凯电（1913年10月8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二、必须十分注意加强边疆地区的建设

由于清政府日益腐败，长期忽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经营，致使经济、文化、交通处于落后状态。这不仅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给国防的巩固带来严重的影响。由于物资贫乏，补给困难，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驻军很少，因而一旦有事，便难以应付。外蒙与内地横隔沙漠戈壁，交通极为不便。在沙俄不断侵略我国边境的情况下，清政府曾有关于加强边疆建设的议论，并有修筑张库铁路的建议，但又认为张库铁路收益不大，因而改建了京绥铁路，致使张家口至库伦的交通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结果，外蒙事变发生后，北京政府不能及时迅速地将大批军队调往前线。由于交通不便，造成了补给困难，许多部队由于军械、粮秣不济，不能及时发动进攻，甚至被迫后撤。

三、必须因地因敌制宜地编组部队，讲求战法

根据蒙古地区的自然条件，自古以来用兵作战利于骑兵，不利于步兵。外蒙叛军大部是骑兵，行动快速。这就多少弥补了其数量不足和组织不严的弱点。政府军的装备虽优于叛军，但多数是步兵，行动缓慢，以致外蒙叛军向内蒙进犯初期，政府军经常受到袭击。当地吃紧时，增援部队往往缓不济急，以致遭到不少损失。政府军在连遭挫折以后，认识到“出探搜索及传达命令，以及抄袭御敌迅速，非有得力马队，万难取胜”。于是，就地招募和改编部队，组建骑兵营、团，并从后方增调骑兵旅，从而大大改善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在反击战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还认识到“非有得力炮队，不能收杀敌之效”，因而组建了以步、骑、炮、工、辎诸兵种合成的混成旅、团，增配了火炮和机枪，进一步加强了步兵的火力，有效地遏制了叛军骑兵的突击。在战术上，后来接受了由于孤军冒进，多次遭敌围攻的教训，改取多路协同，迂回包抄等战法，既避免了敌骑的袭击，又增加了歼敌的机会，从而改变了被动局面，终于取得了反击作战的胜利。

四、平时必须切实做好战备工作

外蒙“独立”后，傀儡集团在沙俄支持下，组织叛军四处攻城掠地，得逞于一时。而北京政府迟迟不能组织军队进行反击，除了政治上执行退让妥协政策外，平时战备工作不落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前线战事吃紧时，

《吴俊升、米振标给袁世凯电（1913年11月18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巴布扎布，原为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旗（今辽宁阜新）人，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惯匪，后卖身投靠沙俄。

从赤峰派往林西、开鲁增援的部队，途中遇河水暴涨，因无工兵，只好临时雇工赶造船只、架设浮桥，不仅延缓了时间，也贻误了战机。由于平时没有固定的储备物资，当前线械弹告急时，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从后方部队中抽调，以保证前线的需要。又由于未能根据沙漠草原地区的特点，组织数量充足的驼马运输队，因而前线需要作战物资急如星火，而后方的物资迟迟不能前运。这也影响了部队的作战。此外，政府军的编制、装备也极不统一，如毅军全系大营、淮军全系小营，在练军二百余人的骑兵营中，步枪即有五种之多。这样，不仅影响后方供应，也影响作战指挥。这些都说明，平时不切实做好战备工作，战时是难以应付裕如的。

第二十章 反对英国分割西藏的战争 (1912年3月—1918年10月)

在沙俄侵略我国蒙古的同时，英国加紧了对我国西藏的侵略。它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制造叛乱，驱逐驻藏川军，并支持由亲英分子所控制的藏军向川边地区进犯，妄图制造西藏“独立”，分割西藏地区。当时的中国政府（以下称北京政府）在西藏爱国僧侣和民众的要求以及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令川、滇两省出兵反击，打退了藏军对川边地区的进犯。最后，终于粉碎了英国妄图分割我国西藏的图谋。本章着重叙述川军在西藏和川、滇军在川边地区与藏军作战的经过。

《昆源致统率办事处电（1915年11月25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第一节 英国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叛乱

1903年，英国派兵入侵西藏，遭到当地爱国军民的无情打击。以后，英国便加紧采取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寻找代理人的政策。1905年，英国以所谓会见英国皇太子的名义，用武力劫持班禅九世去印度，优礼款待，百般笼络，企图以班禅取代达赖，充当英国傀儡，结果遭到班禅的拒绝。此后，英国把注意力转向拉拢拉萨地方当局。以大贵族夏扎·边觉多吉为首的一部分封建领主，由于在对英贸易中获得了许多好处，便越来越倾向英国侵略者，并影响了徘徊于内地的达赖十三世的政治态度。

英军于1903年发动侵藏战争后，主张抗英的达赖于1904年英军侵占拉萨前，在沙俄间谍德尔智的怂恿下离开西藏，准备前往俄国，后在外蒙库伦被清政府阻留。1908年10月，达赖辗转到达北京。由于他在抗英斗争中未能得到驻藏大臣的帮助以及其它原因，对清政府怀有某些不满情绪。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乘机进行拉拢，大肆挑拨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使达赖的对英态度有所转变。1909年12月21日，达赖返回拉萨，后在西藏亲英分子的影响下，逐渐倾向英帝国主义，疏远中央政府。

清政府鉴于英军多次入侵西藏，逐渐意识到加强西藏的治理和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紧迫性，于1906年4月命张荫棠领副都统衔，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分入藏，“查办藏事”。张抵拉萨后，参革了在抗英战争中严重失职的驻藏大臣有泰等十余名官员，获得西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随后即着手整顿西藏内政，推行“新政”。1909年（宣统元年）夏，清政府接受驻藏大臣联豫的建议，派川军二千人，编为三营，由知府钟颖统率，从成都出发，取道昌都开赴拉萨。同时，命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进驻昌都，屯兵据守，以便策应入藏之川军。这些，本为中国内政，英国却公然表示反对，并乘机煽动西藏上层中的亲英分子发动叛乱。达赖回藏后，亦下令藏军阻击入藏之川军。

1910年2月初，钟颖率领川军在西藏江达（今太昭）击败了藏军的阻拦，于2月12日进驻拉萨。达赖于当夜与少数亲英分子离开拉萨，逃往印度。清政府革去达赖的名号，下令通缉随同叛逃的几个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达赖逃印后，英帝国主义以帮助西藏“独立”为诱饵，百般拉拢。3月5日，英国政府竟然为川军入藏和达赖被革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6月，英国又派步兵两个纵队及工兵一部（携炮四门），进驻印藏边境，并叫嚷“倘若达赖回藏，藏境发生变化”，英军“则须入藏以当保护之任”，公开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拉萨后，驻藏官员和川军内部分成维护帝制与赞成共和两派，内讧不已，并危及藏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英帝国主义决

定利用这种局势，实现其分裂西藏之阴谋。英印总督与达赖密谈后，随即派遣亲英分子达桑占东（又名擦绒）潜回西藏，策划武装叛乱。与此同时，英国还在西藏边境一带集结军队，以为声援。西藏部分大农奴主乘机以达赖名义发布了实际上是脱离祖国的“驱汉”命令，大肆驱杀汉人，并组织以达桑占东为总司令的“民军”（即藏军）万余人，围攻拉萨、日喀则、江孜的川军，且进扰川边地区。在亲英分子的操纵和毒害下，具有反帝爱国传统的藏军，竟成了破坏祖国统一的工具。

1912年春，达桑占东调集五千藏军向江孜进攻。驻守江孜的川军百余人，固守依山的造纸厂，并向拉萨求援。由于粮食不济，援兵不至，该部川军在英商务专员及尼泊尔驻藏代表的“调停”下，被迫以枪支弹药换取路费，离开江孜，经印度返回内地。不久，日喀则守军也被迫放下武器。同年4月，达桑占东又调集大批藏军围攻驻拉萨的川军。钟颖率千余人据险防御，等待援军。经数月苦战，伤亡不断增加，粮食亦将告罄，处境异常危险。藏军虽人数众多，但战斗力不强，一时也难于攻破川军防线。后经尼泊尔驻藏官员“调停”，双方达成协

议：川军交出武器，由汉、藏、尼三方共同封存，不得擅取；川军全部退伍，经印度回国；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员照旧驻藏，并保留一定数量的卫队。8月中旬，川军交出毛瑟枪一千五百支、开花炮三门、机枪一挺、子弹八十箱。此时，钟颖已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驻藏办事长官，但西藏亲英分子拒不承认，屡次促其起程。钟颖因未得中央同意，执意不走。双方遂复开战。此时，钟颖所部仅约二百人，粮弹俱缺，处境更加困难。后经尼泊尔驻藏官员再次“调停”，钟颖及其所部终于被迫离开西藏。

驻拉萨川军被缴械撤离后，英帝国主义于1912年底武装护送达赖回到拉萨。达赖周围的一小撮亲英卖国分子，公开策划西藏“独立”，并以极其野蛮的手段镇压坚持反帝爱国的僧俗人士。英军亦以“护商”为名，由江孜侵入拉萨。西藏人民和一些爱国上层人士，坚决反对亲英分子分裂祖国的罪行，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独立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表现出热爱祖国的坚定决心。

第二节 川滇两省出兵平乱

一、北京政府的平乱决策及川滇两军的作战部署

正当西藏亲英分子驱赶驻藏川军之际，川边地区的藏族上层分子，由于赵尔丰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危及他们的统治，加之受西藏亲英分子的指使，于1912年5月也发动了叛乱，并得到西藏叛乱武装的直接支持。两月之内，川边地区的不少州县先后落入当地和西藏的叛乱武装之手。巴塘、昌都被围，乍丫（今西藏察雅东）、江卡（今西藏芒康东）、乡城、稻城、理塘相继失陷，河口（今四川雅江）岌岌可危，川藏交通因之断绝。滇、川两督屡请北京政府出兵西征。全国各族人民一致谴责英国勾结西藏亲英分子分裂中国的罪行，猛烈抨击北京政府的对外妥协政策。在舆论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于1912年6月14日正式电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入藏平乱，令云南都督蔡锷派滇军入藏增援；同时，通告英国驻华公使，声明“此次川军入藏全为平乱，至希英国严守局外中立”。

尹昌衡接电后，迅速作了西征的准备。其作战计划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取南北两路“首尾夹攻”的方针，首先控制川边重镇理塘和进藏咽喉要地昌都，而后分别南下，夺取稻城、乡城、乍丫、江卡等地，以巩固川边地区。第二阶段：从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以西的十余营边军中，选拔“有志之精兵”数百名为前锋，其余各军继后，乘胜直趋拉萨。同时派得力喇嘛前往拉萨劝说达赖脱离英国的羁绊，维护祖国的统一。

蔡锷接令后，命滇军参谋厅总长殷承 为西征军司令，率队进发。蔡锷考虑到川滇两军如先会师巴塘，再行进藏，不仅粮秣难继，而且可能扩大由辛亥革命以来所引起的川滇两军之间的矛盾，因此主张滇军经维西及西藏东南地区直趋拉藏。这样，既可缩短路程，又可形成军事上的有利态势，使“滇犄其南，川捣其东，首尾策应，形势都归掌握”。北京政府不同意蔡锷的主张，而令滇军取道中甸北上，先支援巴塘，以固滇边门户。

二、击退藏军向川边的首次进攻

1912年初秋，川滇两军按既定计划分路开进。

7月上旬，尹昌衡率川军从成都出发。原计划出兵八个团，因“器械不

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4页。

《王汝贤致陆军部电（1913年11月12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张绍曾致参谋部、陆军部电（1913年7月11日）》，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

备，师皆未练，饷亦无储”，遂先以朱森林团为先锋，尹自率三个营为本队，总兵力约三千人（一说五千人），兼程西进。其部署是：朱森林率所部两个营及先遣队陈步三一个营为南路，由打箭炉直趋理塘；副官刘瑞麟率蒯书礼营为北路，经甘孜进援昌都；本队三个营驻雅安，相机应援。朱森林以南路藏军势大，设防坚固，力请集中兵力于南路，尹昌衡未允。朱部至打箭炉后，以军孤势单，迟疑不敢前进。尹

昌衡遂亲赴打箭炉进行动员，指出：今川边部队尽被围困，损失甚重，急需支援，只要川军进展神速，出藏军之不意，兵力虽少，必能起到救援作用。经过动员后，川军遂分两路并进。

8月，被尹昌衡破格提升为北路督队官的刘瑞麟，率蒯书礼营由打箭炉出发，日行百余里，往攻道坞（今四川道孚）。沿途扬言尹都督率师十万亲征，即将到达。藏军闻讯，不战而溃，道坞、瞻对（今四川新龙）之围遂解。刘瑞麟便令边军牛运隆部守道坞，刘筱廷部守瞻对；令杜培基、刘赞廷率部从间道驰援巴塘；自率所部及顾复庆、时传文、朱宪文等营往援昌都。当时，驻守巴塘的顾占文部四五百人，已被围三月有余，

粮弹将尽，水源断绝，处境十分危急。援军到后，内外夹击，迅速解围。刘瑞麟率部突然逼近昌都时，藏军不战而逃，防守昌都的彭日升立即率全部三百人出城追击，缴获辎重无算，并俘藏军首领呼图克图。与此同时，朱森林率南路各营亦顺利完成了既定任务。其先锋部队两个营，先在河口击败藏军，又于8月12、14两日收复了麻盖宗、剪子湾、西俄洛三要隘，继而向理塘进逼。围攻理塘之藏军闻风溃逃。至是，川军西进未及三月，即以破竹之

势收复了理塘、巴塘、昌都诸要地。于是，尹昌衡令顾占文部守巴塘，刘瑞麟部守昌都，分援乍丫、江卡、盐井等地；令营长邹衍贵肃清河口一带残存藏军。

在川军进军川边之际，滇省西征军司令殷承 率新军一混成协、防军十九营，从滇西北取道盐井支援巴塘。8月15日，前卫司令李学诗率部进至溜筒江附近。该地藏军依险据守。经李部奋力攻击，藏军退守隔江之墨里村，并斫断江上溜索，以阻滇军前进。李学诗派人另架溜索，命防军、土军各四个排溜渡过江，迂回墨里村。藏军又将村外木桥砍断，据险死守。16日，滇

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1728年，清政府将西藏东部的康定、理塘、巴塘等地划归四川省，将西藏东南部的中甸、维西、德钦划归云南省。

谢彬：《西藏交涉略史》（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38页。

军发起猛攻，于下午3时将该村攻占。

8月19日，殷承 率部抵丽江，随即作了如下部署：以郑开文为左纵队长，率步兵四大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枪兵各一小队 及李学诗的西防国民军，取维西大道直趋盐井；以姜梅龄为右纵队长，率步兵三中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枪兵各一小队及杨汝盛的西防国民军，取中甸大道直趋乡城；司令部及其余各队暂驻丽江，相机进止。

滇军经充分准备后，于8月26日夜突袭侵占盐井之藏军。经激烈战斗，将藏军击溃，并俘其指挥官鲁宗甲约，遂克盐井。

当滇军向川边进军时，怀有军阀割据思想的尹昌衡竟发电阻止，声称“川军围攻理塘，不日可下，滇军无须由维（西）援巴（塘），请由原议，直抵拉萨”。滇军收复盐井后，尹再次电阻，并令顾占文部向盐井一带开进。蔡锷则连电北京政府，以速克巴塘、理塘，“早日规复西藏”为由，要求继续向川边进军。川、滇两军互相攻讦，矛盾加深。后尹昌衡以“若滇军兼进，酿成（英国）交涉，则咎不在川”为辞，要挟中央。北京政府恐“两军逼处，别生枝节”，遂于9月致电蔡锷，令滇军酌留陆军一大队及防军一、二营，专顾滇省门户，余悉撤回。滇军的平乱作战至此遂告结束。

当川军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基本完成后，尹昌衡认为：“控边制藏，非同时并举，无以全领土、维国权”。根据这一方针，他对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了如下部署：命邹衍贵营驻打箭炉、河口，保护川军的后方供应线；命朱森林团为南路，驻巴塘、理塘，相机进攻稻城、乡城；命团长向树荣率所部两个营及陈步三营为北路，进攻甘孜、登科（今四川邓柯）；从朱、向两团中各抽一营驻昌都，作为机动部队；以打箭炉为大本营，随时策应南北两路。不久，南北两路部队连战皆捷，惟乡城久攻不下。之后，尹昌衡任命黄煦昌为司令，由他指挥集中于昌都一带的川边部队，命张茂林为前锋，率部进据江达，待命入藏。

三、英国胁迫北京政府停止向西藏进军

西征军在川边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引起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亲英分子的极度恐慌。为了制止川军入藏平乱，英国于1912年8月17日令驻华公使

四川都督尹昌衡致大总统、国务院电中称：“达赖行文传知边藏四百余处喇嘛，一齐起事，以牵制边军”。见《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简称《民元藏事电稿》——第5页。

刘贯一：《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简史》，第19页。

赵式铭：《西征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223页。

尹昌衡：《西征纪略》，第4页。

朱尔典出面干涉，以“不承认中华民国，并以实力助藏‘独立’”相威胁。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正急欲获得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遂屈从于英国的威胁，于9月下旬一再电令川军停止入藏，以江达为界，“先行肃清川边，万勿越境深入，致启外衅”，从而丧失了进军西藏的良机。

四、击退藏军向川边的第二次进攻

1912年底至1913年初，藏军经波密窜至川边，再次向川军发动进攻。乍丫、江卡、盐井等地首当其冲。川军陈桂亭营败退巴塘，舒云山营被围于南墩（盐井东北约四十公里）。巴塘守军粮食已绝，正欲撤退。尹昌衡急令嵇廉率部驰援，才守住巴塘。不久，黄煦昌率部至乍丫，与顾占文部夹击东犯之藏军。激战十余次，将其击退，乍丫、江卡、南墩之围遂解。藏军战败后，在嘉裕桥（今西藏洛隆东北之嘉玉桥）以西密布碉卡，驻扎重兵，进行防御，并派人四出煽动藏民，准备伺机再行进攻。尹昌衡根据北京政府提出的“步步稳进，以期慎固封城”的方针：令刘瑞麟部守昌都，西遏藏军，南控江卡；顾占文部守巴塘，南防盐井，东控乡城、稻城；朱森林部守理塘，西援顾军，南防稻坝；刘筱廷部驻甘孜，镇守北路。以上各部，有事互相救援，无事坚守不动。另由嵇廉率兵六百于乡城一带游动，以牵制该地藏军。

1913年初春，藏军连续向嘉裕桥、江卡发动进攻，均被川军击败，遂退守烟袋塘（乍丫西），并继续增兵。刘瑞麟见藏军势众，遂调昌都彭日升、时传文两营由西北方向，傅青云、牛运隆两营由乍丫方向，对烟袋塘藏军实行夹攻。2月28日，傅、牛两营首先发动进攻，将凭借碉房、哨卡顽抗的藏军击退。3月3日，彭、时两营进至距烟袋塘十余里处，发现藏军据守山顶，碉卡密布，难以从正面进攻，遂派数十人绕至山后，实行偷袭。藏军猝不及防，惊惶逃窜。彭、时率部追击，与傅、牛两营会师，将烟袋塘之藏军击溃。上万藏军纷纷西撤。至此，藏军的第二次进攻又被粉碎。

呼图克图系清朝授给极少数藏族、蒙古族喇嘛教著名活佛的封号，其位仅次于达赖，班禅。西藏的大呼图克图，有些具有出任地方摄政的资格。

滇军编制，支队相当于团，大队相当于营，中队相当于连，小队相当于排。

《蔡锷电政府转股承 电滇省援军已发势难中止（1912年9月11日）》，《民元藏事电稿》第42页。

第三节 川军攻占乡城，稳定川边局势

川军虽然击退了藏军对川边的第二次进攻，但乡城一带仍为藏军所控制。尹昌衡决定继续从省城抽调部队，厚集兵力，乘胜向乡城发动进攻。这是一次历时较长，并对稳定川边局势具有重要意义的作战。

一、川军的作战部署

乡城地处巴塘、理塘之南，靠近云南边境，周围皆山，城西有桑披岭为天然屏障，城东的无即河水流湍急，不便舟楫航行。此外，马鞍山、冷龙湾、阿都、下洼、门坎山、八格等处，均为险要之地，亦为进攻乡城必由之路，虽山道崎岖，但能通行驮马。乡城驻有藏军三四千人，主要是步骑兵，还有少量炮兵。武器有日式速射山炮、德式管退炮各一门，另有五子、九子、十二子等杂式快枪（平均二三人有一支），其余均为土枪、土炮和刀矛。

1913年4月2日，孙绍骞在理塘接替嵇廉为攻乡总指挥。4日，由省城派出的第四师参谋长刘成勋率混成支队到达理塘。于是，确定了进攻乡城的部署：刘成勋率混成支队步兵三个营、炮兵二个连、机关枪一个排为左路，由理塘经稻城向乡城进攻；孙绍骞率步兵一营和朱森林、周尚赤的两个步兵营及炮队、卫生队等为右路，由喇嘛桠（丫）经火珠乡向乡城进攻。

二、右路军攻占冷龙湾

在右路军发起进攻之前，盘踞乡城的藏军一部突然围攻靠近喇嘛桠的东龚。川军支队长周尚赤率部反击，将藏军击退，并夺获日式速射炮一门，其它军械数十件。右路军首战告捷，士气高涨。孙绍骞决定每兵暂发糌粑两碗，于5月15日分三路发起进攻。16日，一举攻克下洼、阿都，17日又克火珠乡的山根子。因部队缺粮，遂暂驻火珠乡。该处喇嘛寺之堪布罗松成献出杂粮千包，以济军食，于是士气复振。5月23日，朱森林率队由山根子向马鞍山进攻。马鞍山路隘林密，藏军凭险坚守。朱部与之激战一日，未能攻克。孙绍骞令周尚赤等率部往援，合力进攻，始将马鞍山占领。藏军退守冷龙湾的碉房、坚卡，进行防御。川军进攻数日，终不能克。当时部队缺粮缺水，士气颇受影响。6月3日，孙绍骞亲自到达前线，安定军心。6月25日，川军再次发起进攻，将藏军击退，先后攻占了冷龙湾和门坎山。

三、左路军进占稻城

4月25日，左路军进至拉波，侦知藏军在夕波筑有坚卡十余处、碉房数十座，外有散兵壕和深沟。27日夜，刘成勋密令三营营长张建勋率所部及炮兵第二连，参谋赖心辉率预备营一、四连和机枪排，分道潜占各要隘。28日上午8时发起进攻，先用炮火猛烈轰击，继以步兵第九连由界牌山腰向夕波正面，第一、十一连从左右两翼同时进攻。战至下午4时，川军连克十余座碉房，迫使藏军向稻城方向退走。夕波告捷后，附近的藏军相继投诚。5月3日，攻乡左路川军收复大桥，8日进占色母，逼近稻城。

稻城附近群山环绕，中为平坦坝地，筑有碉房数十座，坚卡十余处。藏军分占东西两侧高山及坝内碉房。刘成勋命预备营营长张英率步兵一个营、炮兵一个连为第一队，进攻右侧高山，命三营营长张建勋率步兵一个营、炮兵一个连为第二队，进攻左侧高山；命参谋赖心辉率步兵一个营、机枪兵一个排为第三队，防守各隘口，相机应援。

5月10日晨6时，川军开始进攻。由于第一队需通过开阔的低洼地，张英派出敢死队冒敌炮火匍匐前进，接近山边，经四小时激战，夺取山顶坚卡四座，进至距藏军主阵地五六百米处。张英一面命炮兵向藏军主阵地射击，一面要求第三队派出机枪一挺抄袭藏军退路。炮兵连续发射炮弹四十余发，击毁碉房十余座，尔后转移火力向稻城城内集中射击。与此同时，张建勋所率之第二队与藏军步骑兵千余人接战，至上午10时，夺得坚卡六七座，并以一个连迂回藏军右翼，粉碎了藏军从左翼抄袭的企图。下午3时，一、二队分别向当面之藏军发起总攻。稻城及坝内之藏军动摇，纷纷逃窜。川军攻占稻城后，立即乘胜追击，于16日克桑堆。藏军向乡城退却。

四、会攻乡城

稻城战后，刘成勋于5月27日率部队主力绕道进攻中乡城，在簇东高地击退藏军的拦阻，进入八格村南的狭谷，遭到谷底和山顶藏军三千人的袭击。张建勋督率前卫营各队迅速夺占了谷底的一座坚卡作掩护。刘成勋见前卫营受阻，立即命赖心辉率兵向左面山顶迂回，连长李邦君、萧子英率兵向右面山顶攻击，张英督队策应。入夜，藏军败退。刘成勋乘机率队追击二十余里，始出谷口，并乘势攻取了八格村及上乡城各要隘。藏军焚毁桥梁，退守对河贡撒、俄杂及业洼等地，凭险顽抗。5月29日，刘成勋部因无造筏架桥器材，遂挑选士兵数百人，从上下游泅渡，分左右两翼实施强攻，并在对岸用火炮、机枪火力予以支援。部队渡江后，攻占贡撒、俄杂，河左部队则直逼业洼。业洼距定乡城二十余里，丛林茂密，坚卡重重。6月3日，刘成勋令张英趁夜暗浓雾，率队进抵业洼左侧高山及右侧河岸一带，占领了进攻出发阵地，于拂晓发起进攻。藏军依托碉房、坚卡顽强抵抗。张英见正面攻

击无效，便命步兵两个连从左侧高山密林中抄袭藏军后路，炮队从正面猛击碉房。藏军不支，退向桑披岭。

左路军经过连续作战，前方兵力已不足两营。刘成勋遂致电尹昌衡，请求派兵一营，接替后方防务。6月19日起，刘成勋集中所部兵力，经三昼夜激战，攻克藏军屯粮要地罗拉寺。23日，又攻占雨洼。藏军退至定乡城外之最后一道防线泥四顶。至此，川军左右两路军从冷龙湾、雨洼对乡城形成了钳形攻势。泥四顶两侧高山耸立，森林茂密。藏军以少数兵力配置于正面，主力隐蔽集结于左山，企图侧击从正面进攻之川军。张建勋侦知藏军部署后，命一部兵力从正面佯攻，主力从左侧迂回进攻。经一日激战，连夺坚卡十余座，迫使藏军退向定乡。川军紧追不舍，抢占通往定乡的大桥，为攻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6月25日黎明，孙绍骞所率之右路军在攻占冷龙湾、门坎山之后，即从右翼向定乡进攻，刘成勋所率之左路军从泥四顶协同进攻。经五小时激战，藏军动摇，向下乡城方向撤退。下午3时，孙、刘两路军攻占定乡。

不久，江西、江苏等省爆发了由孙中山等领导的讨袁战争，四川的熊克武亦举兵响应，刘成勋支队奉调返回成都。西藏少数亲英分子又乘机唆使和支持各地暴乱，川边形势再度吃紧。孙绍骞为了应付危局，一面令各营分扎各要地，以保粮道，一面对下乡城一带的藏军进行招抚。由于亲英分子的阻挠和破坏，招抚工作未见成效。10月31日，藏军数千人分三股围攻定乡。孙绍骞率部坚守二十余日，在得到运粮队的增援后，实施反击，才得以解围。

1914年初，川军先后收复了下乡城、丹巴及三十九族地区，从而稳定了川边局势。

第四节 英国分割西藏阴谋的破产

一、英国策划的“西姆拉会议”

英帝国主义为了分割我国的西藏，除派遣军队公开入侵西藏和指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暴乱外，还极力阻挠中国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发生联系。如 1912 年 10 月 28 日，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达赖的封号，并邀达赖赴京会谈；1913 年 4 月，北京政府又任命了新的驻藏办事长官。英国不仅阻止西藏地方当局与北京政府直接谈判，还不许驻藏办事长官假道印度入藏，同时，提出举行中英藏会议，并以北京政府如不派代表与会，英国将与西藏当局直接缔约相威胁。袁世凯在西征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下，不顾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对，竟接受了英国的无理要求，于 1913 年 10 月派代表参加了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会议。

“西姆拉会议”，是英国勾结西藏少数亲英分子企图分割中国西藏的一个大阴谋。会议期间，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抛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西姆拉条约》草案和“西藏地图”，公然把西藏、西康、青海全部地区和云南、四川、甘肃的藏族地区，统称为“西藏”，并将金沙江以西地区称为“外藏”，以东地区称为“内藏”；“外藏”完全“独立”，“内藏”则“中藏共管”。草案还规定：“西藏中央政府在‘内藏’仍保留其已有之权”；中国不得驻兵藏境；中国政府与西藏有争议时，由英印政府裁决；英人可以在西藏自由经商，中国不得加以限制；西藏内政暂由英印政府监督等等。充分暴露了英国妄想侵吞西藏的狂妄野心。这个条约草案一出笼，立即遭到中国人民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爱国人士的坚决反对，中国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北京政府也断然加以拒绝，立即召回代表。于是，英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外交手腕分裂西藏的阴谋遭到了破产。会议并未讨论中印边界问题，英国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代表夏扎·边觉多吉在会外秘密换文中提到的所谓划定中印东段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把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则是完全非法的，当时以及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夏扎·边觉多吉回藏后，亦被达赖削职。

二、英国加紧武装藏军，再次挑起川边冲突

“西姆拉会议”破裂后，英国遂大力帮助西藏地方政府扩建新式藏军，

《国务院电尹昌衡将士奋勇传令嘉奖肃清川边万勿越境深入（1912 年 9 月 24 日）》，《民元藏事电稿》第 71 页。

企图继续以武力制造西藏“独立”。1914年以后，英国协助西藏地方政府成立藏军总司令部，以亲英分子达桑占东为总司令，台吉车门巴为副司令，计划将原有三千人的常备军扩充到万人以上。英国还在江孜开办了一所军官学校，为藏军训练军事指挥人才；并选派一批西藏贵族子弟去英国、印度学习军事；又在札什城设立了一所机器厂，由印度技师帮助制造枪械弹药。

藏军经过扩充和训练，实力有所增强。于是，英国又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再次驱使藏军进犯川边地区。1914年9月间，西藏地方政府派噶伦喇嘛为西康总管，会同错郭娃代本率兵前往江达。10月，又派穹然木代本带领藏军三百人前往三十九族地区，准备再次挑起战端。由于当时的边军统领彭日升拥有装备比较精良的三个营，分别驻防昌都、类乌齐和三十九族地区，因而藏军未敢贸然进攻。1917年春，四川爆发了川、滇军阀之间的战争，战火波及川边。7月，边军统领彭日升派兵两营进攻打箭炉，被滇军华封歌团击败。不久，川边镇守使殷承 被迫离开打箭炉回滇，由陈遐龄接任。英国见有机可乘，立即接济藏军“五子枪五千支，子弹五百万（发）”，唆使藏军向川边发动进攻。边军一败涂地。

1918年1月，类乌齐被藏军攻陷，边军一营营长田文清败逃昌都。1月22日，彭日升令第三营营长张开胜、第十营营长曹树范分道夹攻驻欧月（昌都南八十里）之藏军，结果为藏军击败，分别退守昌都、乍丫。彭日升急忙向陈遐龄求援。时陈正参与川省军阀混战，且虑彭之势力扩展对其不利，以致见危不救。2月下旬，藏军进攻昌都，首先占据昌都后山。3月3日，彭日升派队分道进攻后山，又被藏军击败。4月3日，藏军攻陷鸡心山，15日又陷四川桥。彭日升等因昌都已无险可守，遂缴械投降。藏军攻占昌都后，分南北两路进攻。边军纷纷溃降，以致“德格、邓柯、石渠、白玉、贡县、武城、宁静七县相继俱陷”，整个川边为之震动。

是时，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先后派人递信给达赖，劝其休兵息战。由于西藏少数亲英分子的阻挠，陈的停战提议未获结果。藏军在攻占德格后，又直逼甘孜、瞻对。陈遐龄于7月令团长朱宪文率部抵御。川军与藏军在甘孜西南之绒坝岔激战二十余日，始进至雅砻江东岸，阻止了藏军的进攻。

三、川藏两军停战议和

川藏两军在甘孜前线形成对峙局面后，陈遐龄于1918年8月再次派人赴拉萨交涉。英国鉴于藏军进攻受阻，加上兵力不足，如川军增调主力反攻，已占地区仍有丧失的危险，遂令驻川边副领事台克满出面“调解”，由英川

《国务院电尹昌衡明正德格土司等出力应即拟奖呈请核办（1912年12月11日）》，《民元藏事电稿》第110页。

藏式房屋多用坚石砌成，形似碉堡，故称碉房。坚卡，是依据山险构筑的工事。

藏三方代表谈判议和。谈判虽未达成协议，但同意从 1918 年 10 月 17 日至 31 日，川军退守甘孜，藏军退守德格，停战一年。

随着我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藏族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西藏爱国人士增强了反帝信心，纷纷要求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取得直接联系。1919 年 10 月，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抵达拉萨，受到西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达赖亦向代表表示：“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班禅九世也派人向中央代表表达了拥护中央的心愿。

此后，达赖逐渐摆脱了亲英分子的羁绊，不断加强了与中央的联系，使英国妄图分割西藏的图谋终于彻底破产。

第五节 战争的经验教训

这次战争虽然发生在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但实际上是由英帝国主义一手挑起的，因而具有明显的反侵略性质。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一、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才能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英帝国主义长期以来觊觎我国西藏，要粉碎其侵略阴谋，必须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团结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大众，共御外侮。清政府在西藏所推行的“新政”，既有它积极的方面，也有不利于团结西藏上层人物和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的方面；此外，团结达赖十三世的工作也做得不够，以致给英帝国主义拉拢西藏上层人物，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暴乱，造成了可乘之隙。

为了增强防御力量，派部分川军入藏，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须向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大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同时，军队必须严守纪律，以取得西藏各阶层的支持和拥护。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宣传工作，加之入藏川军纪律败坏，不讲政策，不注意保护群众利益，结果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

二、国内政局不稳和屈膝媚外政策，助长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亲英分子的嚣张气焰

这次战争发生在国内政局动荡不定的年代。袁世凯篡权以后，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竟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屈从于英国的无理要求，命令川军停止进军西藏，从而助长了西藏少数亲英分子的嚣张气焰。他们一再操纵藏军向川边进攻，使川军处于被动地位。

正当英帝国主义唆使西藏亲英分子操纵藏军向川边进攻之际，四川、云南的政局也动荡不稳。自1913年至1917年，先后爆发了川军与川军、川军与滇军、川军与黔军之间的多次战争，这就影响了集中力量抗击藏军对川边的进犯。不仅如此，主要将领之间也勾心斗角，由尹昌衡亲自推荐的护理四川总督胡景翼，也挖他的墙角，使西征军在兵员补充和粮饷接济上，多次发生困难。此外，边军之间也有矛盾，作战行动往往不能协同一致。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平乱作战。

三、不注意从政治上争取藏军中的爱国力量，是这次战争的一大失策

这次战争是英帝国主义挑拨我国民族关系，蒙蔽部分藏军为其火中取栗而引起的。在藏军中，不少指挥官是受英国和少数亲英分子的挑唆和欺骗而走上战场的，多数士兵是被迫征调的贫苦牧民。藏军内部又互不统属，极不统一。不少爱国僧俗大众对英国侵略西藏深恶痛绝，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些，都是川军从政治上争取藏军中爱国力量的有利条件。但是，不论是清政府还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北京政府以及川督尹昌衡等，都未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不注意有的放矢地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促使藏军官兵觉醒，从而厌恶这种不利于祖国统一和自身利益的战争。川军虽然做了一些所谓“招抚”工作，但成效甚微。在进攻乡城的战斗中，左右两路军依靠军事上的威慑力量，曾迫使部分藏军投诚，但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工作，因而只是暂时地屈服，一旦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又重新被反动分子所利用。

四、搞好后勤支援，对在西藏高原作战 具有特殊意义

1912年川军被迫出藏，1918年藏军东犯时川军迅速溃败，除了政治原因外，在军事方面，后勤保障工作不得力是重要原因之一。川边与西藏同属康藏高原，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经济落后，部队的粮饷无法就地取给，主要依赖后方供应。由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忽视边防建设，对军械粮饷的储备和供应，事先没有统筹安排，而是在临战前仓促筹集，加之在进藏道路上建立的驿站，于战争爆发后大部遭到破坏，更增加了后勤供应的困难。因而缺粮断饷，弹药不济之事，屡屡发生，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进程。辛亥革命时，部分驻藏川军哗变，也与长期欠饷有关。进攻乡城及以后的战斗中，一些部队无法进行攻坚战，一些部队被迫中途停顿，一些部队作战失利，均与械弹、粮饷得不到及时供应有关。这些都说明，在西藏高原地区作战，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是争取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的环节。

